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人民记忆50年



## 前言

马利军

世纪末的人们对历史有着各种各样的纪念方式，各种各样的文艺手段也在帮助人们去温习和体验历史。《人民记忆 50 年》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式加入了世纪末的怀旧，读者会发现，书中的时空旅行是极其新鲜而且不平常的。作者所理解的“人民记忆”，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人社会集体记忆的编年史。正如读者将看到的，本书布满了画页、歌谱，本书的气息似乎也是追求趣味性的。但恰恰是这些因素，《人民记忆 50 年》才称得上是一部难得的充满了灵敏的感性的“人民信史”。作者们以饱满充沛的雕刻，生动清晰地勾勒出半世纪以来中国百姓社会风尚、饮食习俗和民谣俚语的变迁，作者坚定地认为：从来的历史都是人民求生存谋幸福的历史。

因此，本土的、现世的记载方式应该从这一观念出发，以求得新的生命。

作者们鄙视一切自虐的历史观，因为民族形态和民族现实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自有其深厚的岁月催生的原因。与其说我们每个人存活于现世，不如说我们就存活于历史当中。善于嘲笑古旧的事物的人，别忘记了这一点，当富人嘲笑穷人的时候，也就是你这个样子的。作者都是年轻人，他们没有这样的恶习——凭藉现世当今的优越性对着历史卖俏，这一点也是作者同国内某些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

描摹历史，通常的目的是为着告诉未来。但作者无心代圣贤者立言，作者只是发现了一个记忆上的秘密——不管批评家今后怎样把当初的历史颠来倒去，它最终照亮岁月以及人心的，还是当初的鲜活样子。本书作者之一宋强是一个丢三拉四的人，他号称耗了生命三分之一的时光找眼镜和其他。尽管如此，他还是乐此不疲，他宣称：记忆的永恒规律是——一开始隐约闪现的线索，一定是东西遗失的最确切的线索。发掘历史价值，也应照此规律去办。所以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对妖魔化的本土历史感到陌生，跟批评家们热衷于花里胡哨的“开拓”、“发掘”有关。我的意思不是说宋强等人就一定做得很好了，但民族观点、第四代人观点贯穿于本书，应该说是一个反虚无化反妖魔化的有益尝试。中国人的痛苦和欢乐构成的 50 年记忆，应该值得尊敬，这是最好的寻找，也是本书的灵魂。

《人民记忆 50 年》共分 7 卷：《有声的中国》（1946 - 1949）、《乘风的岁月》（1950 - 1959）、《平凡的生活》（1960 - 1964）、《赤地》（1965 - 1970）、《人世间》（1971 - 1976）、《飘逝的红头巾》（1977 - 1989）、《90 年代》（1990 年以来），这种编排，是按照生活形态的相对完整性而确定结构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理解。好在这本记忆编年史偏好的是新趣的追求，所以，大可不必苛求什么。50 年以来的声色光影，终于可以在世纪末洋洋洒洒地写出，而且出版在一个实在不坏的年份里，这是我心中最大的庆幸。

欢迎阅读。

## 1946年：有声的中国

“我所以拿生命来拼的那件东西，是旧的时代，旧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我怕现在已经就完了。...我虽然不晓得将来会带什么来，

总之，它决不能同过去一样的美丽，一样的使人满意。”

——小说《飘》·卫希礼致韩媚蓝的信

这个古老的民族，经过八年抗战的刺激，已经新生了。1945年的兴奋已经过去，大动乱之后的人们，自然会对未来诞生出许多新的憧憬。去年抗战胜利的那些日日夜夜，人们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朦胧的憧憬走上重庆市的山岗的。在浮图关，在枇杷山，他们凝望着隐隐发光的两江之水，浪漫地招着手，向这座风云际会的陪都告别。

他们也许认为：新的现实选择就是与山下这座潮湿、闷热、散发着生物碱气味的城市诀别。今后不管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总之他们会告别这样一种生活：先前因民族利益而自愿选择的不自由。总之他们会最终走上一条自由之路。然而我们相信，这种自由之路的幻想在1946年的新年一定会开始破灭。

新年，物价两次飞涨，以原汪精卫政权辖区为甚。据接收人员的回忆，最初从国统区乘飞机抵达光复后的南京时，身上携带的在重庆只够买一点大饼油条的钞票，可以在夫子庙最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法币与伪币1:100的比例使得日伪占区的币制系统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国家救星们铁一般的意志不仅席卷了许多的“逆产”，而且良民们的财产也跟着遭殃。《围城》里笑曰：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然而国军的光复确实使许多房产变成了空中楼阁，许多产业真的成为乌托邦。

这是忧愁吞噬着希望的一年。本年，随着中央重新在广大沦陷区行使权威，“和平建国”蔽荫下的昔日权贵们夜夜笙歌的物质基础和社交基础不复存在了，虽然南京的孩子们见到黑色小卧车，还是照着旧习惯追上前去拍着车喊“陈主席”讨赏钱，但南京伪政权的陈主席公博早已下了大狱；虽然李香兰和张爱玲还摆出一副悠闲的样子在洋房草坪前合影，然而社会名流早已不是他们，而且，此时困扰他们的是逃生的主意。1946年的钟声敲响之后，更多的人奔突着，为生存而战斗。北平“居大不易”，浙江发生“米潮”。《八千里路云和月》结尾的字幕向观众索问：当那些为抗战而颠沛流离的中华儿女们陷入悲惨的绝境时，谁来关心他们？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末尾，张忠良的母亲在滔滔江畔的呐喊，尽管过去了半个世纪，仍然揪痛着人心：“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光复”后的日子里，深刻的愁苦与愤懑弥漫于民众之中，影院里人山人海，连续20周为《一江春水向东流》洒泪。《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两集，前集为《八年离乱》，后集为《天亮前后》，这一部描写时代动态和悲苦人生的影片，可称得上中国电影史的“哀江南赋”，刻画“悲”的意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为着释缓都市民众的这种压抑和不平，本年度，美国影片《出水芙蓉》在各地上映。《出水芙蓉》一度被视为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标志，

在建国以后屡屡遭受抨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部曾在西方大萧条年代慰藉过千百万美国劳工的歌舞喜剧片，再次温暖了离乱时代以后时中国人的心灵。俊美的女人，明媚的青春，豪华的布景，给晦暗的现实抹上了一点亮色。

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一时期最流行的小说，是傅东华翻译的美国米歇尔女士（M.Mitchell）所写的《飘》（Gone with the Wind），这部小说翻译于上海，印行于上海，在抗战前后流行于学生和职员阶层。南北战争的人性挽歌，在离乱世事后中国人伤感的心灵中得到热烈的回应，这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可以从这部小说中，体味到大动乱时代对中国人的意义。

小说的主人翁卫希礼写信给妻子韩媚蓝说：“……我所以拿生命来拼的那件东西，是旧的时代，旧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生活方式，我怕现在已经就完了，无论这骰子掷出什么来，怕都已无可挽回了。将来我们胜也罢，败也罢，这是同样都要丧失了；我倒不是怕危险，怕俘虏、怕受伤或甚至死，如果死是一定要来的话；我怕的是这场战争一经完结之后，我们就永远不能回到旧时代去了。我呢，却是属于旧时代的人，我并不属于这个疯狂的杀人的现代，恐怕也不能适合于将来，无论我怎样尝试去适合。同样，你，亲爱的，也一定不能适合，因为你和我是同个血统的。

我虽然不晓得将来会带什么来，总之，它决不能同过去一样的美丽，一样的使人满意。”战争使人们失去了固有的家园（虽然那家园不会像《飘》中粉饰的那样妙）。

虽然蒋委员长今年“还都”，但更多的中国人会面对着颓败的家园吟唱《十五从军征》。如果说1945年的狂欢是战士和理想主义者最后的盛宴，那么，今年就是他们带着劳顿的表情洗刷杯盘的时候。《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导演史东山也说：“短短几个月胜利以来的现象，却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伤痛。”这彷徨在胜利岁月里的不幸的一群，终于发现理想的美丽已经逝去，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危机。人性的卑劣、政局的腐败，心灵的沦丧……，警报解除了，更多的危险却来临了，何去何从？这不仅是自由民主主义者的疑问，也是全中华民族的疑问。很明显；内战的全面爆发阻止了疑问的延续，因为中国命运之决战将解决弥漫在人群中的深刻的疑问。

从1946年开始的社会历史，还存活在许多健在人士的脑海里。自本年开始的“中国命运之决战”以来，在许多年的时间内，各种各样的“命运决战”就没有停息过。

这样一种历史形态，注定了形形色色的伤感诗人、趣味主义者不会受到时代的欢呼，这一点，可以从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寂寞中看到。这也可以解释90年代的中国人在倦怠于这样一种历史形态后，热烈欢迎40年代的伤感和趣味的原因。但是，要展现40年代的记忆焦点，就不能够回避陇海线的战火，国统区的沉沦，孔祥熙的激进货币主义，饥饿与反战，……也不能够否认，这一系列风景，构成了40年代“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并且是主宰未来进程的最主要动因。

不少人会指责建国后的许多影片所反映的国统区街景是公式化的：大街上的乳品广告、满面愁容的摊贩、留声机里放着《香格里拉》、横冲直撞的美式吉普车，……等等。但在本年又确实发生了萧条和辱权，发生了“沈崇事件”。据有关社会机构统计，从去年8月至今年11月，美军在上海、青岛、南京、北平和天津等地蹂躏中国民众的暴行达3800起；又据11月的《大公报》统计，从1945年8月到今年7月，被美军汽车撞死的中国

民众就有 1000 多人；被美军强奸的妇女有 300 多人。

3 月 26 日深夜，在上海百老汇路，女青年唐巧珍与她的伙伴正在街上行走，美军卡车呼啸而至，车上跳下几名美军，将唐巧珍劫持上车，因急于夺路逃跑，沿途撞坏人力三轮车多辆。被劫持的唐巧珍不甘受辱，跳出卡车，摔死在熙华德路桥边，肇事凶手驾车逃窜而去。8 月 26 日，《文汇报》刊登读者蒋汉民目睹美军侮辱中国妇女的事实。蒋汉民说：“昨夜我同一个友人在南京西路散步，当行至国际饭店东面，见有三个美国水兵癫狂地向东走，大约是喝醉了酒，跌跌冲冲，委实好笑，所以我的视线老是注意着他们。……东面来了一个年约 25 岁左右的女郎，手中提着东西，甫经行近美军身旁之时，其中一个美兵突不顾羞耻地向该女子胸前乱摸。那时候我看到这女子可真尴尬极了，她用尽全身之力挣扎，总算挣离了魔掌。而看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却很得意地发出了疯狂的笑声！”

美军的风纪败坏和嚣张气焰，终于在年底圣诞节那一天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沈崇事件”。

12 月 25 日，北平亚光通讯社率先发表了“某大学某女生”被美军强奸的消息：“本市讯：某大学某女生，年十九岁。昨晚九时，赴平安戏剧院看最后一场《民族至上》影片，散场时，忽见身后有美兵二人尾随，迳行至东单操场，即对该女施以非礼。该女一人难敌四手，大呼救命，适有某行路人闻之。急至内七分区一段报告，由警士闻德俊电知中美警察宪兵联络处，派员赴肇事地点查看，美军已逃去其一，当即将另一美兵带走，某女生被奸后，送警察医院检验后，转送警局处理。”

26 日，北平市治安当局指示各报，关于亚光社昨日所发新闻稿……缓予发表，并谓此事已由当局与美方交涉。北平行辕发表谈话“惟望市民幸勿感情用事”。胡适也认为：“此事纯系一法律问题……罢课游行……似属不智。”

当得知被奸女性是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后，北大学生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2 月 31 日，全北京所有大学学生上街游行，由清华大学领头，高举旗帜，拥向美军军事调停处，北大学生仿照北伐军歌《打倒列强》的曲调，编了一首新歌在东单广场教唱，2 万多北平市民为之感奋，一起合唱——

退出中国，退出中国。

美国兵，美国兵！

赶快退出中国，

赶快退出中国，

滚出去，滚出去！

12 月 27 日以来，北平、天津、上海各学生团体，妇女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声援沈崇，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妇联《告全国姐妹书》说：“首先我们对于沈女士致无限同情与慰问，她十二日方自上海来，是一个朴实勤勉的好学生。那晚为了排遣思家情绪，才独自去看电影，不料在去影院途中，便遇到了美国恶魔！不论医院方面检查说暴行遂与未遂，我们盼望沈女士不要太封建，为了自己与全民族的冤屈，应该挺身而出，勇敢地向社会控诉，我们一定作她的后盾。”上海文化名人与北大清华教授纷纷发表评论，严厉谴责美国暴行。马寅初说：“这是美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证明、这是对中国的一大侮辱（美方后来果真侮辱了中国人一次：无独有偶，次年在日本发生了同

样的美军强奸案，两案几乎同时判决，在日本的美军强奸犯被判处死刑；驳回上诉；而沈崇一案的主凶皮尔逊则被提前释放回国，这是后话。——作者）……听说那位被奸的女生，是某前任交通次长的女儿！出自名门，尚且被辱，美军蹂躏其他妇女，更不用说。……田汉说：“中国人看上去有些麻木。但这一‘麻木’是暴风雨前的沉默，而不是真正的愚钝可欺。我们现在酝酿着……无比的愤怒，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日益生长的力量是不可压抑的。”本年度最后一天，北大 48 位教授联名致书司徒雷登大使，要求严惩罪犯，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同日，清华抗暴会致信在华美军官兵：

亲爱的美国官兵：我们中国人很赞许你们，为了你们过去的协助合作。

没有你们的协助，我们也许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但对于他们矛盾的

对华政策，我们不能同意，而且恨你们。因为这个政策只有使我们陷入内战之

深渊。现在中国人的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因此我们希望你们回

家去，留下这个问题给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这样我们永远感激你们。

抗战八年，中国人已善于将民族的伤痛化为震天的怒吼。沈崇事件引发的全中国的抗议风潮，也正在推倒着一切堕落的哲学，推倒着一切感伤和彷徨。这个事态同席卷中国大地的另一场革命相呼应，构成了中国人新的理想和新的趋势。“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三闲集·无声的中国》）——“五·四”文化革命在本世纪演化成的最重要结果，在以后的岁月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1946 年岁末的风暴惊醒了“四大强国”的迷梦，而四万万人民觉醒的代价竟然是一个女子纯真的欢颜。

#### 年度记事

##### 全面内战爆发

6 月 26 日，国民党以 30 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队，全面内战爆发。6 月中旬，国民党制定了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投入 193 个旅、158 万兵力，分别进攻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陕甘宁、东北等解放区。国民党试图在 48 小时之内消灭中原中共部队，2 个星期占领苏北，3 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3 到 6 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攻占东北全境。蒋介石在内战部署基本就绪后，撕毁了停战协定，密令刘峙率先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部队奉命突围，并歼灭敌军 5 万余人。

##### 国民政府还都

5 月 1 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 5 月 5 日“凯旋南京”。5 月 5 日，南京城里处处张灯结彩，旌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上午 10 点 30 分，长江路国民大会堂举行首都各界庆祝国民政府还都典礼。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制服，佩带 5 枚勋章，精神焕发地与身穿黑底紫花绸质旗袍的宋美龄走上国民大会堂主席台，向与会者颌首致意。蒋介石发表训词说：“……八年抗战，赖我全国同胞始终一致拥护抗战国策，服从中央命令，百折不回，浴血牺牲，卒能取得今日最后胜利，而且取消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涤除了我们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国耻……”在陈述了民族苦难，呼吁国民自强之后，蒋强调要为“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而“继续努力奋勉”。

人们似乎听到了某种不安的信号。

#### “李、闻血案”

7月11日和15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抗战结束后，李、闻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

7月11日晚，李公朴偕夫人外出，归途中，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用无声手枪向李射击，次日凌晨，李公朴不治身亡。7月15日，闻一多赴云南大学至公堂参加追悼会，会场里有几名特务有说有笑，人们对此敢怒不敢言。闻一多拍案而起，公开揭露国民党血腥暴政，并表示视死如归的决心，全场为之感奋。特务分子于当晚用冲锋枪将诗人闻一多射杀。此案引起全国震惊。

#### 惩办汉奸

根据今年3月修正公布的《惩治汉奸条例》，江苏省高等法院分别对怙恶不悛的大汉奸进行审判。今年被依法处决的大汉奸有：汪伪政府“主席”陈公博、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内政部长”兼浙江伪“省长”梅思平、汪伪宣传大员、伪“安徽省长”林柏生等，臭名昭著的铁杆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创始人殷汝耕也于今年被处死。

#### “第三条道路”

9月1日，《观察周刊》在上海创刊，储安平出任主编。《观察》周刊宣称该刊“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背后别无组织”，无党无派，是个只发表政论而不从事政治活动的独立刊物。该刊物经常刊载一些不满国民党统治的言论通讯，要求“自由”、“民主”，但也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观察》周刊同情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又认为青年学生“偏狭冲动”。时人谓之为“第三条道路”。

#### 竞选“上海小姐”

8月开始的选举“上海小姐”活动是由杜月笙一手操纵的。许多名门淑女、交际花、军阀巨贾的情人姘妇等，为了取得这一桂冠，纷纷前往报名。这次“选美”，实际上是钱的竞赛。谁拉的钱多，谁就获得优胜。23岁的浙江女子王韵梅（四川军阀范绍增的“女朋友”）在杜月笙全力支持下，以4000万元以上的选票获得“上海小姐”的冠军。这次“选美”募捐共获4亿元，绝大多数为杜月笙中饱，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汪宝宣也获得2000万，至于灾民能得到多少，并没有人去关心。

#### 抛售黄金

3月4日，行政院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并抛售黄金。抗战胜利后，物价虽一度有所回落，但不久即再次趋升，大量硬通货充斥市场，存银行无利可得，投资工商业更不保险，只有在市场上投机倒把，这更使抢购风日甚一日。行政院长宋子文认为黑市黄金、外汇买卖刺激了物价上涨，遂开放金、汇市场，以图平抑物价、稳定经济。

从即日起，库存黄金向上海市场抛售。3月份黄金价每条（10两）156万元，金价相对平稳，物价处于可控之中。

#### 滥发纸币

6月8日，国民政府财长俞鸿钧在立法院报告中称：本年1月至5月，支出为15000亿元，而收入仅2500亿元，其它12500亿元的亏空则完全靠印发纸币。

9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宣布，按现有票面价值偿还战前公债，银行、

钱庄多家倒闭。

#### 摊贩抗暴

今年 8 月，上海政府以“妨碍市容”为由，禁止摆摊营业，并逮捕了不听禁令的六七百名摊贩。11 月 30 日，上海摊贩 300 多人在黄埔警察局门前抗议“取缔令”，要求释放被捕摊贩。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打死 7 人，打伤被捕者多人。12 月 1 日，又打死抗议者 10 人，打伤 100 多人，激起摊贩更大的反抗，5000 多人参加抗议。上海全市罢工、罢市，声援摊贩斗争。12 月，当局被迫下令取消“取缔令”。

#### 中国海军接收西沙、南沙群岛

10 月 29 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海军“进驻西、南沙群岛舰队”在司令官林遵上校率领下奉国民政府命令，从吴淞口出发，收复被日军强占的中国领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舰队共由 4 舰组成，分别是猎潜舰“永兴”号、护卫舰“太平”号、坦克登陆舰“中建”和“中业”号。

## [附文]

### 葬 歌

闻一多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莺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剥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  
手撑一伞松荫庇护你睡。  
也许你听这蚯蚓翻泥，  
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  
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  
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

（选自《死水》）

1947 年：在路上



假若鸟儿实有知，  
懂得了人间的兴亡。  
她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

——周璇《五月的风》

在“沈崇事件”的风潮之中，人们度过了一个颇不平静的新年，所有的人似乎都想渲泄点什么，连美军也不例外。元旦这天，天津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等十几所院校学生上街游行，行至中正路时，忽然跑来了二十几位美国士兵，用中国话向游行学生喊着：“顶好，顶好。”一名黑人士兵还掉过身来要求学生们把标语贴到他的背上，这时，美国宪兵的汽车出现了，这些闹“反战”的美国士兵才一哄而散。

示威队伍经过河东区的美军兵营时，十多名美国军人各持照相机为学生们拍照留念，然后对着中国学生大喊：“我们想回国，我们想回家。”一名美军神色暗淡地喃喃自语：“回国，回国找个工作。”当学生们往美军总部门口张贴标语时，美方指示哨兵立即回避，以免发生争端。美军还派出宪兵在学生经过的路线上维持秩序，当学生们向吉普车上的宪兵大喊“回家去吧”时，那位军官苦笑着说：“我们想回去，我们也愿意回家啊。”

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寻找新的家园的年代。

在国统区的众生那里，自由主义的热情越高涨，被窒息的感受便越深。1947年起普遍弥漫的愁苦和失望的情绪，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饱含忧患的呼吁所不能拯救的。司徒雷登呼吁中国人在苏维埃革命和三民主义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然而，北方的炮声迫近了死水般的世界，在这种情势之下，自由主义者只能在杂志画页里吟唱挽歌，张爱玲已经早早地道出了时代落伍者的悲哀，这是布尔乔亚的《葬花词》，是失家园者的一曲挽歌：“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暗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顾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地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远离战区的城市依然主导着时尚，虽然北方传来有关“盗匪”的消息，但人们更多的是听到国军将士横扫山东，力克四平和光复陕甘宁的“喜讯”。当然，无线电广播深受欢迎的节目是张恨水的小说连播和商业新闻，前者使人在幽默与风情万状的调子里忘却某种痛苦，后者则在变幻莫测的感觉里给人们增添些喜忧。人们不知道应该渴望什么，理想的末日来临，物欲早已滥筋。本年度流行冰淇淋和爵士乐，骆驼牌和三五牌香烟挤占着哈德门的市场。

豪华与赤贫强烈对比的讽喻剧天天上演，权贵家里的周末聚宴，照样有从加尔各达空运来的龙虾；水门汀里的垃圾箱旁，孩子们抢夺丢弃的肉骨头。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运动是生活中的重要信息，但灰色的城市里喘息着的人们盘算着的仍然是兑换黄金、储存盘尼西林针剂（40年代的硬通货）这一类事情。时刻发生着逮捕和失踪，然而娱乐生活照常进行。萧条时代的人们需要麻醉，麻醉的花样日新月异。《茶馆》里有这么一幕：张铁嘴走进王掌柜的茶馆，解释说：“我如今不吸鸦片了。”王掌柜的不禁肃然起敬，“那你可真要发财了！”张铁嘴一乐：“我改吸白面了……”——这大概也算是40年代的一个“进步”吧。

有人回忆说，自 1944 年李香兰举行了“夜来香”音乐会后，上海的音乐界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热闹的事情了，娱乐场所的许多新歌是窜改过歌词的美国歌曲，如《小癞麻》和《牧童唱晚》，但这种歌曲似乎难以主导新潮，美国人也发现，只有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些军歌才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因此，主流音乐还是本土老歌，战前的以及孤岛时期的作品重新被翻唱，风行于民众之中。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有《花好月圆》、《蔷薇处处开》、《五月的风》等等，而我们不太熟悉的则是《午夜快车》、《桃花江》一类。《桃花江》唱道：  
我听见别人说（白：说什么呢？）：  
桃花江是美人窝，  
桃花千万朵，也比不上美人多。

……

《桃花江》被后来的音乐工作者讨伐为“亡国之音”，它的作者因此深以为是他平生的憾恨。直到解放以后，有一次作者的儿子练习钢琴时，即兴弹了一曲《桃花江》的旋律，做父亲的跌跌撞撞地冲进来，阻止了这场演奏，并用苍老的声音述说着他的忏悔。……然而，在这个年代，《桃花江》的再次风行，是否暗示着人心的不可收拾，以及即将发生的某种剧变？中华民国的“神圣法统”在风雨飘零中摇摇欲坠。《桃花江》的人间幻境就像这个时代糜烂的生活方式一样，任雨打风吹去。

在悲惨和颓丧的气息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儿流浪记”在上海诞生了，唤醒着人们的爱心和希望。它是一个寻找家园的故事，是对社会不平等的控诉录。这就是本年度起连载于上海报纸上的《三毛流浪记》。它的灵感也起源于 1947 年初，头一天夜里还在用废报升火取暖的流浪儿冻死弄堂口的情景触发了画家的创作冲动。

漫画家张乐平无疑也是“沈崇事件”的积极声援者之一，他经常去的地方是上海的“安乐宫”舞厅，画家去那里决不是为着跳舞的。在那里，他曾亲眼目睹了美国水兵打死三轮车工人的场面，死去的三轮车工人名叫臧大咬子，在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里，臧大咬子成为一名收留了三毛，后又悲惨死去的善良的家长。不过，张乐平更多的是把他的忧患寄托在城市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流浪儿。流浪儿是典型的都市边缘人，很少有人会觉得他们可爱。他们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幽灵般穿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手里总是提溜着一个洋铁盒子，五官因为过于肮脏而显得模糊——没有人会从流浪儿的五官上联想到三毛，那个生机勃勃充满灵气的形象，三毛是流浪儿童中的王子，是污秽的尘埃里生出的花朵，甚至他溢动着饱满的灵性的线描造型，也成为本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标志，甚至成为了商业财富的标志（这是 90 年代的后话，不表）。

张乐平几乎每天都能观察到流浪儿们的生活，他们用洋铁盒向路人讨钱，追赶着太太老爷们为他们摇扇，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擦皮鞋，推车子，时不时还因偷窃而遭人痛打，被警察捉拿。在城市，每年的“四·四”儿童节都是市民的兴奋点，人们拥上街头，观看盛大的童子军游行。中华民国童子军总司令何应钦用浓重的贵州口音在无线电广播中呼吁：“我们要爱护儿童……”这个时候，画家却从围观人群背后看到了另一个儿童不被爱护、儿童被遗弃、被残害、被驱逐的悲惨世界，即“三毛”们的世界。

三毛每周在报纸副刊版页上演出他的遭遇，孩子们为他的经历时而忧愁，时而伤心，时而欢喜。本年在上海，三毛的命运成为儿童生活的大事，

许多人给“三毛”寄来绒衣，鞋袜，张乐平喜欢讲这么一件事：“一户人家有七个孩子，他们就叫大毛、二毛、三毛……小弟弟叫做七毛。他们的生活比《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要好一点，因为他们的爸爸总算还有个工作，但也是苦得很。他们看到《人非草木》、《还有好人》那几段，非常难过。大毛、二毛呆了半天不肯去吃稀饭，三毛、四毛本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脱下来，送给画里的三毛，五毛看见画里的三毛因为打碎了瓶子挨了打，马上去找了一个瓶子来，要代他赔店里的老板。……这样的事情多着哩。”这是萧条岁月的温馨记忆，三毛——一个画中人，通过张乐平灵动、流畅的笔触，凸现出这个时代的一个活灵魂。与其说这个游走于都市的话灵魂是时代的感受器，还不如说三毛本身是一首辛辣的童谣——就像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之际令朝廷人士心惊肉跳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两年后的同名电影出现了三毛迎接解放的情景，王龙基饰演的那个翘鼻头三毛欣喜若狂地挥摆着手臂，加入了欢迎解放大军的秧歌队伍，再不会有童子军歧视他，再也不会会有美国兵踢他，再也不会会有警察捉拿他，解放区的曙色映在他可爱的脸上，是的，三毛的使命在1949年已经完成，他用欢天喜地的舞姿揭开了1947年城市童谣的谜底，三毛的故事兆示了一场真正的人间兴亡，这并非是张乐平作画时的人道主义初衷能够涵括的。然而曙光没有到来之前，在黑暗的航程中，人们在彷徨：何处才是光明世界？

本年度出版的《围城》写道：“（希望）像湿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似乎一切都会有办法。不知不觉中黑地昏天合拢，裹紧，像灭尽灯火的夜。……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在黄梅时节雨连绵的江南，远离战区各个地方，人们已经不晓得究竟在盼望着什么。《日出》的结束语说：“太阳升起了，可是我们却要睡觉了。”这是40年代的哀愁。在1947年，布尔乔亚主义幻灭的年代，人们为日月消长而啼笑，而感怀。《三毛流浪记》里，那个善于冥思的孩子在路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光明世界》，但后来他却把这本书撕碎了，因为发生在街道上的打劫和凶杀打断了他的梦境，他逃回店里，顶上门闩，惊魂难定。连孩子都真切地觉得没有光明，这是中华民国“神圣法统”必然覆亡的强烈征兆。

对旧制度的唱诗者来讲，1947年发生着的种种不良现象是亡国讯号。然而对已经太厌倦了旧世道、旧秩序的人们来说，这四周的嗟伤和沦丧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不必再从胡也频《到莫斯科去》汲取革命的力量和激情，他们在暗夜之中传颂着来自解放区的讯息，这是城市里最新颖的、最秘密的风俗，为青年所喜爱，在人们的心中，中国的光明时代已经不远了。

年度记事

### 战局转变

从去年7月开始到今年2月，经过8个多月大小160多次的作战，解放军平均每月歼灭国民党军8个旅，共歼敌71万人，蒋军虽占105座城市，但其有生力量大量被歼，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至此，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而改为局部的重点进攻，集中兵力对陕北、山东解放区发动攻势。

2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十一月以来的战局》的社论，指出“去年十一月是蒋军攻势开始衰颓的月份，是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主动的月份。”社论认为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集中兵力主要战场，以恢复其攻势”的挽救危机的办法，只能导致“蒋军的阵地由面而变为线，由线而变为点，

蒋军的主动权由全部而变为局部，再由多数局部变为少数局部，再由少数局部而变为没有主动权。”社论最后指出：“战局的决定因素不是别的，仍是有生力量的消长，在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歼灭蒋军的情况之下，战局的进一步变化是必然不远的了。”

### 挺进大别山

6月30日，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挺进大别山。是夜，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3个纵队共13个旅12万余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进入鲁西南。

7月29日，鲁西南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6万人，此役为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开端，8月27日，刘邓大军全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区，完成了千里跃进计划。

### 物价飞涨

1月23日，中央银行一天内抛售黄金15万两，各地物价迅速上涨二至三倍，“黄金风潮”刺激物价的事例暴露了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军政开支费用急剧增大，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46年财政赤字为43000余亿元，巨额赤字主要靠印发钞票弥补，财政部在上海的5家工厂日夜制造钞票仍不够用，还要到英美等国造币厂去印，法币发行额1945年底为10320亿元，1946年底为37000亿元，通货急剧膨胀，使国统区的物价狂涨，以抗战前夜物价为标准，至今年1月涨幅已为5万倍。1937年100法币能买一头牛，到今年1月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出现用大捆大捆的钞票购买一副大饼油条的奇观。

袁水拍诗云：“走到茅房去拉屎，忽然忘了带手纸，摸出一卷金元券，充作手纸正合适。”

### “二·二八”起义

2月27日傍晚，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官员查缉私案，没收中年寡妇林江迈贩卖的私芋及身上的钱物，林妇告以生活困难，苦苦哀求，查缉员竟用枪管敲破其头部，致使林妇出血晕倒，围观群众群情激愤，纷纷起来主持正义，查缉员开枪打死一旁观者。事态遂愈演愈烈。28日上午，民众集结于行政长官公署前示威游行，要求改革政治，不料公署屋顶上的宪兵用机枪向群众扫射，死伤数十人。台北全市骚动，民众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宣布戒严。

由于省主席陈仪昏庸暴虐，3月，事态酿成全岛性的人民起义，3月8日，国民党军在基隆和高雄登陆，开始了长达一周的血腥屠杀，台湾进步知识分子阶层几乎全部被屠，许多起义民众被装入麻袋投入大海，死难民众达1万人之多。

### 抢米风潮席卷全国

5月2日，杭州数万贫民抢夺、捣毁300多家米店，抢米风潮很快便席卷全国。

这期间，抢米风潮遍及浙江、江苏、安徽、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山东、江西、绥远等省的40多个大小城镇，其中包括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全国第一大商埠上海，华北军政中心北平，著名米市无锡和芜湖。

### 刘巧儿佳话

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陕甘宁边区妇女封芝琴婚姻纠纷案。本案已于3月里由边区艺术家编为说书词《刘巧儿团圆》和剧本《刘

巧儿告状》，被人们称为“刘巧儿案”。封芝琴系陕甘宁边区华池县人，自幼与张柏结亲，1943年2月，芝琴与张柏表示同意结婚，但同年3月，封父又以法币8000元将芝琴许配他人。

张家得知此事后，于3月13日夜将芝琴抢走结亲，封父遂向华池县政府告状，县司法处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之父张金才有期徒刑6个月，并宣布芝琴与张柏的婚姻无效，经芝琴的抗争和人民政府调查，此案作出公正判决，封芝琴、张柏婚姻宣布有效，有情人终成眷属，聚众抢亲的张金才依法服刑；封芝琴之父买卖婚姻，被课以劳役，对此，事主表示服判，群众也热烈拥护。

#### 越剧名伶筱丹桂自杀

继12年前阮玲玉自杀后，一代名伶筱丹桂写下“做人难，难做人，死了”几个字后，喝下一瓶“来沙尔”药含恨自尽。上海各界人士纷纷集会，哀悼这位越剧红伶。40年代初，筱丹桂为戏霸张春帆所霸占，今年10月8日，因同她的导演冷山去大华电影院观摩新片，回家后即遭张春帆毒打，为了不让人耻笑，筱丹桂隐忍不言，不料张春帆又将冷山骗至家中，逼其跪地发誓。以后又一连几天用最下流的词汇，对筱丹桂冷嘲热讽，逢人便说筱丹桂与冷山的“奸情”，终于，筱丹桂有一天对好友说：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并最终走上了绝路。

#### 黄河水归故道

3月15日凌晨，花园口大坝合龙，河水归故道。去年10月，花园口堵口工程复工，12月，引河挖成，开始抛石，黄河水部分回流，中共提出抗议，要求合龙入水延期，国民党方面不予理睬，今年1月间，国共双方多次会谈，未达成任何协议。

花园口堵口工程因水流突增，1月15日又告失败，2月7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和联合国“救总”方面达成协议，解放区复堤工程立即开工，堵口照常进行，合龙日期待定，此后，堵口工程加速进行，15日合龙完成。

## 1948年：渔阳鼙鼓

数九寒天下大雪，  
身上虽冷心里热，  
我从前线刚回来，  
胜利的消息要传开！

——歌剧《刘胡兰》

60年代有一部名叫《槐树庄》的彩色电影，里头有一个老地主，死后被人翻出一本“变天帐”，内载：“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初三，贫农团成群结队闯进我家……”——“变天帐”这一社会政治名词，曾经是中国人之间刻骨阶级仇恨的生动反映，中国乡绅阶级的仇恨与贫农阶级的仇恨一样的朴素，在谁做土地的主人这样一个问题上，很难容得一点点的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国30年土地革命史的必然规律。这种历朝以来最深刻的土地革命，在界桩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的经济变革形式背后，蕴藏着暴力和鲜血。在北方，在解放区，丰饶或贫瘠的田垄之上，革命的风潮碾碎着一切恶制度的风景：镗

花窗棂、华屋红烛、妻妾成群、豪强武装压迫、鹰坟、黑牢和奴婢虐待。……

在 20 年代的一篇名为《北京的魅力》的散文中，作者这样赞颂中国的“固有文明”——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

古物罗列的屋子中……

乡绅地主的豪强统治，一直是中国阶级斗争中的邪恶象征，在长工和佃户的呻吟中，古色古香的乡村绅士文明建立起来了，寨堡，深邸，灯笼和酒香，在这富有“东方魅力”的美好生活图景下，隐藏着最广泛、最深重的人间压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建立在残酷的土地掠夺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豪绅生活方式竟然在 90 年代再次受到喝采，四川大邑等县出现的“刘文彩”商标风波就是例证，在消隐了阶级仇恨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津津乐道于中国乡绅地主阶级的享乐主义，表面上似乎仅仅是一种趣味性的时尚，这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北京市在 1996 年便禁止了另一种酒类商标——一种暗示着“妾文化”的白酒商标，有识之士则指出了这种趋向在无视历史本质、扭曲人民记忆方面的危险性。正如我们看到的，玩世不恭地对待历史的新奇做法得到了纠正。刘文彩是著名军阀刘文辉的哥哥，刘文辉统治川康地区多年，拥有大邑县周围 7 个县的土地，可以说是“鸦雀飞不过”的广大地产，是中国第一号大地主。他以地养兵，以兵卫产，这 7 个县的农民几乎全部成为他的农奴，也成为刘文辉军队士卒的后备队。刘的田产由他的哥哥，有“老太爷”之称的刘文彩掌管。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刘文辉和平起义，对人民有功，本着“君子隐其恶”的精神，在很长的岁月里，有关大邑田产和“收租院”真正的业主刘文辉反而很少有人知晓，其兄刘文彩则代替他成为中国人记忆中地主压迫的标志，刘文彩的食谱——人乳炖人参，他的庄园——雕梁画檐的“欢喜楼”，他的反人权——暗无天日的水牢，在很长的岁月里为中国人所熟知。

刘文彩和形形色色的豪强地主一样，势必在 40 年代末期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在 1949 年的逃亡中，他受到农民武装狙击，背上挨了一枪，被迫携带着他的妻妾家丁和金银财富返回他的庄园，在惊恐之中死去，比起某些长期鱼肉乡里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下场算是善终。

1948 年，解放区的土改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 月 11 日毛泽东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中批评道：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2 月 15 日，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说：“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必须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

本年出版的《晋察冀画报》上，一幅翻身农民清算地主的照片很能说明当年的气氛：肥头大耳的地主抄着袖子，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而那位衣衫褴褛的老农则从人群里站出来，气愤地质问着地主，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典型象征，昔日乡村最体面的阶级，穿着墩实的棉袍接受穷汉的审判（从照片的情形看，是一种道德和经济范畴的审判）。尽管地主的衣着依旧体面，但我们可以断定，他赖以维持他的乡村寄生阶级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和道义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中国农村阶级生活的最大变化开始了。

土改中审判负有血债的地主恶霸，那是更为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在类似于《白毛女》、《暴风骤雨》和《平鹰坟》等艺术作品中对此屡见不鲜，不容回避的是，由于封建压迫的残酷性，群众性的义愤导致了许多血腥的场面，小说《敌后武工队》写道：“一群妇女袖藏剪子，手攥锥子，气势汹汹地迎了上去。她们是东王庄死者的家属，她们要用剪子、锥子去和刘魁胜（汉奸——作者）算帐，替父兄，替丈夫，替儿子来报仇！”这个情景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因为在一位外国记者所写的反映华北土改的书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群众恐怖，书中写道：由于场面失控，被审判的恶霸（曾出卖过八路军伤员）死于凌迟，当他被处死前，人民政权押着他游街，他的双臂捆在前胸，敲着锣，凄惨地喊道：“乡亲们哪——看在祖宗的份上，帮我擦一擦脸上的血吧。”而老乡们回答他的是：“呸！给你一块吊马布（北方俗语；指月经布——作者）吧！”

这是解放区朗朗的太阳驱散一切行将死亡的事物的年代，造物主严厉的公正，使得一切悲惨的场面在浩瀚的史料中被淡化，很少有人提起。鲁迅先生曾说：“（造物主）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这一个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浓；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当亿万人的脚步声湮灭了原野下灵魂的呼号时，我们说：历史的主流是健忘的，它只肯关注那些伟大的事物，并使它长存不灭，中国的革命进程不会因流血而变得迟疑，变得温和纤弱，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白居易当年诗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内战烽火的再起和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惊破了伪“国大”权力分配之后的太平梦幻。战场的一再失利使蒋介石痛苦地认识到：他的所谓“国民革命”并没有使政治得到丝毫的改观，国民党对“民生”问题的漠视和无能，正在使他的政权失去道义基础。在城市，教授、学生和工人纷纷诅咒着民国的黑暗，他目前的处境并不比当年的独夫民贼袁世凯好多少。在广大的乡村获得土地的农民则把解放战争变成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运动，1946年底，蒋介石终于产生了某种“醒悟”，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蒋强调说：“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问题。外国人士惑于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宣传，认为共产党在中国不是实行共产主义，而是搞农村改良，确实能够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为农民谋福利，而国民党虽有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不过是徒托空言，毫未实行，这一种错误观念，我们必须用事实来纠正。因此，我们在收复区特别要注意土地的处理和分配，要比共产党处理土地的情形表现出更好成绩；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使农民得到利益，而不是为地主谋利益。”国民党不但拟制了《对中共解放区目前工作大纲》，规定了由中共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仍一律维持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实行“二五减租”，“光复区之土地所有权仍暂归原地主所有，地主“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不久，

国民党又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土地政策，规定“收复区”佃租额不得超过1/3，农民在土改中的胜利果实，由国民党地方政权“征收”后再“发还”给农民，地主损失由国民政府“补偿”，这样，既维持了国民政府“体面”，又“顺应”了民意。

然而，国民党人士悲哀地发现，他们所谓的“土改”在执行中困难重重，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称：“自我军收复以后，地主对土地问题多未遵照中央规定处理收复区土地办法办理，最近发现两种不良现象，一、地主任意查封前在匪区佃农之全部财产，并加以驱逐；二、本年地租，地主不奉行中央颁发之处理办法及实行二五减租，反而强迫佃农对半分租，并追算匪官占领后历年旧帐，致使佃农不安。”“绥靖区”政务委员会接到报告后反映豫北政情说：“政府曾有明令禁止报复，惟还乡团为发泄苦闷，集体残杀，到处风行。与共军接近地区，双方仇杀更无虚日。

在此情况之下，民众仇恨日益加深，实际问题无从解决，多数地方政府为顾及‘人情’，悉听其自然演变，不加禁止。”这样一种结果，只能证明蒋介石所引述的国际人士评价的某种真实性，国民党姗姗来迟的所谓“平均地权”，真的只算得上是“徒托空言”而已，不过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主观方面的某种醒悟，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省的历史。1949年，台湾省“主席”陈诚在台实行“三七五减租办法”，稳定了台湾省的农村局势，后来国民党政权又进一步用重金将台湾耕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民。这是在50年代发端，台湾社会记忆的重大内容，然而骨肉分离的现实，又使大陆人民长期疏离了这一历史，当我们叙述到5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记忆时，不得不面对这一悲哀的事实，并为生活经验和认识上的不能逮及而抱憾。

要谈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史和风俗史，不能不谈到土地的变迁史。前文所述，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土改，在新世界“失乐园”者的“变天帐”上反映出来的，是界碑迁移，田契易主。究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心算”的仇恨记忆。然而土地的革命并不简单的是一场均贫富的社会历史进程，它实现着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伟大理想，同时它重组着一切旧制度赖以运转的秩序。这种乡村秩序是中国人维系了上百年上千年的，这种社会风俗也是一部分中国人不愿意更改的，因此，当我们遥望1948年的华北，我们会为震天的秧歌锣鼓感到欢欣，也会为乡村里的大规模清算而暗自惊心。贫农团和还乡团的仇杀之酷烈，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之威猛，中国人追求社会公正和自由幸福的艰难程度，非其他民族可以想象的。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70年代“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学会了“还乡团”这一名词，这是一个容易令人产生误解的名词，因为它从字面上看太牧歌化，它使我们脑海中浮现出德沃夏克《新大陆》中的著名的爱尔兰民谣旋律。在华北，在河南，在山东，在各个老解放区，都涌现出有着诗意化名称的“还乡团”组织，正如我们从史料中知道的：诗意化文字的背后燃烧着失乐园者复仇的毒焰。在谁是土地的主人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农民展开了本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野性十足的历史性搏杀，搏杀与清算的场面本身决不是诗情画意的。

只有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才会对那场历史清算中的人性本质加以关注，作家矫健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忠诚的长工目睹了他的东家被武工队处死的场面：东家的头颅血淋淋地落地，朝长工脚下滚来，那颗头颅咔嚓



咔嚓地咬着长工的鞋帮子，分明是在嘱托着什么。后来这位长工参加了“还乡团”，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回村子，实施阶级报复，“还乡团”们残酷地殴打一位回乡探视老母的八路（尽管早在1946年中共军队已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老百姓仍习惯于称他们为“八路”），并把这位八路活埋，八路的娘（也是这位长工的干妈）追来了，“还乡团”们又开始毒打这位舍命救儿的母亲。这时，已经黄土覆身的八路开口说话了，这位为东家报仇的长工俯下身去，八路的口鼻中只有些微的气息：“勿伤我娘，勿伤我娘……”——我们会为这番描写感到动容，但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绝不能代替“暴力是历史的催生婆”这样一条铁律。辽东的农民回忆说：为了对付“还乡团”的“大刀队”，解放区的土改积极分子专门成立了“棒子队”。“大刀队”将农会领袖捉住后，一刀两段，连孩子也不能幸免。而“棒子队”的报复措施是：捉住“还乡团”分子后，以土埋身，土层外仅露一头，反复以凉水浇覆，一夜之后，人头变成了冰坨，手起棒落，人头便滚落一旁。这种精心设置的冷酷刑罚反映了本世纪中国最大规模阶级决战的某类原始生态，这种原始生态并非是历史的局外人可以简单评判的。

在广袤的田园上，清算与反清算，地主还乡和农民反还乡的暴力剧交替上演，30年代写《原野的风》的蒋光慈若是活在40年代，他一定会为他当年所憧憬的农村革命的苍白和狭小而感到赧颜。华北和东北的原野上响彻着活中国的怒吼，青年诗人菲可写道：“亿万人在云之下运行 / 巨幅的河川与原野承受着它们的运行 / 巨大的山峦分开它们的族群 / 但很快又回到一起 / 直至同时汇入云中、风中 / 道路上种种历险与惊涛 / 没有超出先祖的预见与忠告 / 是思想催促着它们摆脱了磨难 / 继续运行”（《亿万人同行》）。郭沫若当年为蒋光慈的英年早逝感到痛惜，他说：假若这位革命作家晚些年去世，“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这话大概不会被人喊出的罢。然而，30年代最早描写了土地革命斗争的蒋光慈若重生于1948年，他会承认：眼前的活中国的雄姿是他看到的最伟大的革命史诗，一种制度的覆灭，一些人的死亡促成了新中国的诞生。历史将迫使旧制度的骑士们付出不能溯回的永久性代价而实现民族的更生，这铁律未免残酷无情，但却是造物的需要。

#### 年度记事

##### 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平津战役打响

11月2日，东北解放军攻占沈阳，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自此结束。本年秋天，东北地区国民党军4个兵团，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55万人，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地区，完全陷入被动。而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00余万人，中央军委根据整个形势，决定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并在东北战场进行第一个战役。

战役于9月12日发起，历时52天。除营口守军万余人从海上逃跑，锦西、葫芦岛之敌南撤外，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为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

11月，华东、中原野战军协同发起淮海战役，至本年底，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部被全歼；张克侠、何基津、廖运周部起义，解放军攻克徐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12月，平津战役打响，天津、新保安，张家口国民党守军被全歼，北平被围困。

##### 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

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12月25日，宣布了发动内战的头等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诚，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历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勱等。

本年，陈伯达发表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和《四大家族》两本小册子，在国统区秘密流行，国民党统治的道义基础已经丧尽。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日本战犯

11月4日，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确认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国、英国以及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认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日本是中日战争的侵略方，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及贺屋兴等人，应对日本占领南京后，6周内屠杀中国人民30万人之世界暴行史上最残酷的事件负责。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松井石章、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人死刑，对其他战犯也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 蒋经国“打虎”失败

为了收拾人心，蒋经国本年在上海进行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动，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10月，“打虎”扯出上海扬子建业公司囤积居奇一案，该公司总经理是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孔令侃成为蒋经国准备拿来开刀的“大老虎”。蒋介石闻讯，不顾军情紧急，从前方飞回上海，下令将孔令侃救出。监察委员们支持蒋经国，坚持要查扬子公司，蒋介石授意上海市长吴国桢为孔百般开脱。

10月底，孔令侃离沪赴美，溜之大吉，蒋经国管制经济失败，被迫辞职。

#### 宋庆龄“哭灵”

3月21日，孙中山先生逝世23周年，蒋介石率国民党文武官员前往中山陵谒陵，正当在孙中山像前默哀时，宋庆龄走上前去，望着国父遗像大声哭着说：“你真死了哇？你死断了气哇？现在的国家让一群狐群党群在那儿胡作非为，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你一点也不管啊？你真死了哇？！”蒋介石等人感到恼火，又不便发作，谒陵活动草草结束。

#### 朱自清宁死不食美粮

6月8日，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表示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北平各大学百余名教授联名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8月12日，朱自清因胃病复发医治无效而病逝。朱自清是我国新文学史的杰出代表人物，曾与俞平伯，叶圣陶创办“五·四”以来第一家现代诗刊，1926年出版散文集《背影》，1932年起主持清华文学系。毛泽东盛赞朱自清“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 “币制改革”彻底破产

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紧急处分令》，实行空前的通货膨胀，使通货增加了11倍。本年发行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1元比法币300万元，金圆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11月8日，行政院通过《修正金

圆券发行办法》，撤销 20 亿的发行限额。11 日又通过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黄金、白银、外币准许人民持有，银币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并重新改定兑换率，金圆券与银元的比率由 2：1 降为 10：1。贬值 80%，金圆券与美元的比率由 4：1 降为 20：1。13 日，蒋介石明令公布以上两个“办法”，等于宣告“币制改革”彻底破产。

#### 陈布雷绝望自杀

11 月 13 日凌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蒋介石谋士陈布雷，因感于蒋介石政权无可挽救，吞服大量烈性安眠药自杀于卧室内，他在办公桌上留有一封致蒋介石的遗书：“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力，而结果其无价之一生。”

陈布雷生于 1890 年，浙江慈溪人，号畏垒，1912 年加入同盟会，1927 年以来，长期为蒋介石起草文件，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陈自杀后，郭沫若等人深表痛惜。

#### 香港警察在九龙寨拆屋并枪击民众

2 月 5 日，中国政府发表照会，强调九龙城寨的主权，管辖权属于中国，港英政府应对九龙城寨拆屋事件负责。

去年 11 月 27 日，港府通令九龙城寨内居民将所建木屋自行拆毁，限两星期内执行，今年 1 月 5 日，香港警方实行强力拆屋，1 月 10 日，中国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向港督提出交涉，但港英当局否认九龙城寨有管辖问题存在，两天后，港英政府出动警察，再次强行拆屋，并开枪射击在场群众，造成居民 6 人重伤。1 月 16 日，广州举行声援大会，部分群众前往沙面焚烧英国领事馆，广东各界发起“穗各界对九尤事件后援会”，声援九龙城寨同胞。

## [附文]

### 王氏家谱·忠魂寻访记

范强口述 心国撰稿

早在童年的时候，父亲就跟我讲了好多好多我叔父打东洋鬼子的故事，英勇顽强，惊心动魄，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叔父从军时，我还未出生。从开始记事起，我就常听祖母说，叔父身体壮，有力气，会做事，讲孝心，村里的人都称赞他是个好小伙子。我把父亲讲的故事联系起来一想，就觉得叔父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打心眼里敬佩我的叔父。

我多么盼望见到我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叔父啊！盼呀，盼呀！可是，一直盼到解放，还没有见到他的影儿，真是急死人！我焦急地问祖母：“叔父怎么还不回来？”祖母只是哭，一句话也说不上来，我又急切地恳求父亲，要他出去把叔父找回来，他答应跟祖母商量。父亲和祖母商量了几天，才狠下心来，把家里仅存的几担粮食全卖了，算是盘费，天刚黎明，父亲就带着包袱雨伞出发了。

我在家里，天天等待着父亲带回好消息。可是，二十多天后，父亲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只好安慰祖母和父亲，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以后再慢慢地找吧。就是真的为革命牺牲了，也要把叔父的忠魂寻回来。

就这样，我们家里每年都要卖一次粮食，父亲每年都要花十天半月出去找叔父，父亲叹息不止，我还是安慰他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已经完成高等学业，当上了人民教师，祖母的眼睛哭瞎了，父亲也完全失望了，可我呢？仍然眼巴巴地盼着……

初步四清开始时，大队党支部书记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我叔父在解放战争中国贪污挨整变节投敌，后又被我党抓住杀了。并在群众大会宣布我的叔父是“大叛徒”，消息传开犹如晴天霹雷，祖母悲痛欲绝，从此卧床不起，父亲忧心如焚，万念俱灰，而我却觉得这绝不是真的，我深信叔父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但是我转念一想，建国十六年了，假使叔父还活着就会回来，即便人不回，也要捎个信回，至今既不见人回，也没有音信，多半是不在人世了。现在，叔父的生死倒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叔父是大叛徒，还是革命烈士？必须弄个水落石出，绝不能让革命志士蒙受不白之冤，因此，我暗下决心，代替力不从心的父亲，担负起寻访烈士忠魂的职责。

1966年，我参加四清工作队，2月份在县城集训。在一次忆苦思甜会上，老革命刘培鑫同志讲了他当年在湖区打游击的业绩，他讲的业绩跟我父亲讲的故事几乎完全一样，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莫非他曾经跟我叔父一起打过鬼子？不等散会，我就把刘老请出来，满怀希望地问他：“您在湖区打游击时，可认识王子金这个人吗？”“王子金——”刘老不假思索而又很神秘地说：“我不仅认识他，而且我们还是亲密战友呢。他在新四军中确是条好汉呀！咦，他是你什么人？”“我的亲叔父，自五师突围后，就不明下落，现在还有人说是‘大叛徒’呢！”“胡说，王子金是大烈士，他为革命献身时，是我亲手安葬的。”

难怪古人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寻来全不费功夫”啊！在这个偶然的机，我毫不费力地得到了我们全家人20多年梦寐以求的有关叔父下落的确凿信息，尽管这个确信证实了我的推测，叔父果然不在人世了，但他是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更何况叔父是大叛徒还是革命烈士的重要问题，从此便真相大白了呢！因此，我万分高兴而又激动地请刘老再给我详细讲讲，刘老也满怀激情地追述了我叔父英武而壮烈的革命历程。

“王子金同志是抗战爆发的第一年与我一起参加革命的。不久，我们编在一个班里，他当班长，我当副班长，我们两人一起学习，一起打鬼子，志同道合，亲如手足……”

“1948年，解放军南下鄂西，组织上派我到南漳担任财政委员，做好支前工作，我到南漳的第三天，在一个山村里与王子全邂逅相遇，老友离别重逢，异常高兴，真有说不完的话。他显得比以前更成熟，完全像一个老练的解放军指挥官，我问他现在任何职，他说当支队长。我拉他去喝一杯，以叙阔别之情，他说军情紧急，不可久留，我看他因长途行军很疲劳，问他需要什么，他只向我要了两包烟，就匆匆地分别了。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就在当天晚上，我军在一个山上的古庙里召开支队长以上军事会议，由于叛徒出买，敌人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夜袭这个山头，除了十几个人突围出来外，四十一个支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壮烈牺牲了，第二天，我军大部队赶到，

全歼敌军，解放了南漳县；

‘晚上，我在南漳人民庆祝解放的欢乐的秧歌声中，找到那十几个幸存者中的一个，我问他：‘王子金同志怎么了？’他伸出大拇指说：‘王子金同志是我们解放军的大英雄啊！要不是他抓住那个敌团长为人质，我们早就没命了。’他收回大拇指，把手抚摸看他受伤的大腿，继续说：‘当时我们正在开战斗部署会，敌人摸上了山头，包围了古庙，顿时密集的枪弹朝会议室射来，同志们一个个应声倒下。’

王支队长机警过人，他贴着墙根爬到窗下，看准了敌情，突然纵身破窗而出，闪电般地扑向敌团长，敌团长猝不及防，王支队长左手勒住敌团长的脖子，右手握枪顶住敌团长的脑门，一边喝令敌团长下令停火，一边命令我们赶紧突围，我们趁敌人停火的间隙，刚冲到山脚下，就听到一声惨叫，枪声又响起来了……王支队长怕是与敌团长同归于尽了。’说到这里，他低下了头，热泪沾襟，我的泪水也如泉涌。”

听了刘老的这番回忆，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奋，情不自禁地把刘老抱起来转了一个圈，代表全家表示了我对他的衷心感激。同时，我还为我有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叔父而无比自豪，还没等我提出要求，刘老就愤愤不平地说：“这样一个人民战争的英雄，反被人诬为‘大叛徒’，这太不公平了！我马上向县人民政府反映情况，给予你叔父应得的荣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个月以后，省里的批文下来了，正式授予王子金为革命烈士，县人民政府根据我祖母和父亲的要求，把叔父的遗骨从南漳运回来了。在重新安葬叔父遗骨的祭奠仪式上，县人民政府的代表庄严地宣读了省人民政府批示，刘老激情满怀地介绍了我叔父的英雄事迹，我激动得只说了几句话：“我们寻回来的不仅是叔父的遗骨，更重要的是寻回了他的忠魂。叔父忠魂，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国魂，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为着自由、民主、解放、强大、昌盛而不怕牺牲英勇无畏，殊死拼搏的民族精神，我们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才争得了幸福的今天，我们将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一定会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选自湖北汉川县 1992 年 5 月《重修王氏家谱·艺文志》）

## 1949 年：重庆森林

……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鲁迅《雪》

当任弼时在 1946 年首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名时，谁也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如此之快。毛泽东元旦献词中说：人民解放军必然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尽管苏联大使仍然忠实地履行着外交使团的使命，随南迁的国民党行政院来到了广州，但是，这并未给浩浩荡荡的人民革命蒙上阴影。“南北朝”的

呓语，“中间道路”的空想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白日梦，都不能给这场深广的人民革命施加一点哪怕是咒符的作用。

本年度是“一边倒”的一年，是“别了，司徒雷登”的一年。这两句斩钉截铁的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一切善良的民主个人主义世界观的破产。自视甚高的柳亚子先生来到了北平，这个自以为“天下英雄毛、蒋、柳”三足鼎立的诗人在寒冷却充满活力的北京度过了难忘的新年。然而，几个月的幸福与陶然的感觉过去后，柳亚子像一切恃才傲物的隐贤一样，渐渐对“新朝”产生了失望。在今年，他赋诗一首《感事是毛主席》，头一句便是：“说项依刘我大难……”，英雄意气跃然纸上，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个人性质的幻觉。柳亚子在想什么？要官爵？要“名园”（在另一首诗中柳亚子竟然流露出希望毛主席将颐和园“赐”给他著书立说的意愿！总而言之，无非是沉溺于《儒林外史》“庄征君辞爵还家”的旧式趣味中。对于柳亚子先生的“牢骚太盛”，毛泽东微微一笑，提笔写下了：“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番既委婉又得体的表述也许能使一些人士的怨望之心有所收敛。

发生在新政协里的某些插曲尽管耐人寻味，但中国现代史以来最伟大的设计之一毕竟在这里宣告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神州再造的新纪元的开始（尽管在何应钦主持的悲情剧《龙》里，这一事件被描绘成真正的“国殇”、预示着“神州陆沉”）。这一事件，在到今天为止的漫长岁月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第一次在民族真正独立的前提下开始了强国之梦的追逐。中国人追求幸福的征程，虽然同样山水险阻，但毕竟在开始，没有强虏将它毁坏，没有山河燃烧。同饥饿、贫病和愚昧进行的斗争不断提高着中国人的生存质量，这也是任何对中国现代历史进行着妖魔化描绘的先生们不能抹杀的。

开国大典的场面。各类艺术作品有着详尽和生动的描摹和实录，我们很难再重处落墨。有关开国大典的纪录电影资料在今天显得非常的珍贵，事件的重大性和电影纪录的匮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令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然而，当年的知情者说：苏联的电影工作者曾拍摄了开国大典的场面长达4个小时的彩色电影胶片，后因一场火灾使得整部彩色纪录片荡然无存。所以后来的纪念者们只好翻来覆去地观看那段珍奇的历史性镜头：那一声开天辟地般的隆重宣布。

但是，相信还有更多的电影纪录资料散落于档案馆中，总有一天会解除封存，让欣喜的人们饱看历史的伟大风采。60年代拍摄的《烈火中永生》，就出现过一段与众不同的开国大典纪录电影镜头，我们不知道它出自何处，但肯定是时下的历史专题影视作品没有采用过的。《烈火中永生》在反映江姐等革命志士在渣滓洞听到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后，绣红旗以示庆祝的场面时，叠入了这样一段历史镜头：天安门前游行的人们举着红旗昂首前进，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们的肖像在人群中分外醒目，尽管《烈火中永生》用叠化的手法处理这一镜头，但观众还是清晰地辨认出了斯大林、毛泽东、朱德、金日成、乔治·乌和拉科西等人的头像。这是东方人民民主国家典型的政治审美形态，中国人民将伴随着这种政治审美形态进入波澜壮阔的50年代。与此同时，正如《烈火中永生》所揭示的那样，在西南雾色茫茫的重庆森林里，国民党统治反人权的残暴象征“中美合作所”内，有一群人，有一群为新中国以水代酒庆祝着的志士们，却在预备用鲜血为喷薄而出的东方红日做一次

惨烈的牺牲。

90年代以来，中美合作所的巡回展览在全国再次引起轰动，原因也并非偶然的。

中美合作所的魅力（如果“魅力”这个词语可以形容残暴的事物的话）在于它原朴和残酷的实证，在于物证中显现的屠杀者和求生者互搏时的惊心动魄。当现代的公众习惯于鉴赏一幕又一幕的“胜利大逃亡”和“虎口脱险记”时，切不要忘记掉人类最沉重的悲剧就是，能从死亡临界点逃回人间的毕竟是极少数幸运者。很少有人能从漠漠的死亡之路折回并带回他的记忆。严格地说，这只是宿命论者和猎奇家感兴趣的问题。在本年的冬天，飘雨的重庆森林之中，手提机关枪和燃烧弹压灭了受难者含恨的呐喊，也令旧制度的刽子手为之失色（他们向长官吵闹着要去台湾的机票，并纷纷做鸟兽散，直到人去山空，幽美的重庆森林独自呜咽）。翻开大屠杀的画页，我们不禁产生联想：假若时间机器能够复写出殉难者的心理摹本，那么对拯救人性将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的森林，夜黑如漆，怪岩若锯，遍地榛莽，满山乱石，而照亮这蛮荒景象的竟然是人类屠杀的火焰。

活着的人们会用许多形式再造殉难者的记忆，如四川美术学院的大型声光油画便模拟出了当年的视觉和听觉，这幅画安放在歌乐山脚距原中美合作所警犬室不远的~间暗房里，供游人参观体验。活着的人们用美好的生活赞美着殉难者的价值，这是对黎明前的牺牲者最好告慰。

值得提及的是，11月29日，“西南特区”在松林被执行最后一次集体屠杀时，蒋氏父子仍在重庆。在此头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攻占重庆市郊南温泉、李家泊等地。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称：28日“午后随父亲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彷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29日，解放军已强渡长江，对蒋所在市区已呈锥形包抄之势，蒋经国回忆道：“（夜晚）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车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夜宿。”（见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版《风雨中的宁静》）

当蒋介石的专机升空时，歌乐山脚的烟火依旧袅袅，这一天，解放大军已抵达市区。

胜利与疯狂，光明与死亡，血泪与朝霞，1949年末的几组画面构成了40年代物换星移的凄丽的篇章。

1949年12月1日的报纸记录了30日胜利狂欢的场面：“在蒋政权专制迫害下受尽苦难的重庆人民，终于在昨天重见光明，得到解放。虽然他们在重庆解放前夕，遭到国民党政军和亡命奔逃的那些特务们扰害的恐惧，但是他们昨晚得到了解放。

在炮竹声中欢呼的那种情绪，是胜过一切的。百万人民昨晚感到天真的亮了。

‘7点多钟，人民解放军在雨中分头渡江到达市区。人民纷纷由屋内拥出，急看解放军的英雄姿态。虽然没有电灯，但在家家户户前点燃的太平灯

下，都清楚看见解放军健儿们在微笑着接受人民的欢呼。鞭炮声和欢呼声交织成一股强烈欢欣巨流，冲破了重庆人民被蒋政权迫害遭受的种种苦难和积压的苦痛……又昨晚当一队解放军在炮竹欢呼里抵较场口时，街口的良友乐队奏起《义勇军进行曲》，满街人民同时随声合唱……”

1949年12月1日在重庆街头欢呼着的人们，曾经在睡梦中倾听到了远方山区里的枪声。他们不知道，在郊区，霏霏驳驳如炮竹般的枪声里面，是垂亡者最后的疯狂。牺牲者生命代价的真义，如今已化作人间的沧桑。在解放了重庆，人们用这样的挽词来赞美殉难者的高贵和不朽——

死，并不是终结。种子落在土里，会发出新芽，生命将绵延不尽。一些牺牲了的人，他们崇高的行为会感动另一些人出来继续他们的工作。这里埋葬的不是尸首，这是种子，等到春回来临，它们会开出灿烂的花朵。

#### 年度记事

#### 《将革命进行到底》

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毛泽东在献词中指出，我们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并告诫人民，决不能怜惜敌人，为坚持和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毛泽东向中外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坚决消灭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从上月18日开始，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对河南永城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4昼夜的激战，全歼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指挥部。邱清泉第二兵团本部及所辖第五军、第七十军、第七十四军、第十二军、李弥第十三兵团本部及所辖第八军等部，击毙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等，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第八军少将军长周开成等高级军官52名。淮海战役历时65天，人民解放军以13万人的伤亡代价，全歼国民党军1个“剿总”司令部、5个兵团部、8个军、56个师（内有4个半师起义），总共55.5万余人。至此，蒋介石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主要力量和精锐师团已丧失殆尽，南京、上海及武汉重镇，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 平津战役结束

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入城接受防务和市政，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就此结束。

天津解放之后，解放军发动的平津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为了维护古都风貌，使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司令员向北平守军最高长官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发出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公函。迫于形势，傅作义同意进行谈判。经过林彪的代表陶铸与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周北峰等人商议，1月15日，双方基本达成了协议。21日，双方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具体实施方案》上签字。22日，傅作义率部按协议撤离市区。北平的和平解放，保护了历史文化名城，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 蒋介石下野

1月21日，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



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下野是由国际国内环境造成的。去年底，东北、华北全境以及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夺取。于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12月N日，拥兵50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等又提出5项和议主张，把蒋下野作为第一项主张。豫、湘、鄂、桂4省也相继通电主和并要求蒋下野。除夕日，蒋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人外，其他委员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本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对局的声明》，揭露蒋的和谈阴谋并提出8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这一切，使蒋无法再恋战了。19日，蒋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说：“局面发展到此地步，个人引退已无遗憾，”并愤愤不平地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24日，蒋介石在保留国民党中央总裁职位的前提下“引退”，国民党中央执委对各直辖党部发出秘密指示。《指示》称赞蒋介石“引退”为“磊落光明之伟举”。为使全体国民党员“洞达总裁之意旨，了解工作方针”，中执委要求：(1)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和《引退声明》要“悉心研讨，全力信守”；(2)不论蒋介石在何处，均应“竭诚尽力，接受领导”，在蒋领导下，“救国救民”。

#### 和谈破裂

4月2日，国共和谈代表就实现国内和平所涉及的各项重大问题交换意见。3日，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

1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交张治中，该协定共8条24款：首先确定国民政府负全部内战责任，要求惩办战犯；主张废除伪宪法、伪法统；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改除一切卖国条约，改编军队等。对此，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修改意见。15日，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交国民党代表团，周恩来说：“对于国民党军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年过江接收政权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周恩来宣布：“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接受这一修正案，决定派黄绍竑携带文件返南京请示。

蒋介石阅毕黄绍竑携回之24项要求后，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的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

20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修正案，李宗仁、何应钦电复中共和谈代表团说：“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希望中共“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谈判就此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并于23日占领南京。

#### 台湾改革币制

6月15日，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和《新台币发行办法》，规定：(1)新台币指定由台湾银行发行；(2)发行总额以2亿元为

限；(3)新台币与美元汇率为5:1；(4)新台币与旧台币的兑换率为1:4000，限在1949年12月31日前兑换；(5)新台币以黄金、白银及外汇为十足准备发行。台湾省政府从台湾原存和大陆过来的黄金中拨出80万两作为新台币准备金，另拨1000万美元作为进出口贸易运用基金，使新台币得以维持币值。台币改革使通货膨胀得到缓和。物价上涨有所控制，初步稳住了台湾的货币金融体系。

#### 《光明日报》创刊

6月16日，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创刊。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在发刊词《团结一致建设民主新中国》中阐述办报方针为：“第一是负责的态度”，第二是服务的精神，“第三是建设的批评”，“第四是忠实的报道”。

该报以科学、教育、理论等为主要内容，反映国内外科学、教育、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

####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日子。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一致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此之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已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庆龄、张澜、刘少奇、高岗、李济深为副主席）。

当天下午，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人、农民、学生及人民解放军官兵30万人，汇集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盛典。下午3时整，毛泽东率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准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典礼开始。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30万人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回荡在广场上空。接着，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朱德驱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之后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并主持了阅兵式，

在场的各界群众一直用热烈的掌声为人民的子弟兵欢呼。

阅兵式后，天色已晚，群众开始提灯游行。这时，五彩埃纷的礼花腾空而起，红灯和礼花交相辉映，天安门广场沸腾了，中国现代史的新纪元也开始了。

## 1950年：江山多娇

少年中国的前途果然是有希望，我信这个好预兆，必然在有志创造少年中国的青年——你和我——身上显出来。为盼望看见少年中国的实

现，

我真拭目以持从我们身上显出来这样的一个预兆呢。

——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

1950年5月15日，全世界的地震学家都目瞪口呆，所有的地震仪都被强大的地震波激过了最高限度而顿时失灵。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发生在毗邻印度阿萨姆邦的中国西藏墨脱。——关于墨脱这个地方，在清末和民国期间的现代边塞故事里，曾把这里描绘成中国疆域里最闭塞、蛮荒的地方，历朝政府甚至不愿意在那里屯兵，因为那里的兵每逢调防都要嚎啕大哭：天哪，总算出来了！长官，能告诉我林芝（在世人眼里，林芝同样也是一个苦寒蛮荒之地）发生了什么新闻吗？——爆发出移山填江般威力的墨脱大地震虽然并未惊醒一般中国人的睡梦，也未曾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自然史记忆刻下痕迹，但在这辽远边陲的天崩地裂却深深地刻在了自然观察家和历史的占星士的脑海里。墨脱地震的震中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南侧。北纬28.90度，东经95.2度，地震的震级高达里氏8.6级。

当地的居民，地震前就经常听到群山的呼啸声；如惨号，如呜咽，这哭声般的呼啸悲切恐怖。天空没有风，却有狂风呼号的声音，从震前几天到临震，大地不断发出类似枪炮声、爆炸声和打雷声的巨大轰鸣。那又大又怪的声音由远而近，红色火光上下闪跳，火球满天飞舞，火星如信号弹在空中飞驰而逝。在灾变到来的刹那，一切魔幻变的奇观突然停止，沉沉黑夜里，山谷里涌起馨香的春风，风一阵阵扑过高原，黑沉沉弥漫了山谷，铺遮了天空，它急疾迅猛地席卷大地，墨脱顿时变成了飞沙走石的世界。大地剧烈地颤抖：群山疯狂起舞，自然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了。

在峡谷中奔流的雅鲁藏布江，江面立即白浪滔天，无数巨石、崩岩，从几百米的悬崖上砸落江中，流量达每秒6000立方米的大江，顷刻间被截断为4节。

大地震引发了无数处山体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刹那间江河断流，天地失色，墨脱大地面目全非，在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1平方米的面积就有1.1立方米的物质参与了滑移。有的整座山寨从山顶甩下峡谷，有的村庄从江的北岸抛到南岸，还有的村庄被滑坡体整个推入江中。距离震中最近的格林村，山崩和地陷加上喷沙把所有房屋埋入地下，全村456人丧生，死亡率达90%以上。这次大地震虽然发生在地广人稀的地区，但中印两国仍有4000余人丧生。这场巨变，是否预示着世界上最根深蒂固的中世纪制度的崩殒？我们不可得知，然而，那一天起，布达拉宫的长号声平添了某种忧郁，

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凡改朝换代，都会出现自然史中的非常事件。1950年的那次鲜为人知的特大地震又恰好发生于新纪元肇始的非凡年代，令感觉细腻的人们不得不产生某种联想。

星象异变，大地轰鸣，山河变色，城市崩裂，……这种自然史上的种种非常事件往往伴生着人世间形态的巨大变化。我们宁愿相信这仅是一种巧合。但是，当我们重提47年前的大峡谷之震时，我们还是不由得为某种无形的意志，为某种人间规律的威严而惧悚，而表示出深切的敬重。

这一年夏天，人民解放军骑兵的马蹄声叩破了川康边青翠山谷的宁静。尽管出现了小规模武装抗拒，然而“金珠玛米”大军的不可阻挡之势，使

广袤的雪山藏域为之动容。

藏历 10 月 8 日，求助“神断”，17 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亲政典礼，接管了西藏政教大权，达扎结束了执掌近十年的摄政王位。亲政后，达赖当即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

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 10 月 8 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毛泽东不久后回信，对达赖恩勉有加。这是 1950 年的秋天，时值建国一周年之际。这是继康乾盛世之后，神圣的祖国再次实现中央对西藏前程的有效干预，这是 50 年代之初的福音。统一的光芒照亮了多灾多难的河山、大湖、草甸、雪顶和森林，沐浴在新时代的曙光里。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1950 年实在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年份。

本年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战士在生活的空气里感受到了这个北邻大国的壮丽、伟岸和富强。北京美专的学生们在北京街头悬挂起来的巨大招贴画上写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活跃的高校礼堂里，《卡秋莎》和《华沙工人之歌》的旋律此起彼伏。在北海溜冰场，青年男女们互相追逐打闹，用俄语大声谈笑，人们向他们递来无比羡慕的目光。尽管，在人们印象中，苏联的气息和质地，总是伴随肃穆的队伍、宏大的建筑、粗犷的个性以及冰天雪地，但 50 年代蜜月般的中苏情谊使人们对苏联的感受温暖而亮丽，这是几代人优美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直到今无它的魅力仍未见衰退，相反，随着苏联式审美时代的退去，这种温馨的感受与日俱增。50 年代中苏之间水乳交融般的情谊一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美感。这种美丽我们至今从老年合唱团和怀旧频道中感受到，也许到了下个世纪，我们会充满激情地说：那是我们一代人最后的古典浪漫主义事物。

本年初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举措引起了西方世界的不和。

美国和法国对英国的这种承认感到大为恼火。针对盟国的指责，英国指出，“红色中国”控制整个大陆已成为现实。英国外交部还提醒盟国朋友们：毛泽东已经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还是新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面对这种历史性的局面，英国还能做什么呢？英国人试图保存在香港的利益，而你们没有这样的烦恼。

此事在国际上引起了连锁反应。印度、丹麦、芬兰、瑞士等国，也步英国后尘，相继承认了新中国。

本年度，新中国开始了代表中国合法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进程（这一进程由于复杂的原因，被延搁了 21 年之久）。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赖伊并转联合国安理会会员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从那时起，新中国的英语文件将国民党轻蔑地称为“GuoMinDang Part”）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中国各民主党派为拥护周恩来致联合国的电文，也联合发表声明，《声明》指出：周恩来外长词严义正的电报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公意，我们一致坚决拥护周恩来外长的主张。中国政府还着重组成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以参加联合国会议和联合国的各项工作。

建国一年间，全国已成立了 1 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和 1 个中央直属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4 个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华东、中南、西北、西南），28 个省人民政府，9 个省级行政区人民行政公署（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苏南、苏北、皖南、皖北、旅大），12 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的市人民政府，67 个省辖的市人民政府，2087 个县人民政府。

建国一年间，17 个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是：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东德、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度尼西亚。有 8 个国家已承认了新中国政府，它们是：巴基斯坦、英国、锡兰（斯里兰卡旧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

尽管 10 月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面临新的考验，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在硝烟和血泊中实现了美丽的新生的东方大国，已经在内政外交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变化，赋予了中国人在历史前进中新的感觉。从此开始的人民记忆，尽管时而低沉，时而昂扬，但在一个完整的形态中展示着丰富的性格。从安东到西康，从绥远到海南岛，开始了新生活的人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歌唱——

呵！绿水青山，  
呵，春风杨柳，  
古老而美丽的祖国呵，  
你在地球的衣襟上  
织出一片醉人的锦绣。  
你辽阔的幅员上——  
风光何等旖旎；  
你富饶的地层下——  
宝藏无比丰厚。  
你泥土的养料，  
赋予我们勤劳朴素的美德；  
你江河的乳浆，  
给了我们精壮饱满的血肉。  
你是养育我们民族的摇篮呵，  
你是我们心上的绿洲，  
世世代代，我们在你的怀中  
探求，献身，春种，秋收。  
我们为你的俊容而自豪，  
更把深深的爱倾注给你呵  
——我们的多娇江山，  
——我们的华夏神州！

#### 年度记事

#### 不许饿死一个人

1 月 6 日，内务部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指示》责成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救灾负起高度的责任，不许饿死一个人。《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组织与领导生产救灾，要清楚掌握灾情，详细研究救灾方法，

正确分配粮食并及时运到各地区，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发动人民互助，劝止盲目逃荒；及时发动春耕，播种早熟作物；强调节约，变生活资料为生产资本。

#### 宣判隐匿孔祥熙财产案

2月13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宣判隐匿战犯孔祥熙官僚资本财产案。被告原敦裕钱庄总经理顾心逸和被告原敦裕钱庄经理顾诚齐是同胞兄弟。敦裕钱庄原为私营，于1946年7月5日发生风潮，头寸短缺，顾诚齐通过其兄顾心逸找到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经其以赤金100大条弥补，始渡过难关。此后该钱庄大部分股份即陆续转入孔令侃之手，但孔为逃避社会耳目，隐匿不露。此外，孔子于1946年7月，向美军收回其所有的上海市迦陵大楼以后，为隐藏真面目，令被告等组成私人帐房性质的地产公司。同年8月开张后，用迦陵大楼租金，以该公司名义购进等于其资本伪法币2000万元约5倍的房产。建国后，被告等企图隐匿归己，不向人民政府如实报告。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顾心逸、顾诚齐有期徒刑3年，顾心逸并处罚金人民币6亿元，顾诚齐并处罚金人民币4亿元。敦裕钱庄资本属于官僚资本的部分与纯属官僚资本的大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财产，予以没收。

#### 上海被轰炸 死伤1500人

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3次轰炸。上海解放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于1949年6月23日起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并不断派机轰炸扫射。2月6日，国民党军出动17架美式轰炸机，集中对上海的杨树浦电力公司、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及吴淞等处滥炸，炸死1000余人，毁坏房屋1000余间。杨树浦电力公司的发电设备1/3受破坏，当晚无法发电。至2月13日，国民党飞机又连续袭击上海13次，以后又轰炸南京、杭州、青岛、广州、福州、南昌、蚌埠等地。在5月11日的上海空战中，人民解放军击落敌机1架。此后，国民党空军即不再轻举妄动了。

#### 政务院通令严禁鸦片毒品

2月24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指出：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强迫输入鸦片，为害中国已百余年。尤其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特发布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8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或人民代表大会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定出限期禁绝的办法；设禁烟禁毒委员会，由民政部门会同公安及各人民团体组成；禁绝种烟；少数民族地区有步骤地慎重进行；禁止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违者从严治罪；限期缴出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并由政府酌予补偿；逾期不缴者没收并治罪；吸食烟毒的人限期登记；卫生机关应配置戒烟药品免费或减价医治或设戒烟所。

#### 蒋介石在台北“复职”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行“中华民国总统”职权。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后，由李宗仁任南京国民政府“代总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代总统”李宗仁于同年11月20日以赴美就医名义经香港飞抵美国纽约。1950年2月，台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式电议，要他于3日内返回台北，否则就被认为是放弃“代总统”职权。“非常委员会”并要求蒋介石“复职”。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在台北恢复

“中华民国总统”职务，李宗仁即“电斥其荒谬”。蒋介石“复职”后，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祯为“台湾省主席”，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桂永清为“海军总司令”，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 全国各大城市禁娼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坚决予以禁止和消除。1947年11月石家庄市解放后，人民政府就下令封闭妓院。接着，吉林、北京、蚌埠、南京、杭州、天津、西安、南通、南昌、青岛、上海、武汉等城市禁娼的做法，基本上可分为“北京方式”和“天津方式”两种。“北京方式”即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一举封闭妓院，对妓院老板、领家和鸨儿集中审查处理，对妓女收容教育，治疗疾病。“天津方式”即是先采取多种限制措施，引导妓女逐步走向新生，到条件成熟时一举封闭残存妓院。本年1月15日，天津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严格管理限制妓院活动范围，帮助妓女转业，防止流为暗娼，至预定时间内彻底消灭娼妓制度。到3月，200多名妓女改业，妓院院址也改成工厂、旅馆、民宅，全市妓女由解放前夕的近2万人锐减为800余人。1951年底，残留的妓院全部封闭，妓女集中收容。

#### 山东发现恐龙化石

山东大学地矿系师生十余人，4月上旬赴莱阳一带作野外调查实习时，在莱阳南15公里的金刚口村西沟“中生代”、“上白垩纪”、“王氏系”、“红土层”内发现了恐龙的化石，又在金刚口北7公里的将军顶附近的同一“红土层”内，发现了恐龙蛋的化石，这一发现给古生物科学研究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贡献。

自从1921年蒙古第一次发现恐龙蛋化石后，这是世界上第二次的发现。

#### 《红旗歌》在各大城市演出引起轰动

《红旗歌》的故事是写解放区某纱厂红旗竞赛的热潮中，落后女工马芬姐不积极参加生产，连累得她们的小组三星期挂不上红旗。由于工厂的党组织和行政部门能够及时适当地处理问题，加上这小组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员金芳，一直对马芬姐进行团结改造的工作，最后改变了马芬姐的旧思想，使她醒悟过来。

觉悟的马芬姐，回到工厂埋头干活，在年终第一阶段竞赛大会上得到群众的表扬。终于，胜利的红旗，飘扬在她们头上。

一年来，《红旗歌》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兰州等城市陆续演出，受到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在上海连演159场，观众12.5万多人，这情形在话剧运动史上是少见的。演出时各地报纸曾有很多专刊介绍。

#### 残酷虐杀婢女的地主婆受到公审

报载：广东信宜县第3区小水乡17村地主吴子珍的老婆虐杀了4个婢女受到人民政权公审。吴子珍的老婆，过去每年收谷租1000多担，一向压迫、剥削农民，过着腐化的生活。据在公审大会上暴露的材料，她曾养过6个婢女，有4个被她虐待致死。

有一个因受不了她的打骂虐待，偷偷地逃走了，她把婢女找回来后，把她的衣服脱光，吊在半空，用棉花渗透水，贴满她全身，然后点着火将棉花烧起来，把那个婢女活活烧死。另一个婢女，因服侍得不合她意，她不但给饭吃，还用烧红的火钳烧婢女的乳头，最后又把那火钳插到那婢女的阴

道内，把婢女活活害死。其他还有两个婢女，也是受刑死去的。

侥幸活下来的婢女，也受到百般的摧残：有一个婢女因为服侍得不合她意，她就用火钳扭去婢女的乳头，后来这婢女嫁到一个贫农家里，生过两个儿子，但由于没有乳头让孩子吃奶，又无钱请人喂奶，眼看两个孩子先后活活饿死。

### 毛泽东发布抗美援朝命令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的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3日，毛泽东又一次肯定出兵必要。他说，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面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毛岸英在朝鲜英勇牺牲毛岸英于10月赴朝作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任翻译和秘书。11月25日在美军飞机轰炸中牺牲。

毛岸英牺牲后，他的墓安置于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碑文上写着：

“毛岸英烈士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

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 1951年：秧歌动地

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蒙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

——电影《徐秋影案件》台词

50年代发生在哈尔滨的“徐秋影案件”虽已获平反，但这件震惊全国的所谓“反革命杀人案”造成了一家数口被处决、被长期关押的特大冤情，并以文艺形式流传全国数十年之久。直到80年代，电视台仍粗心大意地播出了有关影片，自然，被害人家属一定要旧事重提的。

老一代人回忆起电影《徐秋影案件》，首先脱口而出的是那段著名的台词：“我是一颗不幸的种子，蒙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这句台词之所以得以流传，是因为它出自一个“女特务”之口，是文艺作品中罕见的坦露人性痛苦的表白。当时的普通观众一定觉得它很真实，而且有“文采”。将一件真正的案件搬上银幕，对当时的电影工作者是一个挑战。漂亮的女职员徐秋影在一个雨夜被人枪杀，公安人员从被害人风格暧昧的日记中感到了这件



凶杀案的不寻常。于是，一个希区柯克式的悬念故事开始了。这句著名的台词不仅成为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象征，而且成为一户人家几十年悲惨人生的讖语。任何一种人类运动，都不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徐秋影案件”就是例证，尽管公允地看，它只是镇反运动中的不和谐章节之一。电影工作者自然是按照严格的政治标准来解释“徐秋影案件”的意义的。不过，虽然这件案子是一起令人憾恨的错案，但影片的警世色彩却在亿万人的脑海中长存不灭。这究竟是传媒的错误，还是命运的错误？

提到 50 年代，我们自然会联想起许许多多的黑白影片，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象征物。50 年代保留了 40 年代的某些电影传统，但苏联风格的影响是最显著的变化。

如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工农兵形象造型非常接近于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序曲干脆就采用苏联音乐；50 年代演员的腔调，也是一种传统国语同老解放区方音的混和物，白杨、陶金等人的发音属于“上海时代”，而田华、陈强等人则老解放区的方音稍重一些。这种语言风格甚至影响了译制片的配音，如一部电影中，德国军官喃喃自语道：“苏联间谍，苏联间谍……”在这里“间”字发声变成了平声，“an”字音也特别夸张压抑，显得很嘶哑。现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这种独特的发音和发黄的胶片、教堂造型式的艺术一起，构成了 50 年代的古色古香。哪怕是严酷的斗争和革命暴力，只要具备了 50 年代的形式，那么，它仍然散发着温暖的色泽。

谁能够想到，《徐秋影案件》朴素的电影形式后面，掩盖了一个近 30 年的悲惨故事呢？——在观众眼里，女特务徐秋影总是出现在若明若暗的光影中，被邪恶势力所控制。她的气息带有旧时代女子的典型特征：软弱、自怜、迷途，总之，这个女人透发着旧时代凄婉的美。在影片中，她活在侦破人员的倒叙和被告人的回忆中，伴随着她的总是雨夜和灯烛，仿佛宗教画中作忏悔的荡妇。很明显，导演对这个女特务注入了一种复杂的情绪，控诉完成了，阴谋曝光了，罪人被惩办了，阳光下的劳动者沿着康庄大道继续向着壮丽的时代前进了。

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这是《徐秋影案件》的呐喊，这是历史性的共和国肃反人们对人们的要求。每一个政权都要镇压敌人，法国大革命如此，拿破仑的革命如此，十月革命是如此，中国革命也是如此。然而，作为肃反标本之一的《徐秋影案件》却因历史的误会，而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噩梦。它的发生和演变，已远离了国家公诉人和被害人的本意，亿万观众的集体记忆错位了几十年，文艺作品的受害人虽然在晚年获得了安宁，然而，当年的观众却开始叹息：逝者如斯夫！

1951 年的春天，东北的气氛就像电影《铁道卫士》所表现的那样，老百姓们沉浸在“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全民性热情之中。哈尔滨的大街上，人们在扭着秧歌，青年男女们唱着：

嘿啦个啦啦，嘿啦个啦啦，  
天空飘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

与此同时，一封控告信寄到了哈尔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控诉人称：三年以前，他的女儿赵洁珊（即“徐秋影”的原型）在松花江俱乐

部西侧的江畔被人枪杀了。公安机关虽作过调查，但在排除了几名嫌疑人（赵的追求者）作案的可能后一筹莫展，加上当时的民主政权镇反任务十分艰巨紧张，所以，这个案件被搁置了下来。因此，被害人的父亲呼吁政府“早日逮捕凶犯”。由此，哈尔滨市公安局成立了“2号案件”侦破小组，再次从死者的遗物中发掘线索，从赵洁珊的一个记事本（这也是电影中的“徐秋影”案件的灵感来源）中发现了一个地址。

于是，一切都不可能逆转了。

这个地址就是新中国“第一号女特务”邵玉魁（即《徐秋影案件》的女特务邱涤凡的原型）的住址。邵玉魁时年33岁，是一个活泼热情浪漫的女子，正沉浸在新时代的欢乐之中，按理说，一切罪恶和刑狱应该与她无缘。然而致命的是，她的妹夫李子和曾是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员，她的两个弟弟又当过国民党兵。她本人也同赵洁珊相处甚密，她所生活的城市——哈尔滨又是著名的国际间谍中心和国民党特务活动活跃的地区。于是，一切历史背景必将顺理成章地带出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是冷峻斗争时代的冷酷逻辑的必然产物。

这个左右了亿万人集体记忆的神话就是：邵玉魁的家庭是国民党特务的秘密基地。邵玉魁是骨干分子，她发展了赵洁珊为特务组织的外围成员，后来发现赵洁珊有所动摇，便指使她的弟弟邵莲魁将赵洁珊诱出枪杀。

已经怀孕的邵玉魁没有想到：正是她腹中的孩子救了她的性命。当她的妹夫李子和和弟弟邵莲魁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她的丈夫正在为婴儿的哺乳四处奔波，而她抱着双膝面对空白一片的墙隔壁，摇过来，摇过去。铁窗外传来隐约的歌声：

亲爱的朋友，祝你做一个甜蜜的梦，  
亲爱的朋友喔，祝你做一个甜美的梦。

这是一首有关三峡夜航的抒情歌曲，刚刚开始流行。按照邵玉魁那时的性情，她一定是最早学会这首歌的人。当年她常常这样，和赵洁珊一起哼着一些新时代的歌曲，她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唱着《你这个坏东西》时，互相打闹的情景。赵洁珊的拳头轻柔地敲在邵玉魁的前额上：你这个坏东西、坏东西、坏——东——西，哈哈一笑，向后倒去，她美丽的浅笑模样，留在了邵玉魁的心里。此时的邵玉魁凄凉地一笑，她再次辨识着自己的身份：一个凶手，一个被中华儿女唾弃的人，一个与新时代审美潮流无缘的阶级异己分子。

在《徐秋影案件》中那个面部扭曲、线条僵硬的女特务邱涤凡监视着徐秋影的一举一动时，邱涤凡的原型——邵玉魁却木然地站在铁栅栏之后，任凭参观者打量和议论：

“啧啧，长得还有点像呢，——做孽呀！”

“你别看她一副老实相，可坏呢，徐秋影就是她杀的！”

邵玉魁并不是没有澄清自己的机会，四年以后，也就是《徐秋影案件》在全国公映之时，哈尔滨人民法院根据她的申诉对案件作了一次认真的复查。当时正值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公布，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次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阶段，所以不用怀疑调查人员的公正性。调查报告长达3万字，用可靠的材料排除了邵玉魁当特务搞情报的结论，否定了她枪杀赵洁珊的定性，认为邵玉魁是冤枉的。

然而，第二年波澜壮阔的反右运动粉碎了她的一线希望，不仅如此，

她的案件株连面也越来越广，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一百多人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产生邵玉魁这样的游离于群体命运之外、有着独特生涯的人物。要详尽其悲苦人生是困难的，要发掘一些同情的眼泪更是无谓的，当事人的眼泪已经流得够多的了，为亲人的死亡，为苦命的孩子，也为她自己惨淡的人生，长期以来，她不再流泪，也没有泪可流了。但是，1987年7月6日，当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对所谓“邵玉魁特务案”进行彻底平反，宣告邵玉魁无罪时，68岁的邵玉魁流下了热泪。

如今的邵玉魁和她那四十多岁的儿子住在哈尔滨市的一个居民区里，靠着300多元的退休金度日，儿子单位里的效益很不好，只能拿到近于最低生活标准的工资，全家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一台洗衣机之外，再没有别的电器。但风烛残年的邵玉魁似乎并无怨言，能够平静地皮过晚年，这是她28年牢狱之灾的最大愿望，她也想不起来应该抱怨什么了。烧锅炉的儿子每天下班回来，笑嘻嘻地将班组里发的白糖和洗涤剂塞到母亲手里，屋里弥漫着蒸馒头的香气，儿子埋着头呼哧哧地洗脸，老太太凝视着儿子耳角上灰白的鬓发和脸上的皱纹，突然一阵心里发酸，这些年的日子，可是把这孩子给坑苦了。

更多的时候，老太太独坐在这间小屋里，冥想着往事。这是冬天，老太太感觉到，四十多年前的哈尔滨要比现在寒冷得多，那阵满大街的商店和饭铺、门口都挂着三、四层棉被厚的门帘，就这样，还挡不住凛冽的北风。有时候，老太太又觉得那阵并不比现在寒冷，那时候，她常常和赵洁珊等姐妹们踏着积雪到江堤上游玩，一打闹起来，就觉得浑身热呼呼的。她一闭上眼睛，就会浮现出那些姑娘们青春明媚的笑容，耳畔响起轰隆隆的秧歌声，天上飘着稀薄的白云，太阳把松江省的山河映射得绚烂而热烈，秧歌的声响越来越近。邵玉魁想着想着，手脚也动起来了，像是在比划着什么，这时候，居民区里老太太秧歌队的锣鼓声惊醒了她，她睁开眼睛茫然四顾，末了，她摇摇头笑了起来：“唉，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

#### 年度记事

#### 胜利突破了“三八线”

1951年的除夕，总攻开始的信号弹闪耀在临津江上空，密集的炮火，无数的重机枪，突然地发出怒吼。炮弹摧毁着“联合国军”和李承晚伪军的工事，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红色的信号弹升起了，中朝军队的第三次大反攻开始了！“三八线”西起临津江口，东至旧邑里海岸线，长达200公里，敌军布置了纵深70多公里的三道防线，部署了“联合国军”4个师，伪军8个师，号称“东方马其顿防线”，然而，几个小时以内，这条重要防线便被突破了。1月4日，中朝军队攻克汉城，几天以后，解放了37度线以北的广大地区。

#### 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经政务院会议通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于2月21日由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施行。

《条例》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于各种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解放后怙恶不悛、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将采取从重处理的原则。对于被胁迫、

欺骗而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对于解放前罪恶不大而确实已悔改的人员，特别是有立功行为的人员，则采取从宽处理的原则。

#### 零陵纵火案

农历元宵节那天，湖南省零陵县 7000 余人集会欢度节日，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然而，下午 1 时起，震惊全国的纵火案发生了，北风呼啸，城区烟雾弥漫，火势迅速扩散到几条街，顿时人马喧腾，哭声一片，欢庆的场面顷刻变做了凄惨世界。

经驻当地部队、公安消防部门和居民的大力抢救，火灾于夜 10 时被扑灭。据统计：火灾共烧毁房屋 1023 间（连同财物损失共值 159 亿人民币旧币），3 人被烧死，16 人被烧伤，受灾人口 2000 余人。

这次特务纵火案很快被人民政府破获，1952 年 3 月 7 日，对首犯张景星等 22 名罪犯宣判了死刑，并执行枪决。湖南省人民政府向受灾群众发放救济米 30 万斤并进行慰问。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受灾人民已在迅速地恢复和重建他们的家园。

“对于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零陵特务纵火案告诉人们：提高警惕，坚决镇压反革命，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的先决条件，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

#### 推广郝建秀工作法

6 月上旬，国营青岛第六棉纺厂女工郝建秀，创造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细纱工作法。其特点是：工作主动有规律；工作有计划，分清轻重缓急；工作交叉结合进行；重视清洁工作。由于主动掌握了机器性能，减少了细纱机的断头，缩短了断头的延续时间，使皮辊花率达到了 0.25% 的全国纪录，值车能力也成倍提高。为此，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在青岛成立了“郝建秀工作法研究会”，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测定和总结，并首先在青岛纺织系统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本年度 8 月，青岛召开“青岛市棉纺细纱职工代表会议”，全国各地的细纱工人代表、劳动模范、技术人员出席了会议，从此，郝建秀工作法开始推广全国。

#### 批判电影《武训传》

女教师领着一群佩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走进武训故居，她感慨万千地说：“武训老先生啊！你的伟大抱负，只有在今天，在毛泽东领导的光辉时代，才能得到真正实现啊！”女教师号召孩子们学习武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时，镜头出现地狱中被绑缚的众生，同时，圣人武训出现了，他挥舞着巨大的笔杆子，带领百姓们向天堂飞升。这是影片《武训传》的一个镜头。《武训传》自去年年末放映以来，好评如潮。在不长的时间内，京、津、沪 3 个城市的报刊上发表的歌颂影片和武训本人的文章就有 40 余篇，从 3 月份开始，才有少量的质疑性的文章出现。

对此，6 月 20 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措辞严厉，毫无调和余地，斥之为“狂热宣扬封建文化”，歌颂了一种奴颜卑膝的丑恶行为。《人民日报》的社论，给文化战线敲响了警钟。

#### 国泰民安享太平

“给诸位，道大喜，咱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先给咱穷人修！”

要讲修，都得修，为啥先修这龙须沟？只因为，这儿脏，这儿臭，政

府看着心里可真难受！好政府，为人民……国泰民安享太平！”老舍创作的话剧《龙须沟》发表在本年度《人民戏剧》上，作品以“人”和“沟”的对立展开戏剧冲突。解放前的北京政府只管收卫生捐，不管修沟，臭沟泛滥淫威：天一下雨，脏水四溢；天气暖热。蚊蝇肆虐，居民苦不堪言。解放后，人民政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首先将又脏又臭的龙须沟修成了暗沟，筑了马路，安装上了自来水。作品通过龙须沟的变化，歌颂了人民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语言生动，人物真实，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浓郁，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北京市人民政府因此授给老舍“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 《谁是最可爱的人》

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饱满的激情感染了全国读者，甚至影响了新时代的散文文风，后来许多人喜欢使用这样的句子：“当你……当你……”。这篇作品讲述了在朝鲜战争上发生的三个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的故事：松骨峰惨酷而壮烈的战斗；战士马玉祥不顾个人安危，冲入烈火之中救出孩子；作者在防空洞中与战士的交谈，表现战士对和平、幸福和荣誉的理解。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作品发表后，成为新中国散文的范本，“最可爱的人”也成为志愿军官兵的代称。

#### 妇女解放

解放战争结束后，支前的农村青年回到他们的家乡，发现家中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伦理革命：订了娃娃亲的女方一家纷纷要求退亲。于是不服气，找到妇救会评理：“我们可是给八路出的夫子，挖战壕扛子弹抬担架等工作，具有军事性质，那就算军婚。退亲这事儿，民主政府可不能不管！”妇救会的回答同样干脆：“娃娃亲纯粹是父母包办的，具有封建主义性质。大字不识一个还军婚哩，拉倒吧！——先参加识字班，再提结婚的事吧！”本年度的伦理震荡已经不再局限于“娃娃亲”，据统计“婚姻纠纷案已达到民事案的89%以上。这反映了《婚姻法》颁布以来，广大群众反对封建婚姻束缚的愿望；另一方面，干部中越来越多的离婚事件也引起普遍关注。这个现象的一方面，同女方未参加工作，政治上落后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喜新厌旧”的主观因素有关。揭露少数干部思想腐化、道德败坏的一部影片里，一位干部对他的情人说：“这是五十块钱，快去把孩子打掉！”

#### “土地证”

在农村引发不同反响在安徽风阳县姚湾乡，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我们的土地会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自中农原田不动，认为发证迟早没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富农也希望“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家门口我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账，所以表现得比较规矩。

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毛泽东在各种土地改革指示的末尾都特别指出：“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布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

契约。在发放土地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姚湾乡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农民鼓掌达 10 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 新中国的足球运动

全国首届足球大会在天津举行，以大连造船厂队为主体的东北足球队击败中南足球队夺得冠军，以此为标志，中国足坛的重心一度从上海移至东北。50 年代中前期，大连造船厂足球队一直雄居全国足球锦标赛和全国甲级联赛霸主地位。

## [附文]

### 上海正在欣欣向荣

李普

上海现在正在欣欣向荣。

一百年来，上海是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主要基地，它的工商业是由帝国主义者培养起来的。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它们主要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

去年三月全国财政经济开始转入新的轨道以后，上海工商业的痼疾全部暴露出来，工商业户纷纷停工歇业。那时没有一个城市的困难像上海这样严重。这证实了人们的这种看法：上海工商业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改造过程，逐渐在本国的经济生活中树植根基，然后才能伴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而重新发展起来。

上海的困难在去年五月中达到最高峰。六月以后，便渐渐好转。停工歇业的逐月减少，开工复业的逐月增加。十一月间工业用电竟开创了解放以来的最高纪录，十二月间更继续增高。年终结算，绝大多数行业除了挣回上半年所亏蚀的以外，还赚了不少钱。

这好转的趋势现在还在继续着。今年第一季申请开工的工业户为去年同期的十三倍；即使比去年第四季，也多三倍以上。复工的为去年第一季的二十二倍。商业方面，今年第一季申请开业的比去年同期多两倍，超过去年第四季三分之一。复业的为去年第一季的十三倍，而歇业的仅为百分之六。

目前不是没有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属于完全不同的性质。第一是技工缺乏。现在已经发生了许多技工跳厂和工厂之间高资争夺技工的现象。去年上半年全上海有十五万以上的工人失业，其中在三、四、五这三个月内失业的达十万人以上。现在全上海失业工人仅四万人，而且一般都是老弱的和没有技术的人。第二是原料不足和流动资金不够。总而言之，现在销路大体上已没有很大问题，所有的这些困难都是在市场好转的情况之下发生的。

从税收方面来看，今年三月间上海工商业户缴纳的所得税和其他税款，约略和去年这时候税收和公债的总额相等。那时工商业者大喊困难。但是今年他们兴高采烈，举行了一次集体交税的大游行。一年来特别是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以来，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就是他们如此踊跃交税的原因之一。同时，这的确反映了工商业者的处境是比过去好了。

根据所得税的自报查账户所申报的数字，去年赚钱最多的是机器染织工业。这一行业绝大多数的自报查账户赚了钱，总共盈余两千亿元。其次是棉纺织工业，盈余一千六百多亿元。

……

另一方面，去年工业中亏损的行业却寥寥可数，只有毛纺织、丝织、面粉、火柴等极少数行业。这些行业中一部分厂家略有盈余，但盈余的不及全行业其他厂家亏损的多。丝毛织品将来一定有销路。面粉和火柴工业，过去发展得大多，早已过剩，必须以销定产，逐渐打开销路。还有呢帽工业，几乎家家亏本。现在大家都不喜欢戴呢帽，只有改制适合人民需要的产品，才有发展前途。

上海好转得这样迅速，是和全国经济的恢复分不开的。促使上海如此好转的，是两个主顾。

一是一般人民，尤其是农民。机器染织工业赚钱最多，它们最突出主顾便是已经分到了土地而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去年上海的花色布销到中南的占百分之四十五，那里盛产棉花和烟叶。销到西北和华北的占百分之十六。西北要黑布和深色布。

华北主要由天津供应，但上海的紫红布还是大受棉农欢迎。

现在绝大部分中型以上的工厂所接受的定货已到年底，甚至还有接到明年定货的。

一是军队。脸盆、毛巾等等，凡是适合部队需要的，都有供不应求的现象。还有钢笔和口琴，去年的产量超过历史纪录好多倍，百分之八十的销路在部队。这并不奇怪，人民解放军是有文化的队伍，全国的文化高潮将首先在解放军中开始。

新中国的经济一定会逐步恢复起来，这是大家都相信的。上海是全国最大的轻工业城市，它的轻工业生产还有很大的潜在力。如果上述两种市场继续扩大，其他的城市不能满足这些需求，上海便将日益繁荣起来。很明显的，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投资必然与日俱增，军队的需求不会减少。至于人民的购买力，仅拿经济作物来说，今年棉、麻、烟叶的播种面积大大超过了去年。不要说像去年那样丰收，只要有一个平常年景，农民对工业品的需求就会比去年大得多。土地改革今春已经在一万万三千万人口地区完成，今年秋后又将在其他广大地区进行。这对工业将发生巨大的影响。夏收转眼就到，离秋收也不很远，农民就要伸出他们的手来。这是现在全国特别是上海所面临的问题。

（一九五一年五月）

## 1952年：黎明的颤栗

“照吧，照吧，让后人受教育……”

——张子善 1952年2月10日临刑前

刘青山永远忘不了马加什·拉科西温暖而坚定的栗色眼睛，在民主德国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后，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度过了愉快的几天。那位秃头、矮个儿、体形刚劲有力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

一书记走进中国代表团聚集的大厅里，同迎接他的中国同志拥抱。拉科西同志越走越近，刘青山和中国代表团成员们使劲拍着掌，手都拍得麻木了，他身边的一位景颇族女同志甚至欢喜得直掉眼泪。刘青山早就听说过传奇英雄马加什·拉科西的名字，真心地爱戴着这位“喀尔巴阡之鹰”，为他的到来感到激动和幸福。是啊，全世界爱好和平，崇尚进步的青年们谁不知道拉科西的名字？匈牙利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工人阶级的最优秀代表，他在霍尔蒂法西斯法庭上的英勇表现丝毫不逊色于当年“国会纵火案”中的季米特洛夫。50年代初期的中国干部和共青团积极分子们都读过一本名为《马加什·拉科西在法西斯的法庭上》的书，拉科西雷霆万钧般的宣告激荡着他们的心胸：“自由属于人民！”

这位平时只能在书刊上、新闻影片里、天安门群众游行时高举的画像里才能出现的人活生生地站在了刘青山面前，刘青山屏住了呼吸，凝神注视着这位“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一举一动。他有点诧异地发现，伟人的个头比他想像的要矮得多，面貌也并非肖像上的那般英武，双眼分得过宽（这令刘青山联想起河北农村的一种说法：这种长相的人，不是呆子，就是人精）。爱好梳妆、衣着考究的刘青山还注意到：第一书记的西服虽然质地不错，但做工却很一般。他刚刚看过一部匈牙利的喜剧短片，该片讽刺了工作中的不负责任行为，一个吊儿郎当的服装厂工人，漫不经心地对待装钉钮扣的工序。他自己因此而自食苦果，在舞会上为了遮掩他那条绷带断裂、随时就要脱落的裤子，只好掐着腰蹦蹦跳跳，这令他的女友感到气恼，忍无可忍中，女友离开了他。于是那冒失鬼张皇失措地扬起手臂：“亲爱的，回来！”裤子猛地滑落至脚背，舞会里一片惊叫。但是，为什么从拉科西同志的着装上产生如此般可怕的联想？刘青山暗想：这未免太不恭了而且……简直就是一种罪恶的念头！于是，他的脸上挤出些更加热切的笑容，伸手抢着去握拉科西同志的手。

在热烈的气氛中，拉科西同志讲话，大意是：本届世界青年联欢，出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如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生存下来的法国小伙子，找到了难友的妹妹（在波兰）；一位来自黄金海岸（加纳）的年轻乡村医生想提高技艺，而殖民者却对他的热情抱以冷漠的态度，所以聚集在布达佩斯的中国医生、苏联医生为他专门开办了短训学校。当然，匈牙利人民也是一个具有想像力的民族，他的民族有很多传奇，比如牧鹅少年马季（听众大笑、鼓掌，他们刚刚看过这部影片）。拉科西同志接着说：“不过，今天最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属于伟大的中国，在场的所有姑娘和小伙子都是真正的英雄，我为你们感到自豪（热烈的鼓掌）。”

在兴奋和欢乐的气氛中，拉科西同全体中国同志合影留念。合影之后，中国青年纷纷围拢拉科西，请他签名。不知为什么，平时爱出风头的刘青山没有挤上前去，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但是，活跃的拉科西还是注意到了这位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的年轻人，拉科西开口说话了，他指着刘青山：你，很像匈牙利古代的武士。

所有的目光集中到刘青山身上，刘青山被簇拥到拉科西面前。中国代表团负责人笑着介绍说：他叫刘青山，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副书记。15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匈牙利人发出惊叹的声音。拉科西眨巴着栗色的眼睛：唔，看来今天我们得请你给我们签名了。在场的人又一次鼓掌，大笑。刘青山慌里慌张地想掏出他的派克金笔，掏了半天，才把笔塞到第一书记温暖的



手里，拉科西飞快地为刘青山签了名。

签名之后，第一书记拉科西显然意犹未尽，他示意匈牙利记者为他和这位中国“红小鬼”拍一张合影，他站得挺直，紧靠着刘青山，毫不掩饰他对这位中国人的好感。

末了，他回过头来，坚定的眼神凝视着刘青山：我相信毛泽东时代会造就出更多这样的特殊材料制成的杰出青年。拉科西环视着所有的人：我们为毛泽东时代而祝贺吧。

这是去年秋季的一个镜头，极端自负的刘青山不知道，那一次戏剧化的场面竟然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荣耀（至少当时人们普遍是这样认为的，长眠于九泉之下的刘青山永远不会知道：4年以后，拉科西因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被开除出党，在苏联中亚地区度过了他凄凉的晚年）。现在看来，也许这是一次征兆，是刘青山革命生涯中的最灿烂的亮相。在这次会见的十几天以后，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大干线，进入了中国国境。虽然刘青山并不知道这时他的问题已被揭露，张子善也在河北省“三反”部署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但他还是从车厢里的广播新闻中感到了国内不寻常的气氛。终于，在列车驶进天津站时，面色严峻的河北省委干部和公安人员在月台上等待着。

至于那位拉科西同志是否听说刘青山最后的命运，我们已经不可得知了。不过我们可以猜测：那位老人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叹息不已的。但是，有理由相信：枪决刘青山等人，丝毫不会影响毛泽东在拉科西心目中的伟大。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前后，有许多令人感叹的细节。当时的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也是刘、张的副手）屡次规劝未果，向河北省主要领导反映了刘青山等人的问题。谁料，这位主要领导竟不以为然，摆摆手让李克才不要再说下去：“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小李呀，你要注意与老刘和老张搞好团结……”据说这位领导后来私下里还说：“卖主求荣，不好！”领导冷冰冰几句话使李克才挽救刘、张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去年的11月21日，在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李克才在会议讨论的第一天站起来，向与会的824名代表大声揭发了刘、张的罪行，引起全场轰动，在当时，李克才此举是相当冒险的，因为会议后有人断言这是一种反党性质的行为。但正义终究取得了胜利。

面对新中国第一贪污案的材料，毛泽东陷入了沉思。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有人提议：是否可以刀下留人，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而毛泽东说，正因他们俩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广，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甚至20000个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于是，领袖大笔一落，贪污元凶人头落地。

本年度2月10日，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保定举行，两万人参加了大会。

会上，河北省副省长薛迅代表省政府宣布了刘、张的罪行。据查，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侵蚀下，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区造船贷款、河工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总计达171.627多亿元（旧币，下同），用于经营二犯秘密掌握的“机关生产”，他们勾结奸商，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使国家损失达21亿元。1950年到1951年春，在兴修潮白、

永定、大清、海河等工程时，他们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出卖，换成坏粮，抬高民工食品价，先后剥削及窃取折旧费共 22 亿元。

使民工因食品恶劣、劳动过度病残或死亡多人，民愤极大。刘青山、张子善将盗窃和非法经营所得大肆挥霍浪费，生活奢侈腐化，刘青山甚至堕落到吸食毒品成癖。

1950 年下半年，刘青山用公款从香港购进两部小汽车，一辆留给自己（调离时拒不上交，带到了石家庄市），另一辆送给了别人。不到半年时间，刘、张二犯贪污挥霍达 3.78 多亿元。其中刘青山为 1.83 亿元，张子善 1.94 亿元；刘、张二犯已经堕落成革命事业的无耻叛徒，河北省高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二犯死刑，立即执行。

听到死刑的判决后。刘青山周身一颤，张子善则触电般地双膝一软。列车在大街上缓缓行进，街道两边站满了群众。刑场上寒风凛冽，远处的学校里传来歌声：“前进！我们新中国的青年……”而摆在刘、张二人面前的是两口醒目的紫红棺材。

一位省委干部向他们宣布中央指示：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枪决后妥善安葬，棺木公费购置；三、家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子女由国家抚养。中央指示宣读后，两人终于开始放声大哭。省委干部也露出不忍之色，摆摆手说：“去吧……”。临刑前，张子善感觉到记者的照相机对准自己时，呜咽着说：“唉，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教育……”刘青山则长出一口气，眼圈发红，将脸扭向一边。张子善又嘟囔道：“枪毙我一个人吧，枪毙我一个人吧……”刘青山大喝一声：“孬种！”这时候，他也许想起了布达佩斯的戏剧性场面？——直到临死，他的身子跪得板直。

#### 年度记事

####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的祝词中说：“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声音，它标志着共和国第一次反腐败斗争轰轰烈烈的开始。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贪污大体有以下几种：——出卖财政情报，如税则税率的变动，拍卖物资的底价等；勾结奸商盗取国家资财；造假报告，假单据，骗取国家资财，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包庇走私漏税；受贿吃回扣；侵吞公款，据为已有，挪用公款公物，从中牟利等。

1 月 26 日，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城市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 上海的斗争

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成为“五反”运动的漩涡地带，奸商们为了遂其私利，用尽了各种罪恶手段，如用腐烂棉花做成“急救包”，高价卖给志愿军，把不能用的汽车零件卖给志愿军，用坏牛肉做成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在咸菜里掺砂子，等等。更为恶劣的是，奸商们居然对揭露他们罪恶行径的人进行暗害。上海铁路局麦根路货栈巡守组组长于春根就是奸商们报复的对象，奸商们一开始为收买于春根，不仅送去钞票，还有火腿、衣料等物，遭到于春根严辞拒绝。奸商们又恼又恨，三番五次想害死于春

根。有一次，奸商用一辆卡车撞断了于春根 4 根肋骨，阴谋被揭露后，于春根的光荣事迹传遍了上海。

本年度，专政机关对气焰嚣张的奸商实行严厉打击，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王康年被判处死刑。

#### 英雄辈出

据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表的联合战绩公告说：战争爆发以来，朝中军队共毙伤俘敌 66 万余名，其中“联合国军”31 万人，李承晚军队近 35 万人，击落击伤敌机 7300 架，并缴获大量物资。本年度涌现出一大批如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根思为代表的国际主义战士。黄继光是迄今为止，我军历史上唯一获“特级英雄”殊荣的士兵（另一名特级英雄是彭德怀元帅）。本年 10 月 20 日，黄继光跟随部队一起反击敌人。途中，敌人的地堡封锁了前进的道路，他对指导员说：“我去炸毁它。”当黄继光接近第四个地堡时，他身边的两名战士已经牺牲了，黄继光也中弹栽倒了。当枪炮声再次惊醒黄继光时，他用力支起上身，奋身一跃，用胸膛堵住了枪眼，扫除了前进的障碍。

#### 省市建制及大机构调整

全国原分 30 个省、12 个直辖市、5 个行署区、1 个自治区、1 个地方、1 个地区。

本年 11 月 15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19 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省区建制的决议》决定：撤销平原省，其行政区分别划回山东、河南、河北三省，撤销察哈尔省，其行政区分别划归山西、河北两省；撤销苏南、苏北行署区，恢复江苏省，南京直辖市改为江苏省辖市，撤销了皖南、皖北行署区，恢复安徽省；撤销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行署区，恢复四川省。19 次会议还决定，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会议还决定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机构。

#### 新的工资制

本年 8 月 1 日，政务院通过了《关于颁发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人员津贴标准及工资制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的通知》，此《通知》从 8 月 7 日起施行。各级人民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津贴分为 29 级，并实行工资分制。最高如国家主席、副主席工资分为 1006 分，最低区、县勤杂人员（29 级）为 85 分。每一工资分所含实物的种量与数量，一般地区均应为：粮食 0.8 市斤；白布 0.2 市尺，植物油 0.05 市斤，食盐 0.02 市斤，煤 2 市斤。据有关资料显示，毛泽东主席月工资标准是 300 万元（人民币旧币），折合成植物油 50 市斤。

#### 中国作家获斯大林文学奖

本年 3 月 15 日，苏联部长会议作出以斯大林奖金授予 1951 年文学艺术方面有卓越成绩者的决定。中国作家获奖的有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二等奖），贺敬之、丁毅的歌剧《白毛女》（二等奖），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三等奖）。

#### 张资平的命运

根据《惩治汉奸条例》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张资平，在国民党政府溃逃前获释，赋闲在上海寓所。张资平早年曾是“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的重要领导人，还是邓演达的政治秘书，他幻想着能够通过这一层关系得到昔日党内同志的帮助和人民政府的任用。上海市政府一位农工民主党的副市长

曾接见张资平，严肃地告诫他：要认真反省过去的罪恶历史，洗心革面，争取宽大处理。张见钻营无望，又致信上海市教委，要求去华东师大教书，未果。1951年，某省到上海招聘师资，张资平隐瞒了历史，领到了一笔派遣费，但不久便被群众揭发，张资平受到严厉训斥，取消了派遣资格。随着镇反运动的深入，张的历史罪行再次被司法机关追究，本年张资平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8年，押赴安徽某劳改农场劳动。数年后，张资平在劳改农场病死，这位当年上海滩红极一时的“三角恋爱”作家，仅次于周作人的第二号汉奸文人，寂寞地了结了他的残生。

#### 抗议处死罗森堡夫妇

12月27日，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等14个团体发表声明，抗议美国联邦法院判处罗森堡夫妇死刑，指出：这一判决是美国政府迫害进步人士的悍然行动，旨在煽动反苏的歇斯底里。

罗森堡夫妇是犹太人，供职于美国原子能研究机构。联邦调查局指控他们从1944年起便向苏联提供原子弹情报，严重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联邦法院于本年判处这对夫妇死刑，并于1953年用电刑处死了被告。

罗森堡夫妇案件是冷战时期的焦点新闻，被美国舆论界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轰动的案件”，全世界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和左派力量都参加了援救罗森堡夫妇的行动。

## [附文]

假如我们死了

（美）伊斯尔·罗森堡

你们会知道，我的儿子，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留下歌没有唱，  
丢下书没有读，丢下工作没有完成，  
就长眠地下。

别再哀悼吧，我的儿子，别再哀悼。

为什么他们造谣诬蔑，阴谋陷害，  
为什么我们流泪，忍受痛苦，  
全人类都会知道。

大地有一天会笑逐颜开，我的儿子，会这样的，  
我们的长眠地将万古长青，  
那时，屠杀将会终结，  
全世界在友爱与和平中绽出微笑。

工作吧，建造吧，我的儿子，  
造一座纪念碑，献给爱，献给欢乐，  
献给人类的高贵品质和我们的信念，  
保留给你们的，我的儿子，保留给你们的。

——选自《罗森堡夫妇狱中书信集》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3年版）

## 1953年：二流子涅槃

“洗衣服啊大嫂，裤腿挽得这么高，腿还怪白的哩！”

“还有你娘的腿白呀？”

“什么态度？”

“这个态度就不孬！”

——刘玉堂《温暖的冬天》

50年代的中国以钢铁巨人般的脚步前进着，时代的巨轮碾轧着旧中国的一切，它的制度、法统和生活方式。在横扫一切旧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旧中国的另一种产物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农村二流子和城市无业游民。社会结构中的惰性气体——二流子和闲人，虽然不像地痞和匪霸那样属专政机关打击的对象（严格地说，二流子阶层仅仅是伦理道德领域的癌疾，在政治上基本上是无害的），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已经成为照耀各项工作的明灯，对工业、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伟大任务，这是一场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革命。自然地，一切剥削阶级习气也成为社会伦理革命的对象，毫无疑问，二流子阶层所具有的好逸恶劳的品行同新时代劳动人民的趣味格格不入，二流子阶层注定无法逃避时代的清洗，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农村合作化的洪流将把旧时代的泥淖席卷得干干净净。

实际上，改造二流子的社会革命从延安时代就开始了，二流子变成劳动模范的事迹成为边区最为感人的故事。然而，改造好的二流子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是风毛麟角，正如叫花子有乞讨为生的嗜好一样，二流子骨子里也具有根深蒂固的“闲云野鹤”情结，我们可以推测：二流子的生活方式如果换在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男人身上，乡党一定不会特别的鄙视他，大家可能还会觉得他风流喜洽，是个雅人。而不幸的是，在中国生活水平很低的农村，一个以田土为生而又不事生产的人是大逆不道的，由于二流子和邻居一样属于劳动阶层，尽管他的言谈举止低级而有趣，但正如萧伯纳当年拒绝邓肯的求婚所说的：“假如我们的孩子脑瓜像你一般疯狂，身体又像我这般孱弱，那岂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结合？”——二流子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现实结合得如此糟糕，他们为正经的农业劳动者所唾弃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二流子这一名词已经从中国人的辞典中消失，成为一种真正的记忆。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农村的茶馆里成天闲坐的年轻人那里看到某些印记，长者同样会鄙夷他们，并且用古色古香的“二流子”一词来咒骂他们，以他们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子女。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不会有人送他们去劳动教养，他们也不愁找不到对象，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坐茶馆的原因，他们的谈吐比一般农村居民拥有更多的信息量，他们诙谐喜洽的性格有可能博得女青年的喜欢；他们中间的部分人由于东游西荡而见多识广，只要他们有所行动，他们有可能成为农村的“能人”——《编辑部的故事》里的假导演江宝根就属于这种新型“二流子”。

正如当年的二流子属于城乡范畴的社会概念一样，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城市青年中轻而易举地找到某些当年二流子的特征，甚至贾平凹笔

下的“闲人”如果出现在 50 年代，也难免被认同为二流子阶层。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二流子体现出的与民族现实不符的个性在当年是超前的，他们的无所事事、油腔滑调，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年代是可以被民众所宽容的，但在那个年代，在一种窘迫的生活条件下和严肃的社会空气中，二流子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一种罪恶。我们今天以同情的目光看待当年的二流子，是因为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那个时代不同。80 年代有一部名为《咸亨酒店》的戏剧，里面的阿 Q 深得观众的喜欢，缺了二流子阿 Q，气氛当然要索然得多。很明显，导演也对这个角色注入了深厚的同情，他是这样处理阿 Q 被杀的场面的：阿 Q 被五花大绑、骂骂咧咧地经过咸亨酒店：“他妈的，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小 D 哭着冲上去抱住他：“阿 Q 哥！”文学批评者会认为这个场面不伦不类，但它折射了今天的人对人性的关注，反映了今天所流行的“爱心”——这种“爱心”当然也是同严肃的历史环境格格不入的。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要当心，假如一个老太太夸你“很活跃”，那一定不是什么好话。老太太一定从你的油腔滑调、游戏人生的样子联想到了她的某个亲戚——一个抽大烟、玩蟋蟀活活把家业败尽的亲戚。败家子往往是二流子的前身，享乐主义是二流子的温床。

五、六十年代的二流子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屡有表现，这种人的特征一般是：厚颜无耻、嗜赌成性、讲究吃喝、游手好闲，是剥削思想社会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二流子的劣根性，他们往往被阶级敌人利用，在物质利益引诱下充当破坏农业合作社的不光彩角色。二流子出身流氓无产者，是团结和帮教对象，所以地主、富农乐于利用他们的糊涂观念和愣头青性格，让他们充当向农业社进攻的工具。

我们可以综合各种文学作品的描写，想象一下 50 年代里，一个二流子怎样度过他的一天。

二流子的作息制度和一般农村人不一样，50 年代的许多农村是不通电的，因此，绝大多数人在晚上八、九点钟便早早入睡。二流子则属夜猫子类型，昨晚 12 点钟，他在镇上赌输了钱，点着一根偷来的葵花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几里路回家，二流子的家在村头，是一间破破烂烂的土屋，除了一张小饭桌和一个旧床外，几乎没有任何家当，床上只有一付草垫子，米缸也是空的，所以二流子的家是不用上锁的，门上象征性地用草绳扣住，进屋时拔拉开草绳就是了。二流子的睡眠一般要持续到第二天晌午，外面的喧腾世界丝毫不能影响他的好梦，然而最近不太一样，村子里的有线广播喇叭架在木屋后的树上，一大清早就把二流子吵得不能安生，“农业社是我们的幸福园地……”，这个清脆的、浓厚学生腔的女声出自富裕中农的闺女，二流子身体卷成一个“”形捂着耳朵，用淫褻的语言把这女孩子和她的母亲、她的祖母、她的祖宗十八辈女性亲属骂了个遍。很明显，二流子无法安睡了，当然他决定不再挺身大睡也有生计上的原因——他已经断炊了。这个月补助给他的救济粮，已被他拿到镇子上换成挂面和猪蹄子捣了臊子，余下的换了钱赌输了。找村主任想办法吧，只能白遭一顿数落；砍点竹子卖到纸厂吧，竹子又沉，路又远，而且又卖不上价，——二流子的祖上给他留下的十几顷好地、镇上的店铺和一座碾米厂早在民国 36 年便在一场豪赌中输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屋后的一大片竹林和两亩薄地。不过这对他来说是一场幸事，划

分成份的时候他被定为“小土地出租者”，政治上同上中农一视同仁。但真正有田产有家业的上中农是耻于跟这个二流子为伍的，每逢二流子腆着脸向村里的上中农告帮时，他们会扭过头去朝地面上猛冲一口：“呸！”

送子观音瞎了眼，生出这么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所以，跟这些人惜粮食是绝不可能的，想到这里，二流子直起身来恨恨地骂：妈的，迟早一天老子要起来共你们的产！统购统销，折产归社，看你们还能神气几天？”

二流子有一个特点：尽管他们时常为生活问题所困扰，但他们似乎总是沉得住气，村头的庙宇是长者聚集的地方，他们三个五个一堆蹲在戏台子下面晒着太阳，聊着年景，二流子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年轻人，他在长者圈子外敞怀们虱，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长者们虽然平时为人厚道持重，但对混在他们中间的二流子也不免口尖舌利起来，他们会动不动拿二流子来说事：“给困难户吃供应粮咱没意见，可就像他（指着二流子），人高马大的，种着几亩好田，一粒粮食不交，张着一张嘴每年叨集体的供应粮……”，“长贵家的大小子成天不学好，东游西逛，田也不种，到了老也就是他（指着二流子）这样了……”，“啧啧，村干部一开会就煮挂面，二流子也在家里煮挂面——你算老几，也配？”二流子也习惯于自轻自贱，非但不生气，还挺凑趣，一面捉虱一边点头哈腰：“嗨！提我干嘛？我这人模狗样还值得您老操心？不过现在的干部哇，日子是过得不赖……”他很容易地把人们说闲话的目标转到干部那里了。虽然大多数时候人们并不把二流子当作正经的发言者，但有时候二流子的风凉话中透出的信息也不能不使戏台子下的人皱皱眉头。农村人承认：二流子的眼神好使。

在农村时，只有这几类人是满口新名词：干部、青年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再有就是二流子和地主。二流子喜欢说新名词，是因为他喜欢到城镇活动，因此他的流行语汇不亚于城镇居民。二流子能说新名词还有一个好处：每次向村干部申请供应粮时，可以用新名词来表态：“明年，我一定……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村干部也被他逗得一乐：“走走走，别让我再听到你这个腔！”二流子深知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懂得撒出些油腔滑调是可以的，但绝不能登鼻子上脸，这是一种生活智慧，违背这种原则，只能自取其辱。二流子一般都有一个很难听的外号，这外号基本上人人都叫得。但假如有两种人叫他的外号，二流子一定是要生气的。一种是小孩子，当一群小孩尾随在二流子身后喊着“大喇子”、“滚刀肉”之类的外号时，二流子会猛地转过身，露出很凶的样子，小孩子便一轰而散。二流子追几步，扔一块石头，然后悻悻的拍拍手，用很恶毒肮脏的话咒骂着他们的父母，抄着双手一摇三晃地继续走道。地主分子也不敢惹二流子，二流子的流氓无产者本性爆发出来，是很可怕的，不仅如此，地主在村子里，除了怕干部之外，最怕二流子找麻烦，地主见着二流子都躲着走，唯恐二流子把他们当出气筒。是的，二流子只能在地主身上找到社会主人的感觉，只要他们有闲工夫，他们随时都要发泄这种感觉。在村间的戏台子前，偶尔也有一个地主经过。这时候，笼着袖子昏昏欲睡的二流子便露出亢奋的表情：“唉？你这个老不死的，凑什么热闹？我们贫下中农（根据不同地区，或称贫下中渔、贫下中牧）在这里谈事，有你这个狗地主什么事？想搞破坏吗？”地主一惊，连忙陪笑脸：“哎，哎，大侄子，这不，我去地里收拾我那点麦子，刚路过这儿……”二流子披上棉衣，威风凛凛地站起来，提溜着地主的脖领子：“收起你那一套！谁是你的

大侄子？这些日子艾森豪为儿打朝鲜（注：农村人不懂艾森豪威尔是个全名，误以为美国总统是为他的儿子出兵朝鲜的），我瞅着你也想要‘炸尸’了！”地主带着哭腔向二流子告饶：“大兄弟，你放我一马吧，乡里乡亲的……。”二流子啐了一口：“呸！你别做梦！想变天？重新剥削老子（天知道谁剥削过他！）？你死了这条心吧，滚！”二流子飞起一脚，地主踉踉跄跄地跑了，二流子的这番表现着实让戏台子前的人们打心眼里感到讨厌，但大家都不好说什么，斗地主嘛，于是，大伙儿都不再说话，日头已值晌午，人们陆陆续续散了。

二流子折腾了一阵，也感到有些无趣，更主要的，他觉得饿了——虽然农闲季节每日只吃两餐，但饿了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二流子不想回家蒸红薯，他木立了半晌，忽然想到：舅舅家里今早打酒割肉，不知是什么事，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去蹭他一顿再作图谋。

打酒割肉的这家人原是为招待邻乡来的亲家，主人眼尖，远远地看到二流子佝偻着肩穿过邻家的菜地朝这厢走来，顿时一股恶气窜上心头，主人叫过灶房里烧火的女人，如此这般地嘱咐了几句，折回堂屋里。

二流子还未走拢，便闻到了肉菜的香味，他清了清喉咙，正想大声甜蜜蜜地唤几声“舅舅”，冷不丁两条恶狗窜了出来，朝着他狂吠乱咬，二流子连忙挡狗呼救：“舅舅！舅妈！家里有人吗——快出来管管狗！”没有人搭理他，他的裤子被撕裂了，发黄的棉花飘了出来。这时候二流子看到了舅舅家的小孩——他的两个表弟出现在院坝里，这两个可恶的小杂种非但不管狗，反而被他的狼狈相逗得哈哈大笑，一边笑还一边鼓励着恶狗：“咬哇，咬！”

舅妈终于出现在院子里了，她先喝走了两个孩子，一边拿着扫帚撵狗，一边打狗一边嘴里骂：“该遭五雷劈的畜牲，只配吃屎的畜牲，一天到晚就知道东寻摸西寻摸，谁有工夫伺候你这个畜牲！——瞧你们这副癞样，还不趁早给老娘滚开点！”

这哪里是撵狗，分明是在骂人，二流子虽然脸皮厚，但也知道舅舅家里不可能有他的座位的，他暗骂一声“晦气！”讪讪地离开了这所院子。

更多的时候，二流子的生活是看不到希望的，农妇的叱骂只是他们每日生活的日常内容之一，他们随时随地都面临着这种尖冷的人言。然而，他们能够磨练出来这样的本领：很快就将恼怒化解为无，鲁迅当年写道：在喝过两碗黄酒之后，阿Q又高兴起来了，那么，二流子又为什么事高兴呢？闲汉们总会找到乐子的，在不知什么地方蹭过一顿饭食后，二流子的步伐变得轻快，骨头也轻了许多，他走过村口的小桥，见军属何大嫂在沟边洗衣服。于是笑咪咪地打招呼：

“洗衣服呢大嫂！裤腿挽得那么高，腿还怪白的哩！”

性情泼辣的大嫂气得发怔，一扔衣服，回敬道：

“还有你娘的腿白呀？”

“什么态度？”二流子悻悻然。

“就这态度就不孬，瞧你那副德性，二流子！”

二流子一边走一边嘟囔：

“这老婆，太骄傲自满了，瞧男人回来怎么收拾你……”

天知道，二嫂的丈夫回来会收拾谁呢？只要二流子出现在村子里，这种粗俗的风情剧每天都会上演，二流子的欲念通过这种途径得到某些发泄，



但这只是二流子阶层最后的快乐，当旧社会的情调随着时代的脚步消失的时候，二流子生活方式的温床也将被无情地摧毁。

#### 年度记事

####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本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日报》于9月25日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人民日报》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又是实现三大改造的物质基础，而现实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两者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是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特点。

#### 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在签署停战协议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1953年7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了协议。27日，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板门店正式签署朝鲜停战谈判协议及其他有关协定，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上签字；金日成于平壤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上正式签字。28日，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定上签字。

金日成和彭德怀27日发布停战命令，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全线完全停火。一位深受美军喜爱的志愿军女广播员在这个难忘的夜晚向她的听众告别，她动情地用英语向美国士兵们告别，最后一句话是：“请想一想，这场战争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呢？”可以补叙的一个细节是：在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朝中方面的一位军官用苏制打火机点烟，打了几十下不见火苗，会场空气顿时尴尬起来，美国军官友好地赠送给对方一只美式打火机，军官点着香烟后，满意地点点头，然后手一扬，将那只银光闪闪的打火机扔出他背后的窗口。

#### 毛、梁交恶

“跟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他这个人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在政协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梁漱溟问题的长篇报告时，毛泽东不断插话，用这样的措辞严厉批判梁漱溟，并评价梁是用笔杀人的伪君子。几十年后，梁漱溟先生提起这一段往事时，仍然为这一层极深的误会而痛心疾首。事情起因是：梁在8月11日的政协扩大会议上发言，认为近几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生活依然很苦，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相差太远，他说，如今“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党放弃了农民。12日，毛泽东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他的发言，梁听后“甚感意外”，但并不服气，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收回他的批评，并说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13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16日，梁再次登台声明自己不反对总路线。17日，周总理针对梁的“倨傲”发表讲话，提起了国共和谈时期不愉快的往事。1946年梁漱溟、罗隆基等人曾起草了一个协议，该协议显然认识不到国共冲突的实质，虽经周恩来抗议后收回，但已经太伤

感情。梁的耿直从这次政协会议上开始出名，直到 70 年代，梁屡屡在政协发表“不合时宜”的讲话，周恩来深知梁之性情，指示“可不必纠缠”，使梁漱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平安无事。

#### 斯大林逝世

尽管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号召信徒为病重的斯大林祈祷，但斯大林还是于 3 月 5 日病逝。获知噩耗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往苏联大使馆哀悼，并向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致电吊唁。3 月 6 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3 月 7 日至 9 日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一切饮宴和娱乐活动。全国县以上行政地区一律于 3 月 9 日举行追悼大会。

3 月 9 日下午 5 时，正当莫斯科举行斯大林葬礼的时刻，天安门广场也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向斯大林遗像敬献花圈，从来德总司令到鲁迅夫人许广平等各界人士纷纷致辞哀悼。同时，《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伟大的友谊》一文。

诗人流沙河回忆：单位举行斯大林追悼会时，有一人突然放声大嚎，令会场中人十分紧张，年轻的流沙河认为此举不免矫情，也许正是这种“独立见解”埋下了以后的《草木篇》的祸根。

#### 中国式集体农庄

“高级社一成立，跟苏联老大哥差不多了吧？”“差不多！”

“共产主义一实现，那个牛奶还喝不惯哩！”

“经常喝就喝惯了……”

这是 50 年代的典型对话之一，反映了中国农民对集体化之路最率真的理解。地处北大荒黑龙江省克山县的和平村就出现了高度集体化的集体农庄。和平村是一个有四、五年劳动互助基础的村庄，全村 282 户中只剩下 3 户单干的农民，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思想觉悟的提高，必须走苏联农民走过的集体化的道路，和平村集体农庄就这样成立了。这个农庄的主要生产资料折价作股归集体所有，但每户仍留有自己的房屋，几亩菜园和一两头母牛，他们还可随意饲养猪和鸡只等。

集体农庄的核算实行劳动日制分配，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形式。集体农庄制度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所有农作物的产量都大大超过了一般农业合作社和互助组。

如庄员王焕义过去是一个有三匹马和七公顷半地的富裕中农，参加互助组时，全部收入为 23 石 1 斗粮，然而，集体农庄的头一年，庄员每户平均净分便达 30 石 8 斗粮。

#### 干涉婚姻自由逼死人命案

据新华社报道：安徽省歙县卫生院秘书朱唯物、院长张锦辉、县府民事科长钟生明等干涉女护士江丽丽婚姻自由，非法审讯逼供，致使江丽丽投井自杀身死。

江丽丽与卫生所干部赵立品发生恋爱关系，赵立品工作有错误，被停职反省，接受调查处理，负责调查赵立品错误的钟生明不是对赵进行正确的思想教育，而是着重纠缠他和江丽丽是否发生性关系的问题。钟生明、张锦辉、朱唯物还不断给江丽丽施加压力，其中朱唯物表现最为恶劣，他非法审讯江丽丽，常常在半夜三更把江从床上拖起来讯问，强迫她承认被赵强奸过，江迫于威胁，捏造了口供，赵立品得知后服毒自杀（未遂），县里不但不予重视，反而判处赵五年徒刑。

江丽丽后也因不堪迫害，跳井自杀。令人发指的是，县法院在江死后，还非法开棺验尸，一定要达到证明江丽丽被强奸的目的，此事引起公愤，有关当事人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 育婴堂黑幕

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被嬷嬷关进狭窄的铁箱子里，当人们打开这铁箱，女孩子僵硬的尸体已变成一个“V”字形，这仅仅是有关育婴堂慈善外衣下的罪证之一。

7月4日，上海群众九百多人聚集在徐汇区的育婴堂广场，追悼被帝国主义以“慈善事业”为名而杀害的无数无辜婴儿，到会家属们静听着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圣母院工作组宣布经过调查的婴儿名单，盼望着能重新和亲生骨肉团圆。但名单宣布后，绝大多数家长失望了。家属吴杏芬昨上午带着一盒月饼赶到会场，想看一看才生下一个月就送进育婴堂的孩子，但她在会场上只看见一堆婴儿骨骸，她悲愤地哭着说：“我的孩子要活着已经九岁了。现在没啦，我恨死了帝国主义分子！”这些家属们在解放前因生活困苦而被迫把孩子送进育婴堂，但今天他们只看到残害孩子的木棒、铁棍、剪刀、鸡毛帚，看到了搬运尸体的工具：竹篓、扁担、棺材、破席子……这些触目惊心的实物使人们痛哭失声，从掩埋被害婴儿的“圣地”挖掘出的累累白骨，令人们为之战栗、愤怒！

## 1954年：西望长安

“我没有别的企图，只是为往上爬。爬得越高，享受越好！……我只想骗点好吃好喝，没有别的。……我胆子最小！我不敢面对困苦，困难，

我老想吃现成饭！”

——老舍话剧《西望长安》台词

一切带着旧时代气息的游魂——有产阶级家庭的食利子弟、城市阿飞、妓女和二流子，一切旧中国腐朽生活方式的余孽，正在丧失着自己的家园。同时，一种代表新时代社会精神的崇高原则建立起来了。本年度，“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发表了著作《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中写道：

“在我们的时代，一些普普通通的平凡人，都可能建树伟大的功勋。这是因为党把我们引向正确的方向，给了我们智慧。创造的大门是为每个人敞开的。只要我们留心看一看，就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平凡可爱的英雄，即使是遭受到最不幸的人，他的前途也仍然是光明的。

“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因此每一秒钟对我们都无限珍贵。我们应该让每分秒都过得有意义。人活着，不能只是吃饭穿衣，混一辈子。生活应该有更高的目的。

只图个人的安逸和舒适，那是卑鄙的自私。一个人，如果谁都不需要他，即使活到150岁，并且无病无灾，也不能说他是幸福的。”

《把一切献给党》同60年代出版的《雷锋日记》一样，在生命价值、事业与幸福的理解方面惊人的一致。但如果将两者的时代意义作具体化分

析，那么《雷锋日记》可以看做新生代中国人的青春誓言，而《把一切献给党》则是新中国社会原则和理想原则的首创；《雷锋日记》是三年困难时期后收拾人心、反对自由主义的精神范本，《把一切献给党》则是对一切旧社会意识、一切资产阶级享乐人生观念的第一次宣战。

只有固守快乐原则的人才对新中国倡导的公民生活方式感到恐慌。小说《红粉》中写道：两个旧中国的浪荡子——一个是从良的妓女，一个是富家子弟，按照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开始了夜生活。然而，新中国正在扫除一切形式的夜生活（除了电影院之外）：舞厅关闭了，咖啡馆改成了食堂，他们只好在苍茫夜色之中仓皇四顾。

终于，他们在三轮车上发现了一个马上要收场的夜市，女孩大喊起来：“快，快！”

“快去买一客水晶包！”男的跳下车去，捧了一客热腾腾的水晶包回来，女孩嘴里咬着油汪汪的水晶包，浮现出甜美的笑容。那一声“快、快！”无疑包含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一切都在收场，而在收场之际，人们挣扎着，试图挽留住最后的温馨。这种挽留是徒劳的，正如《红粉》最终揭示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样，享乐生活观越顽强，失去的就越多。不管是挣扎还是驯服者，最终会成为新中国价值观的善男信女，就像电影《活着》所刻画的那样。本年 10 月，敢于向新中国崇高社会原则挑战的“张老头”被北京公安局收审，“张老头”本名张瑞生，是北京德胜门的一个老书贩子，为人桀骜不驯，日伪、国民党时代都拿他没办法。人们给他起了不少外号，如“老疯子”、“老腐败”、“老国民党”。张瑞生有个特点：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书都敢卖。就像张瑞生自己说的：“进去是我张老头，出来还是我张老头！”他讥笑检举者说：“你想敲我的饭碗呢？差得远呢！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偷盗，四不卖国，你狗拿耗子，多操这份心！”——张瑞生的书摊在这个地方小有名气，他经营着德胜门小市靠东南边的一个旧书摊，摆满了各种旧书，只要看看这些书的名字就够了：《狂蜂戏蝶》、《性典》、《风流佳人》、《灯草和尚》……还明日张胆地摆着许多裸体画报。这样的书摊自然吸引了许多主顾，只要围观的人一多，张瑞生便清清喉咙开讲：

“列位看官，要说如今这社会可就是太封建！这些书在日本时代，在解放以前那都是风行于世自由买卖，那时候连明信片上印的都是裸体女人。南美洲的人 12 岁就生儿养女，可咱们的婚姻法规定要 20 岁，这就造成一般青年人的痛苦。众位既来这儿看书，就不用怕羞，常言说得好：书中自有颜如玉，年轻人要不懂这个，那可就枉活一世了。”

这个“老疯子”的被抓使德胜门少了些热闹。司法部门宣布他是“杀人不见血的教唆犯”，按照法律、这种罪行最严重的可判处死刑。事实上，张瑞生的罪行足以被政府课以重刑，他家附近的私营新华铁工厂就有不少工人爱到他那儿看书，厂工会主席揭发说：“我们工厂的 30 多位工人，都看过老头儿的书，有两个结了婚的青工连干夜班的时候都看淫书，看过以后就去找暗娼。”张瑞生被捕后，德胜门一带的居民拍手称快，这个浑身散发腐朽气息的老废物终于得到了报应。

张瑞生教唆案是 50 年代社会改造进程的一个插曲。这个改造进程是艰巨而伟大的，改造妓女、改造二流子、改造一切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并不只限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团体自上而下的号召，它需要依靠一种全民性的动员、一种有序的思想赖以生存的温床。游手好闲者在新社会、新风尚的汪洋

大海之中再也不能继续逍遥下去了。这是个人生活无法逃脱时代检视的年代，个人生活并不能作为逃避社会神圣原则检视的借口。不允许“多余人”我行我素——电影《青年一代》就有这样的镜头：资本家的儿子郁郁寡欢地坐在亭子间里说：“我不想上班，老爹留给我的利息够我吃几年的了。”而主人公则严肃地告诫他：他应为这种生活方式感到羞耻。相信所有的观众都会对这个典型的食利者的生活方式产生本能上的反感：包括他的装束、发型、茫然无措的神情和开汽水瓶的样子。

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既然是不现实的，那么，一切自由主义者必将面对“我向何处去”的悲剧性命题，每个人都从日常生活中的变化感受到社会革命的势不可挡，每个人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脱胎换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人；要么随波逐流，尽可能地保留一些有闲阶层的习惯，又不惹犯众怒；要么铤而走险，最终为时代的巨轮碾得粉身碎骨。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第二种道路，如陆文夫小说《美食家》的那位主人公，每天惦记着去吃一碗“头汤面”，这虽然是典型的闲人举止，但于新中国无碍，在文革到来之前，绝大多数人可以在新风尚和旧风俗之间自得其乐的。

所以 50 年代虽然是个严峻的年代，但人们仍然找到许多古色古香的回忆——这种古色古香直到文革爆发才做落花流水去，把旧时代最后一点温馨破除得干干净净。而铤而走险的人是可悲的，他们无法在新旧冲突的夹缝中作出明智的选择，只好在革命队伍中骗取荣誉，在鲜花、掌声和功勋中找到荣华富贵的虚幻感觉。本年冬天，在西安农业技术研究所被揭露的特大政治骗子李万铭就是代表人物。当他被几个受骗人撕破画皮时，吓得跪地求饶，特别申明自己“不是反革命”，是好逸恶劳的劣根性害了自己。谁能想到：这个骗术拙劣、意志薄弱的国民党青年军士兵竟然是新中国的头号政治骗子？——李万铭行骗生涯从 1949 年便开始了，然而并非一帆风顺，第一次行骗便被识破判了 3 年刑。然而值得研究的是：一个人为什么能被一种脆弱的幻觉支配，数年之久顽强地演练着一种疯狂的人生？老舍的话剧《西望长安》也许能够给人们某种启发。

通过《西望长安》，人们都知道了大骗子“栗晚成”（李万铭之谐音）的名字，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城市（甚至还混进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过东欧），行骗单位也不计其数。《西望长安》只摘取了西安、汉口和北京为背景，展示了一个小丑的现代《升官图》。剧目《西望长安》寓意辛辣，主人公的青云直上固然是一场黄粱美梦，然而围绕在他身边的热心人又何尝没有梦境般的感觉？不能说《西望长安》是 50 年代中国式的《钦差大臣》，它只能算是一出社会新闻的情节剧，这种戏剧演出的目的是配合伟大的肃反任务，因此，它和民国时期的《枪毙阎瑞生》一样，意义仅限于警世的层次。剧中人说：“唉，……我都是用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了旧社会的渣滓！”当旧中国的余孽发现他无法在社会革命的洪流维持他好吃懒做的生活时，他发现了维持他体面生活方式的最安全地带，那就是革命阵营内部。

戏就这样一幕幕进行下去，主人公先是出现在陕西省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穿一身旧军服，胸前挂着五六枚勋章，神色严肃，整日价心事重重。他奇怪的样子自然引起了年轻单纯学员的兴趣，在人们一再追问之下，这个栗晚成（李万铭）终于讲出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位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最近马上要调到中南军政大学受训。训练班马上给他办了组织关系证明，用盛大的仪式欢迎了这位“最可爱的人”。

主人公出现在第二幕时，已是 1952 年的春天，他已经是中南农林部研究所的秘书主任了，娶了妻子，有了较高的职位，然而，他还是整天的闷闷不乐，在同事追问之下，他拿出了一份电报，军委总参谋长命令他速去西安参加军事会议。他马上就要提升师长了。结果，农林部不但为他购买了机票，而且补助给他 200 元钱，“栗师长”含着感激的泪花同妻子和同志们告别，又登上了去西安的飞机。主人公凭着飞机票和“军委电报”，在西安受到了热情招待，然而，马脚就在这时候显露了，剧中人发出了疑问：“他由西北到中南去，拿着两件彼此完全不相干的文件，党的关系是西北农林学院出的文件，行政关系是由军政大学组织部出的文件”。“他的党员鉴定书写着：他 1935 年参加了红军，推算起来他才 8 岁！”“他在中学肄业一年。可是，党派他到中央大学去作地下工作。那时候，中央大学是国民党的，我们可以派人进去，但是必须经过考试。凭他的中学一年级的程度，怎么能够考进去呢？难道国民党的大学特别照顾共产党员？在同一文件上，他既然入了中央大学农学系，又忽然地入了军，入了军政大学预科，然后又忽然变成了志愿军……”剧中人的总结令观众为之惊心：“这样一个文件，任何人随便一看就能看出好几个漏洞，可是在到我手里以前从来没有人看过它！”

于是责任人开始辩解：

“你可别忘了，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人事制度还相当的不健全！”

而回答是铿锵有力的：

“我知道！我也知道，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不遵守制度，文件连看也不看，拿起笔就批！”

剧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然而，人们在这讽刺精神的痛快淋漓之后，免不了还是有一种智力受到侮辱的感觉。栗晚成（李万铭）的卑贱和无耻令人愤恨，一个丧失了精神家园的寄生虫，在 50 年代取得令人炫目的表演成功。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类似的平庸把戏会在日后的岁月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而且剧场永远客满？

## 年度记事

### 新中国宪法颁布实施

9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建国五年来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全文共 106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规定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规定了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该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对我国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 中共中央强调增强党的团结

2 月 6 日至 10 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革命胜利，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的作用，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因此，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说，我国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比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因而全国人民的团结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所以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帮助敌人来

危害党的生命。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的罪恶活动而作出的。然而，高岗拒绝党的挽救，反而以自杀表示他对党的最后背叛，饶漱石也从无悔改之意，仍然继续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开除出党。这次斗争的胜利，不但增强了全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自觉性，而且把党的注意力很快引导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上去，对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 继续撤销、合并若干省区

继撤销绥远省并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后，6月19日，《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上通过。《决定》指出：国家有计划经济的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为了使中央能更切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增强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为了节约干部加强中央和供给厂矿企业的需要，并适当地增强省、市的领导，撤销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和适时的。决定把辽东、辽西两省建制撤销，合并为辽宁省；松江省建制撤销，与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宁夏省建制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为甘肃省；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哈尔滨、长春、武汉、广州、西安、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均改为省辖市。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5市并入辽宁省的建制；哈尔滨并入黑龙江省的建制；长春市并入吉林省的建制；武汉市并入湖北省的建制；广州市并入广东省的建制；西安市并入陕西省的建制；重庆市并入四川省的建制。

#### 少数民族基本完成民主改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极为复杂，一般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有许多少数民族甚至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形态。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的不同，宗教信仰广泛而深厚，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影响很大，再加上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隔阂等原因，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改革的时间、方式和步骤都不强求一律，依照各民族各地区的特点和本民族群众及领袖的意愿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领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牧民，废除地主、领主的剥削和一切特权，但不没收他们的农具、房屋、粮食和其他财产。寺庙和教堂的土地原则上不动。改革的方法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协商，至上而下地进行。到本年度，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多数地区的民主改革顺利完成。2000多万贫苦的农牧民翻身做了主人，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 我国开始使用布票

9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自10月起，棉布实行凭票供应，布票分全国通用布票、省市地方布票和军用布票，同时发放线票、棉絮票。全国按地区每年每人1.6丈至1.9丈，婚丧嫁娶可补助一定的布票。

#### 处死奸商

5月，上海市举行公判大会，依法判处奸商李文达、王焕章、赵松青死刑。

投机商人李文达做了十多年掮客，1953年7月，他趁市场缝纫机供不应求之际，勾结其弟李文华，骗得400多万元（旧币，下同），虚设“星星缝纫机工业社”，谎称可生产缝纫机，短短3个月内，骗得订金4亿多元。同年夏季，农村急需化肥，李文达竟恶毒地将7000多斤重亚硫酸钠假充肥田粉卖给农民。农民使用了有毒的假化肥，双手肿烂，800多亩水稻稻根腐烂，减产14万多斤，损失1.3亿6千多万元。

投机商人王焕章系行商出身，1953年在“美星印花厂”任襄理，后为扩大行骗范围，又自筹“美纶印花厂”，先后骗得6000多万元作为资本，未经登记便开始营业，并向上海人民保险公司投保1.3亿。去年年底竟纵火烧毁厂房骗取保险费，幸为职工发现，扑灭及时，才未酿成巨灾。

李文达、王焕章二犯与骗取求职农民保证金5000万元、逼死人命的奸商赵松青罪大恶极，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

#### 鼓励失业人员自谋生活

本年4月，劳动部召开全国失业工人救济工作会议，强调，4年来在处理失业工作上的成绩是很大的。这不但表现在及时地采取以工代赈、转业训练、发放救济金、生产自救等方式救济一部分失业工人，减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和提高了一部分失业人员的就业条件，而且还介绍了大批失业工人重新就业。由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带动了各种经济事业的发展，劳动力的需要急剧增加，使缺乏厂矿企业生产条件的失业人员，在其他各种经济事业中找到职业和自谋生活出路有了可能。会议决定今后劳动就业的方针是：除根据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失业人员的就业条件逐步介绍就业外，要鼓励失业人员自找工作自谋生活出路；行之有效地缩小统一调配的范围，以扩大自行就业的门路。

#### 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本年度政务院公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以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与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工作，负责调解民间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并通过调解进行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人民内部团结，以利国计民生。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指导下由群众选举产生，调解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按照政策、法律进行调解；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不能强迫调解；调解不是起诉的必要程序，不得因未调解和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在文革中被粗暴地解散，70年代中期又得以恢复。

## 1955年：风萧萧

我理解到党所达到的高度集体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非党和反党的毒害从内部瓦解的艰险的难关，这才通过血泊争取到了胜利。……

这

才比以前数百倍强烈地实感到了因为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所以才能够取得了



的胜利，我所分受到的一分胜利的光辉对我显得更加亲爱，同时也使我深

深地感到了内愧。

——胡风上书毛主席、党中央的话

刘震云小说《官人》介绍某副局长的履历，提到“他在反胡风运动中掉过队”，所以这位抗战时便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便一直郁郁不得志，到了退休还是个副局级。

宦海沉浮，什么事情都可能使人“掉队”或“站错队”，但作家用胡风事件来解释一位副局长的仕途坎坷，却是令人生疑的。因为历史上胡风事件的始末，究其详情，有太多大烦琐的文艺概念，太专业化，牵扯的文艺界人士的误解和内疚也不少，所以，如果说明风事件使得某位文艺界领导“掉队”了，也许更能令人信服，假如将胡风同一位农村干部联系起来，阐明历史的乖误和人生的不测，按照《文学概论》上的话说，未免有点不够“典型”了。

胡风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名人，但却不是因“论主观”、“五把刀子”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而出名，而是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以毛泽东的序言和按语而出名，不管怎么说，这应该是胡风的悲哀。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这本材料断定，“（胡风）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三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措辞之严厉、定性之鲜明，今天读来仍然为之失色。几十年以来，胡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这样一种形象。

在批判胡风运动的一幅宣传漫画上，无产阶级的巨手将胡风及其派系连根拔起，舒芜、路翎、阿垅、贾植芳、张中晓等胡风分子丑恶的面孔从泥土中露出，显得惊恐万状。这是共和国历史文艺界的第一次肃反，它不仅压灭掉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声音，而且由此而来的机关肃清反革命运动使得1955年的空气变得肃穆起来。

今天读到胡风当年的三十万言书和其他有关著述，人们会发现胡风及其战友在文风上的奇怪之处。如本章题记中摘引的胡风致毛泽东的信，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胡风顽强地使用着一种同现代汉语规范文字有所距离的语言，急促、张皇，甚至有些不通。这并非完全因为当时作者心境的原因，胡风一贯如此，他的语言风格既不同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主流文风，也同伟大导师鲁迅的语言习惯大相径庭。

在全国群情激愤讨伐罪恶的“胡风集团”时，人们也许已经认定，胡风、路翎等人的文学语言特征就是一种反革命的语言特征。然而，有理由认定，胡风坚持的是一种由蒋光慈、柔石开始的“普罗”文艺语言，尽管这可能仅仅是作者的一种独特嗜好，并不存在特别的暗示。但我们今天读到它，仍然有一种抑郁的悲壮的感觉。使用“普罗”文艺语言的中国作家们似乎命中注定有着不祥的人生，从胡也频、柔石到王实味，从胡风到路翎都是如此，总是沉浸在与旧势力毫不调和的斗争幻觉里。

40年代末出版《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在国内革命战争风起云涌之际，仍然在小说里追忆着“民主社会党底革命实践”，难怪他建国后的作品总显得不合时宜，写一篇被批一篇，《洼地里的战役》、《战士的心》、《你永远的忠实的同志》等等，都被批得体无完肤。路翎因胡风事件受迫害几十年，

默默无闻地在街道上做清洁工，以每月的十多元的“清洁费”维持生计，过着一种贱民式的悲惨生活，并患上了轻度痴呆。路翎获得解放以后，又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状态。在长期同文艺创作无缘之后重获言说自由的人，突然发现他年轻时所为之牺牲的理想信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古旧的事物，这确实是一种命运的悲哀。路翎今天仍在勤奋地发表着言论，但人们同样感觉是那樣的倔强、古旧、陌生。舒芜也是如此，他发表的有关“白居易是老淫棍”的批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一个以《论主观》而闻名的文艺思想家，在迟暮之年居然研究起白居易的“花边”，这是令人嗟伤不已的。

更令人嗟伤的是这场文艺悲剧本身。包括胡风的论敌在内，都没有想到论战会导出共和国文坛的第一大冤狱，并且直接引发了肃反运动。胡风于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逮捕，被判处重刑，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每上诉一次，便被加刑一次，直至文革开始，胡风的刑期已变成无期徒刑。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一年以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到1958年5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育、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

单纯就1955年的文艺思想斗争而言，它虽然造成了文艺界内的某种恐怖气氛，但是，平心而论，并没有阻止文化界人士的探索。胡风所栽培、扶植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如艾青、田间、张天翼、欧阳山、端木蕻良、艾芜等人，仍然活跃在50年代的文坛上。而广大文艺工作者为之欢呼雀跃的“双百方针”，恰恰是在胡风横遭牢狱之灾后的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所反对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也是胡风以自由和荣誉为代价竭力加以反对的，“双百方针”提倡的“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又是胡风毕生为之奋斗的自由原则。然而，正因为胡风事件并未造成50年代中国文艺的凋零，才更加映衬出胡风等作为个体的可悲和寂寞。鲁迅当年感愤地说：学潮胜利了，但没有人去理会被开除的大学生冯省三的命运（见《热风·即小见大》）。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而拿破仑的革命却不承认它是继承了雅各宾派思想的精义。胡风下狱了，在百花齐放的欣喜气氛之中，还有谁能去真正关注一下为新中国文艺“热烈地战斗”过的寂寞斗士呢？集体的强大与个体的渺小，会增加个人命运中深厚的悲哀色彩，这个规律的残酷，大约古今都会如此。

胡风事件从一场文艺斗争急剧地上升到阶级斗争，固然是一场残酷的转变。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样一种结局才使得这场斗争局限于肃反范畴，因此并未造成对文艺界有生力量的致命打击。时至1955年，新中国的文化生活虽没有出现人们期望那样的极大繁荣（其中，电影业还因批判《武训传》的影响，从1951年出现了两至三年的停滞），但仍然在寒冽的春天中顽强地发展着。书架上充斥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文学作品（由于苏联文学译本、改写本过多过滥，国家出版总署曾于去年4月明令：停止胡乱出版苏联文学名著改写本），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丁玲、周立波等人的著作也依然畅销，《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三里湾）等新书也是读者抢购的对象。新中国的“文化热点”——肖也牧的小说（在50年代初的影响和轰动不亚于90年代的《废都》）则是紧俏产品，图书馆基本上见不到肖也牧的作品，没有谁去明令封存肖也牧的小说《锻练》、《我们夫妻之间》、

《海河边上》，它们已经被借阅者据为已有了。小说浓厚的知识分子情调和城市趣味成为文学爱好者秘密的话题。解放前的出版物（除明令查禁的反动、淫秽作品外）仍散见于旧书店、琉璃厂的书摊上，再版旧中国的文学作品、连环画仍然是出版社的重要业务。解放区时代的新文艺当然是时代倡导的主要鉴赏对象，但在城市，旧中国的通俗小说、古典文学名著仍被读者垂青，梅兰芳重新焕发艺术青春，马连良戒掉了大烟瘾，无线广播电台最受欢迎的文艺节目之一，是鼓书艺人的长篇连续大鼓词《狄公案》、《薛仁贵征东》。乡镇的戏台上，《王二姐思夫》、《小寡妇上坟》、《乌盆记》等文化部门定性的“坏戏”时时上演。文化生活的庞杂和无序蕴含了价值观的冲突。本年2月，吴运铎在《长江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为了抗拒资产阶级毒素侵蚀，对青少年来说，首先是要善于开展不调和的自我斗争，做一个善于管理自己的人——的确，人们开始担忧文化市场的不良成份对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北京某走读制大学的学生宁苹在《北京日报》发表的忏悔文字就证实了人们的这种担心。

宁苹是因盗窃财物的行为而被所在大学开除的，50年代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很少沾染这种恶习，一个青年学生不要说偷盗，就是谈恋爱，生活超标都被视为可耻的行为，严重的要记入档案。学生档案中，以下词句是非常严重的：“××玩世不恭，缺乏革命热情”、“××与高二（三）班女生×××经常在××街轧马路，此动向值得注意，需加强道德观教育”，这种评语一经出现，往往注定一生的工作、事业将受到影响。而宁苹的严重错误在于道德败坏，这是必须用铁的纪律加以惩处的。

宁苹在追忆她的堕落过程时写道：

“我很小时就开始看大本的书了，十一、二岁便看了《飘》、《苦果》、《狂飚》这样的书。这些书给了我一些影响。尤其是在北京解放时，我才13岁，今天回想起来，它对我的毒害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徐许著的《风萧萧》。”

宁苹所提到的《苦果》、《狂飚》、《风萧萧》都是旧中国时代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作品，以《狂飚》、《风萧萧》为例，它们都是40年代在城市知识青年中风行一时的“抗战+爱情”的时髦之作。拿今天的眼光看，像《风萧萧》所演绎的抗战情报人员的爱情纠葛和惊险奇遇，不会比80年代的《保密局的枪声》更具煽情性，然而在40年代国统区的萧条状况下，《风萧萧》所引起的轰动与争议，应该是耐人寻味的。它的独特魅力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人们觉得有肃清的必要。宁苹的文章写道：“对于（《风萧萧》）这样的书，我没有能力去理解它的意义，当然就更谈不到批判它；相反，由于我从小培养起爱享受、不劳而获的思想和这本小说所描写的那么相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多么亲切的好作品啊！一口气读了两三遍，而其中我喜欢的地方不知读了多少遍。像白苹（舞女）和梅赢子（美籍华裔交际花）这样的人有多好啊，他们过着豪华而幸福的生活，而我又是多么向往那种坐吃坐穿玩乐的生活啊！我几乎被她们迷住了，在日常生活中学着她们的样子，按照她们说的样式布置我的房子，平时讲话也学着她们的口气，甚至连她们平时所喜爱的什么颜色都成为我的嗜好（直到现在遗留了这个痕迹，紫红色、银灰色，我最喜欢）。”

“这样，当时的比较好的家庭物质条件，加上深深地埋藏在心中的《风萧萧》等旧小说的影响，使我不能辨认前进的方向，就向着我所希望的那种生活大步的走去了。在吃和玩的方面都尽量地讲究，星期天出去玩一次最少也

得花四、五万元（旧币）。但，尽管家里给的钱不少，我在这样的欲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是不能满足的……”

“原来，还是鸳鸯蝴蝶！”这是40年代的读者对《风萧萧》的讥评。1988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的《风萧萧》，已经在流行文学领域大大落伍了。人们很难想象，这样的书居然在当年给青年学生造成如此强烈的心灵滋扰，看来，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正如本年度的文坛奇事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样，本年度的文学奇迹是高玉宝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的出版。两年前当《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日报》刊载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时，读者就开始关注这位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作者。高玉宝是没有任何文学功底的部队战士，他的小说初稿充满着大量的别字和象形符号，然而，小说中表现出的旧中国的痛苦却是令人震撼的。经提炼、修改后的小说出版后，掀起了“高玉宝热”，这部小说深刻地深响了几代人（“周扒皮”至今仍是中国人周姓人士的全国通用浑名）。高玉宝取得了炫目的文学成就后很快成为一个记号，他曾担任一家玻璃厂的厂长，读者对《高玉宝》的特别钟爱，成为新中国文艺的温馨的插曲。

在温馨和严酷交织的1955年，有一些人从读者视野里长久地消失了，另一些新人浮现了出来。《财主底儿女们》、《猫城记》、《金锁记》、《围城》既然注定在人民革命中受到冷遇，那么，就别想指望这些作品在新中国得到更好的待遇。这也许是一个审美规律的问题。悲剧不在于上述作品本身当年的处境，而在于岁月的封存使得作品成为人民记忆中长期的缺席者，即使是重见自由的阳光之后，它们的出笼也是羞怯的、形象模糊的。如果今天有人说：90年代红极一时的张爱玲和《围城》只是封闭后的一次重放的活跃，那么这种结论对当年的作家来说，是悲，还算是喜？

#### 年度记事

##### 我国实行军衔制

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六次常委会通过并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关于军士和列兵评定军衔的指示》。按照上述条例和指示，全军评定军衔工作正式开始。对元帅的评定有一个插曲，中央有人建议，应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周恩来、邓小平也应授元帅衔，经充分酝酿后，中央决定：毛、周、邓不授衔，如爆发战争再考虑。9月23日，毛泽东主席正式发布授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两项命令。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国民党起义人员、和平解放西藏地区的有功人员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 新人民币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自本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同时收回旧人民币。旧币票面额很大，以万元为单位，票面种类很多，每一种票子又有很多版式，大小不一，不易识别，印刷技术差，易于磨损，给伪造者以可乘之机。因此，国家决定用面目一新的、代表一种健全的货币制度的新人民币来代替旧人民币。新币筹备较早，原定于1953年发行，故新币票券下方印有“1953年”字样，由于技术原因，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推迟到本年发行。并且避开年

初城乡物资旺季，选择在淡季发行。新人民币的面额为人们所熟知，主币分为1元、2元、3元、5元、10元（10元币于1957年开始发行，3元币后来不再发行）5种，辅币分为1分、2分、5分、1角、2角、5角6种；每种券别版面均印有汉、藏、蒙、维吾尔4种文字。新旧币的折合率为1元新币等于旧币1万元。这种等值在以后给年轻人造成了错觉，因此七、八十年代常出现有人拿着1955年前的银行存折（储额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要求“落实政策”、发还“巨额存款”的笑话。

#### 万隆会议

本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山城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针对少数国家对新中国的误解和指责，周总理提出了“求同存异”的著名方针。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求同而不是求异的。

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遭受过、并且现在仍遭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灾难和痛苦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当求同而存异。周总理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国广泛的赞扬。万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次会议所体现的亚非国家团结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以及保卫亚非和世界和平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

#### 孙立人兵变

入夏以来，虽然大陈岛等岛屿陷入“共军”之手，但台湾民众从未像6月这样紧张。蒋介石突然下达一系列人事变动命令，岛内随之开始军事戒严。“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上将被调任“总统府参军长”，表面提升，实质软禁。10月，“郭廷亮共谍案”累及孙立人等少壮派军官，300多人被捕，孙立人变成了第二个张学良。

孙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弗吉尼亚军校学习，历任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滇缅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美国人一直希望孙立人取代蒋成为台湾的新强人，孙也因对蒋的特务系统不满，预谋于6月6日发动“兵谏”，清除蒋身边的旧官僚，建立所谓“清明政治”，阴谋败露后，孙立人被长期软禁，直到33年后才获自由。

#### 圣人出黄河清

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向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彻底根除黄河灾害、大规模地利用黄河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的富国利民的伟大计划。邓子恢副总理说：在黄河拦河和中上游水土保持工程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控制黄河水流，拦蓄大量泥沙，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灌溉、发电和航运事业。这样，黄河下游的河水将逐渐澄清，河床将不断刷深，河道将日趋稳定”。将会实现千百年来民族夙愿：看到“黄河清”！

#### 实行义务兵役法

7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义务兵役法》。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都要义务服兵役。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征集服兵役。当年未被征集的，在22岁以前，仍可以被征集服现役。义务兵在部门服役，是为国家尽义务。除衣、

食、住等由国家供给外，每月发给少量的津贴费。规定对义务兵家属实行优待政策，现役军人参战或因公负伤残废，享受国家的抚恤优待。

#### 城镇居民粮食实行定量供应

对居民口粮的规定标准是，根据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平均每月每人 16 公斤至 25 公斤，机关团体文教人员平均不超过 14 公斤，大中学生平均不超过 16 公斤，一般居民平均不超过 12.5 公斤，未成年儿童按年龄规定供应标准。

#### 国家机关干部实行工资制

根据国务院的颁布命令，从本年 1 月起，军队干部全部实行工资制，7 月，机关干部也由包干制改为工资制。同时提高了国家机关行政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工资标准，行政人员的工资标准共分 30 个等级，高低差距扩大 31 倍，至此，完成了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过渡。工资制给干部造成这样一种心理，工资高低不止是待遇问题，而且是政治荣誉问题。毛泽东为此专门讲话，挖苦了那些长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的干部。但“长工资”与单位内部矛盾纠纷，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是紧密联系着的，所有的人都会说：“我不是为那几块钱，而是……”。

#### 我国开始推广普通话

10 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11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必须逐步用普通话教学，使学生学会说普通话。同时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把推广普通话列入工作总计划。各级高等师范学校应该成为推广普通话的中心，应积极协助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编辑教材、训练师资，调查方言。本年度开始，各级各类学校的广大员工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教育系统形成了一个推广普通话的热潮，很快在全国大多数小学、部分师范学校和中学的语文课上开始用普通话教学。

#### “三八”式干部傅景林虐待妻子被捕

傅景林虐待妻子案在 50 年代，曾被改编成电影。片中那个道德败坏的干部对妻子大吼大叫：“你已经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而这卑鄙的表白正是傅景林肮脏灵魂的真实写照。傅景林是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业务科长，是 1938 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进城以后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居功自傲，觉得自己是老干部、革命的“头等功臣”，于是想到：“人生在世能活多久？不寻快乐，吃点儿喝点儿，死后也是枉然。”慢慢地，他堕落了下去，追逐着享乐生活。他觉得陪伴他生活了 12 年的李香芝“不好看”、“不时髦”，没有文化，于是感到她不称心了，不断虐待她。每月发了薪水，他都用来喝酒，只给家里留下一小半。李香芝无可奈何地和两个幼小的孩子啃窝头就咸菜。他睡觉前，让老婆给他脱鞋脱袜。李香芝生完孩子 10 天，身体还很弱的时候也要下地服侍他。傅景林对她不打便是骂，动辄说：“你和我离婚吧！”他认为：老婆是他的“私有品”，可以任意打骂和折磨。于是在他老婆身上为所欲为。他喝了酒，回家打老婆；在工作上遇到困难，也回家打老婆。

傅景林思想蜕化，道德败坏，虐待妇女，侵犯人权，已与共产党员称号毫不相称，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经上级党委批准，将傅景林开除出党。同时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将傅景林逮捕法办。

## 1956年：必由之路

“我从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摘自 50 年代在中国流行的苏联歌曲《我从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到 1956 年初，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已全面进入了高潮。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工人、手工业者、店员（那时还没有第三产业一说）、战士和资本家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呼喊。1 月 15 日，并非是一个国家节日，但天安门广场却比过节还要热闹。到处是飘扬的红旗，到处是欢乐的人群。人们聚在伟大首都的中心地带，一起高歌星舞，同心欢庆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胜利。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庆祝方式，高跷、跑驴、小车会、腰鼓在广场上表演得无比起劲。到处是感人的场面：62 岁的老大妈杨菠氏，是个小脚女人，牙也掉了，眼神也不济了，可是她却穿着最好的衣裳来参加庆祝，老人家年轻时也曾赶过许多庙会，见识过许多热闹场面，可是她一生中经历过的所有庙会的总和加起来，也赶不上天安门庆祝盛况的一半啊！她自豪地牵起衣襟，对着人们说：“瞅见我这身儿（新皮袄）了吧，都是毛主席给的！”——忽然间，拥挤的人们腾出一条道，浓妆艳抹、喜气洋洋的歌剧队踩着鼓点走过来了，演员们唱的是根据李季长诗改编的民族小歌剧《王贵与李香香》：

三里铺开了丰收花，王贵和李香香结婚啦。

人群“噢……噢……”地喝起彩来，这是中国民众对爱人当众亲热的典型反应，透着纯朴的幽默和戏谑。今天的歌剧表演，演员格外的与以往不同，饰王贵的男子是北京益昌帆布工厂的经理王先生，而扮演李香香的年轻女性也是一位资本家的太太。这两位男女主角舒展着歌喉：

老狗你不要逞威风，  
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  
我王贵死了不要紧，  
千万个穷汉后面跟！

没有人怀疑他们真诚的喜悦，没有人怀疑他们在 17000 位北京工商业资本家中的代表性。他们真心地感谢着毛主席教导他们认清了前途，使他们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 20 万人的欢呼声中，实业界代表登上天安门，向毛主席呈上大红的喜报。“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

人群中，“改造企业，改造个人”的标语格外醒目，资本家们庆祝着公私合营的伟大胜利，也庆祝着崭新人生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们也是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劳动者了。好几位资本家在微薰的幸福中联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兴高采烈跳龙门，  
一心要做劳动人。  
向前奔走齐协力，

共产主义万岁春！

欢庆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王府井大街灯火辉煌，鞭炮声不断，而天安门上空也升起了礼花。柳亚子的诗句：“火树银花不夜天”，后来被上海的电影工作者采用为一部表现公私合营伟大改造的电影名字——《不夜天》，确实，“火树银花不夜天”正是这一太平盛景的写照。

一周后，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庆典。春雨潇潇的上海市，约 50 万人在南京路，淮海路和北四川路载歌载舞，庆祝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

也许是这座“东方巴黎”艺术趣味与北京有所不同的缘故，除了解放区传统的秧歌舞外，引人注目的还有漂亮的彩车，装扮成园艺师和工程师的少男少女，歌咏队中，“我从未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旋律格外响亮。这是一首本年度最流行的苏联电影插曲，抒发了一个美国黑人艺术家在红场上的喜悦和自豪的心情。上海人在庆祝这一伟大的国家改造时，也忘不了以他们的精明来阐释公私合营与家业兴旺的必然联系——静安区篮球馆外正在演出有关“老三代”和“新三代”的活报剧。“老三代”自然是一个悲凉凄惨的场面：拿着算盘的祖父、提着鸟笼的儿子，挽着讨饭篮的孙子苦着脸，在戏台子上踉踉跄跄，走向一条没有希望的败家之路，他们狼狈不堪的模样逗得观众哈哈大笑；而扬眉吐气的“新三代”则象征着新生工商业者的光辉未来：祖父读着《社会发展史》，认识到剥削制度的可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在彷徨中看到了光明；儿子捧着《公私合营申请书》，毅然向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而穿少先队员制服、扎红领巾的孙辈们拿着书包和和平鸽蹦蹦跳跳，他们自然是世界的希望、新中国未来的建设者。

在上海人民广场的盛大仪式上，副市长许建国向全市人民祝贺。他兴奋的情绪溢于言表：“从今天开始，我国资本主义最集中的城市，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

这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全上海人民的胜利，也是全国人民的胜利……”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致电后，会场立即欢腾了起来。广场上挥舞着无数的旗帜，形成了五彩缤纷的浪滔。鞭炮的青烟，在人群的上空结起一片云雾。在硝烟的香气中，许多平时不苟言笑、举止沉稳的资本家，穿着西装革履，破天荒地扭起了秧歌。他们的家属也穿着漂亮的衣服，拿着鲜花，跳起了集体舞，曲子非常轻松，活泼很甚至有些诙谐：

（轰！轰！轰！）

老乡们，老乡们，

快快参加八路军，

快快参加八路军，快快参加八路军……

上海工商业的巨子，有“红色资本家”美誉的荣毅仁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您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荣毅仁：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昨天，我的全家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 3 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记者：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您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罗毅仁：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的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信任，而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对于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项涉及几亿人口的、大规模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一场颇具难度的社会经济变革，不仅没有造成经济上的破坏，避免了生产力下降的情况（后来非洲的许多新兴国家类似的变革几乎毫无例外的失败了），而且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联系，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充分利用这部分企业发展生产、活跃经济、积累资金、培训工人与干部，有力地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今后的国家建设和今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

然而，从全面的、冷静的眼光看，这场改造在一派皆大欢喜的气氛之后，也存在着某些问题——或者叫隐患，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改造过急过快。一些私方人员对公家干部心里的嘀咕，恐怕并非只是因为资本家固有的落后意识在作怪的原因。下一年的“大鸣大放”中，这方面的意见最多。正如陈云在本年所警告过的：“不应该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而要尽可能地使用他们”，这是因为“资本家有本领”，“是因为他有知识，对我们有用处，对发展生产有好处”。苏联为了学到美国人的先进管理经验，不惜动用宝贵的美元外汇，而“现在我们需要出美元、洋房，资本家还敲锣打鼓来向我们要求工作，给他们工作就高兴，我们为什么不用他们？不用他们就是傻瓜，这不能说是懂政治”。但可惜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批判右倾保守的调子越来越高，公家干部感到和这些资本家共事两头为难，左了则违反统战政策，右了呢，又丧失阶级立场。因此对资方人员敬而远之，资方坐冷板凳也是命中注定的了。按当年的话来说，就是“安排私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资方人员在1957年的牢骚也就不足为怪了。

老百姓对改造的负面认识还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似乎市场供应的花色品种变少了。这个根源在于经济改组合并上的盲目性，尽管毛泽东在本年盛赞了张小泉和王二麻子的剪刀，但产品生产经营的单调趋势也越发明显。其次，服务业一方面拒绝为旧中国的腐朽没落生活方式开绿灯，一切有碍于社会平等原则的殷勤服务方式消失了；另一方面，社会平等原则为冷漠、恶劣的行业作风提供了借口，“顾客是上帝”注定被作为旧中国的陈腐庸俗的口号而抛进历史的垃圾堆。这种变化，给新中国的服务业人员素质带来了新的要求。既不能像旧社会伺候太太小姐那样卑躬曲膝，又要对顾客充满阶级情谊，这个课题确实令人困惑。当年的一部影片《满意不满意》似乎就象征着这种困惑。能够很快适应新中国原则的服务员自然是这个时代的楷模，如

沈阳某菜场的女营业员李素文（后来文革中成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不管她的人生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但我们应该承认：李素文等人代表了新中国第一代服务业职工的光辉典范。与先进人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服务水平的滑坡令人担忧，像电影《满意不满意》那种用阶级苦难教育职工的方式自然是有它特定的局限性的。一则现代黑色幽默就把这种善良愿望碾得粉碎，“新社会好了，我们妇女地位也提高了，同是当女招待，可受气的换了。打我参加工作，我就没给过吃饭的人好脸子，爱吃不吃，不吃就滚，谁也没请你来。……甭说顾客动手动脚，他就是稍一皱眉，我手里这盘菜就敢扣他脸上！”——服务业的冷漠与恶劣在文革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年长一些的中国人对此都有深刻体会。有趣的是，虽然相声中讽刺的“革命照相馆”并未恢复，但今天的一些城市，某些过去的服务方式和格局却令人产生了温馨的怀旧联想，如气息慵懒散漫的国营饮食服务公司、国营理发馆、排队开票的场面等等。

在一些工商业很不发达的地区，急功近利的改造甚至造成了小城镇和集贸市场的萎缩和衰落。如浙江吴江县铜锣镇，历史上以出产肥猪和烧酒出名，在本年的改造风潮中，因大搞商业国有化，市场贸易受到了打击，有200名经商的小业主无以为业，只好离镇外出，另谋出路。至于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使农村商品生产发生的严重萎缩，只有另辟一篇题目专门来讲了。

毛泽东在本年年初讲话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力创造了社会主义条件。”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改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过渡时期的使命就是要实现广阔的和深刻的社会革命，从而达到朝着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必须承认，“解放生产力”这个道理，作为中国式社会主义最宝贵一条经验，在本世纪的下半叶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中国人付出了若干年的沉重代价，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走上了实现真正解放的必由之路。

#### 年度记事

#### “八大”召开

本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党代会之一，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群联系。

#### 论十大关系

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内容是：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主张用多发展沿海的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和内地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必须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发展和支

持内地工业。在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上，提出三个方面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要给生产单位一定的独立性和权益，要关心群众生活，特别要使工人、农民在增产的基础上增加收入。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着重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上，提出对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原则，并肯定了“死刑缓期执行”的合理性和独创性。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提出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长处，要学习它的长处，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理的一面。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味照抄，机械搬用。

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该采取这个态度。

#### 苏共二十大的震荡

在本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做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中国的一些高干和大学生中流传，对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有的人兴奋，有的人困惑不解。而中国从一开始便对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持不同看法；毛泽东就挖苦过国内的某些风派人物，说他们以前比谁都“爱戴”斯大林，现在风向转了，又振臂高呼“太好了，老子以前就是这个主张！”本年 4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有保留地支持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反思，但仍然肯定了斯大林的主要功绩。文章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社会上从斯大林错误中引发的各种怀疑。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提出的。

#### 反冒进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如《农业发展纲要 40 条》本来是要在 5 年、7 年、12 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有些工业生产计划也订得不切实际。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说成保守主义，或者都说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得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这篇力求稳妥的“反冒进”文章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指出所谓“两头都反”实际矛头是针对“冒进”的，所有类似的“反冒进”文章他都“不看”，“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反冒进使 6 亿人民泄了气”。

#### 实行新的工资标准

5 月下旬，国务院召开全国工资改革方案平衡会议。确定增加工资 14.08 亿元，用于今年的额度为 12.5 亿元，并决定一律从 6 月 11 日起实行新的工资标准。经过这次工资改革，1956 年原有职工平均工资每月增加 6.65 元，比上年增长 14.5%，并在工资制度方面解决了 4 个主要问题：一、实行动用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二、调整了产业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工

资关系；三、改进工人工资等级制度，使熟练劳动和不熟练劳动、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在工资标准上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四、改进企业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制度，按职务规定统一工资标准。

#### 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6月29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菲律宾外长加西亚声称南沙群岛“理应”属于菲律宾一事发表声明，指出：南沙群岛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有无可争辩的合法主权。我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合法主权，绝不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方式加以侵犯。

#### 西康省热河省建制撤销

本年10月1日，西康省（省会雅安）建制撤销，原西康省行政区域划归四川省。

12月30日，热河省（省会承德）建制撤销，原热河省行政区域分别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和河北省。

## 1957年：“高级垃圾”

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改，也就算了。……有那么一批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去见阎王。……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

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马克思）这些人当阎

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受整的。——毛泽东7月9日在

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小说《艳阳天》里有一个情节：富农子弟马立本戴着耳机躺在炕上自得其乐，喜形于色地对客人说：“好家伙！北京在搞大鸣大放，真带劲！”——在很长的岁月里，年轻的一代只能通过这样的细节管窥到1957年的热闹光景。在春夏之交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似乎发生了一场“新闻维新”。类似于《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的言论出现在党报的头版，著名的国家媒体夜以继日地传播着“右派”论点，我们很难想像：齐越、夏青这样的播音员播送那些“右派”言论该是怎样一副腔调；我们也不知道，平民阶层听到这些言论是否会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惧悚感？不能否认，当时中国确实弥漫着乐观的空气。许多旧戏被解禁，不少人到书店去打听《金瓶梅》是否重新上市。从这个角度上看，一般民众还是欢呼“鸣放”的。

要不是报纸提醒，谁关心“右派”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老百姓最后还是振臂起立了，不管他们是否注意到那一场短暂的“新闻维新”，他们事后还是为那些无法无天的邪恶言论所愤怒。老百姓承认，那些书生们文绉绉的右派言论，他们当时听不太懂。但是，他们听得懂那些经有关部门整理出来的话，如“杀共产党”、“今不如昔”等等，于是老百姓要发言。如《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被精心整

理出来的言论是可恶的，“杀共产党”这样的以讹传讹的言论也左右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右派言论”的记忆。怪不得 50 年代的一篇通讯写道：一个解放军战士跳上讲台，指着右派只说了一句：“狼心狗肺！”便气得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岂止是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据说，当毛主席召见一名富有才华的年轻干部时，这名考察过匈牙利事件的干部夸夸其谈了半天，老人家听毕他的“政治新思维”，气得浑身哆嗦，走进书房时，竟然差点被门坎绊倒，他的反应是：我党受教育这么多年的高级干部都糊涂堕落右倾到如此程度，那么党外右派会是怎样的反动恶毒啊！

这段由喻权域教授亲口告诉笔者的历史插曲，也许能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历史是怎样由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交织而成的。有时候，偶然的因素反而更能证明历史规律的严酷性质。当然，将历史的转折归结为领袖个人意志的变化也是不公平的，但冈察诺维奇当年说得好：“太阳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可怜巴巴的小星星。”如今，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热衷于发掘这样的课题：假如，毛泽东案头上没有那些歪曲的汇报材料，那么，整风会不会朝着一种健康的方向发展？假如，……等等。可惜的是，这只能属于一种比较风趣的历史新解，和历史本质无关，即使这种猜测是对的，那也不能引出新的历史教训，只会徒然添些憾恨和感伤，而压在中国人记忆上的感伤成份未免太多、太多了。

整风运动中的另外几个插曲也是很有意思的。著名文学理论家、诗人孙大雨以“反革命罪”状告上海高校和文艺界的一些人士，这种方式很难说不是意气用事，正因为如此，孙大雨在反右中被人联名以诬陷罪反诉了一次，使他成为反右运动中为数不多的受刑事处分的“右派”（葛佩琦被判处无期徒刑）之一。孙大雨的耿介狂放，连毛泽东都拿他没办法，笑一声“花岗岩脑袋”，由他去了。最不合时宜的是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反右风头上嘴也不闲着（龙云爱说话），他在人代会上说了三点：一、云南彝族地区，生产文化落后，不应马上实行土地改革，引起彝族人民反感（甚至骚乱）。减租退押是应该，但云南很少有押佃的事；二、公余粮征得太多，影响民食；三、苏联中止技术支援，太不应该，苏联搬走我国东北地区的工业设备，应该索回。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阵营人人有义务，苏联却让我国还帐（还要高利息），也太不讲兄弟之邦的情谊了。龙云有关中苏关系的话，即使在平时的情况下都是违规的。因为在整风伊始，中央就有明文规定：有碍国际关系的话不能讲。

而龙云的这番话不仅冒反右形势之大不韪，而且触犯了整风的“约法三章”。连龙云的老部下卢汉都大摇其头，私下顿足：“老主席太孟浪，他的话虽然在情在理，但在这反右的风头上，怎么能说这些话呢？要挨，要挨！”果然，龙云除了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谥号：“反苏”。这是继东北作家萧军以后，第二个被公开批判的中国“反苏”分子。

在老百姓的印象里，右派分子都是读书人，工人、农民中是不可能划分“右派”的，也没有当“右派”的资格（中央曾明令：工人、农民中划了右派的必须改正），但老百姓没有当“右派”的资格，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可以随便“鸣放”，有一顶帽子在等着“鸣放”分子，那就是“坏分子”。对于“坏分子”老百姓并不陌生，刑满释放分子、没有改造好的二流子、不够劳

改条件的各种社会渣滓，这些旧社会思想的余孽如不加以严厉的管束，那势必是要败坏新中国的社会空气的。据说，有几位讲评书的艺人就是在“鸣放”中，不恰当地拿旧社会来说事，而被打成艺术界的右派分子的。评书艺人在整风座谈会上长吁短叹：“旧社会我们到县里乡下演出，人家那个接待，啧啧！一日三餐好酒好肉，烟卷、茶水、水果、毛巾伺候着，有点嗜好的，还供应烟土，至于叫条子的那些事更别提了……咱不是闹待遇，可有一样儿，如今到基层表演天天白菜、熬豆腐，夜班费几毛钱，这也不能体现党对我们民间艺人的政策吧……”这种言论未免太过，连同情者在一边听着心里都不是滋味：“你说这些干啥？嗨，坏了，坏了！”

《艳阳天》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节：一个赶马车的农民进北京办事，太学堂里正在开辩论会，会上右派教授替农民叫苦，叫嚷“今不如昔”、合作社“搞糟了”。

这农民听不下去了，上了讲台同右派教授论理，他的实证是：他怀里的两个白馒头，“叫你看一看，我们农民如今吃的是是什么——旧社会吃得上吗？”同学们一片叫好声，右派教授“狼狈不堪”。——在民众的心里，右派是一群无聊的、充满旧社会气息的人，他们不是鼓吹“一本书主义”（丁玲），就是瞎聊“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刘绍棠）；不是拿《草木篇》来影射新中国（流沙河），就是疯狗般的要“杀共产党”（葛佩琦）。时间在流逝，老百姓心目中最著名的右派不是罗隆基、费孝通这样的高级干部，而是那些有过惊世骇俗言行的人（尽管这种言行被篡改了）。

不少右派名人还是毛孩子，如刘绍棠、流沙河和王蒙这样的“神童”。他们是第一代为政治而殉难的新中国知识青年，他们不像高长虹那样狂悖，也不像张中晓那样多愁善感，他们身上的旧时代色彩很少，但正因为他们的殉难，才加深了这一运动的深刻悲剧性。许多年以后，流沙河的兒子终于读到了父亲的《草木篇》，失望地说：“一般嘛！”悲剧正在于此，我们相信诗人流沙河此时痛惜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啼笑皆非。

1957年上演了一部戏剧，名叫《高级垃圾》，这部剧富有独特的喜剧效果。一位政协委员到处搜集新中国的阴暗面材料，终于听说他下榻的饭店里有一位理发师对共产党有意见。踌躇满志的政协委员请他到房间里为他理发，听他诉说冤屈。理发师尚未开口，便激动不已，政协委员安慰他：不要激动，慢慢说，是不是有亲人被镇压了？理发师于是讲了他的冤屈：他的父亲是在解放前被恶霸逼死的，而共产党却让这样一个恶霸做了政协委员——“你说，我怎么会不对共产党有意见？”这政协委员听毕，脸色变得苍白，原来，他本人正是理发师说的那名恶霸。真相大白了，理发师带着一群激愤的群众找这名政协委员算帐，而主人公却躲到了麻袋里。

戏的结尾是，理发师问：麻袋里的是什么？女秘书战战兢兢地回答：没有什么，只是一包垃圾。理发师不解：垃圾为什么不倒掉，而用麻袋保存着？女秘书想了想：噢，这是一堆高级垃圾。剧场里响起一片欢快的笑声，剧到这里结束了。这出戏对右派的价值判断是符合了毛泽东1953年抨击梁漱溟的讲话的。毛泽东自问自答：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选反动分子做政协委员？我们选他，就是因为他还有市场，有骗人的资格。

被判定为“高级垃圾”的殉难者们在观众的哄笑之中，恐怕只有靠着希望才能生存下去了。大多数人在希望之中生活下来，终于看到了光明。大多数人后来成为了国家栋梁，胡耀邦当年召见共青团系统的右派分子时说：

你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情的。对于不幸的人们来说，希望正在于此。时间证明《高级垃圾》只是一个错误的寓言。但悲剧性的 1957 年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不祥的年代。

## 年度记事

### 周恩来在匈牙利

布达佩斯的枪声刚刚平息，局势尚未完全恢复平静。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就来到了这座硝烟还未散尽的城市。考虑到中国同志的安全，匈牙利工农政府用坦克车接送了周恩来等人。1月16日至17日，周总理同卡达尔总理就匈牙利局势、双方关心的政治经济问题和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对当前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问题和匈牙利局势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在社会主义处于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周恩来同匈牙利领导讨论了匈牙利的教训，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从人民群众和青年对过去领导者的严重错误“产生的正当的不满”而发展成恶性后果的。

在访匈之前，周恩来访问了莫斯科。此时，中苏交恶已初露端倪。毛泽东在同年1月27日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说：“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的顽固分子还在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要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讲。”“这回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搞得他们也抬了。”“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讲，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

####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节录）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 (2)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 (3)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 (4)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 汉阳暴乱

据新华社报道，7月12、13两日，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由升学要求而引发的罢课游行在反革命分子煽动下变成了一场暴乱。

制造暴乱的是该校副校长王建国（共青团员）、教导副主任杨松涛、教员钟毓文等，民盟盟员杨焕尧则是反革命集团的军师。12日下午，示威游行的学生冲进了县人民委员会和中共汉阳县委，捆走了县委会的一名干部。晚上，在杨松涛的挑唆下，学生又拥到了县兵役局，企图捉拿兵役局长；有些人冲进兵役局后试图打开军火库，只因被兵役局工作人员制止才未得逞。

第二天，反革命分子煽动和组织了更多的学生赶到县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各种要求。县长韩茂林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同全体学生见了面，认真负责地答复了他们提出的要求。部分学生的情绪稳定下来了，然而，反革命分子借口对有的答复不满意又大闹起来。并提出了口号：“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要战争不要和平！”“打倒法西斯”等等，这些反动口号激起了群众的不满，工人、农民及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学生的不法行为。

9月6日，湖北省汉阳县人民法院在万人公判大会上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3犯死刑，并当场执行。杨松涛等4人被判处15年到5年的有期徒刑。

### “15年赶超英国”

本年末《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社论提出，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建设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深感赞赏，他批示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一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同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归根到底，我们应当争取15年和平。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 今昔对比

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乡人，任某乡农业技术指导站站长。解放前，他的父母带着他讨过米、逃过荒，祖父和母亲都因讨米而病饿死于他乡。刘介梅本人幼年时讨过5年米，长大后又做了15年雇工。两个妹妹也因无法养活卖给别人当童养媳。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土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土改分配时，家里分得6.3亩田和全套耕牛、农具，住上大4间新瓦房。1956年刘介梅家庭人均粮547斤，食油6斤6两，全家共吃了27斤猪肉。由于刘介梅忘记了过去的痛苦生活，1953年开始富裕后，放了6担稻谷和200元钱的高利贷。今年在黄冈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刘介梅发表了诸如“合作化糟得很”、“统购统销把农民搞苦了”等言论，公开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统购统销表示不满。针对刘介梅的错误言行，为了挽救教育他本人，也教育和刘一样有着错误思想言论的人，用事实回答一切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错误思想。黄冈县委在征得刘介梅本人同意后，把刘一家旧社会所穿的



破衣裳和讨米碗以及现在的家庭所用搬到县城，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刘介梅今昔对比展览。

据 8 天统计，前来参观的人有 15 万人之多。人们参观以后，纷纷在留言簿上写感想，厚厚的本子写了好几大本。刘本人痛哭流涕承认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广大群众也因此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 [附文]

这是为什么

《人民日报》社论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 5 月 25 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倀，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

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 5 月 25 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 and 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正如何香凝女士所说的，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压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未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大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 1958年：沸腾的日夜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大跃进”民歌

“反右”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刻骨铭心，它造成了人们对世事多疑的性格——这实在是“反右”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酿成的最大历史悲剧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再看一看久远的历史吧：《官场现形记》中的那位中堂老大人传授的为官秘诀，最关键的一句是：“多磕头，少说话。”“多磕头，少说话”自然是一种堕落的社会哲学，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为社会主义文明观所不容的封建思想残余。然而，为什么时隔若干年后，中国人的某些分子还在倡导一种战战兢兢的、察颜观色的人生观和社会观？难道是近现代中国历史本身就具备了一种喜怒无常的性质？还是我们民族性格中“还原”的能力太薄弱？这些问题，应该在世纪末得到很好的反思。因为众所周知，对于1958年开始的狂热，不仅没有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上得到及时的纠正，相反，彭德怀的遭遇又提供给中国人“多磕头，少说话”的懦弱哲学一个残酷的印证，使得几代中国人以消极的态度看待历史，这不能不说是最大的悲剧。

日历终于翻到了不平凡的1958年，置身于历史之外的读者很容易将这一年同1957年联系起来。如果说1957年是中国历史喜怒无常性质的一次典型上演，那么，1958年则是悲剧的序幕。中国人对1958年的印象是：这是充满着集体主义的温馨的热闹年景。除了火热的工地生活、生动活泼的新民歌运动，盛宴般的饮食也成为困难时期人们美好的回忆。困难时期的人会唠叨：“那时我在工地，什么时候想吃什么就吃，大桶里随时盛着面条，管够，半夜还加一顿夜宵，啧啧……”尽管接踵而来的3年饥荒成为1958年狂热的绝好注脚，但许多人还是认为生活在1958年是一种幸福，电影《活着》描述了公社食堂的富足：一个顽皮的孩子盛了满满一大碗凉皮（上面浇了花样繁多的佐料），然后将凉皮倾倒在另一个孩子的头上；周末人们吃的是真正的白面饺子，个大馅足。——在回忆中生活，固然是件凄凉的事情，

然而，客观规律注定了大跃进盛景之后的萧条结局，这种结局我们将专门讲到，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艰难岁月之一。

本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冯健写的通讯《沸腾的日日夜夜》。文章写道：“1958年是我们伟大祖国充满着奇迹的不平凡的一年，奇迹之一是，全国人民夺取钢铁的大战获得了大捷——今年的1070万吨钢产量计划已提前，超额完成（实际上，合格钢产量只有800万吨——编者）。

“那些紧张战斗的日日夜夜，那些壮丽的劳动场景，令人永远不能忘怀。

“我在京广、津浦铁路沿线看到这种动人的图景。夜晚，列车在原野上奔驰，不时从成群成列的土高炉、土炼钢炉和土焦炉身旁穿过，旺燃的火焰呼呼作响，映红了漆黑的夜空。

“千百万钢铁大军开进荒山野岭，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山冈，爆破手们在常年沉静的山谷里，点燃了开出的雷管、炸药，无尽的矿山、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向炼铁、炼钢炉前。

“千万条道路赶筑起来了，条条通向矿山和熔炼炉。火车加快了运行速度，船只乘风破浪地急驶，都在为钢铁奔忙。……”《沸腾的日日夜夜》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1958年幸福、温馨、壮美、温暖又充满诗意，1958年在记忆中变得夜色阑珊，在苍茫的大地上，青烟袅袅，炉火通红，劳动者矫健的身影在暗夜和炉火之间时隐时现。在中国人民漫长的生活史中，这种热火朝天的场景曾经屡见不鲜，文艺家们从这种场面中找到了许多灵感，仅仅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就诞生了王愿坚的著名短篇小说《普通劳动者》和田汉的幻想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普通劳动者》后来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典范，然而我们印象甚深的是壮丽的集体主义生活、高尚的情操和十三陵水库工地的食谱：馒头和腌萝卜，我们想像着，当劳动者们享用着馒头和腌萝卜的时候，那感觉一定是非常香甜的。话剧《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是新中国第一部，也可能是最后一部描绘了人类大同时代情景的浪漫幻想作品，它对共产主义时代的想象令人激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影院、图书馆、理发馆、俱乐部、音乐厅，人人各取所需，人人心满意足。但是谁能够预料到：这样一种以今天的物质水平看来并不算特别奢侈的愿望，在50年代末竟然成为一种不祥的幻想？

50年代末中国人民改造自然的标志——十三陵水库，在当年是一个被文艺工作者热情讴歌的地方。它是总路线的瑰丽乐章，是劳动者的圣地，新华记者的报道如下：

“（5月）28日，当人们愉快地度着假日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了义务劳动。

“3点20分，汽车到达了工地指挥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人一走下汽车，就被水库建设者们发现了，他们聚拢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周围，不停地鼓掌，不停地欢呼‘毛主席万岁！’

“5点35分，毛主席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一起执铁锹为水库工程铲土。……’

“毛主席刚一放下铁锹，一位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锹包起来，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锹，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一位社员流着激动的眼泪说：‘过去的皇帝剥削了我们的钱，强迫人民在十三陵给他们修陵墓，今天，共产党领导我们在十三陵修水库，

多打粮食改善人民生活。毛主席呀，他老人家那样忙，还要和我们一起修水库，这给我们带来多么大的鼓舞和力量！”

有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场面被拍成了电影，至今在电视中频频被播放，已成为反映第一代领导集体形象的经典镜头。7月1日，十三陵水库终于落成了，这个能容纳8000多万立方米水量的水库是全部用义务劳动建成的，在1月21日开工以来的160个昼夜中，40万人在工地上做了870多万个工作日。

仅就这一点来说，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一天，十三陵水库工地，一片节日景象，无数面红旗插上了周围的山头，15万水库建设者聚集在这里，唱着《我们胜利了》的歌曲欢庆这个伟大的成就，长歌动地，锣鼓喧天，在人们心中，这不仅标志着战天斗地精神的胜利，而且代表着总路线的伟大胜利。

1958年是中国人空前乐观、建设热情空前高涨的一年。7月5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告诉人们：“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了，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刘少奇的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在河北省徐水县，一个“共产主义乐园”正在崛起。有关报道说：徐水县已经实行了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徐水县已经是全国高产的一个典型，该县正计划放几颗“高产卫星”，如一亩山药120万斤，1棵山药500斤等。《人民日报》在《徐水人民公社赞》中热情地发表评论道：“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而河南省范县已经将共产主义日程化和具象化了。10月28日，范县规划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县委书记做报告时用形象的语言谈到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当毛泽东看到范县的“三年规划”时，微微一笑，提笔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可也。”毫无疑问，今年是老人家情绪非常好的一年，在中南海的那些不平静的日日夜夜里，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喜讯摆上老人家的案头，在他的眼里，这是他诗人生涯看到的最瑰丽的诗篇，“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一首名为《送瘟神》的诗篇里，老人家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态：“夜不能寝，浮想连朋。”在十三陵水库落成不久，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使得老人家如此诗兴盎然，“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这让我们看到了1958年的另一种真实——从领袖到民众面对强国之梦的自豪和悲喜交织的心情，虽然1958年的最终结局是一场可怕的萧条和破产，但是，有理由对一样壮举，一种理想设计，一场大同之梦的失败感到遗憾。因为这种失败不仅以物质和生命为代价，更可悲的是，它给予中国人心灵上一次深刻的创伤，民族的前进出现停滞，民族的信心像肥皂泡破灭，许多年后才把它找回。但许多年后，提到1958年的理想主义，人们还是禁不住痛心疾首。

当人们指责“浮夸风”是万恶之首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再津津乐道1958年新闻媒体上甚嚣尘上的“高产卫星”。因为现在的人们谈到“高产卫星”，总不免带出一点幸灾乐祸的样子来。现在的人们热衷于揭穿骗局，也乐于看到违背客观规律的人遭到惩罚。现代的人们优裕，善谈，高智商，当他们看

到 1958 年广西红旗人民公社水稻亩产达 13 万斤，河南小高炉日产生铁 1.807 万吨的惊人报道时，他们会为过去的狂热而付之一笑。然而对于 1958 年的幸灾乐祸，才是今天的不幸。当粮食问题永远是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候，谁也没有权力去嘲笑 39 年前的谋幸福之举，更不要说这个历史悲剧是属于民族的。说不定，当我们处境优裕而忘乎所以的时候，狂热和悲剧会再次发生。

人们常说要珍惜现在。然而，如果现时、现在成为以后岁月中人们的“黄金时代”式的眷恋，那么，这就是在毁灭着“现在”。美好的事物不应当是记忆的专利品，更多的时候，它应该属于未来。1958 年的短暂繁荣重演就给困难时期的人们留下了可悲的幸福记忆：“那时候，桶里总盛着面条，想吃就去捞……”这样一页历史，愿它永远翻过去，不再打开。

#### 年度记事

##### 乘风破浪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社论说：1957 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事实充分证明了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胜过了战争的力量。社论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

指出，我们要在 15 年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准备再用 20 年到 30 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2 月 2 日和 3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两篇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打破一切右倾保守思想，“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 奇文共欣赏

2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奇文共欣赏，毒草成肥料——王实味、丁玲、肖军、罗烽、艾青等人文章的再批判》。文章说：今年 2 月《文艺报》有一个再批判的特辑，刊登了 15 年前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和其他文艺刊物上发表过的一批文章，有托派分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和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再批判》的编者按语指出，丁玲等右派早在延安时代就“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今天又和新的右派分子秦兆阳、钟惦斐、陈涌、钱谷融、刘宾雁、王蒙、刘绍棠一起，以“革命的姿态”向党进攻，实际上是反革命。

##### 批判“新人口论”

1957 年 7 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就在一届人大 4 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发言，今年 2 月，马老先生继续在人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谈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

为此，康生和陈伯达几次批判马寅初，认为马寅初的问题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本年 6 月 6 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在人口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的代表是马尔萨斯，无产阶级的口学说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把人口数量说成是决定人类能不能过幸福生活，能不能丰衣足食的主要因素，而马克思认为决定人类幸福的不是人口数量，而是生产关系是不是和生产力的性质相

适合。6月12日《文汇报》的一篇文章也认为：马寅初的理论是极端错误的，他本人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者。

### 炮轰金门

8月23日中午，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向金门开炮，一个小时内发射了5.7万发炮弹，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24日至27日，双方为争夺金门正南的东碇岛发生激战。26日至29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大担岛失利，9月2日，双方海军在料罗湾交战。9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又向金门和驶往金门的蒋军运输舰发起猛烈炮击。10月6日和25日，毛泽东撰写了两篇以国防部长名义发布的《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6日的文告建议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我国内政问题，提出自当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但以没有美舰护航为条件。台湾方面拒绝和谈，10月20日，炮击恢复。10月25日文告确定今后逢双日不打金门的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上的军民同胞得到充分的供应，前提仍是没有美舰护航。至12月底，人民解放军击沉击伤国民党各型舰艇23艘，击落击伤蒋军飞机34架，毙伤蒋军中将以下官兵7000余人。对金门等地的炮击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其间，坚持了双日不打炮和节庆日不打炮的原则，并定期发表文告。

###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

早在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便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经过8年多的筹划与修建，它终于在今年4月22日正式建成。

这座纪念碑是用17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石建成的，碑基占地3000多平米，碑身高达37.94米，是我国自古以来最大的一座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雕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镏金大字，背面的碑心由7块巨大花岗石组成，上面刻着周恩来总理所书的碑文。

镶嵌在大碑座四周的是10块汉白玉浮雕，雕刻着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历次革命斗争画面。5月1日，纪念碑正式揭幕，次日向游人开放。人民英雄纪念碑从此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象征。

### 除“四害” 灭麻雀

今年是麻雀的灾劫之年，自毛泽东同志发出“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讲卫生”号召以来，麻雀也被列为人类大敌之一。全国各地不论男女老幼，敲打铜盆铜锣，可怜的麻雀们被撵得东窜西逃，成为真正的惊弓之鸟。当麻雀们纷纷从树枝上、瓦楞上跌落下来时，人们开始欢呼“除四害”战役的伟大胜利。据5月28日《羊城晚报》报道：广州突击围剿麻雀的战役胜利结束，全市共围剿31万只（包括雀蛋2.58万个），捣毁雀巢3.9万个，广州驻军也参加了这次战役。有意思的是，麻雀的是非功过在文革期间竟然升格为政治问题，有一位生物学家因写了一篇关于麻雀觅食的习性的论文，被红卫兵戴上“恶毒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加以批斗，红卫兵把一串血淋淋的死麻雀挂在他的脖子上以示惩罚。是毛泽东的一句话终结了这场“麻雀官司”：“麻雀不要打了……”。

### 跨进原子能时代

6月13日，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建成。这座原子反应堆是重水型的，功率是7000至10000千瓦，设计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参加建设这

个原子反应堆的我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在苏联专家的热情指导下，经过紧张劳动，6月13日下午4时，反应堆开始发生链式反应，并逐步提高功率，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它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已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

#### 医学奇迹

据新华社报道，6月28日，上海广慈医院抢救了一位被铁水烫伤的上钢三厂工人邱财康并获得成功。邱财康被高温钢水烫伤，烧伤面积达89.3%，据美国外科权威伊文思的材料记载，烧伤70%以上的所有病例全部死亡，超过80%的更是无法救治，然而该医院40多名医生仍然运用植皮技术抢救邱财康，并取得了成功。这一事迹被看成是“医疗卫生战线大跃进的一个伟大成果”，并被拍摄成彩色故事片（遗憾的是，病人存活很短一段时间后仍然死去了）。

#### “蝌蚪避孕”是伪科学

本年初，一些报纸不负责任地向群众推广吞服蝌蚪避孕的单方。经有关方面试验证明，所谓“简便、省钱，稳当可靠和无任何副作用”的活吞蝌蚪避孕法，不但毫无功效，反而容易使妇女染上寄生虫卵，损害妇女健康。

#### 蒋介石、杜勒斯的“联合公报”

9月30日，美国为在政治上隔离台湾，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由国务卿杜勒斯发表了一篇未与台湾商量的谈话，声称驻扎在金门、马祖岛上的国民党军队将撤回台湾。对此，蒋介石于10月1日进行了反驳，蒋宣布拒绝从金、马撤军、杜勒斯的讲话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台湾当局没有义务去遵循它。10月23日，蒋介石和杜勒斯发表“联合声明”，美方承认“金、马、台、澎在防卫上都有密切关联”；蒋介石宣布放弃军事“反攻大陆”的口号，要以“三民主义”来“光复大陆”。

#### 汉字改革

本年1月28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决议》将汉字简化方案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化字共230个，2月1日起在全国印刷的书写文件上一律通用；第二部分简化字285个和第三部分简化偏旁54个，先行公布试用，待征求意见作必要修改后再正式推行。1959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文化部又推出第四批92个简化字，总计共推行517个简化字。1956年开始的汉字简化措施对中国人影响巨大，除港台地区外，40年来，这个简化方案一直被使用着，甚至新加坡、韩国也采用了简化汉字。尽管八、九十年代一度因崇尚港台文化使繁体字沉渣泛起，但总的来看，1956年开始的汉字简化已深入人心。

同时公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第一次对普通话作了明确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同年1月1日起，《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全国性报纸的文字，由原来的竖排改为横排，这是我国报纸形式的一项重大改革。郭沫若、胡愈之等撰文指出文字横排的科学性。人的两眼是横的，眼睛视线横看比竖看要宽，阅读时眼和头部转动较小，自然省力，不易疲劳，书写、排字也较方便，同时还可提高纸张利用率。

#### 昆剧《十五贯》轰动全国

本年4月，周总理在观看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后，称赞该剧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他说：“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

是进步的，昆曲的一些保留剧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5月中旬，周总理在关于《十五贯》的座谈会上再次讲话：“《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化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并指出该剧起到了很好的“现实教育的作用”。中央领导同志还向全国公安司法系统推荐该剧，对谨慎办案和纠正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时代，《十五贯》再次成为一部很好的教材。

#### 上海新风尚

在上海市的各个公共场所里，已经看不到“谨防扒手”的牌子，代替它的是失主送来的许多表扬拾金不昧的信件和锦旗。

据上海报刊报道，今年有4000多位遗失东西的人，在上海市的公共汽车场、三轮车管理所和人民游乐场领回了失物。失物包括金壳手表、钢笔、成百上千元的储蓄存款单、扇子、雨伞和手帕等。这些失物都是售票员、三轮车工人、民警和一些市民在各种公共场所拾到的。在每一件失物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一个下雨的夜晚，女乘客赵慧珍坐三轮车回家，不慎将一个装有2万元存款单和现款、图章、钢笔等的皮包遗忘在车上。三轮车工人严义顺发现这个皮包后，冒着大雨赶到了居委会，并通过皮包内的线索找到了失主。当赵慧珍感激地酬谢严义顺时，这位三轮车工人只说了一句：“这是我应该做的嘛。”便笑嘻嘻离开了居委会。

#### 对蒋介石发出的信号

12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印度答记者问时，重申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态度。

周总理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的话，那么蒋介石就有了贡献，而他就可以根据他的愿望留在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他还说：“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

### [附文]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刘西瑞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值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二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说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不神秘。一般的社值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在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



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闲“胃病”。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

……

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足是不行的。

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做，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做。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足半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像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现实的事物了。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情况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经生产到每亩五十万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一亩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我们粗粗算了几笔帐，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这是一种情况。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单算劳力帐，要大搞万斤田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他们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

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做到这样，还很不容易。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

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价。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粮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45%，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那由国家买吧！”经过算细帐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说了。

## 1959年：雪山春雷

我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我不离开自己的祖国。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于1949年

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与布达拉宫辉煌的金顶相辉映，喇嘛们吹响了低沉的号角，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深墙之内，农奴们在皮鞭的驱赶下，像牲口一样负重物，沿着石阶艰难地攀援。这就是60年代初李俊导演的黑白故事片《农奴》开始的场面。

很少有人不为这部电影所反映的人间地狱景象感到压抑和恐惧。这是新中国十七年间罕见的影片，无论在写实上还是风格上，都是非常杰出的。人们推举电影《农奴》与另一部《小兵张嘎》是代表着“十七年”间中国电影美学最高成就的作品，有着其充分的理由。“十七年”已经成为中国文艺史上的专用名词，“十七年”间大量的影片出现在电影频道里，供人们怀旧，咂摸流逝的滋味。人们用特殊的感情去重新触摩“十七年”间雪点跳荡、色彩黯淡的电影胶片，并不会以今天的鉴赏尺度去苛求它们，然而，“十七年”电影中的优秀作品仍然可以给90年代的观众真实的欢悦或痛苦，《农奴》和《小兵张嘎》便是如此，它们并不因题材的古旧而丧失穿透力，相反，以《农奴》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作品在美学上的成功，可以使人相信：如果不是后来的那场“革命”，中国电影水平完全可以早早地超越《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代。

毫无疑问，《农奴》标志着电影业从“全盘苏化”走向民族风格探索的转变，主人公强巴咬碎了自己的舌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哑巴，从此以后，电影空间变得开阔，而镜头变得沉郁而令人窒息，电影工作者天才地利用中国传统美学的“留白”、“镂空”等原理，向汉族同胞展示了他们以往并不熟

悉的藏域世界：雪山，寺庙，服饰，沾染着鲜血的哈达，阶级压迫的颤栗，民族解放的曙光。

在 1959 年民主改革以前，内地的同胞们除了不时领略到西藏歌舞和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两位年轻的副委员长的风采外，大多数人对西藏的真实情况所知甚少。解放前的文艺作品中，除了周文的某些小说涉及到川康边的风情，李劫人的《大波》中，出现四川总督赵尔丰在西康境内“剿番”的片断，除了浮光掠影式的笔猎外，人们很少知晓藏域社会的内情。建国后的电影《金沙江畔》，直面描写了四川藏区人民对红军的深深的隔膜，这种隔膜是有史以来长期的民族压迫的产物，只有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打倒了三座大山后，民族平等与民族解放才有可能获得实现。1951 年的和平解放实现了西藏人民自由的第一步，然而，直到 1959 年的叛乱发生之前，对反人权的西藏农奴制度触动很少，秘密的酷刑和杀戮很难为广大的内地民众所知悉。

而《农奴》是开山第一篇，它不仅描绘了一个痛苦的西藏，而且展示了一个人性觉醒了的充满希望的西藏。

1951 年 10 月 2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主力，和平进入世界屋脊名城拉萨，当年的纪录片上可以反映忠勇的解放军战士开进拉萨城的情景，八角街上摇曳着彩绸和哈达，人们载歌载舞欢迎金珠玛米的到来，看不到任何不和谐的地方。然而，许多年以后，一本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连环画《不许出生的人》袒露了某种敌意：画面上，穿着英式服装的藏军懒洋洋地敲打着军鼓，而僧侣贵族和农奴主一脸沮丧地垂着头。70 年代末上演的话剧《不许出生的人》不可避免地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痕迹，舞台上，那个女牧主逃亡印度未遂，摇身一变，兴高采烈地向群众宣布和平解放的消息，并热情洋溢地说：“我现在已经是政协委员了……”而在她口头上拥护解放的同时，却把一名叛乱头目、帝国主义特务藏匿于密室中，直到 1959 年，阴谋才开始败露，至今我们仍记得密室被打开的情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奴无意间闯开了密室，一下子同他的旧主人撞了个满怀。他的旧主人——也就是叛乱头子——仓皇地退回了密室，老农奴战战兢兢地说：“我什么都没看见……”。这一情节有着独特的意义，西藏——神秘的香格里拉——在 1959 年前，它的社会本质好比隐藏在密室里的罪恶，直至 50 年代末的一声春雷，才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剥皮抽筋，人骨法号，由《农奴》和女藏胞巴桑揭露的一切，使人们懂得了什么叫最残暴的人类压迫。

本年度达赖集团公开叛国，西藏的战斗和炮轰金门一样，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国内战斗。然而，1959 年的平叛战斗和金门之战仍然算得上 50 年代的胜利，它不仅考验了国防能力，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对西藏广大农奴来说，它意味着这个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结束了惨无人道的奴隶主统治，这也是人类革命的胜利。众所周知，中世纪式的奴役在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较普遍的社会问题，比如直至 80 年代，非洲的毛里塔尼亚才宣布废除奴隶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追求幸福和自由，一直是 20 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主题。没有理由将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农奴解放排斥于这一进程之外。西藏今天仍是国际政治领域中有少数人纠缠不休的一个“问题”，但中国人会说：1959 年雪山的春雷给地球上最黑暗、最压灭人权的制度划上了休止符，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从史料记载上看，1959 年的叛乱起因似乎源起于“看戏事件”，然而，

这仅仅是表相而已，以达赖为首的上层势力的离心倾向实际上由来已久。毛泽东在 1956 年 11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指释迦牟尼涅槃 2500 年——编者），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我们共产党是被别人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实际上，确实有人在给达赖施加影响，达赖本人也曾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迟迟不肯回国，后经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才回到拉萨。

西藏上层集团公开反对“民主改革”，以“民意代表”的身份进行“请愿”，向政府施加压力，党和政府对这种错误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和警告，同时考虑到进行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故决定在六年之内暂不进行改革，六年之后改革与否再现情况而定。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对此正式作了宣布。可西藏上层集团一些人反而以为中央软弱可欺，人民解放军“害怕”他们，竟然召开“庆功会”，组织“曲细岗珠”和“卫教军”等反动组织，不断发动零星的武装叛乱，并于 1959 年 3 月在拉萨公开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在西藏地区全面发动了武装叛乱。

武装叛乱的导火索是所谓的达赖“看戏事件”。

达赖对一些新事物比较感兴趣，早在 1958 年 11 月，当他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从内地学习了新节目回拉萨后，就向军区表示想看文工团的演出，由于灯光、道具携带、布置不方便，演出只能放在军区军人俱乐部大礼堂。1959 年 2 月 7 日（藏历 12 月 29 日），是西藏宗教中传统的驱鬼节，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跳神”活动，回到罗布林卡后，达赖即派人用电话跟工委统战部联系，商定 3 月 10 日下午 2 时半到军区去看戏。3 月 9 日，双方又就看戏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了安排，这一切情况，西藏地方政府的几个噶伦都是知道的。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却借此策划了一个阴谋。

9 日深夜，拉萨朗子辖（市政府）的墨本（市长）洛卡娃向一些市民造谣，称军区要毒死达赖，鼓动市民第二天去劝阻达赖看戏，第二天上午，一些不明真象的藏族同胞被胁迫，被骗至罗布林卡大门口，西藏地方政府的警察、“卫教军”荷枪实弹地在大街小巷巡逻，整个拉萨谣言四起，局势十分紧张。中午时分，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爱国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去见达赖，在罗布林卡门口被叛匪砸死。西藏地区政府噶伦、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乘汽车去罗布林卡，结果车被砸坏，人也受伤，幸亏保卫人员及时抢救，才幸免于难。下午 3 时左右，叛乱分子将帕巴拉的遗体系于马尾，用马拖着在拉萨游街示众。一千多叛乱分子举起“雪山狮子国”旗帜，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的口号，恣意捣毁机关、商店、学校。

当天晚上，西藏地方政府在罗布林卡召开所谓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决定“西藏独立”，“与中央决裂”，命令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等拉萨三大寺的喇嘛向市区集结。当夜 1400 多名喇嘛和 2000 多藏军、“卫教军”开进市区，并派一部分武装进入罗布林卡，将达赖置于武装包围控制之下。

接下来的几天，拉萨城里枪声不断，火光冲天。叛军推举了“人民会

议”的领导，调整了“西藏独立国”的武装总司令部，并向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通报了情况。

叛乱分子在布达拉宫右侧的药王山上安放了大炮，将炮口对准了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并在军区门口架设了机枪。

到3月19日，拉萨城里已聚集了武装叛乱分子7000多人，西藏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武装叛乱。3月20日凌晨，叛军向拉萨的机关、部队和企事业单位发起全面进攻。霎时间，拉萨城内枪声、炮声隆隆不断，不少地方火光冲天，一场恶战开始了。

面对这次大规模的叛乱，西藏工委和军区临危不乱，沉着应付。当时西藏的工作由中央驻藏代理代表、军区政委、工委副书记谭冠三主持。3月10日，谭冠三即与西藏地方政府严正交涉，指出这是有预谋的分裂祖国的事件，性质极为严重，要求他们立即制止事态的发展，彻底追查主谋，并保护好达赖的安全。许多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和广大僧俗爱国同胞坚决反对这次叛乱，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人和家属到军区大院，在这危难时刻坚决同祖国站在了一起。

据报道：当时人民解放军驻拉萨的部队并不多，除了各机关警卫部队外，能机动作战的只有1000多人。在叛匪的进攻面前，守军和民兵沉着应战，英勇抗击，青藏公路运输站是叛军进攻的重点，80多人的一个民兵连，打退了敌人3次集团冲锋，牺牲了6人，却使叛军没能前进一步。自治区筹委会、外事处，人民医院、西藏日报社等单位，在叛军的进攻面前巍然屹立，使叛军留下大片的尸体。

3月20日上午10时，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解放军驻藏部队打响了反击叛乱的信号弹。西藏军区发布了“奉命讨伐，平息叛乱”的布告。乌合之众的叛军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很快就溃不成军。在炮火的支援下，以159团的一部首先攻占了药王山，拔掉了威胁我军区指挥机关的叛匪制高点，切断了拉萨市区与罗布林卡的联系。傍晚，又有约一个团的兵力攻占了罗布林卡，歼灭了叛军的主力 and 指挥中心。

21日，解放军回兵市区，对叛军形成合围，逐个歼灭了据守在大昭寺、小昭寺内的叛军。22日上午，盘踞在布达拉宫的叛军见大势已去，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纷纷缴械投降。至此，嚣张一时的拉萨的叛乱已经平息。此战共歼灭叛军5360名，缴获各种枪枝10212枝，轻重机枪183挺，各种火炮39门，炮弹二万余发，子弹一千万余发。

达赖一行600多人乘夜出逃，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在叛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西藏的武装叛乱活动还得到了外国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叛军训练“游击队员”，1957年8月，将两名藏族特务空投至西藏，并带电台潜入拉萨，在达赖身旁活动。达赖出逃前，这两名特务带电台随行，并与美中央情报局保持无线电联络。从1959年9月至1961年3月，美国还向西藏腾格尔海等地区空投了特务50名，并出动飞机19架次给叛军空投武器。印度政府也极力支持达赖，印度外交部司长梅农专程迎接达赖到印度，并为达赖集团的活动提供各种方便。

拉萨的武装叛乱平息之后，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撤销索康等18名叛乱分子的自治区筹委会委员职务，任命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帕巴拉·格列

朗杰为副主任，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兼秘书长。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驻藏部队和增援部队迅速在日喀则、亚东等地解除了藏军的武装，并对山南等地的叛军进行围剿。到1962年上半年，经过3年的战斗，解放军平叛战斗胜利结束，基本肃清了西藏境内的叛军。

共和国1959年不平凡的春天，雪域的农奴解放写下了困难时期的令人振奋的一章。

同年，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北京万人大会上，就联合国讨论所谓“西藏问题”发表讲话反驳道：联合国讨论所谓西藏问题，是严重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可耻行为，是完全非法的。这一所谓提案硬说什么西藏人民没有“基本人权”、“没有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诬蔑中国政府在“镇压”西藏人民，要“消灭”藏族，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捏造，班禅说：“过去，西藏人民在一小撮反动分子的统治下，确实没有根本人权，没有公民自由。但是，从来没有听到这些先生们为西藏人民讲过一句话。……我要正告这些先生们，西藏人民和全中国各族人民对你们的这种卑劣行为是坚决反对的。……西藏人民基本不会因帝国主义分子的叫嚣而改变自己前进的方向。”

尽管后来西藏人民和中国各族人民一样，经历了命运的动荡和起伏，然而，十世班禅在人民大会堂里充满爱国热忱和正义精神的演说回荡在岁月时空里，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希望的高涨，班禅大师的遗训会越发显得珍贵，垂范千古。

#### 年度记事

##### 庐山会议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其间风云突变，彭德怀上书毛主席成为“反党事件”，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人被打成“猖狂向党进攻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受到批判，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议》、《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会议结束后，全党掀起“反右倾”斗争的高潮。

##### 人民大会堂等建筑竣工

在国庆10周年前夕，10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在北京落成，它们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和华侨大厦，其中最为雄伟的是人民大会堂，它座落在新扩建的天安门广场西侧，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体积达159.69万立方米，整座建筑由万人大礼堂，5000个座席的宴会厅和全国人大的办公楼组成。人民大会堂全部工程，只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集现代风格和民族传统为一体。十大建筑犹如10颗明珠，给古老的华夏之都增添了绚丽的风采。

##### 实行特赦

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提议：在国庆10周年的时候，特赦确实已经弃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中共中央的建议说，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在押各种罪犯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

造，根据这种情况，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17日，全国人大决定：“对于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实行特赦。”同日，刘少奇主席发布了特赦令。

#### 我国发现大庆油田

50年代中期，“铁人”王进喜在北京街头看到公共汽车上的煤气包，心情十分忧愤，而今年9月25日，石油勘探队在东北松辽盆地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时值国庆10周年，油田因此而命名为“大庆”。大庆油田的发现，打破了中国是“贫油国”的论调，解放前，中国只有甘肃老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等几个小油田和四川圣灯山、石油沟两个气田，大庆油田的开发，使原油产量大幅度增长。4年后，周总理自豪地宣布：中国已基本实现了石油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 党的好女儿向秀丽

25岁的向秀丽是广州何济公药厂的女工。本年12月13日，工厂因酒精泄漏发生火灾，向秀丽也被火焰烧着衣衫，这时候，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逃离火区，在离火区不远的地方，有几桶金属钠，如果着火就会发生剧烈爆炸，给工厂造成巨大损失，在这紧急关头，向秀丽纵身扑在地上，用身体拼命拦截燃烧着的酒精。火烧灼着她的身体，她的左手被烧焦了。但向秀丽强忍着焚身之痛，直至昏迷。

当向秀丽苏醒过来的时候，劈头第一句话就是：“金属钠没有爆炸吧？厂损失怎么样？”经过一个多月的抢救，向秀丽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了。中共广州市市中区委员会举行追悼大会，正式追认向秀丽为中共正式党员。

#### 统一计量制度

7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国际公制为我国基本计量制度，并统一公制计量单位的中文名称；在保留市制计量的基础上，改市斤为十进制（中医处方用药除外）；除了特殊情况必须使用（如海里）外，取消英制和其他一切旧式计量单位的使用。

#### 紧急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

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指出：1958年以来，社会集团购买力急剧膨胀，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为缓和这一状况，中共中央决定：一、从6月份起，节约公用开支8亿元，除特殊情况外，暂停拨放给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的办公杂支、器具购置方面的经费；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本年要把县以上企业职工人员减少800万到1000万人，从而减少工资方面的支出15亿至18亿元；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四、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储蓄。

#### 广东举行粮食大辩论

《南方日报》从10月17日起，陆续发表文章，驳斥“粮食紧张论”和一部分人关于“粮食越吃越少”的论点。文章的题目分别是《去年粮食大跃进不容抹煞，农民生活大改善铁证如山》、《农民是少吃了粮食吗？》、《吃多了吃少了有案可查，粮食问题大是大非有分晓》。南海县兔约大队富裕中农黄丽容、麦七才等，攻击人民公社，说“去年粮食大跃进是假的，农民留粮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口粮是4两庄（即每人每天只吃4两）”等等，广大贫下中农对此表示愤慨，一致要求和他们算帐辩论，算细帐证明，农民的口粮不是少了，而是增加了。

## 粮食问题严峻

10月，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3个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情况的报告，3省一致反映粮食问题是农村最严重的问题。其中广东省已饿肿10930人，其中已死亡134人。造成粮食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对增产幅度估计过高，产量数字水份过大，再加上1958年秋收没有搞好，以及一度放开肚皮多吃。中央指示，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达不到的目标，应该修改，不要硬性下派。

## 容国团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4月5日，中国选手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这次男子单打比赛集中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240多个优秀选手，容国团苦战26个回合，终于取得了这项荣誉，并打破了日本选手垄断单打冠军的局面。

容国团生于香港，15岁即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1958年获全国锦标赛冠军。他的打法以快攻著称，技术全面，能攻善守，比赛中头脑冷静，拉、搓、推、挡、左右抽击等技术运用自如，将中国近台攻击技术的“快、准、猛”发展为“快、准、狠、变”。

这样一个为新中国摘取体育荣誉的人后来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 1960年：在困难的日子里

“农民兄弟大筐小篓地购买饼干糕点，这证明在总路线的光芒照耀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50年代末某诗人的“思想汇报”

一位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在1958年底给组织写思想汇报时说：“今天；我在城里看到许许多多的农民兄弟大筐小篓地购买饼干糕点，这证明在总路线的光芒照耀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年以后，诗人还为这段文字感到啼笑皆非。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饥饿时代来临的气息，自然在乡村最早显示出征候。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时代，长期把这三年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直到拨乱反正之后，这一文过饰非的社会名词才从中国人的词汇中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所有饥饿与奋斗的记忆，是这段时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

一位作家的外祖父死于1960年，对于孙辈们来说，他只能活在老一代人感伤的言谈里了。作家母亲经常说：外祖父长得人高马大，经过房檐，得低着头走路。他天生又是一副直肠子脾性，家里来了外人，不管是谁，外祖父总是乐颠颠地张罗着办招待，母亲最熟悉外祖父的一点，就是他总爱举着一根长竿到枣树下打枣。每当外祖父打枣招待串门者的时候，外祖母总是恨得牙痒痒的，嘴里咒念着“老不死的”、“老败家贼”等等。大跃进时代里，外祖父终于死了，古道热肠的“老不死的”是饿死的，他那雄伟的躯体被无休止的工地大战拖垮了，他那健食的胃难以继续靠区区几两粗劣的粮食维持下去。外祖父的死在当年并不算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饿死人的情形是经常



发生着的。乡邻甚至给外祖父的死添了一种近似于黑色幽默的说法：他不饿死谁饿死？那么高的个儿，房门都过不去。作家回忆到这里，很是沉痛。

实际上，饥荒的征兆即使是在“吃饭不要钱”的年代里就已经比较强烈地显现了。1958年11月，云南省委向中央报告说一部分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毛泽东为此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并强调，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应该同时抓。——人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批评层面尚限于工作方法上的失误，毫无疑问，这个层面还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本质。当蜂拥而来的农民大量套购可以凭粮票无限制供应的糕点时，穿着列宁装的城里人是否肯停下来，对即将到来的饥饿时代有所觉察？

的确。1958年10月，食品紧张问题已经初露端倪。这在当时广东发往海外的信件中也有所体现。

“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吃到一斤肉或一块鱼了。每个人的处境都是相同的，任何能食用的物品都买不到。”

“人们为了接近饭桶而争先恐后，而米饭永远也不够。”

“既买不到蔬菜，也买不到鱼和肉，这些东西只有持诊断证明的病人才准许买。

鸡蛋黑市价格卖到1角8分到2角钱一个，小鸡卖到3至4元一只。”

“现在到处都没有东西可买，形势是可怕的，我们饥饿时没有东西可吃。人们害怕死亡。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死了，他们也不能瞑目。人们在生与死之间踌躇，每个人都在受罪，一切东西都没有了。”

1958年冬季以来，除粮食问题已逐渐成为国计民生的最尖锐的问题外，市场出现了副食品和一些工业品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粮食全年库存比去年减少50亿斤；油料库存也比以往哪一年都紧，许多城市只能供应几天、十几天；有些副食品长期紧张；部分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市场上排队争购的现象很多。

采购人员满天飞。一部反映列车新风的故事片中，采购员的形象是耐人寻味的，列车的前方发生了塌方，被迫停在荒山野岭，所有的人都为停运而感到焦急，而那位胖乎乎的采购员嘴里却嚷着：“这接下来吃饭怎么办？”他总是挂念着“吃饭”，看来，这一类人总是比一般老百姓有着更松弛的生活观。采购员在全民心目中作为一个比较令人羡慕的职业，也源于50年代。而饥饿时代的采购员的社会地位更好比是“花枝俏”，在社会记忆中，从50年代开始的近30年间，采购员的招牌金光闪闪。

我们相信，困难时期的采购员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易于娶上漂亮的媳妇。采购员的走俏和物资的紧张是相辅相成的——电影中的采购员形象总是轻松而快乐的。《今天我休息》里的罗爱兰，就是如此，豪爽，善饮，善交际，当然有一些落后习气，但并不妨碍观众在影院里对“罗爱兰”发出热烈的笑声。这是困难时期的温馨片断，温馨的感觉来自“商品”，虽然采购员本人并不能变出“商品”来，但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能够接近“商品”和“食品”的角色自然是令人佩服的，这种角色除了采购员之外，还有食堂主任、炊事员和食品供应站的负责人。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不可一世的翩翩公子的靠山就是他那位当食堂主任的父亲。一位食堂主任的儿子自我感觉竟然如此良好，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种状况却是中国某些历史阶段沉重现实的反映。

在北京灯市口锡拉胡同的特殊食品供应处，外国使馆人员和专家照常可以买到市面买不到的主副食品和烟酒等。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按规定也可以凭一个红皮“供应证”买到限量的主副食品和烟酒。按照1960年9月1日对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临时特供证的规定，毛泽东一家可以每月凭证供应肉30斤，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然而，嗜肉如命的毛泽东把肉“戒”掉了近3年之久。共和国第一家庭甚至因此发生了因儿女饭菜不够量而吵架的情形。

对于有资格出席国宴的许多高级干部来说，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摆设的色彩鲜艳的水果，已经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看果”：一种仅作为摆设而谁也不好意思去吃它的装饰品。有几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到宋庆龄家里作客，忍不住拿起托盘里的水果大吃起来，国母看到这几位元帅级的人物惨兮兮的样子，一阵心酸，吩咐勤务员将剩下的水果送给他们带回去，一位元帅高兴得像孩子一般，用手帕包了一个小小的苹果，感激地说：够了，够了。

许多人认为过去的年代虽然物质贫乏，实行的是配给制，但绝对物价指数还是很低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困难的年代里，中国的绝对物价水平甚至直逼（或超过）90年代。女作家曾瑜的父亲经常提到的1960年的一次“盛宴”，按90年代的物价水平来看，也是令人膛目的。她的父亲经常为他年轻时的豪爽而自鸣得意，当年他是一位油漆工，月定量是40斤（东北地区条件稍好一点，全国其他地区一般机关人员月定量为21斤，而且其中的2斤要支援国家）。她父亲当年尚未婚娶，家庭负担较轻。祖母从农村来探望他，父亲要了4两白酒（每两8角）、1条炸鱼（每斤9元）、10个白面馒头（每个约2两，定价5角）。父亲印象最深的是，这场盛宴之后，祖母把吃剩的半边炸鱼和几个馒头小心地用饭盒装起来，带回农村给父亲的几个兄弟享用。曾瑜至今认为这场奢华，是困难时期其家族的一次荣耀。

而对于绝大多数面容浮肿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一定会为今天的某些人好奇的发问感到伤心。没有体验过困难时期的人感到奇怪：“我们今天每月也吃不了21斤，为什么你们会饿出浮肿病来呢？”当中国人的物质水平发生了变化，“吃饭”这个词汇，包含着越来越多的“吃菜”的意思后，21斤（准确地说，是19斤）定量对困难时代的人类生命的意义，当然就变得遥远而陌生了。每月3两油、3两左右肉（常常供应不上肉）的机关工作者为了弥补粮食定量的不足，常常成群结队到山区和郊外挖掘野生植物的块茎，把它们在公共食堂里磨成粉末，这是一种不错的食品，至少，比报纸上提倡的以糠麸为原料生产提炼的“代食品”好得多。饥饿令人们生出智慧——哪怕是望梅止渴的智慧，电视剧《毛泽东和他的乡亲们》里的公社食堂，用反复蒸煮的方法提高米饭的涨发量，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智慧”之一。中国人词汇库里有一个独特的名词，叫做“精神会餐”，相信这个时期里困难现实会助长它的流行。尽管，它有一层革命乐观主义的包装，但我们分明听到了潜藏在深处的欲望的呻吟。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在书本里消失了多年的阶层——文人雅士和有着闲逸情趣爱好的人们组成的阶层。毫无疑问，困难时期是最执着的“美食家”们必须收拾起排场的时期。小说《美食家》作者陆文夫笔下的朱鸿兴，正如以前的章节所讲到的，每天早晨起来是要惦记着来一碗“头汤面”的，我

们相信可怜的美食家在这时连“浑汤面”都没得吃。不仅如此，他还时时被老母亲的唠叨折磨得心烦意乱。老太太虽已昏馈，但味觉还是新鲜活泼的。老太太想不通，这不孝的儿子每月挣几十大洋（很明显，她把人民币同旧社会的现大洋等量齐观了），为什么就舍不得买几十文钱的苏造肉给她解解馋！美食家受到苛刻的物质环境虐待，同艺术家才思枯竭一样，堪称人生最惨淡之事。

四川作家车辐回忆道：“困难三年中，我很少进馆子，一则没钱，二则怕见熟人，彼此都弄得尴尬了。在那朝不保夕的日子，何苦去给人添麻烦。有一天下午4点钟左右，我同一位老友进到陈麻婆饭店，那时正是馆子‘吊腰’的时候，人较少，凑巧我们彼此（指作者和麻婆豆腐主厨薛祥顺）看到了，他（薛祥顺）招呼我进到后面一间窄窄的屋子里去，很快地给我炒一大份鱼香圆子来，困难时期哪去找什么鱼做圆子啊？拈一块进嘴，却原来是用土豆做的鱼圆子，加上家常鱼香味，在那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薛师傅不说一句话，就为我们弄了这样一份好菜来，感激得难以用言语形容了！扬琴里的《辞剑浣纱》、《伍员渡泸》，川戏里《漂母赠饭》等情节也浮现出来，呜呼，士穷乃见节义！”动情之至，令人心悸。这种感受，没有饥饿时代的切肤体验的人是刻画不出的。

以描写四川人民的社会生态以著称的作家李劫人死于困难时期的尾声。李劫人精于食道，解放前曾开办“小雅”餐馆，亲自主厨，甚为雅事。他的得病原因是平时晚饭前，喜欢喝两杯，吃点卤菜。困难三年之末，李劫人的家人从外地买回卤牛肉，未经消毒，结果李劫人因此上吐下泻，痛得休克。临床诊断为急性坏死小肠炎，恶化为肾功能衰竭，不治身死。作家车辐写道：“他的死同唐代大诗人杜甫之死相若。”只此一句，悲凉得近乎冷峻。被食物的欲念所折磨的不幸的回忆，映射出了中国人民追求幸福之路的险阻和艰难，只有经历了这种险阻艰难，锦衣美食的价值才在岁月中显得无比宝贵，令人充满感激。

#### 年度记事

##### 学习刘文学

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模范少先队员刘文学的事迹。刘文学是四川省合川县渠嘉公社双江小学四年级学生，1959年11月18日为保卫公社财产英勇牺牲。

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青少年都要向刘文学学习，自觉地用共产主义精神来对待生活、学习，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在此以后，全国中小学开展了“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

##### 感人的平陆事件

2月2日，河南平陆县为三门峡工程配套的风南公路张沟段，有61位民工食物中毒。当地医务人员采取了各种解毒措施均无效。平陆县县委书记赶赴现场组织抢救。

县医院断定必须在4日黎明之前注射特效药“二巯基丙醇”，否则民工有生命危险。

县医院司药员当夜赶往三门峡市找药，黄河船工不顾危险，打破黄河不夜渡的惯例，送司药员过河。但三门峡及其周围备战均无此药，3日下午，平陆县委向中央卫生部告急，并挂长途电话给北京王府井特种医药商店求援。该店职工立即到15公里外的库房里取来1000支药剂。时间紧迫，卫

生部决定空运，因当晚没有班机，遂向空军求助。空军飞机当夜即飞至平陆上空，该地区没有地面指挥和空中联络，山峦重重，地形复杂，机组人员克服困难，将药箱准确投下。医院得到药剂后，终于从死神手里夺回了 61 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后查明，此事件为人为投毒，两案犯已被依法枪决。

#### “鞍钢宪法”

3 月 11 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央肯定了他们的做法。22 日，并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地区、各部门。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过去鞍钢认为他们这个企业是现代化了的，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从此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大中企业，开始学习推广“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或管理人员与工人相结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郑州黄河大桥落成通车

郑州黄河大桥是双线铁路大桥，又名黄河新桥。过去，火车过旧桥要拆成几节，3 个小时方能通过。新桥于 1958 年 5 月 14 日动工，由刚完成武汉长江大桥建筑任务的工程队承建。此地河道变化莫测，河床地质复杂，工程十分艰巨。桥址南岸，靠邙山头，下游是有名的花园口险工地段。全桥 72 个桥墩，采用“片石位能压浆法”浇灌墩基；142 个桥孔，使用国产钢板梁。建桥过程中曾遭遇几十年来未有的特大洪水，工人、技术人员团结战斗，克服困难，终于提前完成任务，于 4 月 21 日竣工通车。

#### 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

6 月 25 日凌晨 4 时 20 分，年轻的中国登山队的 3 名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登上了海拔 8848 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他们将一面国旗和一座毛泽东石膏像放置在顶峰，并按国际惯例签名留放峰顶，从而成为人类第一批从北坡登上此峰的英雄。

这次攀登珠峰是从 3 月 25 日开始的，他们只用了 2 个月的时间，就从西方登山界认为“无法超越的”北坡登上了顶峰。

中国登山队这次由我国著名的登山家史占春率领，先后经过 3 次适应性行军，到第 4 次行军时突击顶峰。在登山过程中，队员们克服了高山极度缺氧和摄氏零下 40 度的严寒等重重困难，发扬了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团结互助，互相支援，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 蒋介石拟定反攻大陆计划

由于大陆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台湾国民党当局以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于是，蒋介石密令台湾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了一个作业中心。他们研究制定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国光”。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后，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接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反攻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

地发展。但这个计划未能实施，成了一枕黄粱。

#### 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9月26日，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和劳动部《关于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同意各类企业的非生产人员以及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工作人员，都必须大大精减的意见。“大跃进”以来，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急增，本年比1957年城镇人口增加了3124万人，到今年8月，职工总数达4905万人，加重了国家财政和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成立了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5人小组，开始着手精简工作。中央要求在3年内将城镇人口减少2000万人以上。精简对象主要是1958年以来来自农村的新技术职工，动员他们离职回乡务农。

#### 全国浮肿病严重

11月23日，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职工、学生和居民的生活安排。据有的省和团中央的报告，近来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学生和城市居民患了浮肿病。10月和11月间，重庆9所大学患浮肿病的人数占师生总数的10%以上；太原市14所大学占13.5%；山东财政厅占35%。另外，不少地方患肝炎、妇女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因此，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抓紧副食品和瓜菜的生产，大搞代食品的采集和制造；要严格控制劳动和工作时间，保证足够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对干部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要严格控制，不可过度；凡是口粮标准已经减得差不多的地方，不要再压减口粮标准；对现有的浮肿病人，要限期治好。

#### 农村某些干部的恶劣行为

12月8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贵州省遵义和毕节地区群众生活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时，对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作了指示。

指出，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权，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

#### 凭票供应商品已达30多种

12月14日，国家统计局对目前市场情况提出分析报告。《报告》指出供应出现紧张状况，农副产品以及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销售量大于收购量，库存大量减少，下半年情况更加严重。1月至10月累计，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66.6亿元，比1959年同期下降9.7%，其中粮食收购量下降34%，食油收购量下降42%，生猪收购量下降31%，食糖收购量下降64%，棉花收购量下降23%，全国生活用品的市场供应异常困难。到9月底，各地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已达30多种。11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52.5亿元，比1959年11月下降15.6%。据全国42个大中城市统计，11月猪、牛、羊肉销量比10月减少29.4%，家禽减少51.3%，鲜蛋减少30.4%。

1961年：燕子曲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歌曲《小燕子》

废名曾写道：“人类有记忆，记忆之美，应莫如柴火。春花秋实都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看着火，应该是看春花，看夏叶，昨夜星辰，今朝露水，都是火之生平了。”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以生命之力为火，燃烧出劳动之美，克俭之美和敦厚之美。他们年复一年地以最真诚的恭敬和勤勉励志应答着时代的呼唤，完成着壮丽的人生。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无悔的人生？——在那些艰苦的日日夜夜里，尽管人心低沉、忠言衰微，但在田野的篝火、工地的塔柱之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坚毅地劳作的身影，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默诵他们的名字：雷锋、王进喜、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这是困难时期的另一种风景。而正因这种不屈不挠，使人们看到了希望。

1961年是河北知识青年邢燕子辍学返乡的第四年，这个夏天，21岁的邢燕子要出嫁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极其生动地反映出平凡岁月的人民风俗，以及这种风俗受到的挑战。

中国新闻人物邢燕子的丈夫王学芝是一个爱动脑子、很有心计的小伙子，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的。但，尽管是在提倡移风易俗的年代里，在农村人眼里王学芝仍属于农村男青年中的“困难户”（“困难户”这个名词在中国民族语言中沿袭数十年，仍未消亡其丰富的词意，条件不好的婚龄青年也属于这个词的特指对象）。

当长者二大妈劝邢燕子“想周全”、“别过了门又后悔”时，邢燕子的态度是鲜明的。

“我有什么后悔的？学芝劳动强，人挺老实，脾性也好，又是党员——”

没等燕子说完，二大妈又接了过去：

“学芝人好，这我知道，可他家家底太薄，你去了怎么过？再说，他家哥儿四个，还有一个妹子，又没有房……”

“没东西怕啥，有人就行！”燕子笑了。“二大妈，他家如今没房是实情，可咱们这人民公社搞好了，将来还要住楼呢！现在窄狭点，我不怕。”

二大妈没办法，叹着气走了。可是，没过两天，出嫁在外村的姐姐也来了，一进门就说不同意燕子和学芝结婚：

“燕子，你咋真成了俊子了，别人家你不知道，学芝家你还不知道？”

“我咋不知道，我知道的可清哩！”燕子说。

“那你为啥偏跟他结婚？他家六口人住不到一间半小屋，学芝成年在外间找宿，你去了怎么住？”

“没地方就住在大街上！”燕子故意气着姐姐，说完自己也笑了。过了一会儿，她拉住姐姐的手，恳切地说：“姐，你放心吧，没有过不去的

火焰山！”

一个60年代女孩子的可爱形象跃然于纸上。

按旧乡俗，姑娘们出嫁前总要向婆家要些衣物，又是被褥，又是衣裳。好心的邻居们和谢大妈又来劝燕子：

“燕子呀，学芝家哥儿们那么多，不趁这会儿要几身衣裳，过门之后再想做可就难了。”

“多了不行，顶少也得要它两身，要不白跟他家人结婚？……你穿的实在也不多……”

燕子觉得出嫁要东西是旧社会的坏习惯，要改变农村面貌必须移风易俗。这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因此对这些劝说，她只当没听见。人们说多了，

燕子就说：

“咱这个老规矩得改改，再说，明知他家困难，我干啥还要东西？整天下地劳动，要那些新衣裳做啥呀？”

这一来，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接下来的描写，邢燕子的行为告诉了我们，究竟什么是那个年代塑造出的一代人的非凡性格，这是中国式的“星期五义务劳动”精神，曾经也是青年人为之自豪的生活价值观。

听说燕子要结婚了，父亲从天津给她寄钱来，叫她买两身衣服，但是，她却偷偷地用它买了两把铁锹。

“唉，真是，燕子这孩子啊……”二大妈感动地说。

婚期一天比一天近，燕子还是天天下地劳动，好象心里根本没有这回事。有一天，“老姐”王学娟实在忍不住了，她找到燕子，问她：

“再有几天就结婚了，你还天天下地，也不准备准备呀！”

“到时候搬上铺盖上他家去不就行了，有啥可准备的？”燕子说。

“看你说的，就是别的不准备，咋说也得做两双新鞋、洗洗衣裳呀！”学娟说。

“不忙，现在农活正在劲头上，有新鞋没新鞋要啥紧？”

就这样，燕子一直干到结婚前一天。

燕子一心扑在生产上，老人们疼爱，青年们钦佩。这事传到了公社，公社党委决定帮助她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公社妇联夏主任也把自己存着的

五尺白地蓝花洋布悄悄给了燕子，叫她做一件小褂。结婚前一天，王学娟

和刘连风也偷偷把她们做的两双鞋硬塞给了燕子。

为了叫他们结婚，村里在学芝家东邻找了一间房，并准备叫他们长期住下去。队长们叫燕子去看房子，燕子不肯；老支书催她去收拾收拾，她

不去。支书催得紧了，她说：

“咱村缺房少屋的不只我们，那房让别人去住吧。”

“学芝家那么些人，没房子你们怎么结婚？还是你们去吧。”老支书说。

“我和学芝商量好了，就在他们家里结婚。”

“他娘和学孟他们呢？”老支书又问。

“他们先在外边借几天宿儿。”燕子说。

“那以后怎么办？”

“以后自有办法。”

老支书问是什么办法，燕子只是笑不肯说。老支书知道燕子拿定了主

意的事，谁也改变不了，他只好说了句“你这个怪丫头”，就走了。

以下的叙述，今天看来也颇为有趣的，它散发着 60 年代的乡土气息，语言也是极其生动活泼、而且不平常的。更主要的是，邢燕子圣女贞德般的高尚风范，在这个年代里照亮了一度变得晦暗的人心，洋溢着纯洁的光泽，穿透时空——

结婚第三天，燕子请婆婆和兄弟、妹妹们回家里来住，她和学芝搬到屋外窗跟底下早年喂小驴儿的草棚里去，刚搬完家，她就扛锄下了地。当地风俗，新媳妇过门一个月后才出来干活，燕子队的姑娘、媳妇们见燕子第三天就来下地，都劝开了：

“燕子，怎么刚两天你就下地来了？快回去再歇几天吧！”

“成年成月地干，结了婚还不多休息两天！”

“不，我呆不下去。离开了大伙，我闷得慌。”燕子说。

这时，“老姐”王学娟也插上来：“你这个死个丫头，十天八天没你，咱这燕子队还垮了台？别那么不放心……”

不管人们怎么说，燕子还是坚持又干开了活，而且比以前劲头更足。

一起长大的姐妹们，到了一块不免说几句体己话，一听说燕子和学芝搬到

那个宽不过五尺、长不到六尺、人直着站不起末、而且下雨就漏的小草棚

去住，几个人都吃惊地问：

“哎呀，他家那个草棚子小得象个兔子窝，你们两个人怎么住法儿？”

燕子笑起来说：

“你们别看小，有‘小楼’就不愁有大楼，这会儿谁要换我们的‘小楼’，我还不换哩！”

从此，那个只有一条小炕，地上除个小缸之外什么也放不下的草棚，就成了村里有名的“小楼”。

60 年代前期是和平年代的英雄典型人物倍出的时代，我们流连于英雄人物的生活传奇之中时，可以发现，这些人物大抵都有过人的坚韧无私品格。由于这个时期生活环境的原因，这类人的生活实录中不会有过于繁复的意象，他们的集体主义品质导致出的行为，也是惊人的相似，如《邢燕子的故事》中就有这样的情节：

一次，她到公社参加民兵会议，队里给了她一元钱的伙食补助费。中午吃饭时，有些开会的人到饭铺，又买鱼又买汤，燕子却只花了九分钱买

了两个红高粱面窝头，拿到公社办公室，倒了碗白开水吃起来。一个同志

见这情景，吃惊地问：

“燕子，你就只买了两个窝头？挺干的，怎么没买点菜？”

燕子笑着，指了指窝头和开水：“你看我这不是有干有稀，吃的很好吗？”

回到队里，燕子把剩下的九角一分钱全部交给了大队会计。会计接过钱一数，奇怪地说：

“燕子！你怎么吃的，只花了那么几分钱？”

“队里还不富裕，能少花一分就少花一分。咋的，你还怕队里钱多了



扎手？”说着她笑着走了。

无独有偶，吕向阳——一名从河南新乡工学院志愿来到吉林省一个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大学生，也有着同样的经历：

向阳常到橡皮厂镇上开会或给生产队办事，一般的情况下，他都是赶走十五里地回家，不愿在外面打尖吃饭。一天，向阳参加大队的一个会议，

上午会没开完，有人上饭馆吃饭，叫向阳也去，说道：“因公外出，队里

补助六角钱，吃什么也够了！”向阳说：“你们先去吧！”等人们走了，他并没有跟着去饭馆，却进了一家煎饼铺。

“同志，吃点什么？”服务员热情地招呼说。

“我先看看。”

服务员看到向阳眼不好使，就给他唱价：

“山东大煎饼，一斤一毛，粮票六两，菜有……”

向阳没等他唱完就说：“给我来四两煎饼吧！”

“吃什么菜？”

“不要菜了。”

“来碗什么汤？”

“汤也不要。”

服务员以为向阳要把煎饼带走呢，称好四两煎饼给他，却见他接过煎饼，卷了卷，就吃开了。服务员多少有些惊奇地望着这个年轻人，一面忙

着张罗别的客人，一面倒了碗开水递给他。

一回如此，两回如此，次数多了，吕向阳再到这个煎饼铺来，服务员也就不再问了，习惯地给他称四两煎饼之后，再倒碗开水来。

一来二去，队里的人也知道了向阳出去只吃四两煎饼，不要补助。有人问他为啥这样过，他并不多说，只说：“咱们队穷，底子薄，开支困难，

打绳连麻都没有，能省就省点。”有时候，碰不到煎饼铺，他就花八分钱

买四两米饭，滴点酱油就着吃下去，也算顿饭。

中国年轻的一代大都从中学课本里学过一篇名为《梁生宝买稻种》的文章，这篇课文选材于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我们会记得梁生宝为给互助组节省两角钱不住客店而在车站的屋檐下露宿，只花5分钱喝一碗面汤的故事。——应该说，上述生活片断显现的美德，是贯穿过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面的。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贫乏而乐观的时代最值得珍视的记忆花朵。

美好的记忆会在飞速旋转的光影中安样地凸现，记忆之美的特征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人生的遽急和现实问题的繁复，决定了历史势必以安详的姿态照耀着我们的生活，历史中最珍贵的事物在已变得遥远、粗疏的时间残片中，显得鲜明细腻而温暖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怀旧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怀旧的人会享受生活中永恒的价值，不管时间会去如何的摧残这永恒之美的面容。

岁月流逝着，人们还记得那燕子英姿飒爽的形象，这个健康丰满，通体洋溢着快乐精神的姑娘，头戴草帽，遥望着蓝天，似目送着飞向远方的金色大雁，这个形象代表着当年中国女性的美，也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火热般的韵律——

金色的大雁，  
你快快飞哟快快飞。  
飞过那雪山，飞过那密林，  
捎信儿来到哟美丽的北京城，  
带给我想念的毛主席。

#### 年度记事

#### 乱云飞渡仍从容

暮色苍茫看劲松， / 乱云飞渡仍从容。 / 天生一个仙人洞， / 无限风光在险峰。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赫鲁晓夫集团继1960年7月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之后，对我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蒋介石趁我三年经济困难，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印度军队不断在边界挑起武装冲突。一时间，乱云飞渡，形势险恶。1959年7月5日，毛泽东曾游庐山仙人洞。1961年9月9日，为李进（即江青）所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写了这首七绝。

#### 保护侨胞财产

4月25日，中央同意侨委党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对征调侨眷、归侨房屋家具、侵占侨汇等的处理意见。《意见》中说，在公社化运动过程中，不少地方曾发生了平调侨眷、归侨的房屋、家具、缝纫机、自行车等财物，强迫或变相强迫以侨汇、黄金、白银、金银首饰作投资捐献，掠夺华侨、侨眷的财富，违背中央生活资料永久归个人所有的指示，必须认真处理。对占用的华侨房屋，必须坚决退还，并按使用的时间补给合理租金。凡是强迫侨眷、归侨投资捐献的财物，一律坚决清理退还，并付给应得的利息。无偿占用侨眷、归侨的家具、自行车、缝纫机等一切财物，坚决清理退还原物，并付给使用期间应给的报酬；损坏要修；原物不在要赔。

平调侨眷、归侨的家畜及屋前屋后的零星果树等，应坚决退还永远归个人所有，无法退还时，折价赔偿。并指出，上述规定适用于港澳同胞家属。

#### 继续压缩城市人口下乡

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办法》的讲话。指出，“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如工业和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实际上是城里人跟农民争饭吃，争肉吃，争油吃，争鸡蛋吃，争棉花，争麻，等等”。“总起来讲，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

“工业战线要缩短，农业战线要延长”。“就可以和农业并举，一同前进”。对这几年发生问题的原因，刘少奇引用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

#### 减少城镇人口和城镇粮食供量

6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

办法》。

规定：(1) 城镇减人，必须造成声势；(2) 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城镇人口要在3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城镇粮食销量争取压缩到480至490亿斤，比上年度减少30至40亿斤；(3) 清查黑人黑户，做到人粮相符，严禁虚报冒领和营私舞弊；(4) 三五年内全国口粮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等等。

#### 周恩来谈满族和日本问题

8月10日，周恩来接见嵯峨治、溥杰、溥仪等人并进行亲切交谈。周恩来在谈话中指出，世界上有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不管是哪种人，相互间都应该是平等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关于满族问题，周恩来说，满族入关统治中国近300年，奴役各族人民，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他们也同样受到灾难。至于“满州国”时代，溥仪、溥杰都应该负责，当然更大的责任应由日本军国主义来负。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

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关于日本问题，周恩来说，日本军国主义伤害了中国人民。解放10年来，有上万的日本朋友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中日两国有近2000年的来往，同2000年比起来，50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应该往前看。

#### 《简化汉字总表》编成

12月12日，《简化汉字总表》编成，收录简化字532个，对偏旁简化字进行了一次总结，共计1914个字。1964年5月，重新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总表共收2238个简化字。

#### 今天的塔吉克人

中国塔吉克族约有15000人，其中有一半以上散居在新疆帕米尔高原东部的塔什库尔干。解放前，塔吉克族从事游牧业，苛捐杂税无止境地加在塔吉克人身上，塔吉克人终年穿着破烂的羊皮衣，吃的只是少量牛骨和酸奶子。今天，塔吉克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牲畜总头数比1949年增加了2倍多，耕地面积比1949年扩大了1倍半。实现了定居的塔吉克人，在人民公社化后，农机厂和水电站相继建成，本民族的技术工人也成长起来，小学教育也普及了，蒙昧的状态已成过去。在雪山皑皑激流湍急的帕米尔高原，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谣：

就算一生吃过的东西都忘记了，  
就是忘不了母亲的奶汁；  
把一生听过的话全忘记了，  
就是忘不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 1962年：冬天的故事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七律·冬云》

本年冬天，在困难时期临近尾声，而一场新的国际风暴开始的时候，身置旋涡中心的毛泽东不无嘲讽之意地写下了一首《七律冬云》，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这首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斗争豪情的诗开始流行。同时流行的一幅招贴画阐释了《冬云》的时代气氛：在北邻，苏修和蒙修加入了反华大合唱，苏联撤走专家，恶毒攻击中国；在东方，日本佐藤荣军国主义政府、“南朝鲜傀儡集团”同美帝沆瀣一气，一直充当反华大合唱的主凶；而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从事着“反攻大陆”的罪恶勾当；在西部，印度反动派在边境燃烧战火。……中国形形色色的敌人还有：南越吴庭艳卖国集团、老挝的富米集团，泰国和缅甸的反动政府，英国殖民主义非法拼凑的马来亚联邦，……等等。这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理解。而对外界来说这是继1949年后，中国再次被妖魔化的年代，而外部封杀中国的生力军，竟是被中国人民长期视作“老大哥”的苏联。相信对于面临了新的困惑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令人痛苦又令人愤慨的一个斗争新课题。虽然迄今为止报章尚未将中苏冲突公开化，然而平民百姓们仍然从不同寻常的生活空气中嗅出了某种气息。文革中流行的连环画《铁人王进喜》，就反映了自1960年以来中国人的不快心情：在茫茫风雪当中，北邻社会主义大国的专家撤走了，援建项目也中止了，在窝棚旁目送他们的中国工人们愤懑而忧伤。……有关中苏两党的紧张关系的传言在机关和学校里被人们公开或半公开地议论，没有人阻止这一切，因为人们相信分歧迟早要爆发。人们相信，这场分歧将终结一个时代，结束一个苏化模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甚至日常时尚里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在东北农村，老人们甚至谈起当年苏联屯军东北的不愉快的情形，那时候，只要苏军出现在原野上，村子里的人就敲着锣扯着嗓子喊：“老毛子来喽——”家家户户就赶紧把媳妇闺女藏起来。在局外人看来，蜜月般的岁月终究要结束了，但没有想到，结局是这般的残酷无情。

本年从4月16日开始，中国西部的新疆伊犁至塔城的漫长边境线上，滚滚人流践踏着边防哨卡，人们冲过边境线，流向苏联一方，这种罕见的越境逃亡持续了整整半个月，7万多中国公民一夜间变成了苏联人，这个恶性事件被当时的文件称为“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

在中苏连接最宽敞的山口霍尔果斯，驻扎着一个连的解放军。公路上浩浩荡荡的人群奔突着，并疯狂地呼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人流后浪推前浪，无法遏止地冲过哨卡，踏伤了劝阻的战士，滚滚的人流在这条公路上一直流了3天3夜。上级指示，不许开枪，因此，从山口逃亡的群众几乎无一伤亡。然而，哨所的房屋仍然被狂怒的人们砸烂，多名战士受伤。

在塔城，事态的失控并不亚于霍尔果斯山口。苏联方面派遣人员，向当地居民散发了10万多张苏联侨民证，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当地群众，自然向往着能吃饱穿暖的地方，苏联方面于是在边境线上摆满了面包、黄油，

边民们于是纷纷逃向苏联境内。

这就是 1962 年 4 月至 5 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大批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的基本事实。

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仍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更有甚者，“有一次，赫鲁晓夫对日本议员说，如果征求新疆哈萨克人的意见，如果他们喜欢让苏联管辖而不喜欢让中国管，那么苏联就将吞并这片领土。”可见，赫鲁晓夫的扩张主义野心已暴露无遗。赫氏的不加检点和狂妄自大连苏共其他领导也觉得过分。因此，在赫鲁晓夫下台时指控他的材料中就有这一条。

众所周知，从 1960 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变得愈加浓厚。

到了本年度，局面则更加凝重，充满寒意。

从 1962 年 11 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全面的系统的攻击中共。在苏共领导人指挥下，有 5 个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兄弟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民主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攻击中共，有 40 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共。对此，中共中央于 1962 年 12 月 15 日至 1963 年 3 月 8 日，发表了 7 篇文章予以答辩。在这些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

上代中国人都记得 1962 年最后一天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这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之际，中国第一篇指名道姓地批评外国兄弟党领导人的公开文章。

1962 年 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用题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试图概括说明“真正的分歧”所在，而陶里亚蒂同志恰好成了代用的靶子。文章说，第一，中国共产党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第二，中国共产党认为“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第三，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不可分割的。这不是“好战”的观点，而把这种观点诬称为“好战”的人，则是拿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及人民革命战争对立起来了，这些就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分歧在于对未来的看法是悲观主义还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然后详细地说明了中国怎样看待“和平共处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铁托——共产主义的叛徒”，“科学社会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及最后“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重复建议举行另一次“代表”会议）的问题。

这是 1962 年隆冬，中国老百姓知道了一个叫“陶里亚蒂”的意大利人的名字，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肃杀的论战空气刚刚开始升腾，二战以后中苏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裂痕在扩大。人们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下跨进 1963 年的新年。二战以来最大的分裂事件固然促使中国人重新焕发出民族自豪感，并且在新的层次上认识到民族独立的价值。但正如《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一文中所反映的剑拔弩张的世界观那样，中国人民在新的国际矛盾中造就了一种强烈忧世的民族性格。具体体现为：

在中苏论战中明显地表现了当时在党内十分广泛的“左”倾观点。例如，当时特别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与帝国主义国家合作是靠不住的，联合美国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屈服帝国主义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际根源；又例如，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特别强调大规模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要作好早打、大打的准备，备战备荒为人民；又例如，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特别强调支援世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等等。这些观点不仅指导了同国际上的斗争，同时也指导了国内的经济建设。

使经济建设摆到了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位置上，从而要求大干快上，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农业和一切事业。同时还要处处体现备战的思想，大搞三线建设，进行深挖洞广积粮，完全打乱了我国经济建设正常发展的规律和计划。

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和生产上的过分紧张局面。这不仅不可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相反地给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

#### 年度记事

#### 七千人大会

中共中央于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

大会第一阶段，从1月11日到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稿（第一稿）。“书面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1月27日下午召开全体会议，刘少奇对“书面报告”第二稿作了补充说明。这个说明，在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前提下，推翻了过去成绩、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公式。

认为有些地方的工作，成绩不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不止一个指头。在讲到国民经济产生困难的原因时，认为有的地方是天灾，有的地方是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叫做“三分天灾、七分人祸”。28日和29日上午，分组座谈讨论，与会同志对“书面报告”第二稿和刘少奇的说明普遍表示满意。

大会第二阶段，从1月29日下午到2月7日会议闭幕，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地强调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1月31日至闭会，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地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省委主要负责人普遍作了检讨，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门负责人就工作指导上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中对党的工作、作风方面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

这次大会主要解决了三个重要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 第三套人民币开始发行

中国人民银行于 4 月 15 日开始发行第三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和第二套人民币比价为 1:1，在市场上混合流通。

第三套人民币在第二套人民币的基础上对版别进行了全面调整、更换，取消了第二套人民币中的 3 元券，增加了 1 角、2 角、5 角和 1 元 4 种金属币。

第三套人民币是我国目前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这套人民币从 1958 年开始统一设计。票面设计图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的方针。在印制工艺上，第三套人民币继承和发扬了第二套人民币的技术传统、风格。制版过程中，精雕细刻，机器和传统的手工相结合，使图案、花纹线条精细；油墨配色合理，色彩新颖、明快；票面纸幅较小，图案美观大方。

第三套人民币券别结构合理，纸硬币品种丰富，设计思想鲜明，印制工艺也比较先进。发行第三套人民币，增强了人民币的反假防伪能力，为健全我国货币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51 年前后，印度方面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际，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南的中印边界东段地区推进，侵占了约 9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后来又在中段侵占中国 2000 平方公里领土；本年 9 月印军悍然向中印边境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流血事件。10 月 20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不顾我国政府多次抗议和警告，下令要把守卫在中国领土上的中国军队清除掉，并以陆军 10 多个旅的兵力，在中印边境东、西段同时向我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

这次反击作战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 10 月 20 日开始，我边防部队首先在中印边境东段歼灭了入侵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 7 旅和其他印军一部；在西段清除了印度在我国领土上非法设立的 37 个侵略据点。接着，我国政府于 10 月 24 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但印度政府在当天就予以拒绝，同时继续在边境上调集重兵，再次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发起猛烈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反击，开始了第二阶段作战。11 月 16 日起，我边防部队在西山口、邦迪拉和瓦弄地区先后击溃各路进犯印军，并拔除其据点 16 处，追击到传统习惯界线附近。经两个阶段反击作战，我全歼印军 2 个旅和 3 个旅的大部，共毙、伤、俘准将旅长以下官兵 8700 余人。21 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 22 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

### 一些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4 月 1 日、20 日、5 月 15 日，国家先后对茶叶、自行车、酒、手表、砂糖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到 1964 年底全部商品价格恢复正常。

### 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窜犯大陆

1962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称要进行“反共抗暴的革命运动”。并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3 月间，下达了“征兵动员令”。4 月间通过所谓“国防特别预算”，还成立了“战地政务局”，准备登陆后建立政权机构。5 月间进行的海陆空军登陆演习愈演愈烈。

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决不让蒋军的阴谋得逞。6月23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具体揭露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为窜犯大陆进行的各方面准备活动，号召全国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肃清敌特，巩固后方，从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蒋军在哪里冒险窜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在哪里。人民解放军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备工作。同时在兵力部署和物资装备方面做了调整和充分的准备。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群众和民兵，也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支援前线的备战工作。

由于人民解放军严阵以待和新华社的公开揭露，蒋军被迫放弃了军事冒险，而改为由小股匪特在沿海地区进行试探性军事骚扰。

#### “好猫论”的出台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邓子恢、邓小平、陈云等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1961年后农村中再次兴起包产到户的做法，虽经去年底和今年初中央文件指出应予纠正，但是许多地方的农民并不愿放弃这一做法，党内上下也有一些人为农民的这一做法说话。在今年5月的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邓子恢就发言说过：有些山区，就让他们单干，或者叫包产到户，这是社会主义的单干，他只要完成上调任务，有什么不好。他的发言曾得到许多人赞成。本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区汇报并进行讨论。到会的人对一些地方的包产到户做法，赞成和不赞成的各占一半。邓小平在会上引用安徽农民的说法：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再一次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还批判了小说《刘志丹》，毛泽东说“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会议作出了撤销黄克诚和谭政的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发表了公报。《公报》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 江南造船厂制成万吨水压机

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制成的我国第一台1.2万吨压力的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试车完毕，正式投入生产。这台水压机是我国机械工业中最大的一台锻压设备，该机重量为2200吨，比国外生产的要轻800吨，它的主机有六七层楼高，基础深入地下40米。万吨水压机的图片后被载入各种课本，成为新中国工业成就的象征。



### 纠正“海外关系”问题的提法

5月31日，中央批准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关于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加具体分析地把归国华侨、侨眷、归侨学生在国外的家庭和亲友关系，一律作为“资产阶级关系”或“复杂的政治关系”看待，如上“海外关系”的帽子，百般滥加怀疑和歧视，规定凡有“海外关系”的人，一律不能入党入团、参加工会、当积极分子；对归侨学生的入学、学习限制很严；把归侨干部当作精简对象，任意调动；对优秀的归侨干部也不提拔重用；在历次运动和政治审查中，把那些和国外亲友有关系的人，列为批判斗争和追查对象；有的单位甚至把华侨与五类分子并列（所谓地、富、反、坏、右、资、侨），混淆了敌我界线。这些错误认识和做法，在政治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违背了中央、国务院反复多次有关侨务政策的指示，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中央在指示中指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是模糊政策界限，混淆敌我关系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有害无益的。

### 东方歌舞团成立

1月13日，以学习和表演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人民的歌舞为主要任务的东方歌舞团，隆重举行建团典礼。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出席了典礼，并讲了话。他勉励大家认真学习亚、非、拉等国家人民的歌唱和舞蹈。“要认真学，学得好，学得像，要学习各国人民艺术的长处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为世界人民约友谊服务。”东方歌舞团是适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

## 1963年：平凡的生活

如果你是一滴水，  
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  
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如果你是一颗螺丝钉，  
你是否永远坚守着你的生活岗位？  
——《雷锋日记》

时间进入了1963年，1959年开始的3年严重困难时期已告结束。阿尔巴尼亚诗人阿·恰奇写道：

不管天空能晦暗多少次，  
中国的太阳会拨开云层。

这无疑是对《冬云》中“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意境的另一种文学阐述。有道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国际新闻界对中国形势空前低调的60年代初，中国的复苏却使人们对前景充满了渴望。

日本广播协会的一名记者本年来中国之前，曾想象着“共产党中国的人民由于连续3年的欠收而完全精神消沉”，可是踏上中国的土地，却大为意外地发现“在街上看到的无论是儿童或大人，都显得精神充沛，看来都

真正过着愉快的生活。”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更是写道：“一些亚洲友人，对中国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成绩，得到甚至比大跃进的奇迹还要深刻的印象。”

毫无疑问，1959年开始的困难岁月加深了中国人对艰难生活的理解。这个时期的中国人卓越的精神，也在岁月中格外醒目，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困难时期，有一个战士写下了这样一篇日记——

“现在，我们国家处在困难时期。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我们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克服当前存在的暂时困难，坚决反对大吃大喝。力戒浪费……同志，你是否意识到你的一切生活在幸福之中？可能意识不到，也可能意识到了。当您能吃到一顿饱饭，穿上一套衣服，能当家作主，自由地生活，您有如何的感觉呢？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这是党和毛主席给您带来的，是革命前辈流血牺牲给您带来的。”

在生命中止的前两个月，这位战士还写下了这样一篇日记：

“今天部队发放了夏天的服装，本来每人发两套军服，两双胶鞋……我想，当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再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可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却还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从内心感激党和人民的关怀。党和人民对我们这样好，可是也不能烧火棍子一头热呀！我们也得力党和人民着想，应当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处处做到增产节约，发扬我军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

“为了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减轻人民的负担，共同克服目前的困难，我只领了一套单军服、一双新胶鞋，其他用品也少领了。以前用过的东西，我都修补好了，继续使用。穿破了的衣服补好了再穿。我觉得就是现在穿一套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也比我过去披破烂衣服要好千万倍啊……”

书写日记的这名战士就是雷锋，他因一次意外事故死于1962年。本年起，他的故事，他的箴言为中国人民所传诵。学习雷锋的热潮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大事。

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在中国大地上震彻四方。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都热情地题了词，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学习。雷锋的伟大精神感染和教育了千千万万群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学雷锋，见行动，一花带来百花香，”人们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水平大为提高，到处出现着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风尚，特别是在我国青少年中开创了一代新风。当时我国青少年的道德面貌，不但使年长者感到欣慰，而且使国外的朋友们为之鼓舞。本年谢觉哉虽已年高88岁，但深为这个中国土地上培养出来的战士平凡而伟大的品质而感动，他提笔写下了这样的诗篇——

轻轻的年龄，  
平平的事迹，  
短短的记述，  
滚出了革命战士的火球：  
任何恶浊碰着就要被焚毁，  
任何黑暗触着就要被照亮。  
开出了共产主义的花朵：  
神圣的工作在每个人的日常事务里，

理想的前途在于一点一滴做起。

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形象像雷锋和焦裕禄那样，以其强大的人格和瑰丽的人生持久地温暖着人心。也从未有一个形象像雷锋那样，在日复一日的后来引发着中国人人生哲学的强烈碰撞。雷锋，一度变得古旧而难以理喻，成为中国斯多噶主义的代名词，成为兵营式社会主义纪律观和道德观的代名词，这种意识上的误区，也和中国社会史一度的反常性质有关。《离开雷锋的日子》表现出的困惑，就鲜明地反映了这种价值观的反常。青年作家王彬彬曾指出：当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的”时，他是在强调历史其实是“从（当下的）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研究过去的事实。按照这种观念，历史是没有确定不变的解释的。但是，当人们用今天的标准阐释一切历史时，这里面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常常会吞噬掉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原有的美质——这事实上也是阉割了历史的行为，对英雄精神的功利性批评恰恰出现在“雷锋塔”成为颓圮，社会开始出现道德危机的时候，这种批评又因为反讽了英雄而被广为流传，与过去的表述方式一样披上了时代过于粉饰的色彩，成为同样虚假的表述。已成为雷锋被凡夫俗子们所鄙薄的依据，构成了对雷锋乃至其他社会榜样的个人尊严的亵渎，这种风气实在是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了。

应该看到，过去政治宣传所营造的雷锋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得缺乏美感；以往年代所加诸雷锋形象的所有特征，不再具有吸引力，这也是时下出现的困惑之一。

但为什么雷锋仍在今天被人们真诚地召唤呢？这与其说是道德力量的“复苏”，不如说是雷锋本人曾经活生生的感人生命过程和雷锋形象的“美质”并未因时代的曲解而泯灭。

历史上的雷锋“天资聪颖”，而且“极其好学”，淡化了宣传资料中所体现对领袖的崇拜色彩后，雷锋排队买《毛泽东选集》的情景，就是一个纯粹的好学青年的感人形象。《雷锋日记》曾激扬了整整两代人养成记日记的习惯，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学修辞。虽然有《雷锋日记》被润色的传闻，但是，在雷锋当时生活的时代，记日记是一种知识青年行为，而且在那个文化层次需要普遍提高的时代，记日记反映了一个人对知识和高尚情操的追求，反映了一种人生自觉。能记日记已经说明雷锋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及内省意识，说明这是一个极其好学、富于深度思考的青年。毛泽东曾说：“我看到雷锋日记，这个人值得一些哲学。”从种种材料上看，雷锋在部队时，完全可以说是当时的“知识精英”——至少是青年才子，是个思想极其活跃的青年，爱讲笑话爱拉手风琴，爱唱湖南民歌。一个有知识、有地位（当时，参军是许多青年的主要梦想，军人权受欢迎且在民众中地位较高）又善于助人的青年，必然会受到群众的喜爱。但可惜的是，雷锋这些有别于常人的特点被赋予政治意义后，过于严格和枯燥的理念逐渐使其成为一个道德禁锢色彩极强的忠厚“好人”象征。

而事实上，雷锋并非一个禁欲主义者。他的遗物居然也有当时的奢侈品——手表；一件保养得很好的皮夹克，这说明雷锋的节俭有一部分用在个人的喜好上（而非全部行使民政部门职能——赈济灾民）。这种喜好明显带有青年人追求新潮的特点。据最近的消息披露，他甚至还有一次未来得及完成的爱情。而这些，是过去年代的榜样身上绝不会有的。按照那个时代的尺度，他应具备天神的一切特征，世俗的、个人的特质享乐爱好被理所当然

地认为是对榜样的亵渎。青年雷锋就这样在人为操作下远离了人群，在漫长岁月中放射着斯多噶主义的光芒。

一篇介绍《离开雷锋的日子》的文章称：这部影片第一次全面披露了雷锋牺牲的经过，而在过去的年代里人们的确无法详知这一切，为什么呢？就因为雷锋死得太平常了，不如我们所常常设想的英雄的牺牲那样壮丽。因此，雷锋形象的塑造对那个时代的宣传工作者是一个挑战，一个英雄死于一场事故竟有碍于英雄事迹的情节完美。然而，在平凡的日子里，平民英雄的生与死透着日常性的美丽。并且成为三十多年后《离开雷锋的日子》的灵感源泉，这是一场返朴归真。

回头看看 60 年代的全民性热潮，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一点。

60 年代的雷锋首先是作为一个军人形象出现的，他的“钉子精神”无疑带有超常的军事主义色彩。有趣的是：这种“好战士”精神已经走出了国界——比如在以色列的军事学校里就矗立着雷锋的雕像。军队作为一个国家的保障，无论古今中外，都奉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的原则；从这一点来看，“钉子精神”是军队的传统，而非雷锋所独有，只是这个勤于思考的青年军人把它形象化了而已。迄今为止，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都不会以为军队不需要这种精神。只要每一个军人都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国防便有了人的基础。而事实上是，中国军队的坚韧在世界上有目共睹。作为一个民族的魂魄，军队的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不屈、顽强拼搏的传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东方精神。

当我们用一种深厚的态度看待历史时，应该明白，嘲笑历史发生着的某些天真和古旧事物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富国的人嘲笑穷国的生活风俗一样洒脱。

对雷锋存在的某些时代局限性，新生代的才子们任意拿来调笑自然也是很容易的事情。然而，历史形态本身绝不会如此轻佻，雷锋之歌将在高尚的人们中间永远流传下去。这是中国的本土史诗，是时空无法掩去的人性的美丽。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写道——

呵，让歌手们歌唱吧，  
登上我们新的长城——  
“……北来的大雁呵，  
你们不必  
对空哀鸣，  
说那——  
寒霜突降，  
草木凋零……  
且看这里：  
遍地青松，  
个个雷锋！——  
快摆开  
你们新的雁阵…  
把这大写的  
‘人’字——  
写向那  
万里长空！……”

## 年度记事

### “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

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荣誉称号，八连是具有光荣传统的连队。1949年上海解放后，来到了热闹繁华的上海南京路担任警卫任务。该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热爱人民，助人为乐，树立了一面拒腐蚀永不沾、艰苦奋斗的旗帜。《命令》号召全军学习八连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不断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远保持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本色。

### “一定要根治海河”

7月间，海河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由于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地区连降暴雨，引起太行山的山洪和海河各水系的特大洪水一齐向平原灌注。低地为大水所淹没，村庄被大水包围。总雨量在1000毫米以上的面积达5560平方公里，淹没104个县，7294万亩耕地，水库崩塌，桥梁被毁，京广线被冲断75公里，天津告急，2200余万人受灾。

据统计，河北省县市遭灾者计有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天津共7个专区101个县，占以上专区县市总数的96%。其中被水淹的县市28个，被水围困的县城33座，保定、邢台、邯郸3市市内水深2-3米。计有22740个村庄受灾，被水淹的有13142个，农田被淹面积5360多万亩，其中约3000万亩绝产，200多万亩良田因积沙失去耕种条件。倒塌房屋计1265万间，有2545个村庄的房屋全部被毁，约有1000万人无家可归。人畜伤亡也很惨重，人员死亡5030人，伤42700人，大牲畜死亡数达52000余头。直接经济损失为60亿元，国家为救灾开支10多亿元，当地人民和驻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抗洪抢险的斗争，在雨停水退后迅速排水抢种，使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11月17日，毛泽东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 禁演“鬼戏”

4月29日，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恐怖形象的“鬼戏”，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为演出‘鬼戏’辩护”。

戏剧界对“鬼戏”问题的看法，目前还不一致。《报告》认为，演出“鬼戏”存在着助长迷信的副作用，是和当前我们要加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各种落后思想和落后习惯的任务相抵触的。《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城市或乡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中央在指示同意文化部党组这一《报告》的同时，要求文化部门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 “我们这里不收小帐”

报载：一天，上海华侨饭店来了两位老太太，她们是从新加坡回国的，服务员刘丽蓉走过去热情招待。临走，她们便把找头2元多钱送给刘丽蓉，说：“大姐，这是点小意思。”刘丽蓉告诉她们，如今国内早已不收小帐了，请她们收回。不料这一来，引起了老太太好多话。她说：“在新加坡，在香港，是什么都要小帐的饭店收小帐，旅馆收小帐……连上厕所也要给小帐。”

她又说：“记得国内过去也是收小帐的啊！”

刘丽蓉说：“那是解放以前的事了。”

“是啊，是解放以前。”老太太说：“可你们现在招待得这样好，又连这点‘小意思’都不肯收，倒真使我们过意不去呢。祖国其是变了样！”

95%以上的人民公社有了电话

5月7日，新华社报道：中国邮电通信网络已延伸到广大农村，目前一般的县都有了10个左右的邮电局、所，95%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通电话，邮路总长达270多万公里，长途电信线路总长度比1957年增长54.9%。

万吨轮“跃进号”沉没

6月1日，中国制造的第一般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在从青岛驶向日本门司途中，在韩国济州岛西南海域突然遇难沉没。“跃进号”于1958年11月27日下水，载重1.593万吨，是中国第一艘大型货轮。1963年4月30日，“跃进号”装载着运往日本的玉米近万吨、矿产品和其他杂货3600多吨，从青岛启航。5月1日下午2时10分，在韩国济州岛西南海域，突然发出紧急呼救信号，随即失去联系。中国海军派出4艘护卫舰进行营救。事后进行调查，结果是触礁沉没。

提倡忆苦思甜

5月8日，毛泽东在对东北、河南两个报告指示中提出：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此后，各级各类学校普遍开展了访贫问苦，请“三老”（老贫农、老工人、老红军）作忆苦思甜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等活动，向学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

人武干部列入地方编制

6月16日，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将基层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列入地方编制问题的报告》。自1961年10月25日中央批准在全国人民公社、厂矿、高等院校配备专职人武干部以来，已经在这些基层单位配备了7万余名。

《报告》建议：将人民公社、厂矿、高等院校的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正式列入各单位的编制，他们的工资、福利费由国防费开支，其他经费和一切待遇，均与各该单位编内的同级干部一样由地方解决。

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由毛泽东主笔的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文章说：“在中苏两党之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苏共领导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一条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路线。苏共领导沿着修正主义、分裂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的过程，也就是分歧的发展和加剧的过程。”

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再次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文章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实际上是疯狂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维埃国家，是为了扫除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人民中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灭的影响，也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

2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又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称南斯拉夫已“资本主义复辟”，其国家政权

已“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据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原油、汽油、柴油、煤油和润滑油等主要产品全面超额完成年计划；石油产品达几百种，比 1957 年增加两倍，1963 年新建的炼油装置总加工能力，比 1962 年新建的增加 4 倍多，工程质量良好，我国自己设计和建设的大型炼油厂，比过去的建设时间短、投资省、技术新。随着我国石油工业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批判怀古思想，歌颂时代精神

《解放日报》刊载《戏装照好不好》一文引起一场怀古思想有无危害性的讨论，有时每天来稿超过 100 件。读者朱仕初来信反映复旦大学同学热烈争论的情况说：“戏装照好不好已引起我们学校许多同学的讨论兴趣，在我所在寝室里，为这问题曾争到半夜。”许多同志反映，这次讨论抓住日常生活中不大引人注意的现象，反映了思想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给人启发较大。解放军战士叶岩松说：“这次讨论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洗了一个痛快的温水澡，洗掉了身上用肉眼看不见、用手摸不着的怀古思想的垢尘。”读者张菁丽在《我是怎样去拍戏装照的》一文中，从自己亲身体会出发，谈到拍戏装照是“发思古之幽情”。于是，讨论就转向怀古思想的危害性上来，许多读者都用自己受怀古之害的亲身经历，剖析了怀古思想的实质是颂古非今，与今天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指出怀古思想像一把“软刀子”，销蚀人的革命意志于无形。河南医学院一位读者来信反映他们班级里某些同学迷恋戏装照的情况，认为拍戏装照中反映出来的怀古思想的确值得注意。不少读者结合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详尽地分析了怀古思想不良的潜移默化影响，强调用阶级观点看问题，发扬时代精神。

## [附文]

八连颂

毛泽东

好八连，天下传。

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

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

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

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

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  
纪律好，如坚壁。  
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  
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 1964年：革命美学

是用无产阶级观点批判旧人物旧思想，还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美化旧人物旧思想，引导人们去留恋旧时代呢？  
——（《早春二月》把人们引到哪儿去？）

正如我们曾提到的 60 年代中前期，终于开始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复苏。本年度中法建交，但巴黎的浪漫与爱情并未因此传播到东方这块圣洁的国土。相反，异国情调的《红莓花儿开》和《山楂树》也被禁唱，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红莓花儿开》坦露了一个姑娘家厚颜无耻的思春，卑贱下流，其没落情调深深毒害着青年；《山楂树》虽不像前者那样透发着俄罗斯式的勃勃情欲，然而歌曲里三角恋爱的情节同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是春天，然而在一部象征着中法友谊的影片《风筝》（由中法两国电影工作者联合拍摄）里，我们却看到了人间景象的差别。

一面是喧嚣、闷热、过分活跃的巴黎，一面却是严肃紧张的北京。当那位赛纳河畔活泼可爱的法国男孩费尽周折，终于在长城脚下找到了风筝的主人——另一位中国男孩时，观众却失望地发现，这位中国少先队员的演技太差，他的笑容是木讷的，他的表情呆板而单调。如果人们认为这个形象代表中国，那么，《风筝》就是 60 年代中国形象的一处缺憾。

这是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春天，石油会战捷报频传，大寨之路振奋人心，困难时期已成为历史，各条战线一派欣欣向荣，当从巴黎来的风筝飘回中国时，它会看到，这个古老的国度一片光明，确实“换了人间”。然而，风筝也会发现，在中国最美丽的都城北京，骑着自行车的人们行色匆匆，服饰单调。当这风筝看到了 60 年代中国姑娘简朴得几乎失去性征的打扮，也会惭愧自己过于花哨的装饰呢。

然而，即使是最耻言谈“时尚”的年代也自有它的流行规律，今天的人并不知道，其实像大背头、牛仔裤、喇叭裤这种东西，在破除“四旧”之前，一直在 60 年代的青年人中顽强（几乎是艰难地）流行着。那阵的人们往往把这种服饰的人讥之为“社会青年”——一个没有正当职业或长期失业待业的，但总是扮演“新潮”角色的青年集群。这类青年虽然受到长者和主流观点拥戴者的批评，但他们却以自己的新颖和富有个性的作风影响着新一代青年。许多人认识到，需要一种宽容的生活观来改变目前单调而沉闷的



状况，需要更多的活跃的个性来冲淡堡垒一般的集体主义意志。需要更开放的笑容。中法合拍的影片《风筝》并不代表中国人的开放。从这种意义上说，60年代前期实在不能算得上是一个令青年人兴奋的时代。尽管，在1964年出现了某种反抗和争论，但一切争论的结果仍然是：壮丽的革命青春代替了任何讲究个人趣味的青年生活。

本年5月2日，《天津晚报》发表了署名“董春燕”的群众来信，标题为《我烫“新式”发型为何被人议论》，请注意，“新式”一词的引号是编者加上去的。这就明白无误地透露了编者的导向性，也暗征了这次讨论的必然结局。董春燕的来信写道：

“我是一个青年女工，平时喜欢打扮打扮，烫个“新式”（引号为《天津晚报》编辑所加——编者）发型，或做一件时装，可是有些人背后对我冷言冷语，说什么怪模怪样，看着不顺眼，等等。我认为发型的多样性，是人民生活提高的具体表现。

我想，爱美之心人人都有，特别是我们年轻人，总不能都梳辫子或剪短发吧。

“有人说我爱打扮是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也有些想不通。你想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吗？有条件穿得好些，头发烫得漂亮些，这是生活小事，怎么能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呢？我为这个问题时常苦闷。

我认为，穿着打扮是生活上的小问题，不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应该把这些小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同日的《天津晚报》发表了另一篇天津钢厂共青团干部马金安的来信，题目便富有辩论性——《我们要什么样的美？》。马金安的来信代表着主流观点，他说：

“我们厂有的青年，留着油光光的‘燕尾式’大背头，也有的青年人留着小黑胡，穿着打扮怪模怪样的。这些人，把许多精力都用到了这方面，以致生产、工作、学习没放在心上。许多工人说他们在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曾经耐心地劝说他们，团组织也在不断地帮助和教育他们。……上述情况虽然是少数的，但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上述两篇文字可以透射出60年代的时尚信息：烫发、大背头，蓄胡子和擦头油。

着装打扮上的个人嗜好引发了一场社会领域的严肃斗争。在最具近现代城市气息的上海市，这种斗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据《解放日报》报道，5月17日，在南京西路高美服装店，一位顾客同营业员发生了争执。有个女顾客指责营业员说：“给我做的裤子式样不称心，你们没有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营业员则耐心地对他解释道：“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制作有害社会风尚的商品。”

争吵的起因是女顾客要求把一条灰色的华达呢裤子做成“小裤管”——类似于今天的所谓“西裤”，在那个年代属于典型的“奇装异服”。——因此营业员拒绝了她的特殊要求，并申明：裤脚过窄的裤子我们是不能做的。女顾客试样时发现，果然没有按照她的意图改裤脚，便再次要求改小。营业员说：“再改小就要形成包屁股、小裤脚了，这种奇装异服是不受欢迎的。”顾客很生气：“反正我付钱你交货，定做就是为了称心如意，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难道我做一条小裤脚裤子就影响社会风尚吗？做一条小裤脚裤子

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吗？”第二天，女顾客还带了一个男人找店里评理，在营业员的坚持之下，他才不得不快快离去。

这样一条在 1964 年相当轰动一时的上海社会新闻，引发了人们对生活方式的热烈讨论。6 月 12 日，《解放日报》发表教师陈漱石的名为《满足什么样的需要？》的评论，从这篇义正辞严的文章中我们仍然可以嗅到 60 年代中期剑拔弩张的气氛：

“裤脚做得小一点，皮鞋头改得尖一点……初看起来，这不过是个爱好问题。

萝卜青菜，各人所爱，原可不必大家谈。但仔细一想，却又不然，因为，‘小’和‘尖’到了某种程度，就会变成为奇装异服。透过服装、皮鞋等等，也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种情趣，两种生活方式的激烈斗争，这就非谈谈清楚不可。”作者接着写道：“满足需要，这也需要做阶级分析。不同的阶级是有着不同的需要的。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健康、大方、美观、实惠，资产阶级则追求奇特、怪异。今天，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与顾客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我付钱，你交货’的买卖关系。

社会主义商业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担负兴无灭资、推动社会移风易俗的光荣任务。因此，我们的商业工作者对裁制小裤脚裤子、做尖鞋头，剃“大背头”的现象不加拒绝是不应该的。社会主义商业是满足顾客正当的需要，而不是无原则地去满足个别人不合理的要求。”

报刊的口诛笔伐无疑是宣布了一切与主流美学不符的社会趣味的死刑。大张旗鼓的移风易俗在城市中继续进行，不仅指向奇装异服，而且波及了商品装璜、广告、照相服务。一年后受到批判的电影《不夜城》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资本家张伯韩的女儿收到了表哥从香港寄来的照片。照片里，当初纯朴内向的表哥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大波浪发型、绣花衬衫，手里夹着一支纸烟，一副典型的阿飞模样。10 月，对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讨伐到达顶点。《湖北日报》发表方林的文章《相片服饰反映思想本质》，文章说：“请看一张照片，这是一张中年妇女的头相：粉脸半斜，朱唇微张，一只手轻抚面颊，恰恰突出手腕上的金表和无名指上的宝石戒指。一目了然，这个人所要炫耀的，正是她手上的金手表和宝石戒指，她喜欢什么，追求什么，明明白白地摆在相片上了，无需注释。……类似的相片还有，戴上手表、拿着钱包照相。这是什么意思？小孩子身上这些散发着资本主义铜臭的装饰品，难道不是他们父母的人生理想的寄托物么？不是清清楚楚地反映了他们要培养为金钱而奋斗的资产阶级接班人么？再比如，有些人，明明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男女，却偏偏要装成封建时代的才子佳人照相（指 60 年代风靡一时的古装照相——编者），这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反映他们怀念旧时代、旧制度，向往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么？”这篇文章还严厉地指出：“照这样一类照片，决不能说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不反映人的本质。不，一定的现象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反映一定的本质的。这类相片中所包藏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肮脏货色，有一点阶级观点的人，都可察觉到。”《陕西日报》也发表文章，对一些具有“封建迷信色彩”和充满“资产阶级思想的商标及装潢”提出指责。如“金钱”胶鞋，“美人”面粉，“真美”香水，以及“寿星”、“仙女”、“鸳鸯”等等“落后”的商标。一位名叫“慧铃”的女青年来信说，“最近看到一些日用百货商店里摆设的香粉，有的是‘健康’牌的，有的是‘爽身’牌的。这些商品的牌号，装潢

都很大方、实际。可是，另外还有叫‘夜来香’、‘美人香’牌号的几种香粉，不仅牌号难听，含意污浊，同时还以美人像和露女像做装潢，看后使人反感。……香粉是为人的健康服务的，香粉的牌号和装潢，应当尽量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新思想、新风格、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景象。应该讲求政治效果和注意大众化。不应当含有资产阶级的喜好，宣传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大众报》更是以几位老理发师的发言，痛斥“资产阶级老爷、太太”的腐化和堕落。女性的“道士发”、“披肩式”、“花瓣式”，男士的“探海式”、“大青背”等等都被视为旧社会的垃圾加以痛斥。

《羊城晚报》11月19日发表的陈医生的《奇装异服之害》，今天读来，也是颇为有趣的：

“从生理上说，衣服的主要功用是保持体温平衡，避免受寒和过热，其次是保护人体不被污染、免受机械性损伤。以此来衡量，形形色色的奇装异服，如‘小脚管裤子’、‘水桶裙’等等都有害无益。……人们常用‘步步尺七’来形容走路时精神奕奕。从生理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国人的步长应该是50厘米至75厘米，这就不止‘尺七’了。但是，穿‘水桶裙’的妇女，由于受到狭窄的裙子的限制，走路的步长大概只能达到30厘米而已。我看到过一位穿水桶裙的妇女，在上公共汽车时，由于跨步受到限制，只得侧身勉强跨上去，说得刻薄些，就像爬上去似的。本想追求‘美’但找来的却是难受，何苦！”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讨论在以后的岁月是时时再起，在中国人的生活剧中，主流美学同异端生活观的抗逆一直在进行着，中国人曾有过“半篮花生出政治”的独特思维，也有过“喇叭裤上看心灵”的激烈争论。但是，这一幕在漫长的岁月中一次次上演的生活剧是否促成了中国人幸福观的上升呢？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抗逆的双方究竟是谁胜利了呢？从历史的结果看，宽容的、丰富的生活观确实成为当代生活方式的主流。然而我们依旧要问：那些顽强地维护着个人爱好的人是否胜利了呢？历史的悲剧正在于此，当我们看到60年代和我们一样不太保守的青年人受到指责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对他们的形象做出准确的判断。因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可悲地扮演着边缘化人物，因此现在的我们也无法对他们加以赞赏。中国人民生活的“信史时代”，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到来，而对先前的生活历史，只好“立此存照”。

我们为那种无法舒展的人性而感伤，而永久地怀念。

#### 年度记事

####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告》，大庆油田是集中全国4万多石油战线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奋斗开发成功的。到去年年底，已探明储量26.7亿吨，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当年原油产量600万吨，国家投资71000万元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35000万元的资金，并培养出一支具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中也适用，或可作参考。

全国工业战线开始掀起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并

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从此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 原子弹爆炸成功

10月16日，中国西部无人区升腾起一朵蘑菇云，国防科技工作者从掩体里跃出，在荒漠上欢呼雀跃。两个小时以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名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宣布了这一特大喜讯。新华社在当晚奉命发表中国政府声明，严正指出：“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声明宣布了中国政府的承诺，“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 撤销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职务

达赖出逃后，中央政府曾长期保留其职位以期待其转变，直到今年12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职务的决定》，指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在逃亡以后，组织伪流亡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积极组织和训练逃亡国外的残匪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都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走狗的叛国分子。国务院根据西藏人民的要求，决定撤销叛国分子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

#### 推广桃园经验

本年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9月18日，中央转发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这个经验是去年底至今年4月，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敌对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四清”内容已不止是清工、清帐、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认为，“桃园经验”是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值得向全国推广。

#### 批判“合二而一”论

本年4月，杨献珍在中央党校对新疆班的学员讲课时，引用我国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东西均》一文中“合二而一”的术语，用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他认为，一分为二是说一个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合二而一是说两个对立面组成一个统一体。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同样说明对立统一规律。本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文章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抹煞事物的矛盾性，宣扬阶级调和论。杨献珍被视为反党分子，并被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许多持有相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也被视为修正主义者，开始受到批判。

#### 农村“五股黑风”

最近两年来，武进地区刮起了“五股黑风”，就是单干风、投机倒把风、份盗风、封建迷信风、赌博风。

单干风。主要表现在不敢改正“责任田”，不愿并组到队。单干风的另一种表现是：大量地、经常地开荒和搞自留地。

投机倒把风也不断出现。弃农经商的越来越多，全区初步统计，弃农经商的有65户。

偷盗风。凤准大队有个生产队长，1962年公开指使社员偷邻队农具，规定每偷一张犁给奖金15元，偷一张耙奖10元。

封建迷信风。现有迷信职业者达48人，其中巫婆26人，神汉11人，阴阳先生9人，算命的2人，耶稣教活动也很猖狂。

赌博风。赌博主要是老赌头、赌棍引起的。最近两年，参加赌博的人甚多，党团干部参加赌博的人数也不少。如凤准公社光华大队党员几乎全部参加赌博。

#### 国防部授予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称号

2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人民解放军某部六连以“硬骨头六连”称号。

六连是一个战备思想硬、军政纪律硬的英雄连队。在战争年代里，六连就是敢于刺刀见红，以善于打硬仗闻名的。全国胜利后，六连继续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四个第一，发扬三八作风，以四好为标准，从根本上提高阶级觉悟，加强战备观念；从实战要求出发，从难从严苦练过硬本领，扎实地培养战斗作风；认真地遵守军政纪律；一切工作都立足于打头阵、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思想基础上，取得了突出成绩。

#### 草原英雄小姐妹

2月9日早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飘着雪花，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代父出门放牧。快到中午，天气突变。西北风卷起大雪漫天狂舞。羊群顺着风拼命逃窜，姐妹俩拦堵不住，只好跟着羊群奔跑，越跑越远。因极度疲乏，姐妹俩在冰天雪地里睡着了。深夜，龙梅冻醒一看，羊群、妹妹都不见了。她爬起来，一路走一路喊，走了两三里，才找到玉荣和羊群。姐妹俩护着羊群，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走出了70多里。

第二天拂晓，她们离白云鄂博车站不远了。这时玉荣丢了一只毡靴，光着左脚。

姐姐便要脱下自己的毡靴给她穿上，这个情节，后被移植到芭蕾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中，成为70年代难得的感人画面。

在白云鄂博火车站，出来迎接客车的扳道员王福臣，看见了龙梅连忙把她带进扳道房，用雪替她搓揉两只冻僵的手。龙梅渐渐暖和了一些，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来：“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经没靴子了……”

经过一场抢救，两人终于醒了。龙梅立即问矿区党委书记：“我的羊还在不在？”书记回答说：“羊没事，你放心吧！”龙梅和玉荣的事迹，很快传遍了草原，传遍了全中国。

#### 巴西当局逮捕我驻外人员

4月3日，中国贸易工作人员和新闻工作者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等9人在巴西瓜纳巴拉州被巴西当局无理逮捕并拘留。事发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交部发言人和各人民团体呼吁，要求巴西当局释放9人，但巴

西当局未予置理。从9月份起，巴西第一军区第二军事法庭对9名中国人员进行“审讯”，11月22日，该法庭在无任何人证物证的情况下以所谓“进行颠覆活动”的罪名，判处他们10年徒刑。

次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巴西当局对中国人员的严重政治迫害。中国政府再一次警告巴西当局，迅速恢复9名中国人员的自由，否则将对由此引起的后果负担一切责任。次年4月17日，巴西当局被迫释放其非法监禁的9名中国人员，9名中国人员回到祖国，受到热烈欢迎。

#### 全国自行车评比前三名

“永久”牌。上海自行车厂产品，前身是“搬手”牌。它是全国名牌产品之一。

60年代，“永久”牌自行车的品种有普通车、支农车、轻便车、比赛车、涨闸车和机动脚踏两用车等十几种。“永久”牌自行车的主要优点是：设计比较考究，零件、部件制造精度高，加工细致，耐磨性能和强度好，产品质量稳定。因此，1962年与1963年连续被评为全国第一，产品畅销全国，并有部分出口。

“凤凰”牌。上海自行车三厂产品，它是1958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牌子，几年以来进步很快，产量、质量都有显著提高，成为全国名牌产品之一。它在1962年与1963年均被评为第二名。主要品种有：普通车、支农车、双梁车、轻便车、涨闸车等。产品的优点是：装潢漂亮，零件、部件的精度和强度都较好，质量稳定，骑行轻快。

“飞鸽”牌。天津自行车厂产品。它是全国较老的名牌产品之一，广泛销售全国并有出口，主要品种有：普通车、轻便车、支农车、涨闸车等。产品的优点是：骑行轻快、平稳，比较坚固，前、后、中轴灵敏度好，质量比较稳定。本年度主要生产“62”型车，供应农村需要。

#### 倪志福钻头

8月，倪志福在北京科学讨论会的讲台上，向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科学家们宣读了科学论文《倪志福钻头》。这篇论文以大量的研究数据科学地论证了这种钻头的优越性。它比国内外机械工业常用的尖顶钻头提高生产效率2倍到5倍，已在许多国家传播使用。

1953年，车间里接到一批在特种钢材上打眼的任务。这种钢硬度大，“标准钻头”要钻半天才打通一个眼，而且还磨损许多钻头。倪志福反复观察和研究磨损了的许多“标准钻头”，发现那些磨损的崩坏的钻刃全在钻头的尖部和两侧，说明这些地方压力太大。于是他决定将磨损的地方再磨掉一点，试验着把原来的钻头改成三个尖七个刃的新钻头。

当时倪志福还是个二级工，磨这种几何形状较复杂的钻头不那么得心应手。在砂轮前，他没日没夜一次次修磨钻头。经过反复试验，这种新型的钻头诞生了，并被命名为“倪志福钻头”。

## 1965年：山雨欲来

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

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文人之不幸和文人之恶，全在于它们是文人。

中国的文人从来不安分守己，因为几千年的文官政治，使每一个文人都为着自己的私欲而骚动不安，如贾雨村言“钗于奁中待时飞”，阴暗的阴魂当然生出些阴险的技巧，毛泽东对此可谓洞若观火：“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些语言是毛泽东式的，出现这种不祥的语气，是在1962年，在批评小说《刘志丹》的时候。揣想毛泽东当时的心理背景，他也许想起自己20年代的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当时的心态就是一个“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人的心态，所谓身在江湖，心存庙堂的典型传统文人心态。毛泽东不会忘记，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他曾努力接近当时的共产党先驱人士和学界泰斗陈独秀与李达两位先生，想以自己的热情和智慧与两位纵论天下大事，却受到了两位礼貌的冷遇，有史家说，这两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尽管他本人也是大知识分子），也是他在解放后一再欲擒故纵，打压中国文化人的“翘尾巴”习气的原因。毛泽东也想起了胡风，这位知识分子想凭一纸万言书扭转乾坤，这一切的较量都是毛泽东做了赢家，但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那股力量常常让主席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不时想起来“反戈一击，抑制强敌”。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的这种评论与其说是对小说的评判，不如说表达了毛对整个文艺工作的一种态度。

我们相信，本着毛泽东作为泱泱大国领袖的胸怀，也相信小小的几只苍蝇玩不动地球，也许他也能充分容忍“反面教材”的施毒，就像电视剧里的唐太宗说的，“听一点靡靡之音也不至于亡了我大唐国。”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权威，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允许毒草的生长，他曾说：“100年前，欧洲人曾把西红柿叫作毒草。”——其实真的有毒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可以教人们更形象地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而，历史的发展无法在领袖的理智范围内正常地进行。毛泽东的方法与逻辑，被人成功地夸张和利用，实现了一次新式的文化禁锢，更可悲的是，毛泽东也顺应了这个灾难的自然流程。

本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开始了姚文元以文杀人的生涯。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这个所谓“文化”范围内的大革命发展到政治斗争，经济破坏，暴力和毁灭的结果，正应了一句老话“一言丧邦”。

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清官，他正直无私，以民为父母，敢说敢做，为民请命敢丢乌纱帽，敢丢项上人头，在民间的口碑中是“包青天”一样的好官。为了国事，海瑞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是家家（谐音嘉）皆净（谐音靖）也”，意思是天下一穷二白，你皇帝老子掠财太甚了。这话既出，一般情形下是要杀头的。

海瑞却敢把这话写到给皇帝看的奏折里边，嘉靖可不像一般文人雅士这般幽默，文人说一张白纸好画画儿，嘉靖说海瑞你太欺朕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你至少还是个巡抚，怎敢说嘉靖是“家净”呢，于是海瑞下了

大狱。海瑞骂归骂，对皇帝很忠诚，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些酒菜给他吃，海瑞吃了之后很奇怪，经追问，才知他骂的那个嘉靖死了，他大哭，如丧考妣，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毛泽东曾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毛泽东说这话是在 1958 年。

主席的话，又让文人动了些心思。1960 年魏静生、马连良、王雁、李慕良到北京市委找吴晗，要求他把海瑞的事写成京剧剧本，吴晗开始表示，不懂戏，没写过京戏，写不了。终赖众人不过，硬着头皮写，七易其稿，中间请老舍等名家校正，最后定名为《海瑞罢官》成稿。《海瑞罢官》主要写了海瑞巡察江南，令乡官退还民田，为百姓平反冤狱，斩贪官徐璜的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封印罢官。这折戏对吴晗来说真不是好戏，退田平冤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封印罢官又让毛泽东过敏。

在 1959 年的庐山，正直无私、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会上尖锐的发言和给毛泽东的信造成了会议议题的临时改变 掀起了一场令人痛心疾首的“反右倾”风暴。

面对自己闯下的“大祸”，彭大将军从大局出发，申明“我可以去种田，更深刻地反思自己。”庐山会议后彭将军真在北京挂甲庄种地，并测量其最高亩产量。彭的“伏罪”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毛泽东在讲到海瑞罢官时说：“要害的问题就是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罢官真的是要害，吴晗和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理解完全不同。这给上海的姚文元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当无中生有、联想丰富的姚文元一出台后，所有正直的人们，从平凡百姓，到文人和官员都变成覆巢之下的“危卵”。

我们再也没有耐心去重述姚文元那篇臭名昭著的《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了。面对十年浩劫的起源，面对文人之恶，人们于今已无话可说。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已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回顾历史，使我们欣慰的是，同样作为文人，我们有许多刚正的脊梁一样的人物，他们的抗恶斗争和遭遇的不幸，警示我们，一言既可丧邦，一言也可以兴邦。

对于姚文元行文作风的痞气和霸气，早在 1959 年就有人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 1963 年，《文汇报》发表姚的文章说“因为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翻翻对于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书——但只以薄薄的小册子为限。最近……手头上有一本名为《克罗士先生》的论著，作者为克洛德·德彪西。我对这位著名人物一无所知，……”我们这位对音乐、德彪西一无所知的姚某，潇洒地运用了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的三“子”主义，逮住德彪西就是一阵乱打，把这位印象主义大师说得一无是处，并气势汹汹地提出了几个问题——“一、这样‘新颖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为什么要那样赞不绝口地推荐它，介绍它？”“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三、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的流派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姚某的这种无耻无知与滑稽可笑令人想起文革中某位老师的一次遭遇。这位老师有一次在黑板上写下王勃的两句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正自我陶醉之际被学生揪到了批斗会场，批斗的理由是，这个人民教师抄写的诗句竟让劳动人民的子弟看不懂。

音乐家贺绿汀此时表现出他的良知，本着对艺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他站了出来，针尖对麦芒地痛斥不知天高地厚的姚文元。

“没有把书中的意思弄懂，就断章取义，凭自己的想象大加发挥，结果闹出了笑话。……出了自己的洋相，……批评家最好要有广博的知识，如果对某个问题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也要谨慎小心，多做一点研究工作，实事求是，不能够好读书不求甚解，更不能望文生义。”

贺绿汀的这些抨击言辞诸如“闹笑话”、“出洋相”、“不求甚解”、“望文生义”等，无疑是对在“反右”中一夜成名，自以为握着文艺生杀大权的姚文元的一次打击，在姚文元看来甚至是人身攻击。要知道，那时的姚文元，不再是写写《揭穿帝国主义阴谋》之类的简单的“沪新中学姚文元”，也不是写写批评滑稽戏《活菩萨》的《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那个“上海市工会姚文元”，他已是批胡风，“打”流沙河，“横扫”丁玲、巴金、艾青、秦兆阳的“金棍子”姚文元了。

他踌躇满志，正要抡圆了棍子，狂打周谷城、吴晗、邓拓、廖沫沙呢，正要“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呢，哪里忍得下贺绿汀反击的这口恶气。

贺绿汀为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承受了飞来横祸，贺先生后来说：

“一九六三年，（我）向当时的‘棍子’姚文元提了意见，这一下子惹了大祸。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残酷的打击，把我搞得家破人亡，我的二女儿贺晓秋刚刚大学毕业，竟被迫害致死……”

贺家的遭遇仅是棍子打死人的一个例证，仅靠一篇文章，姚文元就重演了“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新编。这篇文章就是姚的《评三家村》，杀死了邓拓，田家英，吴晗，吴晗妻子袁震和女儿，加上因姚文元掀起的文化革命含冤去世的人们，姚文元杀人，何止千万。

1965年给我们留下关于语言与国家兴亡的记忆和教训，传说苍颉造字时人们听到鬼神哭泣，不知道鬼神是因为失却了解释奥妙的特权而哭泣，还是因为语言和文字将给人类带来灾难而哭泣。苦难中的人们更愿意相信后者。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打油诗文字可以兴起文字大狱，一场清代的文字狱可以诛杀150多人，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文字互搏可以让千万的生命枯萎，这一切又何止惊天地、泣鬼神呢？

自焚书坑儒以来，千年的教训提示我们，一种文明怎样才能变得更加积极活跃，遵守怎样的社会游戏规则，这绝非靠一人一语之力可以实现。在中国社会的特殊传统下，作为人类文明领航者的文人，肩负着更重的历史使命，承担着更艰难的道德选择。所幸我们毕竟越过了那个时代，为某个可疑的句子而神经过敏的事件从生活中逐渐消失，这也算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吧。

#### 年度记事

##### 林彪强调“突出政治”

1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印发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林彪说，1964年有些部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有的搞得过于突出，时间也占得多了一些，冲击了政治。有的过分强调抓军事技术，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林彪提出，1965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著”的高潮，使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最根

本的必修课。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军事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军事训练、生产等如果和政治思想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加强市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3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财贸工作座谈会纪要》。财贸工作座谈会，主要讨论了打击投机倒把，进一步改造小商小贩等问题。会议提出：（1）打击粮食投机，平抑集市粮价。除了农民相互间正当的粮食调剂以外，粮食的转手买卖，不准私人经营。粮食部门应当在做好统购统销工作的前提下进行议购议销。（2）限制土纺土织，统一经营土纱土布。（3）限制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个体商贩的经营活动，不准它们超过规定的经营范围和活动地区，不准违反国家价格政策，不准任意增加网点和人员。有证商贩要逐渐减少，无证商贩要坚决取缔。加强改造私商的机构，已撤销的要恢复。（4）认真清理财贸部门的“小家当”。中央批转该文件时指出，当前财贸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市场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委会

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军衔制取消

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提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同日，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布。24日，国务院公布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军装样式和新的帽徽、领章的决定，规定官兵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废止原来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及各种勤务符号；官兵一律戴解放帽，废止原来的大沿帽、女兵无沿帽、水兵大顶帽，一律戴解放帽；废止军官的武装带、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海军军服式样改为与陆空军相同。上述决定于同年6月1日起实施。从而结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度。

批判《不夜城》

《光明日报》6月28日发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林溪的文章说，影片《不夜城》不仅掩盖了资产阶级的本质，而且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妄图毒害观众，腐蚀青年。

首先，影片没有向观众揭示资产阶级那种腐化堕落的生活，是建筑在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的基础上的。电影《不夜城》一面大肆渲染资产阶级花天酒地的生活，一面对工人阶级被压榨的生活轻描淡写。这样就从事实上斩断了资产阶级享乐和无产阶级受害之间的必然联系，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丑恶本质，这是对生活真实的极大歪曲。

其次，《不夜城》有许多生活场景的描写，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与影片的情节毫无关联的，例如，文铮过生日，大跳华尔兹舞那些恶心的场面；文铮用花衬衫披在张伯韩身上那种庸俗的玩笑等，然而作者是那样饶有兴趣地刻画这些细节，这不正是一种委婉的肯定和由衷的欣赏吗？

### 李宗仁归来

7月20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回来，本日到达北京。李宗仁在机场上宣读了声明，他在声明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方照顾和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还希望留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凛于民族大义，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团结抗美，一致对外，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作出有用的贡献。

### 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

11月6日至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先后发出通知，号召向王杰学习。王杰1942年出生于山东金乡，196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牺牲前在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任班长。1965年7月，他到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训练，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的紧急时刻，他为了掩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的生命安全，扑到炸药包上，英勇牺牲。此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王杰的热潮。本年发表的《王杰日记》写道：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

“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

“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 革命泥塑——收租院

《收租院》泥塑是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几位青年教师、学生和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1965年6月，这支10多人的创作队伍来到了大邑县安仁镇“地主庄园陈列馆”。这里原来就是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于一身的地主刘文彩的“公馆”，他们访问了过去受过苦的农民不下100人。从刘文彩水牢里活着出来的冷月英，因交不起租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肖大娘，都诉说了自己的亲身遭遇。

许多农民以亲身的经历对设计图加以议论品评，而且把他们当时的心情和地主拘腿子的神态、动作、表情表演给作者们看。这一切，都极大地帮助了这些年轻的雕塑工作者，使他们具体地而且形象地体会到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并且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创作激情。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创作了既有组合又能独立的114个群像。

1965年国庆节前后，《收租院》泥塑在当地展出，立即产生轰动，许多农民说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塑像”。年底，一部分泥塑复制品和全部泥塑照片在北京展出，取得了成功。

## 1966年：热情与自焚

红日照五洲，

风雷战旗涌。

——文革歌曲

骚动、反叛、热情、荒唐、全感性、无限渲泄、人之初性本恶，我们无法界定文革初期的情感与政治事件的核聚变式的爆炸，从两首歌我们能体会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地颠倒乾坤而且拒绝逻辑，在这个年代里矫枉过正和矫

正过枉似乎是同一意义。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学校里究竟谁怕谁？  
不是学生怕老师，  
而是老师怕学生！  
学道多助  
师道寡助！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  
师道的尊严一定灭亡  
革命的学生一定胜利！

这些怪异的腔调中，学生的社会主体意识和学生的赫赫显要地位十分突出。文革之所以能被人以四两拨千斤的高招发动起来，绝对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代战鼓疯擂的学生。学生的简单幼稚热情粗暴，使运动冲破一道道理智的防线，强权与简单的多数，是时代的主人。另一首歌这样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就是好！  
就是好啊就是好啊就是好！  
革命大字报，嘿！  
烈火遍地烧，  
胜利的凯歌冲云霄。

对于“就是好”的空洞无物与胡搅蛮缠全无道理可讲的语式，今天的人们在习惯了凡事“要个说法”之后，很难认同这种不容商榷的语言方式。殊不知文革主体——学生与普通群众的思考和言说方式就是信口开河，凭空捏造。“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与其说是革命的景象，无宁说是世界末日的模拟声光图，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革命心态，曾经被农民们唱成“牛屎好啊牛屎好啊牛屎好！”

青年学生，似乎永远走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列上，所有被学生称为“天下先”的壮举中，又以北大学生为急先锋。

历史上的北大学生，就属典型的光荣与耻辱共生的时代角色。

北大人喜欢说他们有由来已久的光荣，但一旦有人问起文革，他们便显得很难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北大都有它的光荣，但光荣到了极致，历史便出现某种逆转。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署名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在北大大饭厅张贴出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北大学生首先躁动起来，把聂元梓拥戴成新闻人物。聂元梓作为北大的新贵，每到一处必是人山人海，享受千百万崇拜者的恭维朝贺。北大学生甚至把聂元梓贴大字报的地方奉为“60年代的革命圣地”，差一点就与延安相比肩。他们在聂元梓贴大字报的大饭厅，用桌子搭了一个讲坛，像小公鸡一样跳上桌子，抖抖羽毛，吼两嗓子。各单位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恐后地跳上桌子发言，表示对聂元梓的支持。更有甚者，有些学生一见有人从哲学系办公室出来，就无条件地大喊“支持你们、支持你们！”这种无条件狂热很容易让人想起二战题材影片著名口头禅：“嗨！希特勒！”

学生的热情迅速发酵、扩张、爆炸，像五四学生运动一样，文革的北京学生也迅速向全国蔓延，不是像当年学生那样组织南下宣传队唤起民众，而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去播火种。这把大火真就烧起来了，连天的大火烧得人们至今还心惊肉跳。学生为闹革命，自愿或被迫停学，使自己的青春在愚昧简单的热情中荒废，这一代人梦醒时分，他们发现自己把自己毁了，毁在幻觉的革命实践中，他们许多人被动地走到人生的顶峰，又被历史无情地摔下来，更让人伤心的是这一代人不但出卖了自己，也让中国倒退了至少半个世纪。

学生在文化革命中的简单热情，令某些人感到鼓舞，并且指挥若定。“文化大革命非要靠他们去干，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翦伯赞写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了解情况。

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康生有一次这样说。

这些话背后的心思，是挑明了要利用学生的热情的。如果说文革是某个政治集团的阴谋实践的话，那么学生——这一历史变革时代的活性成份，因为其可塑性太强又涉世不深，不幸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像在不义之战里横尸沙场的战士，其悲剧命运的根源除了应该谴责疯狂的时代，还应该反思自己。

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大多是学生，“四大领袖”为中国人所熟知。兹开列名单及履历如下：

蒯大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 902 班学生，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负责人，首先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派人潜入徐向前办公室抄走大量绝密文件；制造清华百日大武斗。1983 年以煽动罪、杀人罪、诬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有人建议将其处死并做成恶人标本。

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文革“功勋”在于组织实施挟持、逼供、批斗、毒打彭德怀的活动。1983 年被判刑 15 年。所幸的是他未在航空领域搞革命。

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井冈山公社”负责人，业绩是砸孔府孔庙孔林及鲁国故址，诽谤谭震林、余秋里。1978 年被捕，1982 年病死。

王大宾：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所谓“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主要是对彭德怀、余秋里、谭震林等进行迫害诬陷和攻击，后被判刑 9 年。

文革病狂的热情，不仅让青年一代自焚，更由于其破坏性的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导致我们民族的自焚。许多的民族精英——学者、科技人才、艺术家，在暗无天日之时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岗位，马思聪一家甚至离开了中国。无法“叛国”的，许多含冤死去。我们可以料想，如果不是文革对我们民族精英的毁灭，中国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至少可以比现在先进 10 到 20 年。

1966 年 8 月 23 日，67 岁的老舍与其它三十多人，分别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被送到北京孔庙大院的打砸烧现场进行批斗。他们被当场剃成“阴阳头”，头上被倒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围跪在火堆四周，一面用火烤，一面用带铜扣的皮带抽打。老舍，这位毛泽东称赞的“语言大师，人民的艺术家”，曾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一大批反映新时代人民欢情与鞭挞

邪恶的作品，他的语言结晶已变成人民记忆的精华部分，可是。这位杰出人物在8月的烈日下被打得头破血流，当场晕倒在地。为此，红卫兵认为他“态度不好”，又给他加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加倍地折磨他、殴打他直到深夜。第二天黎明前，他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回家时，已奄奄一息。8月24日，老舍深夜投太平湖自尽了（可悲的是，这太平湖竟因老舍而出名）。杨沫在追忆死亡现场时写道：眼前出现一位挂着大木牌，头上血迹斑斑，嘴唇紧闭，两眼圆睁的老人，难道这就是老舍的结局？想起老舍的《西望长安》，令人想起古人的有关长安的诗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其境界之悲凉，足以刻画老舍在文革间的命运。

与整个社会的狂热偏执相反，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死，却显得出奇地清醒、冷静、安详，死得坦荡，磊落。傅雷等一大批有识有志之士在红色恐怖全面到来前的自杀，正应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当正人君子的忍辱成为邪恶飞黄腾达的资本时，忍辱便没有了价值，傅雷夫妇双方同时自杀，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夫妇的死法惊人地一致（茨威格是在他的祖国就要沦陷在纳粹铁蹄之下的前夜死去的）。而傅雷夫妇的同生同死，又兆示了什么呢？让我们从他的遗书去感受30年前一个灵魂的煎熬吧。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上面分别有蒋介石、宋美龄画像）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

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

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的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

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

而判重刑。……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

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

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求后并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什章委托修奥米加自动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

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 370 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

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加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魏惜蓉，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 53.30 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小说《呼啸山庄》中写道：谁也不曾想到在苍茫的大地之下，睡去的人们，竟有着如此不安静的睡眠。傅雷的绝笔并非代表着宁静的睡梦的开始，1966 年的足音渐渐隐去，1967 年更残忍、嚣张的脚步声叩响了年轮之梦。

#### 年度记事

##### 钢铁战士麦贤得

2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解放军报》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通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钢铁战士麦贤得》。1965 年 8 月 6 日凌晨，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闯进了福建省南部东山岛附近的渔场。“海上英雄”艇和兄弟艇一起，插向敌阵，一串串炮弹飞向敌舰，“章江号”被打得燃起了熊熊烈火。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一块弹片打进轮机兵麦贤得的右前额，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凭着平时练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忍着剧痛，顽强地坚守着战斗岗位。

就这样，麦贤得以有我无敌的精神，坚持战斗了 3 小时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

当战友把他按在一条毯子上，让他躺下休息时，他朝着战友竖起两个手指，便昏迷过去了。

海战归来，麦贤得伤势很重，炮弹片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脑部，党组织决定用一切办法抢救他的生命。广州、北京、沈阳、上海、西安等地的专家都为抢救他而出力。

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然流露出热爱毛主席的思想感情。他开始能发音吐字，就咿咿唔唔地唱起了《东方红》。有时，他翻开《毛泽东选集》，一看到毛主席的像，就激动得嘴唇微微颤抖；他右手不能动了，就用左手艰难地学习握笔写字。最先写的 5 个大字是“毛主席万岁”。

##### 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热潮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报道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焦裕禄自 1962 年冬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后，不顾自己身患肝癌，为解除兰考 36 万人民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痛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全县 149 个

大队中的 120 个生产队，跋涉 5000 多里，查清了全县 84 个风口，1600 个沙丘以及大小河流，并都编了号，绘了图。他以不改造好兰考死不瞑目的决心，总结典型经验，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治理“三害”。

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弥留之际，他深情地对同事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4 年 5 月 14 日，焦裕禄逝世，年仅 42 岁。

#### 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23 日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党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2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5 月 16 日通过，所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次会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 五·七指示

5 月 7 日，毛泽东看了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样，工人、农民、学生也要这样。而且，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 第二炮兵成立

第二炮兵是解放军的战略导弹部队，于 7 月 1 日成立。其领导机构，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及军委炮兵部分机构为基础组成。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建立核威慑力量而建立的。第一任司令员向守志，政委李天焕。

#### 香港同胞反英抗暴

报载：香港爱国同胞反抗港英当局镇压行为的抗议活动，又形成了一个新高潮。

6 月 10 日，香港工人举行了万人联合大罢工，6 月 24 日，香港 5 万人举行了联合大罢工，香港其他阶层的爱国同胞也积极响应这次大罢工。学生罢课；10 多万爱国店员、小贩和工商业者举行了 4 天的联合大罢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港英当局沉重的打击。

7 月 8 日，港英当局蓄意制造沙头角边境事件，再次镇压“新界”沙头角居民，并向我境内开枪，致使示威群众 1 人死亡，8 人受伤。我边防哨兵对港英警察和“防暴队”也进行了还击。对港英当局的严重武装挑衅，我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但港英袭击我爱国机构和进步



工会，逮捕罢工工人，绑架新华社和爱国报纸的记者，甚至出动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队血腥镇压香港爱国同胞。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不仅没有被压下去，反而越来越激烈，队伍越来越壮阔。

#### 全国学生大串连开始

8月中旬起，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当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17.9万人次。

### [附文]

革命的同志，快来和我握手  
来吧！革命的同志，  
革命的战友！  
来和我握手，  
快来和我握手！  
今天，毛主席接见了我们  
革命群众，  
我握了毛主席伟大的手，  
我握了毛主席伟大的手！  
毛主席的手，写出红书照世界，  
五洲革命风雷吼。  
毛主席的手，  
掌握着革命的舵轮，  
引导历史航船飞快往前走！  
来呀！革命的同志，  
革命的战友，  
来和我握手，  
快来和我握手！  
我们手挽手，  
紧跟毛主席向前走，  
彻底摧毁旧世界，  
把红旗插遍全球！  
天安门前飘红旗  
天安门前飘红旗，  
革命声浪动天地！  
欢呼敬爱的毛主席，  
您和我们在一起。  
千万颗红心齐跳动，  
千万声欢呼汇一起，  
万岁，万岁毛主席，  
我们永远跟着您！

跟着您啊跟着您，  
一辈子寸步也不离！  
跟着您啊跟着您，  
红心不变志不移！  
跟着您，建设祖国新天地，  
跟着您，开创无产阶级的新世纪！

## 1967年：黑眼珠里的红色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记忆。  
——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

在北京，一位学生对他的好友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好友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学生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

红卫兵首先引毛主席的话为开山大旗：“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狂热的年轻人们为此写了“一论”、“二论”、“三论”。

1966年8月3日，在《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对红卫兵的这一高论给了三个“热烈支持”，文革期间，这条造反真理演变成一首革命进行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有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北大工作组召集开会时，许多人无视工作组决定，在38楼等处设置了“斗鬼台”，“斩妖台”。对从四处抓来的、以陆平为首的60多个“黑帮分子”进行批斗，第一次开始了政治斗争中的人格侮辱行为，“黑帮分子”被戴上了高帽子（尖尖帽），脸涂黑墨，身贴大字报，批斗时采用了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等武斗形式，最后还游街，游斗。文革的这一创举一发不可收拾，在后来的岁月，红卫兵所有的罪行都从此找到了“革命的理论”，也找到了行动的典范。

在这个年份里，人们的折腾方式五花八门——

抄家：红卫兵“杀向社会”的打人、抄家运动是在“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那时正值夏末秋初，待到进入深秋初冬之季，由于许多御寒的毛衣，棉衣，棉被褥被抄走，布票，棉花票也不翼而飞。有个女学生，父母被冠以“走资派”的罪名被隔离起来了，她为了索回一个自己的小棉袄，跑遍了崇文区、西城区的抄查物资仓库，却一无所获。最后被带到专门存放衣物的体育馆，当她看见满仓堆到屋顶的各式衣物时，寻找自己小棉袄的念头顿时消失了，只好从如山的衣服堆随便拽出一件，打发在文革里度过的寒冬。文化大革命的抄家派的原始动机最初也许是借助革命的需要，后来更多的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要求，中国尽管解放近20年，但生产力的发

展远远没有赶得上人口的增长对社会财富的需求，马寅初的预言在 60 年代初步变为现实。而居于社会上层的殷实之家依然是这样的群体——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艺术家、在“社改”中享受实惠的红色资本家。在穷人坐天下的社会，革命的对象当然首选这样的人，事实证明，这个群体的大部分，在文革的烈火之中变成了赤贫阶级。红卫兵在抄家活动中，因为流浪无产者素质的局限，古玩字画等精神性产品，全部付之一炬，而金银细软，大多饱人私囊，以至于在毛泽东第二、第三次接见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活动中，不仅游行队伍经过的天安门广场出现了黄金，连天安门城楼上也留下过红卫兵失落的金砖。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财富的强权掠夺，比起解放初期的土改等有秩序的财富均分手段，更像一次均贫富风暴。

草菅人命：自北大学生发明了以人身凌虐代替革命斗争后，曾经在纳粹集中营里才能听到的百般刑法，一一地在自己同胞身上演练。北京六中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个学校，纠察队把他们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之类押进“劳改所”。这些人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还要经受“跪煤碴”、“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剃屁股”、“开水洗澡”、“打靶”、“突刺”、“扫堂腿”等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纠察队员还用刑讯室里的人血，在墙壁上书写“红色恐怖万岁”。

多年以来，人们对战争中伤亡多少的记忆并不深刻，而对和平生活中的人命如草芥的现象总是念念不忘。1957 年大跃进时期，农村干部为放卫星而谎称亩产量，实际的交粮数与“卫星数字”相去何止千里，于是上级就发动群众打干部，每到批斗时，人人手执竹条，情愿不情愿都得参加打人。据称，一场批斗会打死七八个基层干部是很正常的，当时是称“打人的共产主义”。中国新社会的这种群众暴行，在短时间里一再发泄，除了法制观念普遍性的欠缺外，千年来总是受人欺侮的下层人民的恶气，在政治的特许下无原则的发泄，未尝不是一个因果报应呢？有一部关于文革期间 100 个人命运的系列文章，其中一章写人们在这种红色恐怖中如何选择死亡，一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劳改犯，终于抓住机会用吃饭的竹筷插入自己的脑心而死，这场面现在想来也令人不寒而栗。

破四旧：人们对“打”、“砸”、“抢”的认识，并不以为它们是罪行，而视之为最革命的行动。破四旧的最大行动，就是打砸抢，这一切公报私仇、财产掠夺的罪行都赋予了革命的标签。破四旧期间，北京、上海、贵阳的繁华路口贴有告示：港式发型不理，港式衣裙不做，下流的像不照，黄色的书不卖，要求妇女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男人不许留“飞机头”，穿火箭式尖头皮鞋的当场破尖，穿“牛仔裤”要剪开裤管……各大中城市的主要街道上设立了红卫兵“破旧立新站”，许多妇女当众被强行剪去满头青丝，穿高跟鞋的被勒令当场扔掉后跟，牛仔裤被当众从裤管口直剪到大腿根。当然在背人的角落，革命的“红手”免不了顺势从小腿爬到大腿上，走在大街上的妇女往往感到从脚心一股寒流直逼头顶。在交通指示灯上，为保证祖国江山一片红，红绿指示灯曾一度被强迫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加上各地对旧店旧名旧文物的破坏，破四旧不仅毁掉中国传统的文化积累，也不仅仅是毁掉了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成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扫除“封、资、修”的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红卫兵砸碎的不仅仅是古代文物，更是践踏着中国悠久的物质积淀，毁灭的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精神。

万岁万万岁：文革中的英语课本，开卷一篇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遥想当年岁月，成千上万的手举语录本，臂戴红袖章，一身军装扎皮带的红小鬼，在天安门广场嘶声竭力地喊万岁万万岁时，旁观者就有些不知今夕是何夕的感觉。

再追思更远的岁月，在同样的天空下，山呼万岁的声音依稀可闻，只是没有这么气势磅礴，这么无与伦比，这么震天撼地。以鲜血和生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中国大众的这种万岁情结真正让人惶恐。难道在血雨腥风之后，君依然还是君，臣依然还是臣吗？鲁迅在 20 年代曾说中国许多人不过是麻木的杀头的看客，60 年代的中国人是否进化为一个为激情所惑的臣仆呢？万岁二字确实很吓人，有一个女孩子不慎将万岁说成百岁，被哥哥听见，于是扬言要去告发她的反动语言。小妹从此在哥哥的要挟下言听计从，甚至连从奶奶的尸体旁取木盆的事也肯去干，这一切为的是哥哥不告发她曾将万岁说成百岁。在很多时候，人们相信历史的发展大大地超过人类心理的变化速度，90 年代初的“红太阳”歌曲热又算是弥补人们怀念毛泽东的平民情绪。

所幸的是，这次弥补仅限于怀旧层面上的。这种变化方式就像股市，跳空高走的缺口总会在某个时段回调弥补，只是大势最终要反弹向上。

大串联：串联的初衷是到各地煽风点火，后来发展到纯粹为着乘车赶船不要钱的“变相旅游”，每到一地白吃白喝白住，临走还以革命的名义征用钱财，看不惯时还要破四旧、打砸抢一体化，居民曰：红鬼子进村了。

武斗：1967 年，中国社会的恐怖不仅停留在对个人的人身摧残和对集体的财富破坏性掠夺上，也不仅仅是情感的高压恐慌，而是有人人自危的你死我活的明确分界，个体斗争已发展成为群体的利益之争，造反派分成各种派别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进行殊死的搏斗，最大的两群体是工人与红卫兵（学生主体），他们的名称有“工总司”、“工纠队”、“赤卫队”、“省无联”、“天派”、“地派”、“8·15”、“4·14”派，在北京，学生自制的手枪、手榴弹、长矛、土坦克、穿甲弹用于了革命，在重工业城市沈阳和军工重镇重庆，机枪；坦克、大炮、榴弹炮等最先进的武器都开上了街头，杀人如麻、流血漂橹之状，在内战后的中国大地重新上演。当时的革命战报这样叙述战况：

1967 年 8 月，甲派（因故隐去真派名，下同）千余人决定北上控告。

某日一时左右，一千名乙派，穿着军装，出动三十多辆汽车，开出××城，

向北驶去。六日，甲派接近×镇，乙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的机枪向甲

派扫射，击毙八人，甲派即散。乙派越集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

一分钟不到，甲派又十三人被击倒在公路上。……乙派抓住几十个甲派，

绑了丢上卡车，用绳子抽打……乙派又架机枪，向甲派半渡之军扫射，甲

派纷纷中弹沉入海底，一甲派群众被乙派按倒在水中，淹得半死，拖上岸

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拽甲派一姑娘小辫子，打了几十个开光，

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并表示拒不投降，××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枚，又砍

了两刀，扔到大卡车上，不久便断气。……如此，追杀四个专区，行程

283 公里，乙派大获全胜。

又八月某晚，丙派开了机枪，攻击丁派守卫的东方红剧场，丙派先用炸药炸倒围墙，而后向内投手雷，当场炸死两人，丙派又持机枪冲到三楼

将丁派三十多人压在二楼，并投燃烧瓶引起火灾，丁派宁死不降，一个个

从二楼往下跳，两派用机枪，步枪，六 0 炮围住剧院，用机枪封住各出口，

用迫击炮炸开围墙，丙派八十多人冲入四间，丁派二十余人用手雷击退丙

派。晨，大楼被攻下，丁派回击，当场死十三人……。

上述这些文字里似曾相识，屠杀者在战争片中的一招一式竟被红卫兵学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杀敌人的方法竟用于自家争斗，80 年代，罗大佑写了一首歌，在我们听来，这潜台词又是多么令人悚然。

亚细亚的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面孔有红色的记忆，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 年度记事

##### 《清宫秘史》受到批判

《清宫秘史》，姚克编剧，朱石麟导演，由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 1948 年底摄制完成，并在香港上映。该电影是一部描写清末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宫廷斗争的历史故事片。1950 年该片先后在全国各大城市放映。当时刘少奇曾说，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本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 清宫秘史》，该文认为影片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贩卖卖国主义的理论，丑化义和团，吹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光绪皇帝，其目的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 中央严令立即停止武斗

5 月 14 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毛泽东批准的《重要通告》，主要内容是：（1）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2）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国家法律制裁。（3）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参加外单位的武斗。（4）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5）坚决执行中央 4 月 20 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5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社论指出：近来出现一股武斗的歪风必须坚决煞住。6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某些地区出现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秩序的严重现象，发布《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 语录歌、语录操

“语录歌、语录操”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兴起，是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形式

化、庸俗化的做法。把毛泽东的一段语录，谱写成歌曲叫“语录歌”。背诵一句毛泽东的语录，做一节体操，就是“语录操”。这种宣扬个人崇拜的形式主义做法，形同宗教仪式，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 1971 年林彪自我爆炸后，“语录歌、语录操”才被摒弃。

####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运动中出现的的一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早请示”：每天早上，开始工作、开会或学习前集体站在毛主席位前，先三鞠躬，手握《语录》贴着心窝，再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边喊边把《语录》有节奏地挥向头顶前，然后，由领队人领念几段毛泽东语录，再讲当天准备做什么事。这些动作统称为“早请示”。“晚汇报”与“早请示”基本一样，只是在每天工作、学习、开会结束之后，向毛主席汇报当天做了什么事，做得好的，没做好的，以后怎么办。

#### 忠字舞

“忠字舞”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兴起，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形式主义做法。

每当集会，边唱边手舞足蹈，以表达对毛泽东的“忠心”，人们称之为“忠字舞”。

跳“忠字舞”时，每人手捧《毛主席语录》，胸佩毛主席像章，边跳边唱当时最流行的《心中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等几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除了所谓“革命对象”外，人人都得会跳，有个说法：“跳好跳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所以，不分男女老少，不论场合、时间，一呼百应。1969 年中共九大以后，逐渐停止推行。

####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新华社 6 月 17 日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在两年 8 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 5 次核试验之后，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和一切有关人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他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正主义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群策群力，大力协同，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各种困难，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保证了这次氢弹试验的圆满成功。

#### 《毛主席语录》发行全球

7 月 2 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短评《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毛主席语录 在全世界广泛发行》。短评宣称：“《毛主席语录》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受到亿万革命人民最热烈的欢迎和颂扬。这是世界人民的大喜事，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世界革命人民喜得这红书，就象久旱逢甘露，雾航见灯塔。”

#### 《人民日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 月 5 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人民日报》

发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认为这张大字报具有伟大意义，又说：“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17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社论说，“毛主席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真正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期《红旗》杂志，还发表文章指责刘少奇1946年2月1日的《时局问题的报告》，编者按称这个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反动纲领”；还发表文章指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拼命鼓吹的‘三自一包’，编者按称“三自一包”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

#### 前三季度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11月24日，国务院业务小组向中央汇报1967年前三季度的主要经济情况和第四季度要抓紧的几项主要工作。农业增产，但工业生产和铁路运输从5月份开始大幅度下降。到9月份，钢和生铁的平均日产量都降到1.2万吨，为全年计划平均日产量的26%左右；原煤（部直属矿）的平均日产量下降到26.8万吨，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50%；发电量每天平均下降到1.57亿度，为全年计划日发电量的60%；原油的平均日产量下降到1.86万吨，为全年计划日产量的40%。第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平均水平大约只有原计划的50%左右。

## 1968年：在蓝天白云下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喊叫：  
永远记住我，妈妈呀北京！  
——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当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学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上山下乡进入中国农村现实的“汪洋大海”后。他们在1968年的夏天才感受到了苍海一粟的孤独。

也许他们还有某种把火种播到台湾省农村的宏愿，但面对处处穷山恶水和红色浩劫的广阔天地，生存的艰辛沉重地打击着他们的热情，原本不可一世的红卫兵战士，在“大有作为”的再教育中变成这个时代的被放逐者。

1966年起，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放弃课堂走向革命“串联”。1967年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但招生考试制度被废除，初高中学生形成积压，仅有大学能复课。

本年度，学生积累数达1000多万人，国民经济却全面衰退，工矿企业无法消化这些剩余劳力。

1968年毛主席发出指示“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

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毛泽东自己也头戴草帽，手握镰刀，站在金浪翻滚的麦田里指示航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声音不断地在阳光灿烂的天空回响，鼓励着 2000 万所谓“知识青年”，声势浩大地扑向金灿灿的田野。

上山下乡最初是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选择，既是时代的使命，也是革命扩大战果的必然。知青们胸戴大红花，脚跳忠字舞，锣鼓喧天地从城市下放到农村。

抱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坚决地开进了深山和荒野。

最初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是充满乐观精神的，如 1965 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有这样的描写：“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诗意消失了。

小乔的祖辈生活在山西晋南，祖辈的生活贫困而单调，1960 年他考入了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分配时，不愿下乡。

小乔的思想被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老李发现了，李师傅遵照毛主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伟大教导，用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来教育小乔，李师傅痛苦地回忆道：“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哪有我们穷人的活路。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生活，像你们这些穷人的孩子才得到上学的机会。可是有人读了十几年书，就忘了本，不愿到农村，到艰苦的地方去，这对得起毛主席吗？”此话触到了小乔的痛处，他沉痛地流着眼泪说：“李师傅，我错了，是我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忘了本，我对不起工人阶级，对不起贫下中农，更对不起毛主席！”李师傅很严肃地说：“人民把你供养到医专毕业，你却不愿为人民服务，不愿到深山窝铺去，你知道有多少贫下中农在盼望着你们？有多少病人在等着你们的诊治？”老工人的话铭刻在小乔的心里，他激动地拍拍胸前的红宝书说：“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坚决到深山窝铺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我们当然明白上述语言有多少后加工成分，也惊异一个工人和一个学生的对话，语言逻辑上这么完整，政策水平上这么高超，但我们必须相信，这就是 1968 年的标准语言。

城市的小青年，不知农村艰苦，抱着中世纪田园诗的梦想奔向农村，也许自有他们的人生见解，而大批从农村苦水里泡大的农民子弟要面对农村的艰辛，那真正是要靠理想主义的支持了。这里边的差别是很大的，最初的知青，他们一到农村就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这也是 20 年后，知青文化热死灰复燃后，老知青们引以为傲的事情。他们企图以此来证明，知青在上山下乡时的苦难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石，并以此来证明知青一代为“中国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条件下，其革命斗士的尊严和高贵被生活的严酷毫不客气地挫败，我们相信，这时候他们心中澎湃的绝不是悲壮的理想主义，而是辛酸、贫贱和刻骨的怨火。知青就像当年阿 Q 对小 D 一样，郑重地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

当年知青生活的艰难处，以下列两事可知：

抢吃“忆苦思甜”饭

一天，生产队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会后自然要尝尝忆苦饭。也不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意，拿出队上积存的几十斤谷子碾成米，加上好几百



斤牛

皮菜，煮了一大锅。会议进行中，旁边那锅菜稀饭早已漫出团团白雾，发

出阵阵诱人的清香。社员们个个翘首咂舌，不时扭头望着那团迷人的白雾，

心里巴望发言快点结束。孩子们紧紧围住那锅灶不肯离去。当队长宣布开

始吃忆苦饭的话音刚落，人们便争先恐后，拿碗取钵，递到锅前。两个掌

勺人应接不暇、累得满头大汗。我也拿着搪瓷碗，舀满一碗，“嘘嘘”地

只管喝不管烫。这哪里是忆苦饭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顿美味佳肴。吃了

几个月红薯早已生厌，现在喝着这香喷喷的牛皮菜稀饭只觉得滑腻爽口。

不一会儿，一大锅菜稀饭已是底朝天，大家直说安逸。“忆苦思甜”真个

成功了。

手表

知青无多少细软，手表更稀罕，一块梅花表足以娶一媳妇。一日，某君由省城返乡，腕上多了一计时之表。此物虽系家传，然年久失修，

指针

走得步履维艰，常有劳逸结合之举。一知青对某君问以时刻，某君先开窗，

伸头仰望天空之日，复回头，低首俯视腕上之宝，面有愧色，曰：“下午

了”。问者哑然。

1968 年上山下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国更加动荡的命运。50 年代末的上山下乡，开发了北大荒和江西共青城。这次上山下乡应是经济发展的积极举措，60 年代末的上山下乡，除了国计民生上的迫切原因外，在历史的命运上，应有天理惩戒的辛辣意义。可以想，文革 3 年的生死搏斗，已经对共和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艺术领域完成了一场空前的扫荡。生产已遭到极大的破坏，困难时期后开始的短暂安宁局面又遭到“红海洋”的全面摧毁。这千多万学生留在城市无所事事，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无力承受，对这些在文革中形成的全新社会等级观的孩子们来说，现有的国家系统似乎也对他们失去了最后的政治控制力。依照他们文革的横扫一切和打个翻天覆地、打个落花流水的惯性，中国社会形态被红卫兵斗争搞得面目全非并不是神话。所以，将知青青春的热情消耗在蓝天白云之下，黄土高山之间不失为一项英明之举，就像一艘恶浪中的大船，抛弃大批的货物赢得航行的安全一样，让青年下乡，是当时的紧急避险之措。

90 年代的知青文化热的重燃，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上山下乡的苦难使那一代人避免了自己毁灭性的命运。尽管在事实上，知青一代人的许多分子与新生代的幸运儿们相比，他们的青春岁月确实显得可怜可悲。但由于历史造成的他们简单热情、盲目忠诚和时代造成的多血质性，这种所谓的青年

运动一刚刚产生就注定了它的灭亡。如何在灭亡中自救，是那代人蹉跎岁月中的最大追问，其意义不亚于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死亡”之自问。上山下乡所经验的痛苦，无不时时撞击他们的灵魂，平静他们发昏的头脑，启迪他们思索的智慧。在从自豪到焦虑、不安之后，许多知青面对了生活的现实，体味了劳动的快乐，感受着隐秘的爱情，追求着个人的真理，从阿城的系列小说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棋王》在饥饿年代的超凡智力；《树王》在拓荒时代的坚韧执著；《孩子王》象征着愚昧时代的开启鸿蒙。尽管“知青热”有着近乎病态的自恋，但我们依然能够分享他们以青春为代价的喜悦，八、九十年代的青年要落在那个时代，也不过如此。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知青用自己的命运挣扎折射出了艰难岁月里的不幸，历史是一条波涛澎湃的河，留下来的是坚石，淘走的是黄沙。

当一代人曾经轰轰烈烈，而今却灰飞烟灭后，留下的是他们以生命代价给予我们的警示，这许多的警示不一而足地被后来的人们引以为戒，让我们以分享他们的快乐的方式祭奠生命吧：

下乡时，我带去自己装的矿石半导体收音机，头一晚上出来一放，可以说产生了轰动效应，引来满屋子大人娃娃坐满一地。尽管收音效果很差，

但听众热情之高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时间很晚，仍迟迟不愿离去。最后走

时提出看一下机子里是什么东西。随你怎么说是一些元件零件，看不出什

么名堂，可就是不甘心。无法，只有满足其愿望才得以收场。一连几天，

天天晚上来听，坐上一屋人，简直有些招架不住。遂谎称电池用完，谁知

热心听众竟自己带电池来，弄得我哭笑不得。子曰：锦车轻裘与朋友共，

敝之而不憾，不亦乐乎？

#### 年度记事

##### 元旦社论：迎接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社论。社论说，1968年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且提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要整顿党的组织。社论还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节约闹革命，爱护国家财产，自觉加强劳动纪律，坚决批判和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歪风；要大力抓好交通运输；要健全和加强各级生产领导班子，重要的生产和科研部门，要迅速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

##### “永远开除”刘少奇的党籍

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

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刘少

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和通过党章草案。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会议一开始，就批判所谓“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 6 位革命家遭到围攻批斗。

会议还错误地批判了朱德、 陈云、 邓子恢。林彪在 10 月 20 日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林彪、江青一伙还联噪要公审刘少奇、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全会通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办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全会最后通过公报。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总口号，作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认真做好整党工作”以及工人宣传队要“永远领导学校”等部署。

#### 狠批“养骡子津贴”等

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在 1966 年以前制订了 30 多种具体的奖励制度。年终奖，月奖，季奖，安全奖，省煤节电奖，小指标奖，集体合同奖，师徒合同奖，节日奖，全勤奖，“窍门奖”，“辛苦奖”，以及为了照顾情绪的“安慰奖”，等等。该厂的戴××最近撰文认为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戴还说，厂里有一台碎煤机，曾经三次搬家，每搬一次就发一次“合理化建议奖”，最后，这台碎煤机又搬回原处，照旧又发了一次奖。甚至晚上给厂里喂喂牲口，也发给高达 40 元的“养骡子津贴”。

一句话，就是“干活给钱”！

戴文指出：“推行物质刺激不仅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旧北京市委的代理人腐蚀工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也是他们压制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根大棒。”

#### 永远“购销两旺”

6 月 22 日，新华社报道：《首都市场购销两旺欣欣向荣》。报道说，今年以来，首都市场形势越来越好。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收购量逐月上升，商品的花色品种越来越丰富。调运农村和外地的商品越来越多，商品库存日益增加。棉布、针织品、火柴、洗衣粉、肥皂、收音机、铝锅、灯泡等多种主要生活用品的月收购量比年初有大幅度增长。大批纺织品、文化用品、中西药品和化工类商品源源运往外地。

目前，从北京市百货大楼、北京食品商场、西单菜市场等大型商场到遍布农村的供销社里，日用工业品和肉类、蛋品、蔬菜等各种副食品琳琅满目，销售活跃。棉布定量的减少，对市场的影响似乎并不大。

####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

南京长江大桥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位于南京下关和浦镇之间跨越长江，连接津浦和沪宁铁路。1960 年 1 月 18 日开工兴建，1968 年 12 月 29 日建成通车。工程全系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大桥正桥长 1576 米，双层式结构，上层公路桥，桥面宽 15 米，两侧人行道各宽 2.25 米，下层为双线铁路桥。两岸以桥头堡建筑作为正桥和引桥的分界，铁路和

公路在两岸引桥部分逐渐分岔，沿铁路桥面全长 6772 米，沿公路桥面全长 4588 米。大桥正桥 10 个孔，采用连续钢桥梁跨越。

铁路引桥共 159 个孔，大部分采用跨度 31.7 米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墩身为双柱式结构，大部分采用钢管基础。大桥主体工程用钢料为 66516 吨，混凝土为 384063 立方米。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宽阔，水深浪急，水下地质情况极为复杂，经常受到沿海强大台风和海潮的侵袭，施工难度极高。大桥的建成，开创了我国自力更生修建大型桥梁的新纪元。

12 月 22 日：藏匿一代人命运的编码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从 7 月中旬到 12 月中旬，全县 688 户城镇居民中已有 191 户、995 人分别下到 13 个公社和生产队安家落户。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初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和参加工作的以外，纷纷被动员去农村、边疆落户。

## 1969 年：玩偶时代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要把敌人消灭光。

——《革命造反歌》

1969 年，这在记忆中大约是最难有鲜明特点的一年，国内形势，首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革的荒谬在九大上变成了法典，刘少奇在他死于开封府之前，也终于被耻辱地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泥塑的包青天的耳朵听见一句新的口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苏联在新疆、在珍宝岛，印度在西藏也分别敲边问塞。表面上看，1969 年的事儿真不少，但这不少的事儿不过是旧调重弹，像一曲无主题的变奏，有些新意，但无法令人激动。老实巴交的百姓向隅发呆，牛鬼蛇神像皮影戏一样，不断上演他们的伎俩，前两年的阶级仇恨在 1969 年也许变成了一种新的情感，调弄这些皮影也许是种很有意思的生活方式。

4 年来的口号层出不穷，4 年来的革命摧枯拉朽。在农村里，人们在缺乏新意的政治活动中疲倦而麻木，尽管每天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开会学不但小伙子们却心不在焉，他们只是喜欢看年轻的妇女奶小孩，也很喜欢看她们纳鞋底时，三个指头拉着针，引出长长的麻线，将针尖从黑油油的青丝中轻轻划过的娴静的样子，所以人们渐渐地意识到，生产队里开大会，并非是件没

有意思的事情。

朋友回忆道：“生产队开大会的永恒主题是斗私批修。挨斗的永远也是那位漂亮的地主婆。”说她是“婆”其实很不恰当，她才四十来岁，脸颊红润而白色，眉眼生动传神，蓝布衣里透出这个地主婆年轻时的俊俏，“她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我见到的最漂亮最迷人的农村妇女”，她的男人被送到新疆劳改，儿子也过继给了有保护能力的贫下中农，开会时，地主婆总是躲在一个角落，“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开场白后就是斗地主。1969年已不大兴五花大绑了，在农村斗地主也不兴弯腰低头了，地主总是低着头，如泣如诉地诉说她怎么在旧社会吃香的喝辣的，怎么样恼了骂丫环怒了打长工，最初人们听来还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后来变得喜欢听她的泣诉了，再后来，地主婆讲得绘声绘色，人们听来不觉十分的神往，心思早离开了会场，仿佛回到中世纪的庄园，自家小有薄产，与娇妻美眷，一起有滋有味地享受生活的丰盈。当人们开始想人非非，突兀而来的口号声终止了这个节目时，那个俊俏的地主婆已停止泣诉，如释重负地叨起一竹管，楞楞地抽着草烟。

“直到我们离开山村的时候，我们都十分留恋开批斗大会，队长也十分喜欢开会，让人不解的是，队长在会后总是能够与地主婆说说笑笑，开一些农村人才听得懂的性玩笑，有机会了甚至在玉米地里拧一把地主婆的大腿，引来地主婆娇羞的嗔骂，一到了开会时间，队长的义正辞严与平日判若两人。人们对地主婆的剥削生活从批判发展到想象模拟，心旌荡漾，这也许不是历史开出来的玩笑。”

开玩笑的也许只有历史，按照西方谚语，我们可以这样说：“人们一思索，历史就发笑。”

林彪一直在为我们塑造一个不可企及的神像，一个“最高最活”的神，但是在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在宣传毛泽东形象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

“禁止在瓷器上制毛主席像”；

“不要搞忠字化运动”；

“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在某种觉悟产生之前，林彪已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中国人塑造了一个神。

在林彪的造神语言中，我们活生生地看到古代乱臣贼子的今世嘴脸——那就是用夸大其辞，阿谀奉承的极端拍马语言，实现先把对手捧到不食人间烟火偶像的位置，拉开神与人的空间，然后自己再进入这个空间，占据作为人的领袖的地位。

林彪这样来神话毛泽东：

圣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列主义的最好方法，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东西。

圣言：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圣物：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画像，金属毛主席像章

圣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的毛泽东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的顶峰。

大礼仪：口唱语录歌，手舞红宝书，脚踏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上班前，下班后站在毛主席像前，诵读毛泽东的语录“献忠心”。对偶像的膜拜甚至到了人畜不分的地步，“养忠字猪”据说是贵州都匀专区的特产，是在猪头上剪剃猪毛显出一个用心的形状框住的忠字。

在毛泽东形象一步步被抬升高入云端的过程中，毛泽东 1969 年曾经有过“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的警觉，但由于大势使然，领袖的谦虚和冷静并不能阻挡崇拜之风的蔓延。

作为子民的平常百姓，生活在 1969 年也许是简单而快乐的，由于林彪的造神运动，人们的生活也变得简单中有丰富。之所以简单，是因为我们只需要看舵手的指引，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也没有多少举棋不定的选择，整个民族就一个灵魂——政治；之所以丰富，是因为我们围绕着一个“神圣”的思想而生存，这个一神体系伴随着语言的规范化，音乐的大统一，舞蹈的群体性，色彩的炽烈单一，整个的审美情感就是一种拜神审美，人们的生活多少有些沉闷中的快乐。

中年以上的人们都有跳忠字舞的经历，遗憾的是，此举并未提高全民族的舞蹈水平，那时人们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例如，唱“敬爱的毛主席啊”，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本，右腿半蹲，左腿半跪，抬头眼望语录上的毛泽东像，唱“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要把语录本收回到自己的胸口处紧贴，象征着“在我心中”，然后两手分开，有节奏地来回高举摆动，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表情幸福，作接受阳光照射状……

跳忠字舞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时间场合，一呼俱应，无论是在田间地头，无论是在工厂大街，只要遍布全国的广播一响起歌唱毛的音乐，人们就像突然解脱似地，放下手中的话计，停住劳顿的脚步，就地如醉如痴地跳将起来，当时有种说法：“跳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此话可圈可点。

毛泽东思想与民同乐，这种单纯，也许永远是一个神话了。

有一个刘奶奶学语录的故事，也是颇值得把玩的：刘奶奶 69 岁了，从来没唱过歌，可现在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还组织老太婆演节目。为学毛主席的著作，刘奶奶白天读，夜里睡不着觉也读，忘了就喊人教。孙女玉珍跟她睡，每夜要喊起来问十多遍，闹得孙子睡不好觉。刘奶奶亲切地对孙女说：“玉珍，你教奶奶多读一个字，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

尽管中央文件规定不要追求形式，讲求实效，但拜神运动对于百姓来说，也算是“忠心”时代的一种超越方式，中央文件在此项上是禁而难止，至少到 1976 年，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人们在跳另一类型的忠字舞。人民对这一系列的“拜神”活动有自己的目的，试想，在一个简单化的时代，有多少歌儿可以唱一唱，有多少舞儿可以跳一跳，有多少集体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重大内容啊。有关“拜神”的一切类似宗教的活动，是那个时代唯一能让人们放下面具，回归真诚的时候，原本和为贵，礼为先的中华民族，又何尝能够总是怒目相向呢？生命的快乐原则假借着拜神的方式在尽可能多的人身上流淌，人们的“表忠心”活动无疑成为抒发自我感情的独特方式，在这个意

义上，拜神的快乐早已变异为自我抒放快乐，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当年生命力的一个象征。

1969年，台湾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说写一个地位低下而极力想维护人的尊严的台湾下层人物，迫于生计当了“广告人”，不得不自我丑化，化装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丧尽了人的尊严。这一切从生计上是为了怀孕的妻子免于打胎，从情感上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孩子，在生活的各个角落，主人公都必须化装成“广告人”——儿子的大玩偶。一天儿子醒来，看见常人打扮的父亲，吓得哇哇大哭，主人公说：“儿子，我是你爸。”儿子更厉害地大哭，说：“我不要你这个爸爸，我要葱头鼻子兔子耳朵的大娃娃。”

#### 年度记事

##### 《毛泽东选集》出版 1.5 亿部

近 3 年来，我国共出版、发行包括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各种文版的《毛泽东选集》 1.5 亿多部，相当于文革前 15 年出版总和的 13 倍多。同一个时期内，全国还出版、发行了《毛泽东著作选读》 1.4 亿多册、《毛主席语录》 7.4 亿多册、毛主席的“老三篇”、“老五篇”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的汇编本、单编本近 20 亿册、《毛主席诗词》 9600 多万册。

##### 康生制造“内人党”案

去年 2 月，康生说：“内人党（即 40 年代革命组织内蒙古人民党的简称）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因此，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电台广播，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 3 日之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3 日后，又将期限延为 10 日。于是，解放初期登记为“内人党”的各类人，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前往登记。同时，又主要利用汉族干部对“内人党”进行清理。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作法深挖狠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本年 2 月 4 日，康生又说：“军队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则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结果，因“内人党”案受牵连诬陷的人达 34.6 万余人，以致不得不将一部分“内人党”分子囚在河北省唐山市集训批斗。整个案件造成 11622 人被迫害致死。

#####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3 月 2 日，苏联出动边防军 70 余人、装甲车 2 辆、卡车、指挥车各 1 辆，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悍然入侵珍宝岛，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我国边防部队反击，给入侵者以应得惩罚。4 日至 12 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15 日，苏军使用坦克 20 余辆、装甲车 30 余辆、步兵 200 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再次向珍宝岛发起进攻。珍宝岛守岛军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 9 小时，打退了苏军 3 次进攻，再次给入侵者以歼灭性打击。17 日，苏军又出动坦克 3 辆、步兵 100 余人，再次来犯。遭到猛烈还击，被迫撤退。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肇事凶手，立即停止入侵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3 月 4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打击新沙皇》的社论，全国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苏联的挑衅行为。

##### 中共九大在京召开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通过的党章，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阐述；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规定林彪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4月24日，选举出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

####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2年8至9月，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四清”运动中，中央提出了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66年中央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又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将上述错误理论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写进了党章的总纲中：“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还认为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这个矛盾。这条基本路线对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 红旗渠

红旗渠是巨型水利工程，位于河南省林县境内。1960年2月动工兴建，1966年建成主体工程，1969年7月完成全部配套设施，前后10年，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建成了气势磅礴的“人造天河”。1959年河南大旱，林县人民政府决定从山西平顺县侯壁断下，把河流截住，劈开太行山，修改一条长700公里，宽8米，深4.3米，引水量为25秒立米的总干渠，即红旗渠。红旗渠引漳河水穿山越岭，流入林县分水岭，然后向南、东、东北3个方向，分成3条支渠和300多座中小型水库，形成一个总长1500公里，沿渠大小建筑物6500座的庞大水利灌溉网。使全县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前不到1万亩扩大到60万亩，把水贵如油、十年九旱的林县改变为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富饶山区。

#### 一个鸡蛋中的“路线”问题

《红旗》杂志1969年第九期发表文章：《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省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文章把农民引进合理性种植、计划产品出售、收益分配等说成是“农村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复辟资本主义”。并说“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把在农村搞多种经营说成是“自由经营”，是“资本主义”，把农民将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自由买卖，不卖给国家说成是“修正主义黑货”。文章还提出“要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把农民提出应“少留多分”，“多劳多得”说成是“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是要拆集体经济的台，制造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老路”。

## 1970年：冬天的童话



对于一去不复返的甜蜜的记忆，  
既找不到眼泪，也找不到反省。  
——普希金《在祖国蔚蓝的天空下》

印度电影《流浪者》早在文革以前就已进入中国。《流浪者》和其主题曲“拉兹之歌”，在中国最轰动的时期是在70年代末，那是在一代人遭受了苦难经历之后。

《流浪者》反映印度等级社会的黑暗现实，歌颂了纯洁的爱情和人道主义，这当然是影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然而，影片引起十年浩劫之后中国人的共鸣，自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我们还记得当年的话剧《救救她》的悲痛呐喊，在女主人公呼唤正义的背后，是否包含了一代中国青年对蹉跎岁月的控诉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流浪者》有两句著名的台词：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毫无疑问，这台词勾起了一代中国人的痛苦回忆。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这副被称为“鬼见愁”的对联所标榜的社会种族主义，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式的“拉兹”，鬼见愁标榜的社会哲学成为萦绕着他们命运的恶梦。

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在接见“鬼见愁”对联的辩论双方的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讲话以后，使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思想的学生（其中不乏革命干部子弟）以出身为标准，迅速分为两大派别。在清华、北大等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血统论”导致的社会分裂，在未来的10年内，使中国人走向文明的反面。“出身”，就像与生俱来的原罪，无法救赎。8月12日，深得“血统论”精义的谭力夫与人联名贴出了《从对联说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他在另一场演说中，发表了以自己的血统打压另一派的情绪：“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青年学生迅速分解为“红五类”、“黑五类”，而一名叫遇罗克的青年人对此作出了否定。

遇罗克出身在一个“黑五类”家庭，父亲1950年被定成专政的对象时，他才3岁。他生得温和、安静，眼神充满智慧。在遇罗克的学习生活中，他坚持不懈地要求政治进步，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然而这些进步要求都因为他的出身而遭拒绝，政治上的失望使他在知识上猛下苦功，逐渐形成“思考的脑袋”。1966年12月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发表的《出身论》成为一时的惊世骇俗之论。

“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人的前进方向，娘胎决定不了。”“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先后印了近 10 万份，都被一抢而空，在这张小报上，他还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作了系统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遇罗克的智慧没有给“黑五类”求得平等的地位，他自己反而成为“黑到底”的代表和血统决定论的祭牲。

突然，门“豁啷”一声被推开了，屋里的人惊异地扭过头去——呵，深蓝的夜空衬托出哥哥那严厉、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

像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人群；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梁，发着寒

光的白玻璃镜框，直摄进人们的心魄……

“你就是遇罗克？”

“……十六条明文说过，报纸上也多次讲明：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后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我犯了什么罪？”

“出身就是你的罪！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摘自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

遇罗克就在当夜被抓走，受尽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摧残和虐待。遇罗克入狱后，他们全家 7 口人，除一个 70 岁的姥姥外，全都被发配到北大荒等地劳教。1970 年 3 月，春寒逼人，一个年轻人充满良知的声音被无情的“专政”压灭了。事后他父亲回忆：

……你哥哥被枪决那天，上午我正在家做饭，警察进来喝道：“你儿子遇罗克被枪决了，你有什么意见？快签字吧！”说看把判决书往桌上

一摔。唉……我好不容易才想过味儿来，坐在地上就哭起来，站都站不起来

了。他挺不耐烦，等我签了好去交差，我一狠心，哭什么？我当着他的面

哭什么？我使劲起来签了字，他扬长而去——人都死啦，还问有没有意见？

——你妈妈下了班，我还在那儿痛哭。她在班上就知道了，你说她可不可

气，硬不叫我哭，还喝斥我，“要哭，你上外边哭去！”她硬是一滴眼泪

没掉！我哪儿有她那么大毅力？唉！……”

遇罗克《出身论》发表后，其邻居的孩子，因为贴了一张“《出身论》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被判了 8 年徒刑，本来意在为出身申辩的逼罗克全家，更显著地成为“黑五类家庭”，过的是更悲苦的生活，某年春节，遇罗锦请假回家——

第二天中午，一位二十多岁的小警察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一手用力点着我的证明说：“这就是你因事回京的理由？你姥姥的病是多年的

老病，算什么理由？这点理由就请十天假？你们三个都这时候回来，

遇罗

克在全市挨批斗，难道你们要回京劫狱吗？立刻回去！遇罗文、遇罗勉也

必须回陕西农村去，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他们才回来四天呀，”母亲向警察解释道：“同队的知识青年都回北京探亲了，他们连过冬的柴禾都没有，您叫他们回去怎么过冬呢？过了

春节吧。”

“春节？春节是给人民过的，不是给反革命过的，你们家的情况和别人不同，我不管怎么过冬，老乡人也没冻死嘛，回去！都必须回去，最迟

不过后天上午，到时候我们来检查，不服从命令，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1970年的冬天，遇罗克被杀，张志新被捕，“红五类”“黑五类”同在广阔的农村，做着大有作为的梦，实践着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童话，拉兹的命运同等地落在“好汉”们的身上，与拉兹不同的是，他们似乎很快乐地承受生命的苦难。

当年知青的几则日记很能说明问题——

1970.4.18

下雨，未出工。

昨晚发生了两件事：

1.大队长郑重通知：美国发射了一个宇宙火箭到西昌，估计今晚或明天就会到达。然后再叮咛：听到声音或响动，你们要赶快起来啊，社

员徐

某等六人被派在晒场上等火箭，等了整整一个晚上，气氛严肃紧张。

据说，

一队通知的是，美国今晚要派火箭来空投特务，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

2.昨天上午知青汤某等到一队帮忙打架，晚上十时许，公社“群众专政大军”十几人奉公社革委会之令到我队捉拿他们。宣读“圣旨”毕，

喝

一声“绑起来”，就把他们双手倒剪，高高捆起，押到公社，当晚就开了

了

斗争会，公社领导的拳脚立刻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再教育，然后把他们关

们关

在“公社监狱”（仓库下面）蹲了一夜。今天生产队已通知所在大队开他

他

们的斗争会。

1970.4.25

出工：薅包谷

几个社员又摆起了“食堂化”，说当时半个月就有参观团来一次，于是规定每人每天扣五钱米，等到来参观团时就酣吃一顿，余某说：“只

有

这顿才吃得饱啊。”毛某：“嘿，你敢这样说？那会儿说食堂不好，就

是

攻击社会主义，要扣你的饭，还要半夜三更弄来斗、弄来打，打死了没声

没气就完了。死个人连死个鸡都不如，死个鸡还可以管几个钱，死个人死

了就算了。”他们还介绍了当时发明的“大米饭”，把谷子蒸熟，晒干，碾出来后再蒸成饭，三两米可蒸一大碗。罗某说：“看起来一大碗，拿筷

子一戳，就是一个大窝窝。”

1970.5.21

出工：浇苔、浇烟。

今天开社员会，公社书记宣讲大好形势，最后他说：“有人说，煤油一家人一月分配4两不够，告诉你们，不是没有煤油，是战备存留了，如

果发多了，还不是浪费点完。又说买不到线，嘿嘿，衣服穿得还是不算好

烂嘛！”

这几则日记很能说明70年代的气氛，在阴郁的冬天里，一切狂热为接踵而来的匮乏所代替，一切“光荣”在人世间的艰辛之中烟消云散。

#### 年度记事

#### 全国掀起“一打三反”运动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要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清查、批判，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央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有些单位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为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要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中央还重申：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除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一切地下工厂、商店、包工队、运输队必须坚决取缔；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上述几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加之一些地方派性严重，因此，在贯彻上述文件和《公安六条》中，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 柬埔寨政变 西哈努克抵达北京

4月19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柬埔寨发生政变后由莫斯科到达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告诉他，“我们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我们支持你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我们决

心支持亲王直到胜利回国”。

4月23日，西哈努克在北京领导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5月5日，组成了以宾努亲王为首相的民族团结政府，中国政府第一个承认了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宣布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为柬埔寨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在政治上和物质上都予以大力支援。

#### 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

4月24日，我国首次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为一个直径约1米的72面体，重173公斤。其轨道近地点439公里，远地点2384公里，倾角68.5度，运行周期114分钟；卫星上装有遥测、跟踪等多种仪器，以及一台《东方红》乐曲发生器，它以20009兆赫的频率向地面不断放送《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及数据。

这一颗卫星设计寿命为15天，实际工作了24天。它的发射成功，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开端。

#### 流行口号：打倒洋奴哲学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赵先平的文章《打倒洋奴哲学》。文章说，70年代第一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上海许多工厂的革命工人正在开展一场改造基础工业的会战。

文章写道：在会战开始，有的单位由于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工业路线流毒的影响，一接到生产“高、精、尖”产品的任务，就向国家伸手；厂房建造要大的、高的，设备物资要全的、洋的。有人居然还得出这样一个公式：要出“高、精、尖”产品，一定要有“洋、大、全”设备；没有“洋、大、全”设备，出不了“高、精、尖”产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难道能接受这种跟着洋人后面爬行的公式吗？绝对不行。文章接着说：“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发展“高、精、尖”也不能有丝毫的例外。事实证明，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真正冲破洋框框，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高、精、尖”。我们在这场改造基础工业的会战中，坚持革命大批判，第一个项目都实行了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洋奴思想一露头，就受到了群众的抵制。要彻底埋葬爬行主义，打倒洋奴哲学，越是“禁律”越要破，越是“禁区”越要闯。

####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北起四川成都，南抵云南昆明，北与宝成、成渝铁路相接，南与贵昆铁路相联，全长1100公里。这条铁路于1958年开始勘测设计并局部开工，1964年9月全面展开施工，成昆铁路穿越大小凉山和横断山脉的隧道有427座，跨越大渡河、金沙江等河流的大小桥梁有991座，隧道和桥梁的总长度占全线的40%。工程十分艰巨，总投资33亿元。它的建成，对于加强沿线地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西南地区资源的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巩固国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成昆线上隧道和桥梁的总长度即达400余公里，有些地方车站也延伸到隧道内。

#### 普及大寨县

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山西省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大寨大队到昔阳县》，同时发表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社论指出，“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为了更快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加强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我们决不能满

足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个大寨式的先进大队，满足于部分县、地区和几个省、市跨过了纲要，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社论提出了普及大寨县的问题。

社论说，“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

#### “批陈整风”运动开始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了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

“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各单位应由主要的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文件下达后，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对外称为“批修整风”运动）。

#### 倪志钦创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11月8日，国家田径队和湖南、广西田径队在长沙市劳动体育场举行比赛。下午3时，身高1.84米、27岁的跳高运动员倪志钦从1.98米开始起跳，于4时10分，在第二次试跳过程中，越过了2.29米的高度，打破了由苏联运动员布鲁海尔保持多年的2.28米的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也突破了他在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创造的2.27米的跳高纪录。这是我国运动员在田径运动的男子跳高项目中第一次创造的世界纪录。

#### 黄浦江越江隧道建成

黄浦江越江隧道是横贯上海黄浦江底的公路隧道。第一条1966年开始兴建，1970年建成。隧道全长2736米，主道长1322米，两端各有引道与公路主干线相连。

隧道内行车道宽7.07米，高4.40米，以货运为主，日夜通行无阻。

## 1971年：三线——三线——

同志们哟，加油干哟，

嘿捉，嘿捉！

要把机器，

搬上山哟！

——纪录片《成昆铁路》

我们把70年代开始的一段历史时期称为中国社会史的“准文革”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人沉寂下来、并且有一批先知先觉者开始思考对错的无声年代，1971年发生的石破天惊的“九·一三”事件，这次未遂政变对中国人的心灵伤害是巨大的。

从消极方面看，“九·一三”事件使社会平添了许多“看破红尘”的分子，“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成为本年开始的民间流行语，后来载入了党代会报告，成为官方用语。怀疑和谴责的空气不仅见诸报章，而且弥漫于民间，如果说中国人开始信奉了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续密于人际防范的哲学，那么，本年度的林彪自我爆炸无疑助长了这种哲学的流行。真正在逆境中能够探讨这恶劣人心的深刻根源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像遇罗克，张志新这种人，当我们重提他们美丽的人生时，我们会以尊敬的心情遥望时空之夜闪亮的星辰，但是，那毕竟是沉睡般的记忆中寥落的亮点。共和国不会忘记为真理献身的人，然而，共和国同样不会忘记在那些日日夜夜里，在各条战线上诚实劳动着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同那些在思想史上溅出光明之花、勇敢而无畏的人们一样，在中国的“准文革时期”用辛勤的汗水作出贡献的人，同样是共和国的脊梁。

在中国腹地以及西部崇山峻岭间，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里有着冠以神秘代码的工厂和封闭的沉闷的社区，这就是著名的“三线”。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在我国的西南、西北内陆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经济建设，亦称三线建设。它是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讨论通过后而付诸实施的，曾一度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主要任务。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国人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早在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多次强调，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积极建设好我国的战略大后方基地，改善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1964年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内地，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保证。要求新建的项目要摆在内地，现在就要搞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沿海地区能够搬迁的项目要搬迁。国家计委据此重新拟定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在《提纲》中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从1965年到1980年，在我国腹心地带的13个省和自治区全面展开了规模庞大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三线建设工程大部分项目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实施并完成的。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三线建设的干扰和破坏是很大的，但是，奋战在这块土地上的几百万建设大军，尽力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使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和资源开发程度低下的历史状况。在三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中，国家把发展交通事业放在优先地位加以安排。相继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同时还修建了一些支线和专用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同期全国新增里程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比重，由1964年占全国的19.2%提高到34.70%；货物周

转量增长 4 倍多，占全国的 1 / 3。公路建设也得到较大发展，新增通车里程 22.78 万公里，占同期全国新增里程的 55%。同时，国家还投资整治了三线地区的内河航道，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 3042 万吨，进而使三线地区的交通运输初步形成网络，内河航运能力得到提高。能源工业重点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芙蓉、陕西韩城、铜川、河南平顶山等 50 多个统配煤矿区，新增原煤开采能力达 11211 万吨；建成了葛洲坝、龚咀、乌江渡、凤滩、龙羊峡、秦岭等大中型水、火电站 68 座，占全国的 40%，新增装机容量 1872.4 万千瓦，比 1964 年增长 4.3 倍；开发了 8 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形成 556 万吨原油加工能力。天然气开采能力达 54 亿立方米，工业总产值达 78.69 亿元，比 1964 年增长 4.5 倍，炼铁生产能力达到 1248 万吨，炼钢生产能力达到 1161 万吨，建成有色金属工业企业 945 个，占全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总数的 41.4%，铜、铝、铅、锌、镍、锑、汞、镁、海绵钛等有色金属的产量达到 62.64 万吨，占全国产量的 50.2%。

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三线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国防科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和资金均较密集，综合配套性很强，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的集中表现。核工业的建成已形成了从铀矿开采、水冶、萃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以及原子能和平利用等比较完整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具有相当的科研生产能力。航空工业先后在陕西、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建设了生产科研基地，新建和扩建了 125 个项目，这些项目占全国生产能力的 2 / 3。航天工业是国防工业的尖端，建有 96 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建成了具有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三线地区兵器工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技术先进的重武器。电子工业新建项目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和陕西等省。

已经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品兼容、生产科研结合的体系。

船舶工业已经建成了我国内地的舰船生产科研基地。始建于 1965 年的试验和发射中心，已形成了一个试验设备比较配套、研究手段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研究试验基地，成为我国航空、航天等飞行器以及卫星工程研究与发展的中心。

三线地区的机械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已经成为优势产业。三线地区机械工业的建设，是按照既能为军事工业配套，又能为国民经济提供重要装备的原则进行规划的，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同时还新建和扩建了一批重要的配套工厂，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型、重型汽车批量生产能力，汽车的年产量已占全国的 1 / 3。在四川、陕西、甘肃、湖南、宁夏等省区，建立了 12 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工程机械制造厂，从而使三线地区形成了较强的重型机械制造力量。重点建设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电机电器工业的制造体系。新建了 16 个机床磨具制造骨干企业，能成批生产各种型号和用途的机床，在贵州建成了磨料磨具生产基地。

新建了四川仪表总厂、贵阳新天精密光学仪器总厂、甘肃光学仪器总厂等骨干企业，使三线地区形成了较强的仪器仪表科研生产能力。新建和扩建了一批中小型拖拉机和内燃机制造工厂，使三线地区各省、区基本上都形



成了相互配套的农机工业体系。

国家在加强三线重工业建设的同时，还兴建了一批轻工和纺织企业，使三线地区的轻纺工业已经形成门类比较齐全、产品基本配套、具有一定生产技术水平的重要产业部门，初步改变了过去轻纺产品绝大部分靠沿海地区供应的状况。

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

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新建铁路的通车，矿产资源的开发，现代工业的布点，使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城镇焕发青春，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分别以功能、特色各具的新姿，展现出勃勃生机，繁荣了地区经济。同时，也使一些老工业城市的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国防工业、轻纺工业和一些原材料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为这些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场所，扩大了商品市场，增加了经济实力。

历经 17 载的三线建设，我国战略后方交通状况的改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开发和利用，国防科技工业后方基地的建成，机械、电子、轻纺工业的发展，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不仅增强了我国经济 and 国防实力，改善了我国生产力的不合理布局，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内地资源的开发，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进入 80 年代以来，世界和平因素虽然有了较大增长，国际局势也进一步趋向缓和，但战争的根源还存在，世界局部战争连绵不断，我国周边也还存在很多不稳定的因素。

因此，一旦周边有事，三线地区的工业企业仍然是我国抵御外来侵略势力的强大物质基础和可靠保证。

1971 年是中国的三线建设形成初步规模的年代，虽然，这时候的大三线并非是文革社会中的世外桃源，三线建设本身存在着失误，人民也为此付出了较大代价，然而这一道在 70 年代令人瞩目的工业风景使得沉睡的西部有了生机。三线，不仅在 70 年代的国民经济中扮演着炫目的角色，而且因人口迁移改变了某些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改变了他们未来的选择。

#### 年度记事

##### 林彪叛国出逃事件逐层传达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通知说：“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不会轻易怀疑的。”这一文件，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先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然后传达到地、师以上干部，再传达到全体党员。10 月下旬传达到全国人民。

#####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在此之前，本届联合国大会曾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从10月18日开始，进行了一周的专门辩论，并对美国和日本政府等要求首先表决它们联合炮制的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需要2/3的多数票才能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的结果，这一提案被否决。26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关于联大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接纳中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的正式通知。29日，中国政府就26届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决议发表声明。声明对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的一切友好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痛斥美、日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重申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严正立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并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及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文章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了。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满载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去参加这次比赛，并且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这显示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新思想、新面貌、新风格，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文章还把友谊和比赛的关系摆正。就是说，要以政治带技术，以友谊带比赛，比赛要认真地参加，但必须以增进友谊为前提，在比赛中，打出新风格，打出新水平，达到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共同提高的目的。

#### 基辛格秘密访华

7月9日至11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他举行会谈。7月16日发表的会谈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时，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周恩来坚持，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不容外人干预；美国还必须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并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表示：（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内政，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也不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二）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问题，留给尼克松总统第二届任期去解决。（三）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个规定的短时期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2/3，还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步减少其余的驻台美军；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 金缕玉衣

据新华社报道：在近几年中，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发掘和清理了很多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发现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如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公元前100多年）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两座古墓，凿成于石山之中，工程艰巨，规模宏大，宛如地下宫殿。墓中有各种随葬品2800多件。其中有第一次发掘出来的两套“金缕玉衣”，以玉石琢成长方形的小薄片，四角穿孔，用黄金制成的丝缕缀联而成，具有重要的价值。

### 急性结膜炎在沪流行感染者 100 万

7 月，急性结膜炎俗称红眼病在上海流行。先在闸北区铁路车站发现疫情，一周左右遍及市区和农村，许多单位一有疫情就迅速蔓延扩散，病人成倍增加。有些里弄和生产队往往一人发病传至全家，一家发病迅速传至全弄全村。市区和郊县的发病率基本一致。全市整个流行过程约 2 个月，流行高峰的持续时间为 2 周，全市发病约 100 万人。典型的病例眼睑红肿，睑结膜出血扩展到球结膜充血和水肿，常有点状和片状出血，流行传播之快，疫势之猛，波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当时使许多工厂、码头停工，浴室和游泳地关闭，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曾随报分发预防红眼病宣传单，可见本病流行对当时社会和生产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 唱好两首革命歌曲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列宁的文章：《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 25 周年而作）》，同时刊登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曲，并以《唱好两首革命歌曲》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说：唱好这两首歌“对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南巡过程中，就提倡并亲自学习这两首歌的含义，实践它的内容，做到“团结起来”，“一切行动听指挥”。

### 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声明

12 月 30 日，我国外交部就日本佐藤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妄图侵吞我国领土钓鱼岛等岛屿发表声明。声明说，在美、日两国国会先后通过的“归还冲绳协定”中，公然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声明指出，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台湾渔民历来在钓鱼岛等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日本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窃取了这些岛屿，并于 1895 年 4 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佐藤政府竟把日本侵略者过去掠夺中国领土的行动，作为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的根据，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现在，美、日两国政府竟再次拿我国钓鱼岛等岛屿私相授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中国人民一定要收复台湾和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

## 1972 年：镜子里的中国

孤独地反刍着岁月。

我和羊儿都渐渐的老了，

——索宝《雪域情绪》

“第一次映入我眼帘的公社景象是收割沿路的晚稻，或者修建灌溉工程，

现在在中国的所有地方，耕地被平整得像艺术品，像古老的花瓶一样，表面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小径和沟渠。不管怎样，中国人厌恶真空，由于需要进行生产，能得到的每寸土地都留下锄头的痕迹。最近开展了一个田园化运动，这既是为了生产，也是为审美。每一块土地都被当成一个花园，被额外的辛勤劳动装扮得非常美丽。”

虽然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在《重返中国》一书中，对从深圳到广州火车上看到的沿途风景描绘，同一年后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国》所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后者和斯诺夫人同样的深爱着中国，只不过他的电影意象在中国批评家眼里是不可忍受的、恶毒的），然而两者道出的都是 70 年代中国的实情。斯诺夫人从香港进入深圳时，这个 90 年代已经变得相当繁荣的地方，在当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渔镇。斯诺夫人就从这里登上了火车，踏上了去广州的旅途，她写道：火车车厢“干净、舒服、宽敞，是国家的骄傲。”在她眼里，70 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本世纪初“把乘火车看成是一种奢侈的休假的时代。”车厢里的扩音器播放着《我们热爱毛主席》，无休无止的现代革命京剧节目也令外国旅客大倒胃口，于是他们提出了要求，解放军战士极不情愿地关上了扩音器。“中国人的耳朵忍受噪音的能力大概同美国少年的一样。”斯诺夫人不无调侃地写道。

中国人长期以来有着一种“镜子”情结，即使是本土上现时现地的事情，以本土方式和本土观点来叙述，人们大多都觉得稀松平常。非得借外国人的口道出，才觉得新鲜有趣。这种情结的发生，其实是不能够责怪中国的观众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70 年代中国的一切，如果用 70 年代的本土语言方式来诠释，观众一定会觉得面目可憎而且枯燥无味。纵览中国的近现代生活画卷，这种情形是不是很多呢？本土叙述手段，虽然一直是表现中国历史的主流手段，但因其长期缺乏变革，缺乏激活手法。在 80 年代曾倍受冷落，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时空形态在西方式的记忆里重焕光彩，并再次启发国人。70 年代末，《光明日报》曾以整版发表王蒙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夜的眼》，就曾引起了文学爱好者的惊叹，人们疑惑着：到底是用现代手法书写记忆才更贴近真实，还是以标榜着“工农兵文艺”的表现形式更能生动地反映历史？——这个话题，已经逼近“人民记忆”一词的社会学本质了。相信当人们饱看“镜子里的中国”的丰富微妙之处，涌起的是对本土记载方式生命力衰落的悲哀。

与安东尼奥尼充满丰富具象和犀利观察性的电影语言不同，斯诺夫人采用的是友好的平常的语调来叙述 1972 年的中国。她每天读到的新闻标题是：巴基斯坦篮球队离开武汉……文化部长于会泳会见朝鲜人民军文化代表团……罗马尼亚巴纳特民间歌舞团在京举行首场演出……周恩来会见黎德寿同志等等。国际新闻版是：抗议美国轰炸越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大量奶粉被倾倒入密西西比河……布拉格群众集会要求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捷修出动军警进行镇压……法共（马列）中央发表声明……等等。

斯诺夫人是这样描绘她看到的中国人的：“当你在一个偏僻地区遇见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会先紧张而好奇地默默闪开几步，然后朝你露出普通人的富有人情味的笑容。他喜欢人们，他的心理是正常的，并不畸形，他不主动找人接近，态度持重，但是天性容易接近，甚至可亲。实际上中国人是友爱的，彼此越亲切越好——正是这个缘故，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并不

是痛苦的考验。他们是具有社会文明素质的谦和的民族，天生文雅有礼。”斯诺夫人还写道：“在今天的新中国，任何地方你都感觉不到任何邪恶气氛。从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的城市里充满了恶人和恶势力，新中国是美好的，新的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你能同他们相处——尽管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做到同他们长期和睦相处，除了阿尔巴尼亚人。”

斯诺夫人还到过中国的工厂，她的《国棉三厂》一文全景性地描绘了一个可以开放给外国参观者的工厂里，70年代中国工人的生活画面：工人拥有无偿分配的住宅，人们为房租、电、水和暖气所付的费用极少，公共浴室也是免费的，理发室收费极低，食堂每人每月只收15元，伙食不错。

“在又大又干净的厨房内，我看见厨师们在做地道的中国菜，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诱人的饭食，一盆盆冒着热气的豆腐旁，放着一筐切得很细洗得很干净的大白菜，旁边还有切好的葱、蒜和鲜姜，刚出炉的烧饼香味扑鼻……大米饭和小米饭是按预定烹饪，现炒现卖。”面色红润的胖厨师们介绍说：带肉的饭菜大约两毛钱，工人们每餐都吃肉，一份肉炒菜加上两个馒头是1角8到2角钱，豆腐菠菜5分钱，工人每天还能喝上豆浆。

“子弟学校和幼儿园也是人们感到亲切的场所，子弟学校的男孩子们理着平头，女孩子们扎着蝴蝶结的小辫子在阳光下随风摇摆。幼儿园的小女孩踮起穿着凉鞋的脚，用脚尖跳着《夸妈妈》、《妈妈纺纱织红布》和《妈妈是个好社员》。”

斯诺夫人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工人的住所，这里有电灯，有不太暖和的暖气，缝纫机和大衣橱是简单的陈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房子的租金加暖气每月11元（没有暖气时是8元）……是的，在这面镜子里，70年代的风俗、伦理、物质环境散发着光泽，这是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岁月，虽然斯诺夫人照给世界看的是阳光灿烂之下美好世界的一部分，但毕竟是存在过的活中国的画面。

在描绘着70年代的中国时，令人并不感到奇怪的是，书中大量夹叙着历史的变迁和革命斗争史，这也许可以弥补有关不太理想的现实状态和素材的单一化。我们看到洋溢于全书的忠实的友爱和有分寸的调侃。当斯诺夫人笔下的世界从我们视野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联想到已故诗人索宝的几行诗：

孤独地反刍着岁月  
我和羊儿都渐渐的老了  
但我不会死亡  
我放牧看羊群  
羊群也放牧着我呵

记忆有时也是如此，我们打开20年前这面镜子，领略那些“准文革”时代难得的平和的温馨，历史中传来的生活气息会使我们激动不已，这也是生命的幸福。一种水乳交融的时间的幸福，

年度记事

社会思潮：“读书无用论”

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洛阳铁二中学委会通讯组文章《通过社会调查批判“读书无用论”》。文章说，过去，这个学校在批判“读书无用论”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读书无用论”的余毒一直没有彻底肃清。1971年开学之前，校领导估计高年级学生在校时间只剩一

年，学习会比较用心，因而主要强调抓好新生的学习态度。可是，在假期学生家庭访问中发现“读书无用”的思想在高年级学生里面不是没有，而是相当严重。文章说，为了提高学生为革命学好社会主义文化课的自觉性，校领导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又采用二比一想的方法，即：比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学文化的艰难，比自己父母在旧社会没有文化的苦难，想自己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革命学好文化课的思想树得牢不牢，在全校展开“旧社会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不能读书？怎样为革命读好书？”的专题讨论，通过讨论，使大家端正了学习态度，逐步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

郭沫若新著：《李白与杜甫》

《人民画报》载文介绍郭沫若的新著《李白与杜甫》。文章说：李白和杜甫，是生于公元八世纪盛唐时代的著名诗人，他们的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同志力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考察诗人的出身家世、经济地位、政治活动和思想等等，给诗人以新的评价。郭沫若同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着重考察了杜甫的阶级意识、功名欲望、门阀观念以及他的地主生活，指明杜甫虽然体会到封建社会的一些阶级矛盾，写了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但是作为他思想脊梁的是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意识。作者批判了历代以来“扬杜抑李”的传统观念，特别是批判了解放后某些研究者把杜甫尊为“人民诗人”的超阶级观点。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

2月27日尼克松访华时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双方声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双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一努力。认为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是违反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双方阐明了各自的立场。中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坚决反对“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等活动。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此美方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同意就发展贸易、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交流提供方便；就关系正常化继续进行具体磋商。

中日邦交正常化

9月25日至30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等陪同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田中角荣就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2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两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

求。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 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

3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发掘了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出土3000余件珍贵文物。其品类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我国考古发掘中所罕见的，这座古墓埋葬女尸一具，外形完整，年龄约50岁左右。尸体包裹各式丝绸衣着约20层，半身浸泡在略呈红色的水里。经研究，尸体的皮下松结缔组织有弹性，纤维清晰。股动脉颜色与新鲜尸体的动脉相似。墓穴结构复杂，从突起地面的墓顶到椁室深20米。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外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木所组成，三椁三棺层层套合。木椁四周及上部填塞木炭，厚30厘米至40厘米，共约1万多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60厘米至130厘米。这座墓的随葬器物，绝大部分放在外椁与棺之间，总数达千余件。有丝织品、漆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粮食、食品、瓜果等等。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是我国现存的2100多年前唯一的一件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珍品。

竹木器中比较珍贵的是120多个身穿彩衣或彩绘的木俑以及瑟、竽、竽律3种乐器。

很多漆器、陶器中，盛有糍粑、酱菜、桃、梨、杨梅、瓜、鸡蛋、稻谷等粮食和食品，出土时还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

#### 上海地面沉降得到控制

3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地处东海之滨，地面离海平面不足4米。从1921年开始，地面逐年下沉，有的地区下沉了2.37米。但从1966年到1971年，上海市地面已经停止了沉降，而且还回升了16毫米。

地面沉降原因：大量抽取地下水。控制沉降措施：回灌等量地面水。科学工作者同工人一起研究，制订了“开灌齐动手，停灌分步走”的回灌制度。作为冷源，地下水越冷越好，因此，冬季是最好的回灌季节；为了在冬季回灌更多的水，工人们又创造了“加压回灌”等操作方法，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上海地面沉降。

#### 《战地新歌》受到欢迎

8月2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出版的革命歌曲选集《战地新歌》，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其中一些歌曲，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教唱，已在全国各地传唱开来。

这本歌集发行以后，许多单位开展了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的工人们，在本厂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带动下，积极学唱革命歌曲。

报道还说，《战地新歌》中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歌曲，激起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共鸣。聚居在云南省路南彝族自治县的撒尼人民，在圭山石林里的草坪上，伴随着大三弦琴乐曲，纵情歌唱《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广西民族学院的壮族和瑶、苗、侗等各族学员利用早晨或课余时间，在校园里高唱《壮族人民歌唱毛主席》。

#### 全国范围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

今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其中内蒙古、京津地区、河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区，降水量较常偏少1/4，不少地方出现了几十年未遇的少雨干旱。据有关专家计算，今年

是本世纪中国最早的三个年份之一。这年特大干旱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全国农田受旱面积达4亿6千多万亩，成灾面积在2亿亩以上。

在这次大旱中，北京、天津严重缺水。天津用水量逐日锐减，海河水位一度降到16厘米，天津市被迫停止农田用水，限制工业和生活用水。

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抗旱，大寨人提出一个影响全国的口号：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

####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自60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强调突出战备，建设战略后方基地的大三线和区域后方基地的小三线。1965年11月，毛泽东到安徽、江苏、上海等地视察时，强调要做好备战工作，要储备一些粮食和布匹，要修工事，多挖些防空洞。1969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在这些机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今年12月，毛泽东认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以大国霸主自居；在国内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普遍深挖防空掩体，广泛积蓄粮食，切实做好一切战备工作。这一指示的提出，更进一步地把我国原有的战备热潮推向高潮。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公开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在“深挖洞”的号召下，几乎每个单位和部队都挖了各种各样的“防空洞”。全国人防工程规模迅速扩大，人防工程标准也不断提高。这一口号片面地把中国经济战略重点引向备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 1973年：一个人的遭遇

呵，妈妈，妈妈，  
你看那矮矮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  
——电影《青春祭》插曲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全国各地开始上映一部名为《铁证如山》的内部影片，揭露“四人帮”死党在福建大搞帮派武装，残害人民的罪行。据介绍，这部影片是电影工作者冒着危险在民房里、废弃的碉堡中偷拍的。很多人还记得影片的一些镜头，如被流弹射死的解放军战士，还有大量的农村荒芜，民不聊生的场面，影片里还有帮派分子搞武斗的情景，镜头透过碉堡的了望孔；可以看到帮派武装分子沿着田间小路边打枪边前进，解说员一再强调这是现场实拍。然而许多上了岁数的人却摇摇头表示怀疑，实拍也好，补拍也罢，今天看来似乎无关紧要了。许多年已经过去，在那部资料影片里，八闽大地乡村凋败，人民困苦的情形，至今难以忘怀。

那部以福建省莆田县为背景摄制的纪录片所揭露的帮派罪行，许多帐算到了一个名叫“李庆霖”的人头上，作为“四人帮”在福建省的重要死党



之一，李庆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后来被减刑出狱，孤独地住在家乡莆田县的一间小屋里，叼着烟杆，啜着浓茶，靠追思和回忆打发着日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尝尽了炎凉滋味而无怨无悔的乡村知识分子，唯一能够代表他独特生涯的标识，是一枚佩戴在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他时不时显出的倔强和辛辣的表情，作为一个有过成功的“反潮流”经历的知识分子，有着这样的表情是不足为怪的。——假定历史滚动的齿轮不至于发生倾斜，被可怕的政治野心所扭曲，那么，70年代的风云人物李庆霖的“百姓吁天录”将被视为一次流芳百世的义举，李庆霖也将被看成是70年代伟大的中国人，他的“告御状”将作为人民记忆中的珍贵篇章而被人们永久地传诵。然而，历史与认识的限制决定了这样一点，在70年代做一个风云人物注定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笑语说穷通，冷眼看炎热，70年代的某些人物的宦海沉浮，确实可以成为现代人醒世录的绝好范本。当年有一个女售货员，工作勤奋服务热情，为百姓所称道。有一天，她调到了京城，做了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于是去跟丈夫商量：你愿不愿意调北京工作？殊不知丈夫根本不买她的帐，你在外面做副委员长也好，当政治局委员也罢，但在家里，你还是我的老婆——甭跟我来这一套！她的丈夫因此同她分居，整日价同厂里的一帮老哥喝酒钓鱼为乐。后来这女的不做官了，依旧回家乡卖菜，两口儿依旧和和美美。

有人把女售货员的经历称为70年代的荒谬，但人们还是乐于去挖掘这种“荒谬”，比如采访一下某位劳模出身的前副总理，她会告诉你政治局开会喝的是龙井茶，这类文章人们还是爱看。不过我们认为这一类事情算不上“荒谬”，这是因为让平头百姓直接治国，本意还是不坏的（虽然在实践上有问题）。其二，虽然平头老百姓入阁了军机，但只要他灵魂里仍然是个平头老百姓，那么，他就难以祸国。70年代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祸国的是那些“阉割了马列主义的秀才们”和好斗分子，前文提到的女售货员还是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乡，没有人打她，也没有人骂她，也没有暗地里说“邪性”。这一切都不能说是“荒谬”，只算得上是“诙谐”。

李庆霖最初也是如此，他的起家源于“不平则鸣”，他的败落也是因为他后来给世间带来了太多的不平。翻开历史，再看一看李庆霖当年上书毛泽东的那封信，其情状之恳切，言辞之悲痛，今天读来，仍然为之心悸。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

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

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

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

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然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

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

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当然，李庆霖没有想到，这信在本年4月寄到中南海时，竟然使得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潸然泪下，尤其读到“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这一段时，同为父亲的毛泽东不禁老泪纵横，他提笔给李庆霖写了一封回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笔回信和300元汇款寄到福建省莆田县时，李庆霖家里无疑像一场盛大的节日来临了，李庆霖捧着主席的来信哭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想到，万般无计之中不寄予希望的一封信，能如此惊动老人家。

然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使两千万知识青年的苦难决开了火山的裂口。

不久，中共中央以 21 号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的复信和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印发全国，传达到广大群众和知识青年，还附上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信的通知》，要求全国党政军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对知青工作要严格检查，加强领导，总结经验。

正如李庆霖所说：“主席复信后，各级对知青工作普遍重视了，办了青年点盖了房，贪污建房经费和迫害知青事件大大减少了，80%的知青有房住，60%的知青达到了自给。粮食不够吃的由国家补，每月 20 斤，每月发 8 元钱。”此外，干部子弟“走后门”的现象也得到了遏止，为了表达他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之情，李庆霖又把中学刚刚毕业的小儿子动员下乡，他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我应该带头听毛主席的话。”并拒绝了公社推荐他的大儿子上大学的美意。凭着毛主席的这封来信，李庆霖也被罩上了五彩光环，他先后担任东方红小学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莆田县教育局副组长，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副组长、省人大代表直至国务院知青办成员。

身在历史之外的人喜欢说：“如果某某人到此为止，也许……”然而，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某种人为的因果等式不可能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李庆霖后来的下场，充其量是个人立场偏斜和权欲升腾的结果，是一个 70 年代的荒谬插曲。

然而，当这个现在已变成古暮老人的李庆霖，怀念着 1973 年温暖的春光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嘲笑这个老人的感情。毕竟，他曾经写出了数亿人心底的呻吟，1973 年的这封信冲破了“莺歌燕舞”的樊笼，成为 70 年代人民信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会公正地评价这一声心灵的呐喊。

#### 年度记事

#####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

6 月至 7 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召开的。会议分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形势，检查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讨论和议定了 6 条统筹解决办法。会议议定的 6 条统筹解决办法是：（1）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县以上的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2）病残的、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和华籍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上山下乡。（3）从 1973 年起，提高上山下乡经费开支标准，全国平均每人补助将近 500 元，到高寒地区的另发 40 元冬装费。知识青年插队头一年，仍吃商品粮，参加分配后，吃粮水平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4）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5）对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坚决打击。省、市、自治区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作出长远的全面规划。8 月 4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报告。

#####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7 月 10 日，中央专案组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中共中央。《审查报告》说：“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

国陈林彪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2)永远开除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4)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认定李雪峰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将他永远开除党籍。一后经调查，认为证据不确，故中共中央于1982年4月1日作出决定，撤销了把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把他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

####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总数的67%，妇女代表占20%，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选出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揭发了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指出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代表们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对林彪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采取的全部措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没有改变，因而大会不可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并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报告》提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继续深入进行“斗、批、改”。

#### 《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批孔文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文章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坚决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改革。

文章说：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52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

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文章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文章最后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 批判“智育第一”的恶浪掀起

12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发表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刘丽华的一次谈话记录，掀起以批判“智育第一、批判“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在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严格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择优培养和选拔人才等做法，都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编者按语》中说：刘丽华的谈话，“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要注意文教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两报展开讨论，这个讨论在上海的报刊上持续了3个多月。上海的高等学校还通过贴大字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错误地批判所谓“智育第一”。

#### 对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突然考试

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许多教授采取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办法，进行抵制。在此以前，辽宁也对教授进行过一次考试。北京考教授后，国务院科教组通过召开座谈会，发简报，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题为《考教授有感》的署名文章等办法，竭力扩大“考教授”的政治影响。上海、天津等地也先后仿效北京的作法，组织“考教授”。

#### 一个小学生成为“反潮流英雄”

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10月21日向报社递送她的信和日记摘抄。信是她与班主任老师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后，家长叫她写的，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北京日报》还发表了编者按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并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北京日报》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编者按，赞扬“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的精神，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此后，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要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破师道尊严”的恶浪，把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统统指责为搞“师道尊严”，以致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甚至受到批判。一些学校又出现了“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 1974年：反潮流

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嘞），  
三大革命打冲锋（哟嗬）  
——电影《决裂》插曲

1974 年的初春，中学生像“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一样，轰轰烈烈地又造起反来。几乎一夜之间，北京市中小学校的玻璃窗几乎被砸烂个精光，教室的桌椅板凳也砸坏不少，在这群患了政治甲亢症的学生中；我们 13 岁的小英雄黄帅由几篇日记开始，不幸成为 70 年代反潮流的象征。后来人们也原谅了黄帅，她毕竟是个孩子，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是个天资聪颖、有好学精神的孩子。黄帅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女学生，她所道出的，不过是对学校里的某种现象的苦闷心情，师生之间的日常冲突，按理说也是人之常情。然而 70 年代里学生们的歌谣：“东风吹，战鼓擂，现在学校究竟谁怕谁……师道尊严一定灭亡”和全国教育界的一片沸腾，使得这个并不懂得世道险恶的女孩子一次次拨弄好自己的红领巾，被上层人物一次次召见。谁也没有想到，几篇较有个性的日记，会使教育界失掉了最后一层体面，教师的凛然和威严，在红小兵的小拳之下已破碎不堪，踏着这些碎片，黄帅越发显得像个“革命小将”了。虽然黄帅形象及其所谓的“黄帅”的日记，事后证明是有人故意推波助澜，但对于当时既成的“英雄”事实，不辨真假的小学生也只有顺势而为了。

黄帅现象引发的社会震荡绝不是 70 年代的孤立现象。如果说当初一个小学生的日记索要的是一种纯洁的权益，那么，更多的成人对权益分配的不满，则是出于弥漫于这个时代的普遍的怨恨，1974 年怪诞的社会风景，使人心变得更加无常。

在历史的某个时期，人性的自觉本来是自我拯救的一个心灵起点，尽管老三届为主体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的罪孽中拒绝文化的历史积淀乃至达到拒绝文明的程度。但在上山下乡后，他们仍然感受到农村的落后陋习，比红卫兵自己更排斥文明——或者是现代文明之风还未能吹到农村。王安忆曾悲哀地说：知识青年不仅没有给广大农村带来“知识”的春风，相反，中国农村的愚昧像汪洋大海般地吞噬了他们。面对农村经济、文化、人民觉悟的落后，红卫兵（知青）难以忍受城乡之间的文化反差，提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但面对 70 年代恢复的旨在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才素质的高校招生制度，以张铁生为典型的少数“知识青年”，终于开始了命运的大逃亡。

张铁生是辽宁锦州市兴城区 1968 年下乡的知青，恢复招考后，开始萌动求进的想法了。在政治亢奋时期过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在农村实在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一心一意想上大学，并以此为契机，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公社一级的文化考察，张铁生以一剂偏方（给领导写信自我推荐）通过了考试，在兴城区文化考试中，他遇到了难关，其实这考试是开卷考试，考题也不偏不怪，比如“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体会”等老生常谈的内容。无奈张铁生天资不足，也未曾下过悬梁刺股的功夫，加上当时既要作政治的先锋，又要作学院淘金者，实在鱼肉熊掌不可兼得。结果张的语文考了 38 分，数学得 61 分，理化仅得 6 分，几乎等于交白卷。眼看升学无望，张铁生又亮出一剂偏方，在理化卷的背后给领导写了一封牢骚满腹的信，不想竟得了个满分。

尊敬的领导：

……本人自 1968 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干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 18 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

我的

时间只在 27 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

对

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说实

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

考试被他们这帮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

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

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

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说些什么，总觉

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动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工作所排斥了，代

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知道的，

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两

天的复习的时间，我是保证把它答满分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都清

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

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其实，平心而论，像“考试被他们这帮大学迷给垄断了”的句子，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信奉者最真实的失落。时代的哲学总纲要求人们去如此这般地做，然而却要把机会赐给了并不十分信奉它的人。这种矛盾，势必在 70 年代引发出了一场新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铁生也道出了某种真实的辛酸。但是，本来可以到此为止的一篇文章却导致了一场恶性事件。后来有人说：这封信使人想起狐狸与葡萄的故事，对于爱读书的“呆子”们，按照这个时代的逻辑就算“不务正业、逍遥法外”！在张铁生语言不太通畅的自白之中，我们似乎明白，知识青年不得擅自读除毛选、《学习与批判》、《征途》以外的书，就是那个时代的大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这一“大法”的。这样看来，张铁生代表的知青“先锋”们，希望这次入学“加以考虑为盼”，这岂不要以身试“法”吗？现代中国的狐狸与葡萄的寓言，应该加一句新的台词：“就算葡萄是酸的，我也要吃它”。

张铁生的闹剧被毛远新当作“有棱有角的石头”砸向周恩来的现代教育思想，原本可以恢复比较正常形态的文化教育再一次被扫进读书无用的垃圾堆。中国再一次陷入自我蒙昧年代。而张铁生自己，作为“教育革命”的闯将，不仅上了大学，还入了党，担任了铁岭市农学院的领导，当上了四届人大的常委会委员，

张铁生的“白卷英雄”传奇，一度倾斜了混乱时代的人心，以至于 1977



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招生以后，有大批的考生模仿张铁生在考卷上写信，对考试指手画脚以图出奇制胜。从张铁生自相矛盾的信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张对学习机会真诚的需求，如果不是历史的荒诞太深以至于我们把荒唐当作了真理的话，张铁生也许不会身败名裂，相反，他一定会痛定思痛，下一番苦读的功夫的。

这个被咒诅为文明“慧星”的张铁生，如今在辽宁农村的一个诊所行医为生，这也算是一种象征——医治创伤的象征吧。

文革十年很自然地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政治高的民族心态。文革的每场运动，大多数的青年总是满腔热忱去冲锋，但最后的结果呢？“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政治命运的屡败屡战导致青年心理的挫折感增强，使大多数青年，总是处于社会生活的非主流地位。自己付出全部的政治热情但却无前途可言，到头来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读书升学”之上，又屡遭打击，这是怎样的一个反复无常的年代呵！

继张铁生之后，1973年7月10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1）班的15岁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在卷子背面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  
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  
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张玉勤的不良情绪受到学校的批评，小小年纪不知何方来的满腹怨愤不能排遣，竟投河自尽。张玉勤的死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不幸，在1974年1月，张玉勤的班主任被判刑2年，唐河县有关人员也被株连280多人。黄帅的“首义”，张玉勤的死，张铁生的呼应，共同构成了1974年青少年一代的情感倾向。于是乎，“白专道路”人人喊打，知识成为人世间最无用、最卑贱的事物，70年代的荒诞风景，让人感慨又无奈。

在第一次大学招生口语面试室里，主考老师准备考一位报考日语专业的学生。

老师说：“请你先写几句简单的日语句子吧。”

考生摇了摇头说：“我只会说，不会写。”

教师问：“那你凭什么来报考大学呢？”

考生伸出一双大手，伸开手指，满手黄亮亮的老茧：“凭这个，不过，日语我是会说的。”

老师想了想，就说：“好吧，你就说几句吧。”

考生想起了几部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精神为之一振，拉起粗嗓门喊：“你的，太巴壳（日语香烟之音）的拿来，我的米西米西的有。”

他见老师猛地瞪大了眼睛，心中更得意，将手往空中一挥，做了个劈刀的手势，大吼：“八格牙鲁，你的瞪眼睛的不要……”

这种幽默，只属于70年代。

#### 年度记事

##### 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中国》受到批判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这个所谓批判，以“高、大、全”和“假、大、空”苛求于一位外国人，在国内外造成极坏影

响。文章说，安东尼奥尼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文章还说，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群众，但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 8年来首次上映国产新故事片

1月16至20日，国务院文化组召开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传达江青、张春桥对《战洪图》、《火红的年代》、《年轻的一代》等影片的意见。于会泳在讲话中对周恩来关于“中央对故事片抓晚了”的批评进行攻击。故事片《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这是文化大革命8年多来首次上映新的国产故事影片。

#### 西沙群岛自卫还击战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但南越当局竟然于1973年9月将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岛屿划入其版图。我国外交部于1974年1月11日发表声明，重申南沙、西沙和东沙等群岛属于中国的领土，指出这些岛屿附近的海域资源主权也属于中国。但南越当局置若罔闻，悍然派出军舰于1月15日入侵西沙群岛之永乐群岛海域，并炮击甘泉岛，无理要求我在甘泉岛附近生产的402号渔轮离开我海域。1月17日，南越武装部队侵占金银岛，并在侵入甘泉岛后强行取下我国国旗。1月18日南越当局又以两艘舰艇于羚羊礁北侧撞毁我407号渔轮驾驶台。中国海军为了中国领土主权和保护人民的正常生产，派出6艘舰艇于1月17日、18日进至永乐群岛执行巡逻任务。1月19日，南越当局竟又派出武装部队进攻我国琛航岛，出动军舰与飞机炮击和轰炸琛航岛，致使岛上渔民、民兵死伤多人，该岛渔民、民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经1小时的英勇战斗，击沉敌舰1艘，伤其3艘。

1月20日，中国陆军部队在海军和渔民、民兵的配合下，收复了甘泉、珊瑚、金银3岛。共毙、俘敌兵300多名。捍卫了我国的领土主权。

####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2月2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卡翁达并在谈话中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 我国就东海大陆架开发协定发表声明

2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和韩国签订所谓共同开发大陆架的协定一事发表声明。声明指出：“1974年1月30日，日本政府和南朝鲜当局在流域签订所谓共同开发大陆架的协定，背着中国在东海海域片面划了大面积的大陆架作为日本和南朝鲜的所谓共同开发区，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决不能同意。中国政府认为，根据大陆架是大陆自然延伸的原则，东海大陆架理应由中国和有关国家协商确定如何划分。如果日本和南朝鲜当局在这一区域擅自进行开发活动，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 黑龙江发现古代猛犸象骨架化石

4月14日，新华社报道，黑龙江省肇源县三站人民公社社员平整土地时，在距离地面约5米处发现一具较完整的古代猛犸象骨架化石。这在中

国还是第一次。这次发现的猛犸象， 身长 6 米左右， 体高 3.01 米， 其粗大扭转的门齿曲线长度达 1.43 米， 据推算， 它活着的时候体重可达 4 至 5 吨。这种动物生存在第四纪晚期， 距今至少有 1 万多年。 这为研究松嫩平原一带第四纪晚期的地层、 古生物、 古气象、 古地理等提供了新的实物根据。

#### 长篇小说《艳阳天》出版

5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初澜文章《在矛盾冲突中塑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 艳阳天》。文章说， 浩然的《艳阳天》， 是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 两条战线激烈斗争中产生的一部文学作品。这部小说， 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 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成功地塑造了“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 萧长春的英雄形象。文章还说， 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典型， 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萧长春， 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这一人物之所以高大、 丰满而感人， 很重要的一点， 是由于作者在创作中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通过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的途径， 突出地刻画了萧长春的英雄形象。

#### 8 个样板戏“ 开创了社会主义文艺新纪元”

7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七期上发表初澜的文章《京剧革命 10 年》。文章把江青、 陈伯达、 张春桥、 姚文元早在 1968 年、 1969 年就鼓吹的所谓“ 空白” 论、“ 创业期” 论、“ 新纪元” 论， 作了系统的发挥， 说“ 第一批 8 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 宣告了“ 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纪元已经到来”， “ 过去的 10 年， 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

#### 批判“ 三字经”

7 月 12 日， 江青对《北京日报》一个内部刊物上登载的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孙武成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一封信， 写了批语：“ 中学， 甚至小学的批林批孔都应抓紧些。要抓典型， 以点带面。如不及时抓紧， 对青少年、 儿童不利。《三字经》之类的东西， 就是针对少年、 儿童编的。我们对这个问题不重视， 不能使一个人从儿童、 少年就粗知一点马克思主义， 敢于批孔老二， 值得深思。” 国务院科教组于 20 日将上述批语用电话通知各省、 市、 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此后， 在各级学校以至幼儿园又开展了批判《三字经》、 《闺训千字文》、 《弟子规》、 《改良女儿经》、 《神童诗》、 《名贤集》等旧书的活动， 这些当代青少年从未接触过的旧书被大量翻印。

#### “江青裙” 被作为“ 新生事物” 强行推向全国

10 月 14 日， 天津正式展出了“ 江青裙”。这一裙装是天津市委的某负责人找人翻古书， 看古画， 临摹出 100 多种唐、 宋、 明女服饰画图， 最后由江青修正审定、 正式命名的。天津市委的某负责人向六省、 市代表介绍了“ 经验”：(1) 此裙是个“ 新生事物”， 推不推广、 穿与不穿， 是态度问题；(2) 市委排上日程， 书记亲自抓， 工商局党委保证， 局长亲自动手；(3) 决定市直属机关女干部和市妇联头头要带头穿；(4) 决定主力军（纺织女工）上阵， 一下穿出 1000 件， 等等。另外， 据沈阳、 抚顺、 丹东、 锦西、 旅大统计， 他们加工、 进货 2.9 万多件“ 江青裙”， 总价 55 万余元， 结果压库 1.4 万多件。如何处理， 愁坏了职工， 难了领导。未了， 不得不统统毁制， 大削价，“ 大牺牲”， 摆摊销售， 这样， 待全部处理完毕， 国家损失达 22 万元。

## 1975年：匮乏年代里的花朵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贝。  
夜色苍茫黑沉沉，  
静静地睡觉吧。  
白头山上有一颗明亮的星，  
星光灿烂守护着你，我的小宝贝。

——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插曲

曾有一篇题为《感谢西哈努克亲王》的怀旧小品写道：感谢西哈努克亲王，他在难忘的匮乏年代里带给人们幸福的温暖；感谢西哈努克亲王，他在特定的时代里架起了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友谊彩虹。中国人民对和蔼可亲的亲王是如此熟悉，以至于在那段历史岁月中，他被视作70年代的电影明星，成为人间共欢的美好象征。70年代前期，我们姑且称之为“准文革时期”，就人们的感知而言，这个时期确实同雅各宾主义式的疾风暴雨时代存在明显的区别，怎么说呢？它显得平和沉闷，生活色彩单调，在阳光灿烂之下，红砖楼房和柏油马路之间，蓝蓝绿绿服饰的人们行走着，构成70年代的人间风景。露天电影场和工农兵剧院里，银幕上放映着繁花似锦、亲情融融的场面：白人、黑人、港澳台同胞，天安门广场夜空的五彩焰火，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民族歌舞，人民大会堂的盛大国宴，茅台、鲜花、冷盘、高脚酒杯，摘苹果的时候，战斗的早晨，南江村的妇女，火车司机的儿子……，万紫千红，歌潮如海。一切富有温情色彩的事物仿佛是蛮荒中的花朵，在记忆的荒漠里熠熠生光。

你是一个大国，  
毫无自私傲慢，  
待人谦虚有礼，  
不分大小强弱，  
我们高棉人民，有了你的支持  
就把忧愁驱散。

……

匮乏年代的特征，使得一切慈祥、友爱、浪漫主义的事物在岁月时空的浮雕中清晰地凸现，惹人喜爱。中国的新闻简报，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又哭又笑，构成了70年代性格的某种多元性，酿造着70年代的独特色彩。

这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构筑的独特时空，老百姓在斯多噶主义的禁欲气氛中悄悄抬头，一度出现的松弛气氛使得人们重新诞生出了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

这个年代里发生着许多秘密的商品交易，同时发生着秘密的爱情，不庸讳言的是，也流传着《少女之心》。这个时代诞生了和传诵着许多地下作品，在秘密沙龙里，在知青点，甚至在莫斯科广播电台，都可以听见它们的旋律。“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 / 美丽的扬子江畔 / 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人……”“清明节的早晨我来到广场 / 千百万群众朝上望 / 冰拱拱的

机关枪在我头上 / 人民法院判我死刑 / 我就要走上刑场 / 再见了亲人 / 再见了，姑娘……”这个时代就是如此，一切秘密的追求都笼罩着专政的阴影，一切的个人欲望都面临着社会的谴责。因此，地下形式流传的歌谣和传奇，只能属于一种残酷的温馨。地下作品缺乏理想和充满苦闷，我们只能看到混乱和颓废，这是匮乏时代中怪异的花朵，有生命，但无色泽。

民间涌动的许多看来是低俗的渴望，实在是一种不幸现实的辛酸印证。曾有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青年工人被“群专”指挥部捉去，几天后，他在看守所里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开列了上百种食品，很明显，这是一个由于饥饿而濒临精神崩溃的人的悲惨的呼号。父亲一见这张纸条，便扑咚一声坐在炕上。那位青工的尸体被板车运回了家中，眼睛睁着望着苍天，似乎正在天堂里寻觅着形形色色的食物。

在贫乏的日子里不可遏止的想念着食物、爱慕着一切盛宴场面，这是艰难世事中人们心理状态的不争事实，每个生活过来的人都有类似的记忆。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写道：“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口嚼大咽。

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上数学课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字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课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指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在书本里、在电影里寻觅食物的芳踪，这种在饥饿中焕发的诗意，是否属中国人独有，我们不可得知，但“精神会餐”这一名词，确实属于中国人的独特发明之一。

在我们的印象中，70年代出现的许多小说电影不乏“吃”的场面。这些有关食物的片断，能够起到抚慰人心的作用，这对今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张爱玲曾写道：“从前相府老太读《儒林外史》，就为看个吃。”看来这种隐秘的心性是有着历史渊缘的，在小说《征途》里，插队黑龙江的上海知青在乌苏里江畔烤野味、半夜三更好狗肉；小说《千重浪》农户人家杀猪灌血肠这些细节传达着东北的粗放食风；《三探红鱼洞》里一场阶级斗争围绕着一盘葱烤鲫鱼展开，读者的眼珠子也随着这盘香气诱人的葱烤鲫鱼转过去、转过来。另一部如今几乎已经失传的小说《海花》，是文革期间少见的有着优美风景描写和浓厚童趣的作品，它曾经激起了少年一代的文学梦想，海滩、丛林、有着酸甜果肉的仙人果，堪称70年代少年文艺中色觉、味觉的至美境界。

然则对为生计所迫的成人来说，有关“吃”的回忆便显得缺乏浪漫，甚至有些残忍。尽管他们今天可以用一种悠闲的文风谈到饥饿的回忆，如李极光《吃在边疆》写道：“支边八年中，亲身经历了许多可歌可泣、可笑可叹的大事小事、奇事趣事。可不知为什么，记忆最深刻的，却是有关吃的一些事情……”——以美食之国著称的中国，一旦食欲被压抑，将出现怎样一些人间奇景啊！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在饥饿的眼睛里幻化为甘饴；追求食物的欲望，变作人们奇诡的智慧。只有回首那些令人嗟伤的事实，人们才会对现世的温暖生出感恩之心。

一本名为《怪菜》的书，其中的“知青菜”部分可以告诉我们匮乏岁月的奇诡智慧是怎么一回事。照录一节，食谱里的人生滋味，可供顺玩一番了。

队里的老水牛病了，请公社兽医治了几天，终不见好，队长就报请公社同意，将牛杀了。杀牛时看热闹的人挺多，分肉时，因一斤牛肉要交一角五分钱，看的人顷刻就散了一大半，没一家愿用一角五分钱买一斤牛肉吃。队长气得直骂街，派人去公社，问公社食堂买不？公社食堂闻知，立即派了两个人，付了钱就将整条牛肉挑走了。嫌牛蹄碍事，就将四只牛蹄剁下，扔掉。

小华也挤在人群中看牛，见这么好的牛肉，才一角五一斤，馋得直吞口水。但兜里一分钱也没有，只好眼睁睁看着公社的人将牛肉挑走。不一会儿，人散尽了，狼藉的地面上，只留有四只毛乎乎的牛蹄。小华走过去，恨恨地踢了牛蹄一脚。走出几步，心里突然一动，就转身回来，

仔细打量牛蹄。暗想：猪蹄能吃，这儿的人怎么会不吃牛蹄呢？它应该是能吃的呵。用手摸了摸，除了皮尽是骨，这才恍然明白这些人不要牛蹄的原因。心想我把它捡回去，看热不熬得出油水。就拎起牛蹄，回屋后就扔

进灶膛，加起柴火猛烧。等把皮全烧焦糊了，才泡在水里。吃过晚饭。才将泡软的糊皮刨净，然后放进锅里，加柴此起来。临睡时，又在灶膛里加

了一个大树疙瘩。第二天起来，揭开锅盖一看，牛蹄汤竟冻结了！忙铲了一块来尝，入口即化，异常鲜美。忙点火将汤烧化，原来牛蹄已炖得骨肉分离了。就将光光的骨头拣出扔掉。心想：牛蹄胶质比猪蹄还重。五月天居然冻结了。喝了一大碗浓浆，倒进锅里，用锅铲不停地搅动，看着牛蹄汤逐渐变黑变浓稠了，才熄了火。

晚上回来，果然凝结成凉粉了。就切成条，加些辣椒花椒面，软糯中透出浓郁的牛肉味，觉得比正宗的川北凉粉还好吃。

《怪菜，知青菜》的导语说：

“知青，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有的产物。成百上千万的所谓知识青年，将自己的青春，祭奠给贫脊的黄土地、苍凉的北大荒和闭塞的乡村荒野。这对于还没从红色狂热中清醒过来的青年，是何等的残酷。强烈的反差，给他们风华正茂的年华带来的失意、彷徨和打击，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

“然而他们毕竟年轻。年轻的生命在贫穷之地为一日三餐奔波忙碌时，也会闪进出几丝光点。尽管这些光点有的来自智慧，有的却是由荒唐而始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大都是为生活所迫而为之的。这些为生活所迫创造出来的菜肴，虽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却闪烁着知青们苦难的智慧，记录着知青们在

那艰难岁月里的踪迹。”

当 90 年代中国人的饮食风尚出现某种“返朴归真”之势时，翻阅“知青菜”式的智慧结晶却难以令人平静。让我们想象着那些萧瑟的秋天，那些唱着《三套马车》走下山岗的的劳动者。饱经了挣扎的艰辛的人们，他们的哀愁消逝在岁月的背后，只有一首慰藉心灵的老歌在时空时隐时现——

睡吧，睡吧，我的小宝贝。

夜色苍茫黑沉沉，

静静地睡觉吧。

白头山上有一颗明亮的星，

星光灿烂守护着你，我的小宝贝。

匮乏年代的花朵在寒冷的环境里生长着，但总有一天，会长大、结果并将生出丛林。

作家费声写道：“70 年代是思想混乱的早年时代，像马尔库塞所说‘各种社会控制已深深潜入人的内心’，不管个人或社会主导思想是否有力地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一种显而易见的潮流已自然将人们向前推走——不管它的前方是什么。”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的时代，显而易见的潮流是什么呢？在那样一种历史环境下，人民对温饱的要求无疑是首当其冲的。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判断：当两年后全国爆发了人民群众的自发抗议活动时，有一个流传最广的口号是：“林彪上台，千万个人头落地；邓小平上台，千万个猪头落地。”《东方红》中的“为人民谋幸福”，在许多年后，仍然是中国社会革命的重大课题，这也是有关 70 年代集体记忆中最真实、最难忘的部分。这种不平静的记忆，终有一天显现出来，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

正如我们知道的，在 1976 年，终于爆发了人民干预历史的事件，这也是匮乏时期延续太长的必然结果。

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道：“多少人在夜里无奈地叹息……”70 年代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征程的最后的黑夜，偶尔有一些虚幻的或短暂的美丽影子划过这夜色，被人们纪念和珍藏。美丽的幻影照着人们，70 年代涌动着物质和精神的渴望，这是中国非凡变化的前夜，一个多世纪以来沉郁的辛酸的代价，终将有所获得。

#### 年度记事

##### 三项指示为纲

四届人大后，周恩来身患重病，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了全面整顿。本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毛主席最近 3 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 3 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邓小平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作为与左倾错误和“四人帮”斗争的武器，作为全面整顿的理论依据。邓小平的提法，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批判。毛泽东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 割不断的琴弦

4 月 4 日上午 10 时 12 分，张志新惨遭杀害。4 日早晨，办案人员再

次问张志新，还有什么话要说，张志新仍坚持要求看判决书，再次遭到无理拒绝。张志新说，不看，没法回答。接着，就把张志新押解到4大队2楼一间办公室割她的气管。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惊叫一声，昏厥过去。但是，张志新站了起来，仍然昂首挺胸，只见她张了张嘴，但是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张志新，女，天津市人，1930年生，1950年参加革命。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沈阳市委、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她从1968年起，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斥责林彪、江青一伙的暴行，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活动；勇敢地为刘少奇等被诬陷的老干部辩护；指出党的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对党和国家的前途表示忧虑。她受到残酷迫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

在狱中，她在精神上、肉体上惨遭摧残，但始终坚贞不屈，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

#### 蒋介石病逝

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市郊草山（蒋介石改名阳明山）官邸内病逝，时年88岁。1972年3月起，蒋介石因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健康状况从此恶化。3月29日，蒋介石在草山别墅官邸口授了遗嘱。4月5日下午，泌尿系统失灵，心脏功能欠佳，下午8时15时，病情恶化，3小时后病逝。蒋介石死后2小时，“新闻局”发布公报，称蒋介石死亡为“崩殂”，并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台湾岛内民众披麻戴孝、哭声震天。《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的题目是《蒋介石死了》。

####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

1973年12月，毛泽东就评过《水浒》，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

后来接受了招安。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本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论《水浒》。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摒晃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晃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从8月底起，报刊上连续发表评《水浒》文章，形成新的政治运动。

江青等人则利用评《水浒》，把批判矛头直指周恩来及邓小平。

####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新华社2月4日报道，中国目前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刘家峡水电站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境内，地处西北高原黄河上游。这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防凌、养殖等综合利用效益的大型枢纽工程，从设计、施工直到设备制造和安装，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水电站大坝高度147米，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

#### 河南驻马店发生特大洪水

8月，河南驻马店发生特大洪水，这场洪水是由8月上旬在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地区出现的特大暴雨引发的。



8月8日，受3号台风的影响，河南驻马店地区出现罕见的特大暴雨。暴雨强度之大，居我国大陆有记录以来的首位，6小时雨量已达到世界最高记录。油房山水库4日至8日总降雨量为1411.1毫米，上蔡县总降雨量为847.3毫米。

由于连日降雨，5日傍晚洪河、汝河水位开始猛涨，7日夜里出现本次暴雨中最大的洪峰。8月8日凌晨分板桥水库垮坝失事——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库垮坝事故。

最大出库瞬间流量达7.88万秒立米。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平均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6小时内向下游倾泻河水到7.01亿立方。到遂平县附近水面展宽至10公里，平均水深4至5米左右。火车站铁轨以上水深3米，部分洪水沿汝河南侧及汝河进入宿鸭湖水库，另一部分进入上蔡县境，8日傍晚，冲破洪河左右堤。

12日，中央慰问团乘飞机在空中视察了已经成为一片汪洋的灾区。纪登奎决定炸开班台闸，使洪水迅速下泄。

14日凌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北京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他在征求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的意见后，指示由武汉军区和南京军区的舟桥部队日夜兼程赶赴现场，执行爆破任务，并全力保护宿鸭湖水库的安全。

本次特大洪水造成严重灾难，总计河道决口842处，长184.55公里，漫决堤段长796.54公里，损毁河堤长1118公里；倒塌房屋3175034间，伤亡人口102626人，死伤牲畜337165头，受灾农田1010.6万亩，冲毁铁路100余公里，中断交通一个月，直接经济损失100亿元。

#### 近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据新华社报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有将近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在我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现在，全国有4万多带队干部在农村和知识青年一起战斗，他们以负责到底的精神，认真加强对青年的培养教育。许多地区还加强对知识青年业余学习的领导，为他们出版读物，创办业余大学、劳动大学、业余学校开展函授教育。有的把插队知识青年相对集中，举办“青年点”，加强领导，使他们受到亦农、亦工、亦学、亦军的全面培养和锻炼。

报道还说，据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14个省；市、自治区统计，有7万多知识青年在农村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0万人加入了共青团，25万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有些优秀的知识青年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喉补委员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 《农村版图书》陆续出版发行

新华社报道：专为农村知识青年、基层干部、贫下中农编选的《农村版图书》，第一批25种在全国农村发行以来，受到了热烈欢迎。现在，第二批20多种图书又陆续出版发行。

报道说，为配合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的需要，第二批《农村版图书》选编10多种有关批林批孔读物。其中，有我国农民反孔斗争史话，儒法斗争史概括，法家人物简介，法家人物故事新编，对宣扬孔孟之道的坏书《三字经》、《弟子规》的批注等。

在农业学大寨方面，编印了《沿着大寨道路前进》、《大寨红旗》等。

这一批出版的农村版图书，还有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的

斗争生活，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军民对敌斗争等的文艺读物。浩然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奇志篇）也收在第二批《农村版图书》中发行。

另外，还编印了介绍写作知识、天文知识、农药知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等的读物。

### 狠批“臭豆腐”论

本年《北京日报》发表文章《从所谓“臭豆腐”谈起》。文章说，物质刺激这个东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本来被革命群众批得很臭了，就连狂热鼓吹物质刺激的林彪一伙，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其臭，因而不能再赤裸裸地叫卖、推销。

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死心，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还是要变着法儿地贩卖这一套修正主义的黑货。他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林彪一伙正是利用引诱这一套拉人下水，扶植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成为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文章最后说，由于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和传统的私有观念，这种关于“臭豆腐”的谬论还会有一些市场。

### 宽大释放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家司法机关最近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12月15日到18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对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发给高级人民法院的宽大释放裁定书和省、市、自治区的释放证，宣布给予公民权，并由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予以适当安置。在宽大释放这些人员的同时，各地公安机关还对服刑期满后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发给转业证明书，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宣布给予公民权，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进行适当安置。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并提供方便。

## 1976年：龙

高山在痛哭，大海泪滔滔。

惊天动地的噩耗啊，传遍全球！

——纪录片《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解说词

要全景式地描述不同寻常的1976年是困难的，本年有太多值得人们去纪念的事情，并且已经载入人类史册。本年度对于中国人来说，自然史记忆与社会史记忆同样刻骨铭心。这一年，美国海盗号宇宙飞船对火星的探测进一步暗示了火星生命的存在，而在中国，却发生了生命的重大改组，这是人民追溯既往又呼唤着开辟未来的非凡年代，这是现代中国史反复无常性格的集中汇演。这是充满着痛苦和激动人心事件的民族更生的脱蛹时期。

1996年，在纪念唐山大地震2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晚会上播放了一段当年的纪录片：解放军战士从废墟下救出一名青年工人，从录音中

可以听到那名青工激动的话语：“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纪录片播放时，那名当年的青年工人就坐在会场内，人们看到他已经泪流满面，尽管时隔20年，但是，当这种20年前的时空片断重现的时候，相信大多数人——凡是对历史有着感性认识的人都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到本年度，中国人的“准文革时期”历史记忆的整体形态已经完成，将迎接一个身心舒放的重要时代。而这种更生却是以巨星殒落、城市夷平为惨痛象征的。

悲哀与感奋交织的1976年，给中国人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人们这种不平静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77年春节前后。1977年春节，各地放映的电影多是《东方红》和《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年底，郭兰英、王昆重返舞台，在首都的一个体育馆里，郭兰英的一曲《绣金匾》成为整个晚会的高潮，当唱到“三唱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时，歌唱家有意地放慢半拍，情绪激昂几乎是声泪俱下，全场顿时一片唏嘘之声，这是十年文革中罕见的真情发挥，1976年的激情澎湃，显示着一种民意的巨大力量，这一切，为中国人民冲破禁区，迎接新意义上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当10年文革的阴霾逐渐散去，光明中国的曙光初现的时候，人们在烟花的硝烟中等待着什么。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他们将迎来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但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说不清楚，这种普遍的渴望和期盼，很类似于本书开篇时讲到胜利后的人们的憧憬。中国人做过许多年的梦，也默默承受过许多次的失败，但这一次的兴奋似乎格外不同，他们感到，这一次太平盛世真的要来了。

#### 年度记事

#####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毛泽东通过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信件的批示，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两次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邓小平事实上被免职。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在代表中央的讲话中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说可以点名批评邓小平。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历来不讲阶级斗争”，搞“翻案不得人心”等意见。在此前后，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邓小平“炮制”的“三株大毒草”，已经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全国，这次运动违反事实，违背真理，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不同形式的抵制。

##### 全国哀悼周恩来逝世

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10日、11日举行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活动，12日至14日举行吊唁仪式，15日举行追悼大会，全国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11日下午，在灵车送往八宝山的十里长街上，百万群众自动伫立两旁，冒着严寒哭送灵车。12日至14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了花圈。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领导人送了花圈。与此同时，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出现了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上百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献上花圈或白花。15日，首都各界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悼词对周恩来一生的崇高品质和杰出贡献作了充分肯定，指出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他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遵照周恩来生前遗言，他的骨灰被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新华社香港分社 14 日在中国银行大厦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及华侨 2 万多人以及香港总督、澳门总督的代表前往吊唁。自周恩来逝世后到 1 月底，各国政府及领导人收到各国政府及领导人，各马列主义政党、团体的领导人发来的唁电唁函 226 份。美国总统福特、前总统尼克松等还就周恩来逝世发表声明表示哀悼。周恩来追悼会之后，人民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仍在继续。

“《文汇报》3-5、3-25 事件”激怒了人民

3 月 5 日，《文汇报》在刊载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时，全部删掉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3 月 25 日，《文汇报》在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公然把周恩来打成“走资派”。文中写道：“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两篇文章激起了人民的极大反感。数日之内，各地向《文汇报》发去的抗议信、电达 400 多件，抗议电话 1000 多次。人们纷纷指出：“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责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严正要求“《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3 月下旬，南京市许多学生和市民进行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游行、集会，街道上和来往的车辆上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大幅标语，人民群众高呼“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等口号。3 月底至 4 月初，北京以天安门为中心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在此前后，杭州、郑州、西安、太原、遵义、昆明、重庆、青岛、天津、长沙等许多城市都出现了这种悼念活动。这是全国性的规模浩大的抗议运动。

天安门事件

从 3 月下旬开始，北京市民不顾当时的重重禁令，自发地集合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各种方式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支持邓小平。4 月 4 日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达 200 万以上。广场放满了精制的花圈，灯柱上吊满了条幅、花篮、花圈，人们从早到晚举行宣誓、默哀、讲演、朗诵、抄诗等活动。参加活动的有党、政、军机关工厂、学校、商店、人民公社，还有外地来京的干部、群众，具有广泛的群众性。4 日晚，华国锋召集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以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的案件。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立即清除广场上的花圈标语，封锁纪念碑，调动卫戍部队在中山公园待命。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书面报告了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批准。5 日晨，出动民兵和公安人员洗劫了广场上的所有花圈和悼念诗文，并抓走看守花圈的 57 名群众。人们看到被洗劫后的广场惨景，愤怒地喊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群众自动派代表进入广场东南角小楼同民兵指挥部谈判，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悼念总理活动等要求，但遭到拒绝，群情激奋。下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要求群众立即离开广场。同时，根据

中央政治局指示，出动 1 万多民兵、5 个营的卫戍部队、3000 名公安人员，手持木棍，包围广场，将来不及躲避而被围困的 200 多人全部逮捕。6 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关于事件的汇报，认为群众的行为已构成反革命暴乱，应该镇压。7 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1 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8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两个决议，发表了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抗议运动虽然遭到了镇压，但它为日后粉粹“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 唐山大地震

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相当于 400 枚广岛原子弹当量的强烈地震在唐山发生。

北至哈尔滨市，南至安徽蚌埠，西至内蒙磴口，东至渤海湾，都出现强烈震感。

这次大地震，震中在人口密集的工业区震级为 7.8 级，震中烈度为 11 度，累计死亡 24.2 万多人，重伤 16.4 万多人，其中唐山市死亡 14.8 万人，伤 30 多万人。唐山市夷为一片废墟，损失重大，直接经济损失 100 亿元以上。震前已发现若干异常现象，并向部分地区打招呼，其中唐山附近的青龙县在震前有所防备，因此在这次地震中损失较小。

唐山地震以其造成的惨重损失和惨绝人寰的影响，被载入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灾难史册，并被列为本世纪中国和世界最大的灾难。

### 《磐石湾》等新影片上映

2 月 28 日，新华社报道：从 31 日起，又一批新影片将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

春节期间上映的这批新影片，有革命样板戏影片、故事片、美术片、纪录片、科教片等 20 多部。

上映的彩色影片《磐石湾》，是根据上海京剧团演出的同名革命现代京剧拍摄的。影片塑造了海岛民兵连长陆长海的英雄形象，歌颂了军民同心保卫海防的革命精神。上映的故事影片中，有彩色故事片《沸腾的群山》、《难忘的战斗》、《沙漠的春天》和故事片《阿勇》。

## 1977 年：科学的春天

青春呵青春，  
美丽的时光，  
比那朝霞更加灿烂……

——歌曲《青春呵青春》

自“四人帮”灰飞烟灭，中国社会渐渐打开自由的窗口，陈景润的故事像考古工作者从地底下挖出来的一个美丽传奇，瞬间让神州 9 亿人完整

地分享了他的成就和欢乐。一些平常人并不了解的问题成为新的流行词语： $1+1=2$ ， $1+1=1$ ，哥德巴赫猜想，素数合数，陈氏定理。尽管我们几乎一点都不懂得这些术语的意义，但丝毫不影响人们欣喜地对陈景润的羡慕和尊敬。人们感到了久违的纯粹的骄傲，在人们眼里，他就像一个朝圣者般的纯洁而超凡，我们从心底悄悄地涌出对这个人的崇拜之情。一场真正来自灵魂深处的革命就要开始了。

与陈景润一起成为人民新偶像的还有杨乐和张广厚，这两位数学家虽没有陈景润那样炫目的成就，但这几位科学家的生存状态，同样地近乎荒谬可笑。这不近人情的荒谬，却让我们感到科学家精神的魅力。类似的描写几乎成为一种新的公式：他们走路总是在看书或者思考问题，往往走到与树或电杆相撞时，头也不抬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他们总是躲在小阁楼上，用蚊帐遮住灯光，在昏暗的灯下演算科学难题，在造反派停了他们的电以后，使用蜡烛照明，几天几夜不下楼，喝冷水啃硬馒头，他们成年累月地推算，稿纸满屋都是，甚至把成山的稿纸用作御寒的床垫，当人们解放这些科学家时，稿纸已装了好几大麻袋。他们的冥思夜以继日，煮鸡蛋时误将手表投入沸水。当领导主动提出改善这些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时，他们诚惶诚恐地抬起厚厚的镜片，苍白瘦削的脸上因贫血而有些红晕，如遇菩萨地直捣脑袋：“谢谢了，谢谢了。”

心不在焉的教授形象在 70 年代末，几乎成了所有有科学成就人的共同形象，时过境迁，这个形象令人想起辛酸的岁月。而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终于走出了黑暗的屋子，他们显得很狼狈，但非常可亲，他们揭开了中国千年来也许都未享受过的科学的快乐的序幕。

对于中国青年来说，1977 的最大快乐莫过于高考制度的恢复，这是对一代人具有拯救意义的历史选择。被白卷英雄张铁生妖氛笼罩的中国教育界，无情地抛弃那些鄙视知识，破坏文明，践踏正义的荒谬哲学。那些曾在艰难岁月份偷食禁果一样学知识文化，或者在庸碌生活中并未放弃理想抱负的知识青年们，迎来了 1977 年 9 月 25 日这个求知者的节日。这一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对广大学生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这一举措恰如古代盛世的科举取士一样，给十年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以迎接光明前途的天赐良机。

恢复高考的欣喜对于一代人来说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很多人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显得激动万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命运突变，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幸福，更是中国的幸运。

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 20 岁左右，不超过 25 周岁，未婚。……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钻研有成绩、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 30 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 1966、1967 两届高中毕业生）。

招生要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报名时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 2 至 3 个报考志愿，文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史地。理科的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

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将注意招收表现好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农业科技积极分子；将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籍青年，港澳青年和归国华侨青年。毕业后要国家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77 年的高考很特别，是在冬天举行的。官方公布参加考试的人数是 570 万青年，而民间统计（应包括初试）为 1200 万人，这个数字与老三届、新三届的总人数大致相仿，全国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录取了 27.3 万人，但大学在当年实际准备录取的人数不止 27.3 万人。很多新兴专业的报考人数没有招生计划多，文革给青年一代留下的知识空白，使许多人眼看机遇从面前划过。从招生人数和报名人数看，录取比例是 1 / 20 到 1 / 40，尽管对大部分人来说希望很小，很多人还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支人数浩大的求学大军，他们从车间，从田间，回到自成一统的小书屋，拿起书本，又走出小屋，向老师请教，向同学请教，甚至向正在读书的初中小弟妹们请教。

新机遇的喜悦使他们信心百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这全新内容的人生竞争，更大价值是生命的快乐。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走进大学校门，甚至连正式考试的考场也未能进得去，但这个机遇给了人们一个公平公正的竞技机会。无论红五类还是黑五类，社会生存的游戏规则从此转向公允平等。文明古国的后裔开始皈依真正文明之路，从这时开始，我们国家把“文明”作为自己的国家特色来加以创造。我们终于选择了科学和民主。

1977 年恢复高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纪元。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生活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大棍之下，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臭老九”之称，同七娼八盗九儒十丐的古代分类法惊人地吻合）。虽然伟大领袖曾幽默地引用过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老九不能走”，意在为知识分子，为知识留下生存空间，但听惯了诗化语言的人都知道——言者无心，听者枉自有意而已。主流思潮依然是张春桥所宣扬的“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真正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学精神，是在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后。全国人民崇尚知识的热情，在这次高考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高考也许不是唯一的人才选择途径，在中国文明经过了独特的历难之后，高考择优取才的办法，至少尽可能多地把社会蕴藏的潜在人才招集到了大学正规教育范畴，经过 50 年代的反右，60 年代的横扫和 70 年代的荒废，中国的科学人才已出现了较大的真空，在这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教育的率先起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较为雄厚的人才基础，后来的实际也证明，七七级和七八级的大学生的绝大部分在 80 年代起的改革开放中，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也由于人才真空的存在，这一代人很快表现出他们作为“人才”的优越，但由于他们命运的先抑后扬，形成了他们较为保守，超稳定的工作风格，甚至因为幸运的成就，他们的苦难追忆也变成了自恋的水仙，这又是那一代人才自身的局限。国家的幸运在于：1977 年恢复的高考招生制度，不但坚持下来，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变得更完善，更科学。20 年来，人们谈起高考恢复时，充满了感恩般的敬意。

这种对科学对知识的敬意在从 1977 年开始的春天里，影响着全民族的价值观，科学家成为真正的明星，科学家的成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中国人不灭的科学精神的胜利。人们深情爱慕着科学家并为这种爱而感到快乐。

陈景润的事迹公布后，100多位正值芳龄的姑娘纷纷写信给他，还随信寄去玉照，表示关心他的生活，支持他的事业，愿做他摘取科学王冠征途的终身伴侣。

当时陈景润已有一位女友，科学家的工作太忙，没有精力很好地给这些情真意切的求爱者回信如何处理这些向往科学、热爱科学家的姑娘的求爱信，颇让陈景润费心思。

有一天，陈景润拿着一大摞姑娘们给他的信和照片，要全部烧掉，女友见状忙说：“给我，我帮你去烧。”

“不行，这些信谁也不能看，我要自己去烧。”陈景润严肃地说。

女友嗔怪说：“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

陈景润解释说：“这些姑娘还要恋爱，结婚的，不能让人知道他们给我写过信。

我要给她们保守机密。”

1980年8月25日，陈景润和女友领了结婚证后，在回家的路上顺便买了几件旧家具和一对旧沙发，还买了十几斤糖果，在14平方米的旧屋中简单布置了一个新房，便草草地结婚了。

陈景润规定，晚上的婚礼在新房举行，不举行仪式，不收任何婚礼。连华罗庚亲自送来的一只红色保温杯，也遭到他的拒绝，后来华罗庚为此发了脾气，他才勉强收下。这是一次唯一的破例。

有人问陈景润：“你们结婚为什么这么节省？”

陈景润非常认真地说：“若不是为了接待外宾，连那一对旧沙发我也不会买的。”

人们对科学家的挚爱和科学家对生活的淡泊超脱，足以证明科学的快乐代替了当时人们生活的许多欲求。陈景润的纯真善良和除科学以外的清心寡欲，让人想起叶芝的诗境。

这是1977年最美的佳话。

#### 年度记事

##### 邓小平复出 “四人帮”被清除出党

7月16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1）关于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2）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3）关于决定把王、张、江、姚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4）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邓小平在全会上指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 伍分硬币含白金白银的说法纯属造谣

本年，社会上流传1955年铸造的伍分硬币含白金和白银成分，致使有些人在市场上大量兑换伍分硬币，然后转手高价出售。如北京新街口地区有两个外地人，一次就兑换硬币2700多枚，从中挑选1955年的伍分硬币。这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

本年3月，记者走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及有关部门。市人民



银行负责人说：近来本市确实连续发现有人大量兑换伍分硬币的情况。这种非法活动，是从外地传来北京市的。所谓 1955 年的伍分硬币中含有白金和白银的传说，纯属造谣惑众。我国发行的所有硬分币，不论什么年号的，都是铝镁合金制成的，根本不含白金和白银成分。

#### 局面会好起来

日本《朝日新闻》社社长广冈知男（他不久前作了自 1970 年以来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说：“中国人比较健谈了，说话的时候也不显得畏缩或顾虑重重了。”

一位最近曾到陕西探亲的美籍华人（女）说，亲戚们告诉她，紧张气氛已经大大缓和了，她说，她的一位叔父说：“我们的日常生活犹如驱散了乌云。”

从外国人士那里听到的一个共同的想法是：自从新领导上台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坦率和多样化的时期。

这表现在许多小的方面：北京的交响乐团专场演奏了曾遭禁止的贝多芬作品；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破天荒发表了对美国畅销书《根》的评论；一位地震学家无拘束地谈到去年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破坏；不断有作曲家、演员和新戏剧同大家见面。

去过大陆的人举了一些表面现象来说明变化，如，中国人中间有了一种新的轻松感，对外国客人比较友好了，衣服有了一些色彩，单调的全国性服装也比较讲究一些式样了。

新领导把侧重点放在劳动纪律、消费品生产、加强科学研究以及使文教和日常生活丰富起来等方面。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主任罗伯特·奥克斯南在 5 月中旬访问中国之后说：“可以肯定，人们普遍认为局面将会好起来。”

#### “文革”后的邮票热

4 月 15 日上午 8 时许，400 多名集邮爱好者聚集在广州邮票分公司门前，他们自觉排好队，等候开门营业。这天，该公司出售的是盖销纪念、特种邮票专册、小型张连套票、单枚纪念特种邮票四方连等 9 种集邮品。开门营业后的两个小时内，1000 多套（册）邮票便一售而空，价格 200 多元的盖销纪念、特种邮票专册，竟也有近百人购买。这些购买邮票的集邮爱好者，多数是工人、干部，也有工程师、老师、学生等。据邮票分公司统计，15 日一天的营业额达 15000 多元。

近一年来，广州市集邮爱好者越来越多，购买邮票的数量越来越大。广州邮票分公司复业一年，共销售特种邮票、纪念邮票 28 种，37 万多套，此外还销售了大量的首日封、纪念品及邮摺、邮册等集邮用品，总营业额达 120 多万元，为十年动乱前 1965 年的 1 倍。

#### “四人帮”取缔的“都一处”烧麦恢复营业

位于北京前门大街路东 36 号，都一处烧麦馆开业于 1738 年（清乾隆三年），迄今已有 240 多年的历史。据传说，乾隆皇帝有一次到通州私访归来，正值旧历除夕的晚上，只有这家烧麦馆灯火通明，尚在营业。乾隆皇帝走进去了叫了一份烧麦吃。

美味的烧麦使他大为惊异：小小的饭馆竟然做出了这样的美味！于是兴致大发，亲笔为之书写了“都一处”牌匾。“御笔”一题，身价十倍。“都一处”从此誉满京华，顾客盈门。解放后，郭沫若同志曾亲临“都一处”牌

匾。

“都一处”的三鲜烧麦独具风味：它用海参、猪肉、虾（或鸡蛋）做馅，精白面粉烫面做皮；皮是用特制的木轴擀成的，圆周像莲花折，包上馅，捏成石榴开头，上屉急火蒸熟，外形美观，馅大皮薄，味道鲜美。

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都一处”这个名称被当作“封建主义”加以取缔，迫使饭馆改名。现在，这家古老的饭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首都饮食服务行业。

#### 对阿尔巴尼亚的反华不予置理

7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联部、外交部《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发表反华文章和我处理意见的通报的请示》。1976年11月阿党领导人就将中阿分歧公开化，今年7月7日又在其党报上发表长文歪曲和攻击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从而使其对中国的攻击出现新的升级。《请示》提出，从国际斗争的全局出发，仍对阿的反华文章不予置理，不同它公开论战。在国家关系上则坚持原则，不作有损于中阿关系的事，对阿援助继续执行已签订的协议。

#### 提高部分职工工资

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国务院决定从今年10月1日起提高部分职工的工资。这次工资调整的重点是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职工。

增加哪些人的工资，要根据其政治表现、劳动态度、贡献大小和技术高低，由群众进行评议，经党委批准。此次调整工资的范围是：（一）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1966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都提高工资；（二）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其他职工（不包括17级及其以上的干部），40%的人提高工资；（三）1971年底以前和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现为六、七类工资区，标准工资分别低于38元和43元的，可分别增加到这个水平，但每人每月增加的工资最多不得超过5元，高等院校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的定级工资，统一规定为43元。通过这次调整，60%的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收入。

## 1978年：现代夸父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腩，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

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再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进入1978年，“政治生活”已不再成为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万花筒般的世界时，我们发现，30多年的奋斗并不是我们赶超了英美而是英美把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们与同一天空下的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当1997年，人们再次赞颂邓小平的功勋时，会无限地感慨：中国在

政治旋风过后，多亏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老百姓及时地把眼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

1978年，全国人民都有了一种“现代化”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强大的反差面前，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些躁动不安。

我们在50年代末曾经有过类似的躁动，那就是著名的大跃进。但70年代末的“现代化”躁动已与往昔有本质的不同。50年代提出15年甚至在5年内赶超英美，与其说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不如说是为着证明“东风压倒西风”的必然性。

结果是，不管我们号称粮食亩产达多少千吨，不管我们的钢铁元帅的大旗举得多高，我们依然失败。与50年代相比，1978年对现代化的渴望，是出于我们对提高生存质量的渴望，在我们眼中，发达国家的繁荣景象，不正是我们多年来幻想的幸福吗？面对繁荣与幸福的美好蓝图，我们如何不心潮澎湃呢？

1978年急于进入现代化快车道的“国民经济十年规划”提出，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10大油气田。这个计划在20年后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成。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12月22日，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新日本钢铁公司，签订了关于向日方订购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宝钢是在上海北郊的海滩和海水上平地而起的钢铁基地，既无基础生活设施，又无现存矿山可以依附，通过长达十多年的时间，硬是用美元造出了一座“宝钢”。这个与日本合作的超大型项目，是1978年国民经济“洋跃进”的典型代表。宝钢的生成与其说是“人定胜天”的证明，不如说是违反经济规律所不得不咽下的一枚苦果，尽管宝钢终于在沉重而缓慢的运转后，成为中国工业的骄傲。但当年的质疑，无疑是人们面对“现代化”新课题提出的反思，即使是到现在为止，宝钢的所有矿石要靠从澳大利亚进口，否则，宝钢只能是一只饥饿的骆驼。

1978年走马上任的乔厂长（蒋子龙著名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主人公）也有类似的激动。1978年，乔光朴厂长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不可不谓眼光深远、胆略超群。他说：“乔光朴，现年五十六岁，身体基本健康，血压有一点高，但无妨大局，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

到干校去养鸡喂鸭。”就是这么一个敢拍胸口的“企业英雄”、面对现代化一日千里的快马，他无不焦急地说：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当时提出在2000年实现现代化——编者注），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不是能按时开饭的。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这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

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腩，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

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再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乔光朴的这种焦灼也许代表当年最广泛的情绪，这种情绪对于唤醒无所作为的状态，是可贵的。然而同时发生的新一轮的急躁冒进的“洋跃进”，除了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国力的重负外，留给后来的教训也是同样深刻的。

“洋跃进”所引进的一部分设备，由于我们的技术力量不适应设备要求，使许多设备在风雨之中或流水线上沉睡达 10 多年。武汉钢铁公司的一套设备沉睡达 16 年，造成了事实上的浪费。

1978 年的另一种焦灼是经济规律对我们的习惯性的价值观进行挑战，它促使我们的观念悄然改变。

某厂意欲邀日本某公司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日方在参观该厂的基本生产力和配套设施后，同意合作，但只需要该厂 1/3 的工人就能维持生产。该厂工人一致反对：我们是社会主义工厂，要保证每一个人吃饭……几十年前我们把鬼子赶出了村，难道几十年后还能让鬼子进工厂？

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日本人和日本货对我们的观念冲击至今使我们记忆犹新。《中日友好合作条约》签定以后，日本人的许多生产观念和营销观念，无不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人，以致于我们在后来看见满街的日货。在 80 年代中期，民间曾经以民粹方式提出“拒绝日货”。这些情状都属国人的正常反应。

蒋子龙的另一篇小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更加清晰地表现了这种激动人心的变化。

九月份，上级发下来一个文件，工厂可以从利润里按比例提取奖金。

我们厂原是搞综合利用起家的。大部分原材料是捡别人的厂甩出来的废物，

花钱不多，一本万利。发奖给钱的事，厂子越小，工人越少，就越好办，

九月底一结算，每个工人可以拿到五十元奖金。就连科室的干部，也可以

分到四十多元。大部分工人等于一个月拿双份的工资。

刘书记一听这个数字吃了一惊……表示反对：“不行，发这么多奖金，这可了不得。”……金厂长接着说：“我们是东方化工厂的领导，我们用

不着替国家操心，我们要操心的是东方化工厂的群众，得罪了他们，我们

要倒霉了。文件向群众传达了，如果奖金不照数给，我们就失了信，国家

也失了信。我们挨骂还不说，群众的心气一散，生产就会掉下来。所以，

我主张五十元的奖金一个不剩全发下去。公司里要问，我们有词儿：按上

级文件办事，兄弟厂要反映，咬扯我们，我们更有理：这是多劳多得，我

们厂搞得好，给国家赚钱多，奖金自然就发得多，大伙说怎样？”

金厂长的形象传达出一个信息，在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关系上，现代化要求有新的调整，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主力成分，在现代化之路上必须得到

相应的尊重，胡耀邦说得更坦诚：“一要建设，二要吃饭。”改革之初，“奖金”的概念几乎成为新名词，“奖金”一度成为人民追逐的热点，奖金加工资，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现代化之路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性的结合，也正是现代化的灵魂所在，中国人才有了获得个人尊严的感觉，在新中国的五、六、七十年代，人们对个人价值总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进入现代化旅程后，个人价值得到了承认，对个人能力的尊重和对个性抒发的宽容，无不是现代化对传统观念的冲击的结果。也许，在1978年，我们面对现代化的激动中，未曾想到它会带来80年代、90年代的解放和相对繁荣，但现代化之门一经打开，虽然出现如“洋跃进”，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各种失误和挫折，现代化毕竟会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人”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中心，中国人得到从未经历过的丰富与满足，现代化思潮也再次证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明确的道理。

### 年度记事

#### 大转折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三中全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二，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全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决定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反对突出和宣传个人，要加强集体领导的作用。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党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 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

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近6000人。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话。大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邓小平说，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大力发挥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明确肯定我国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时指出今天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此而做出贡献，就是红与专的统一。对于学术上不同见解，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

#### 全国掀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文章抨击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冲破了对拨乱反正设置的各种障碍和禁区，论述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赞成文章的观点，但华国锋却指示中宣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加入。”理论界的某些权威人士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他们不让《红旗》杂志发表支持性的文章，并授意一些省市和

中央部门对讨论不予表态，甚至对表示赞成讨论的同志进行责难。由于党中央多数同志积极领导和支持，这场讨论冲破了华国锋等的压制，迅速发展为一个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 小泽征尔在中国访问演出

我国首都音乐工作者和广大音乐爱好者，怀着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欣赏了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演出的交响音乐会。

在小泽先生指挥演出的曲目中，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的《D 大调第二交响曲》，是一部深度难度较大的作品。由于小泽先生以高超的指挥技巧，引导和启发演奏员深入地表达音乐作品的内在美和力求交响性的融会贯通，自始至终抓住勃拉姆斯宽广宏大的交响乐风格，使这部古曲交响作品演奏得既忠实于原作的古典风格，又富有现代人的激情；既春意盎然，富于歌唱性，而又结构严谨。在小泽先生指挥下，乐团演出日本作曲家小山清茂的管弦乐曲《伐木歌》，音乐气势磅礴，具有浓厚的日本民间歌舞的韵律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在音乐会上，小泽先生还以极大的热忱指挥乐团演奏了中国作曲家的作品——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和弦乐曲《二泉映月》。

#### 话剧《杨开慧》公演

文革期间，人民群众对江青的一个强大抗议信号就是——“我们怀念杨开慧！”本年公演的《杨开慧》描写的是 1920 年到 1930 年期间，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的革命活动。报载：全剧再现了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清水塘播撒革命火种，在湖南农村从事农民运动，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力挽狂澜，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一话剧是中央戏剧学院教师演出团演出的。

#### 话剧《于无声处》公演

话剧《于无声处》是宗福先编剧，苏乐慈导演，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演出的。它首先在上海上演，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文艺界的强烈反响。随后许多剧团都纷纷演出这个话剧。

话剧《于无声处》第一次把 1976 年天安门广场几百万人民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的伟大革命行动，作为正义行为在舞台上歌颂，并成功地塑造了欧阳平这个不畏强暴、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英雄典型，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赏。

#### 中国停止对越南援助

7 月 3 日，中国政府照会越南政府，通知它：中国被迫停止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调回尚在越工作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从 1950 年到 1978 年，中国人民和政府在越南人民抗美斗争、进行民族解放事业和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给予其真诚的援助。这些援助的总值超过 200 亿美元，在中国对各国的援助中占第一位，对越南人民抗法、抗美战争的胜利、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了积极作用。对此越南领导人多次给予很高评价。然而，70 年代末、中越关系出现严重摩擦，越南发生驱赶华侨事件，中越边界气氛紧张。因此，中国政府作出上述决定。

#### 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援助

7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通知它：中国被迫停

止对阿援助并接回中国专家。1954 以来，中国政府应阿尔巴尼亚政府的请求，向阿方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先后向阿方派出了近 6000 名专家，为阿方培养了大批的经济和军事技术骨干。对此，阿尔巴尼亚主要领导人霍查等多次表示赞扬和感谢。从 1976 年 11 月阿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阿领导人公开攻击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即使这样，中国政府还是以中阿人民的友谊为重，继续向阿提供援助：1977 年至 1978 年 7 月以前向阿方发送经济和军事援助物资近 30 万吨；帮助阿方建成和基本建成 10 个项目等。然而，由于阿领导在政治上加剧反华，背弃双方签订的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协议，诬蔑和陷害中国专家，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两国经济和军事合作，使中国的援助工作无法进行下去。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作出上述决定。我国援阿专家和技术人员奉命于 7 月 21 日全部回北京，在我国学习的阿学生和实习生，分别于 7 月 13 日和 7 月 20 日回国。

### “伤痕”文学引起强烈的反响

《文艺报》编辑部于 9 月初在首都连续召开座谈会，对《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伤痕》、《最宝贵的》、《“不称心”的姐夫》等 10 多篇短篇小说进行热烈讨论。参加座谈会的有作家、评论家，报刊、电台编辑、记者、大学教师共 40 余人。

从 1977 年 11 月《班主任》发表以来，相继出现不少反映人民群众同“四人帮”斗争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使人悲愤，感人泪下，发人深省，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这些作品从实际出发，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尖锐地提出了千百万人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强烈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这些作品的出现，是文学创作的新气象、新突破，是好事，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

###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 月 14 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批准，15 日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 1979 年：苍天在上

折磨人的时代总要过去，但生存下来的人真会幸福吗？

——埃及故事片《咖啡馆》

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有生命力，在民族思想和意识上，要靠她自己的自新意识，要靠她勇敢地对自己的错误历史进行批判和否定。

中国在本世纪后期给自己一个机会，那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这个“否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它是一代伟人的最后“业绩”，一代人曾为此付出青春热情，这是纠正历史的错误记忆的艰巨工作，势必带来某种情感上的震荡。

1978 年底和 1979 年的岁月，对于中国百姓，可以说是解放的欢笑和感

奋的眼泪交织的口子，虽然我们身边悄悄地或者轰轰烈烈地发生着许多大事，比如：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初案批准设立，借鸡下蛋，借船出海开始成为流行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进行还击，胜利完成了一场令世界震动的自卫反击战。这一切，让国人感到喜悦。然而本年度人们最大的喜悦，是继“四五”运动的平反之后一系列拨乱反正之举。

去年年底中央终于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1976年3月30日到4月5日，北京群众自发地围绕周恩来亲笔题写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表达对总理的哀思。这一次悼念活动，再也不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死了，开个追悼会，表达我们的哀思”那样内涵简单又纯粹，人们开始以悼死者，骂未亡的情绪来表达支持邓小平的愿望，这是中国进步的一次悲壮事件。天安门事件的本质，悼念周总理是人们的感情和手段，声讨“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才是目的，有诗为证——

清明时节人纷纷，  
纪念碑前欲断魂，  
借问怒从何处起，  
红墙那边出妖精。

最为著名的一首诗更直接地表达这次活动的政治批判性——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在“四五”运动前后，对周恩来的怀念和对江青集团的声讨，事实上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福州、太原、贵阳、西安、郑州、杭州、长沙、呼和浩特等许多地方都燃起了自发性的怒火，杭州工人李君旭还独出心裁地编写周总理遗言：“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伪托“总理遗言”的行为，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的意志。

“四五”事件在规模上形成全国人民自发性政治运动的一个顶峰。4月4日，聚集到天安门的群众达200万人，花圈达2000多个，4月5日凌晨开始清场，销毁所有花圈标语诗文，逮捕看护花圈的群众57人；4月5日上午，群众又集中到天安门广场，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烧毁一民兵指挥部的小车。晚上出动万名民兵，3千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再一次清场，抓获200多名群众。清场中，镇压者大打出手。整个群众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1978年11月24日，中央为“四五”事件平反，宣布“四五”事件是革命行动，并为相关人士平反。

消息传开，北京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以贴大标语，发放地下流传的《天安门诗抄》来庆贺胜利。

“四五”运动能够在3年之内平反，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由于“四五”运动的参加者，是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学生、机关干部，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所以人民心目中的记忆性质决定了这次平反是大势所趋，这也再次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一规



律的不可逆转性。相比于“四五”运动从发生到平反的时间历程，许多人的漫长冤狱和终生沉冤则远远不如它幸运，虽然慈祥的阳光终于洒落在死者冰冷的骨灰盒上。

我们的彭德怀元帅就是这种命运的代表，有意思的是，为了避免太大的情感震荡，彭德怀恢复名誉的信息最初是通过（保卫延安）的再版传达出来的。1965年，彭德怀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毛就和他谈道：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批评过头了，错了，等几年再谈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

就是这个“等几年”，使彭总等到了“到三线以后，还在变木加厉地进行不正当活动”、“是修正主义的一面旗帜”的罪名，1966年，彭德怀被押送到北京，失去自由，受到所谓学生领袖韩爱晶，王大宾等造反派的挟持、逼供、批斗、毒打，到1974年，蒙受冤案15年以后，在11月29日去世。当年保留《彭德怀自述》的彭的侄女在乎反后发表的文章中，这样一段文字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伯伯异常清醒。护士告诉他没有人来看望，他便侧过头去，把全部眼泪流到枕头上，留在人间。突然，伯伯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挣扎，张着嘴‘啊，啊’想叫喊。他不愿就这样离开人间，他要最后看一眼祖国的蓝天、白云。然而，专案组的人根本不理这临终前的最后要求。伯伯挣扎不起来，心枯力竭……。这是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心脏，停止了跳动。”

“下午4点左右，专案组才电话通知我，要我到医院料理伯伯的后事。他们仅给我20分钟。我独自站在伯伯的遗体前，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为祖国浴血奋战几十年的老元勋，替人民鼓与呼的忠心耿耿的大将军，却在这暗无天日的年月里，如此悲惨和凄凉地离开人间……。伯伯子然一身地去了，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座丰碑！”

以彭德怀平反为序幕，一大批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的错案、假案、冤案都得到平反。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得到平反；

1978年12月，针对朱德、陈毅、叶剑英、聂荣臻、陈云、徐向前等人的所谓1967年“二月逆流”公开平反；

1978年12月24日陶铸得到平反；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震撼人心。

1979年6月，贺龙平反；

1979年8月，张闻天平反；

1980年2月，刘少奇平反；

1980年9月，胡风平反，5年后他在精神错乱后患癌症去世。

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小说《伤痕》，曾经感动了许多从文革“死里逃生”出来的人，小说描写的生活经历和难以承受的亲情裂变，是许多人的亲身体验。王晓华这个“革命小将”，为了誓死捍卫那个神圣般的政治理想，毅然地与“叛徒”母亲划清了界限，偷偷地提前毕业，去辽宁农村接受再教育。母亲看到的是她的一张冰冷的纸条：“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母亲给她寄去的衣物和信件看也不看就退回去。尽管她的“革命”态度坚决不贰，但家庭关系仍然影响了她的入团，甚至不得不与恋人分手，当她某一天知道母亲的叛徒罪名是政治的

阴谋所致时，悔恨万分的王晓华回到家中只看到了母亲的遗像。

……

《伤痕》所揭示的并不是蒙受政治与亲情矛盾折磨最深最长的一群人的经历，像王晓华一样，生活在亲情分裂、社会歧视和打压、人身倍受侮辱的环境中一群人，如右派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他们从 50 年代起就被社会所排斥，到 60 年代，更是雪上加霜，成了人们唾弃的狗崽子。这一社会阶层在“劣等种族”式的恐惧不安中屈辱地过完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这段时间长达 20 至 30 年，也许是人生三分之一的黄金时代，甚至全部。至少有 3000 万人长期作为“社会渣滓”受到严格的限制，加上文革形成的更多的受压抑的更多的干部及百姓和他们的子女，这一阶层的人数总量达 5000 万人。5000 万人的数字太巨大了，说它是一种社会分裂，是不过分的。

1979 年 1 月 11 日，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1979 年 11 月 12 日，中央批转了统战部等 6 部门《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问题的请示报告》，促使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此外，中央还决定，对在 1959 年以来的反右倾运动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平反。本年公安部部长赵苍壁在回答记者问时说：

“地、富、反、坏、右几类人摘帽以后，应当按照他们从事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他们为农民、工人、教员、知识分子。他们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而不应当对他们有任何歧视或者变相歧视。不要再叫他们‘摘帽地主、摘帽富农、摘帽反革命、摘帽坏分子、摘帽右派’，更不能把他们继续列为‘专政对象’。”后来的历史证明，1979 年的社会大解放也解放了生产力，在经济改革中，最先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人才，最早的一批成功者，是这一大批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这与他们在逆境中磨练自己意志冲破思想牢笼的努力相关，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 80 年代经济繁荣的坚实力量。全中国人获得了在同一个天下同一个起跑线起步的机会，这无疑是民族的幸事，正如诗人所言：是一场风暴，一盏灯 / 把我们连系一起 / 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 / 使我们再分东西 / 不怕天涯海角 / 它在朝朝夕夕 / 你在我的航程上 / 我在你的视线里。

#### 年度记事

##### 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1 月 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双方尽快实行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作观摩。

##### 凤阳 18 位农民敲响农村改革鼓点

1 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 18 个农民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邻村得知后，也模仿着干起来。6 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凤阳县小岗队 18 个农民的壮举，率先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鼓点。

#####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2 月 17 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我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被迫对越南发起自卫还击战。经过 28 天的作战，连续攻克了谅

山、同登等 20 多个越南城镇和战略要地，摧毁了越南针对我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给越南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先后共击毙 37300 多名越军，俘敌 2200 多名。

#### 恢复老字号“全聚德”

公元 1835 年，一位叫杨全仁的从蓟县到北京经商。开始，他在街上摆摊出售鸡鸭，1866 年（清同治三年）杨全仁利用从皇宫传出的烤鸭技术开设了一家“全聚德”。

清朝末年，京郊农村羽吉白的水鸭经过改良品种和用玉泉山水精心饲养，渐渐培育成体大、肉嫩、皮薄的新品种——北京鸭。那时，烤鸭技术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从原来的焖炉烤鸭，发展到挂炉烤鸭，烤技愈精，风味更醇。当时，最负盛名的挂炉烤鸭店，就是 1866 年杨家父子开设的“全聚德”烤鸭店。

解放后，前门外的“全聚德”烤鸭店，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为北京烤鸭店，扩大了门面，改进了经营。另外，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又开设一家烤鸭店。

解放后，北京烤鸭店在和平门外，又盖起一座新楼。新楼的建筑面积为 1.5 万平方米，共有大小餐厅 41 个，可供 2000 多人同时就餐。本年，和平门北京烤鸭店及前门、王府井分店，均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全聚德烤鸭店。

#### 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引起争论

《假如我是真的》，是沙叶新等根据 1979 年夏在上海发生的一起小骗子冒充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的案件创作的话剧。该剧运用讽刺的手法，批判了特权思想。

10 月，该剧在上海内部上演，不久，此剧又在安徽、山西、河南、南京、上饶、泉州等地内部或公开演出，之后又在北京内部演出。演出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受到了文艺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有的欣赏，有的反对，有的主张修改，由此而产生的较长时间的争论，到全国第四次文化会召开前后，争论达到高潮。争论主要集中在戏的主题和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处理、情节结构和形象创造等艺术处理以及对骗子该不该同情等问题上。

#### 大贪污犯王守信被判死刑

10 月，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守信贪污集团案进行了公开审判。贪污集团主犯王守信（女）乘“文化大革命”混乱之际，打击干部和群众，依靠投机钻营、“造反”上台，当上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王上台后，利用职权，大量贪污侵吞国家财产。自 1971 年 10 月至 1978 年 6 月，贪污和侵吞物资折价共达 550770.02 元。其贪污罪行败露后，与另一被告马占清等人多次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物、毁灭罪证、负隅顽抗。破案时缴获赃款 413325.43 元，缴获赃物折价 70014.38 元。贪污集团中一主要成员马占清系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营业主任。自 1971 年以来，马占清利用职权监守自盗，贪污现款 16554.25 元，并私自从“小金库”为王守信提出余款 2.9 万余元。根据王守信等人上述罪行，松花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 3 条规定精神，判处贪污集团主犯王守信死刑、贪污犯马占清有期徒刑 15 年。

#### 杭州恶少“二熊”被判死刑

孪生兄弟熊紫平、熊北平出生于高级干部家庭，湖北省红安县人，分

别为杭州重型机械厂和杭州制氧机厂工人。自 1974 年 5 月至 1978 年 8 月，两人纠集犯罪分子马少华、钱永敏等人，结伙强奸、轮奸、奸污、猥亵妇女达百余人。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杭州市公安局先后逮捕了这伙犯罪分子。主犯熊紫平，品质极为恶劣，早在 1971 年在部队服役期间，就犯有强奸女青年的罪行。1973 年退伍后，与罪犯钱永敏等勾结，肆无忌惮地进行犯罪活动，他采取欺骗、持刀恐吓、卡脖子等恶劣手段，强奸女青年 7 名，轮奸 2 名，奸污、猥亵、侮辱 20 余名。还曾将一名女社员毒打致伤，并敲诈手表一只。另一主犯熊北平从 1974 年以来，纠集罪犯马少华、王斌等人，结拜兄弟，自封老大，采取利诱、持刀威胁及种种恫吓手段，先后强奸女青年、女学生 6 名，轮奸 4 名，奸污、猥亵、侮辱女青年 20 余名，还私设公堂，向别人敲诈勒索现金手表等。两熊罪大恶极，民愤极大，被依法判处死刑，其中熊北平认罪态度好，缓期 2 年执行（后熊北平在狱中自杀）。其他各犯，依法判处 3 至 15 年徒刑。

1979 年 11 月 14 日，杭州市 6000 多群众参加公判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法庭的严正判决。

### “渤海 2 号”沉船事故

11 月 25 日，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 2 号”钻井船在渤海湾内翻沉，船上职工 72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 3735 万元。造成这次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最重大的责任事故的原因，是由于石油工业部领导人严重违章，强行下达任务和瞎指挥。

海洋石油勘探局领导人在接受石油部命令“渤海 2 号”紧急迁移井位的任务后，不认真考虑“渤 2”钻井船队长的合理建议，对事故前一天天津、河北、山东等地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警报未加重视，严重违反科学违章指挥，采取了违反拖船安全的错误做法，冒险降船、拖航，导致钻井船翻沉。事故发生后，“海滨 282 号”拖轮船长没有及时发出遇难国际呼救信号，也未及时测报“282 号”拖轮和“渤海 2 号”船的准确位置，抢救落水人员不力。面对这一严重沉船事故，石油部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原因与如实向上级报告情况，也未采取有力措施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对此，有关人员受到法律和政纪处分。

## 1980 年：第一春

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  
爱情已将它久久遗忘……  
——歌曲《角落》

8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带着摆脱禁锢的喜悦，沐浴着新时代的光辉。

这个光辉除了政治上逐步的正本清源，人民生存环境得以逐步改善以外，国人的精神之路能够地从十年文革中解脱出来，迎接新世纪人性的光辉，这种光辉和温暖的感觉，文学艺术和电影起了强大的作用：人们热爱文学作品，通过文学作品，感受作品的内容，沟通人物的心灵，开放自己的情思。

80年代前后，一大批关于“人”的思考的文艺作品的问世，几乎掀起了反思文学的惊涛巨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视角的作品如《伤痕》、《班主任》、《第二次握手》、《于无声处》、《人到中年》等引起人们心灵的强烈震撼。《人民文学》、《收获》、《钟山》、《十月》等一流刊物，其发行量一般可达300万册，有的甚至达到500万册，而某些风行一时的刊物在90年代，其发行量少到必须保密的地步。这种80年代的繁花似锦与其说是人们对文学的偏爱，不如说是人们自我和谐的需要，就像雷抒雁的《琴》诗所言：“我向你诉说着积久的痛苦/我向你诉说着突然的欢欣/啊/在这个多风多雨的人间/只有你，是我的知音”

从“高、大、全”的艺术魔棒下走出来，文学开始关注最广大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1980年2期），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1980年北京文学7期）反映了中国人临近从沉重苦难到些许活泛的微妙变化。

王老大三个字本身就给人沉重的感觉，在传统的中国家族观念中，“老大”总是忠孝仁义礼智示范的代表，新中国的王老大似乎也很难走出背负沉重的老路。王老大花钱买来被人虐待的孩子后，未过门的媳妇和他解除了婚约；然后他又接来生活无着落的濒临绝境的带着3个孩子的寡妇。生活的重压使他不顾冒犯“一律不得进出砍柴卖钱”的禁令而进山砍柴，不幸摔死在山里。死并不是他人生的解脱，死后，王老大仍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进行批斗。王老大给我们一个启示，天性的淳朴并不能得到生活的格外施恩；同样，勤俭也并非安身立命之本。在一个极其不完善的历史环境下，老百姓是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的。王老大让人想起大跃进，想起文革，在那些“沸腾岁月”里人们无法慰藉的灵魂。最广大的善良的百姓，谁又不是像王老大一样，在越来越大的窒息中恍恍惚惚地活着呢？陈奂生与王老大相比，当属“新人”。80年代的陈奂生已过了温饱大关，也敢炸点油绳去卖了，买顶帽子戴一戴，比起以前来可真是阔多了。不想在车站偶感风寒，昏睡中被老熟人吴书记用车送到了招待所住下，陈奂生醒来一看发票大惊：“困一夜竟要5元钱，贵死人，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一夜把两顶帽子钱都困掉了。”陈奂生一下不知怎样平衡自己了，回到屋里，再也不怕把东西弄脏，把沙发椅坐坏了，“管它，不关我事，我出了五元钱呢。即使房间弄成猪圈也不值。”在极不情愿之下，陈奂生离开招待所，用油绳的本钱买了顶帽子，飘然而去。一路上想起吴书记是个好人，可想不到我陈奂生经不起他的关心，想到一趟丢了5元钱，回去如何向老婆交帐？忽又心中一亮，想到这一回进城，竟有此番动人的经历，这5块钱花得值，试问：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5元钱的高级房间？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有谁还瞧不起他？哈哈，陈奂生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被他放在眼里了。陈奂生对利益计较的先后变化，暗示了在经济解放后的人们的新需求，那就是一种人格尊严和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这两篇小说获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标志着“关切民生”的艺术主张开始雄居文坛的主流。

戴厚英的《人啊，人》198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一度引起激烈争论，其写作风格也没有按着塑造典型人物的要求去走，因此，评论界并未对《人啊，人》予以充分重视。有人这么评价1980年长篇小说“尽管出现了几部较好的作品。但大部分仍旧平平，引不起读者的兴趣，”

可悲的是，戴厚英 1996 年被打劫者杀害在她的家里，而对人生的不可测，我们只有哀叹：“唉，人啊，人！”

刘心武的《班主任》曾经让人们重归心灵的宁静和人性的美好境界；《如意》写的某所中学的工友石义海，外形极丑，内心却非常美好，他深爱着一个被称为“封建余孽”的女人——贵族格格金绮纹，而且多年来一直保存着她赠的信物——如意。在十年浩劫中，每当夜深人静时，他就偷偷地扛着扫帚到竹叶胡同替她清扫罚她清扫的地段。这样的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革命的惩罚，对于石义海来说，是爱的品尝方式。

表现爱情的艺术尝试曾经也掀起过轩然大波，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上，发表了一张英国电影的剧照，照片是一对青年男女接吻的镜头，画报一出来，立即引起了卫道士们的反对，有读者甚至用文革语言要求《大众电影》向读者“认罪”。另一幅表现烈士张志新的油画，显然套用了法国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的创意，张志新在风暴中是裸体的身影，这又让一些人神经过敏，斥问难道革命烈士竟是这样地没有廉耻，竟是这样的男盗女娼吗？画者意图何在？以丑化无产阶级革命烈士来污蔑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操，是何等险恶的居心？由此可见人们对艺术思维的无知，《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似乎就是对这种恐惧的申辩。当豹子在谷仓里第一次看见存妮优美的身体曲线后，他几乎未能控制自己的性冲动，存妮的耳光也不能令他清醒，两个被情爱狂澜掀动的青年很快转成秘密的恋爱，结果封建意识的村人和干部抓了他们月下谈恋爱的“奸”，存妮背着“不要脸”的臭名自杀，豹子以“强奸致死”罪被关进大牢，存妮的妹妹——荒寻从此心境荒凉，见了男青年总是畏而远之。这部小说很快被拍成同名的电影，并且诞生了一首著名的歌曲：“谁知道角落这个地方，爱情已将它久久遗忘……”，80 年代开始了从此正视人性，讴歌爱情的时期，一时间电影、小说，无不以革命加爱情为时髦文艺，命名上时兴用“……恋”。以致于后来人们见“恋即腻”。1980 年的艺术成就还有小说《人到中年》，对这部小说，很多人对马列主义老太太印象很深，而对知识分子的超负荷运转充满同情，这部小说十多年来仍然感动着人们，对于我们民族来说，这样的形象虽然充满了悲剧色彩，但值得珍爱。

在当年的缪斯的日历上，记载着中国的艺术内容还有：张贤亮的小说，抒写战士心理的《西线轶事》与一度视为封建糟粕的《活佛的故事》获 1980 年优秀小说奖；电影《天云山传奇》引起轰动，既表现男女恋情，又表现对祖国情深似海的《庐山恋》的女主角张瑜，获最佳女主角奖，80 年代的第一春，人们亲历了艺术带来的春天般的喜悦，有了对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生存状态和这一切的流动变异的新鲜感觉，我们敞开了久闭的心扉，迎接 80 年代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到来。

年度记事

为刘少奇平反

2 月 23 日至 29 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等 11 人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这一次全会主要解决组织路线；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改革；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五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着重研究体制改变；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五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实际上完成了集体接班，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和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一批年富力强、立志改革的同志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对推进中国改革起了重要作用。

全会以后，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着手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 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失踪

1980年5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带领一支综合考察队进入新疆罗布泊考察。罗布泊地区既有丰富的文物遗产，又有丰富的矿藏资源，但因气候多变、环境恶劣，交通十分困难，以致人迹罕至。彭加木率领考察队自北而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比原计划提前20多天成功地纵贯罗布泊湖底，为今后进一步考察打下了基础。原定任务完成后，彭加木建议充分利用原计划的考察时间，继续东进考察。考察后期，考察队剩下的汽油和水都只能维持2天了，他们扎营后，一面通过电台向当地驻军救援，一面依靠自己力量去找水。6月17日上午，彭加木留下“我向东去找水”的纸条，独自一人走向沙漠深处，就此再未回到营地。彭加木失踪后，考察队和有关部门先后派人多次寻找，并出动飞机侦察行迹，均无结果，后经细致分析，判断彭加木已被狂暴的戈壁流沙吞噬了生命。

#### 我国正式设立经济特区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1979年4月，邓小平已经提出试办特区的问题，7月15日，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特区的财政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5年不变”的办法。此外，两省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都实行新的经济体制灵活措施，1980年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定：特区鼓励客商及其公司投资设厂或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它工业，并在税收、金融、土地和劳动工资等方面予以适当的优惠条件。这4个特区的总面积为526.26平方公里，实行不同于内地的管理体制和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为主，多种经济并存的综合体制。1980年至1985年，4个特区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深圳的蛇口等9个工业区。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技术、知识、管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 讽刺画风行全国

讽刺画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被禁闭了10年。“四人帮”一垮台，讽刺画就像中国俗语所说“雨后春笋”一样，特别兴旺起来了。除了报纸刊物经常发表外，北京和有些省市，一共出版了9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讽刺画小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没有的现象。

讽刺画是直接反映人民的愿望和情绪的。中国历来的反动派都不喜欢

讽刺画，包括“四人帮”在内，他们害怕揭开他们的遮羞布，露出见不得人的东西。旧中国蒋介石的报纸查禁讽刺画，“四人帮”10年不让发表讽刺画，其原因在此。

### 重大人事变动

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1月10日至12月5日在北京举行，前后连续召开9次会议。

除刘伯承、聂荣臻因病未参加会议和陈永贵、赛福鼎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书记7人列席了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早在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不少人提出了华国锋不宜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问题。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这次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会上，华国锋提出了辞去现任职务的请求，并要求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一些检查和解释。会议认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是有功劳的，但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继续延续下去。他在中共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他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倡议，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等的态度，也明显地违背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他热衷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损失，他有重要责任。鉴于上述情况，会议决定：（1）向将要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2）建议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3）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和邓小平分别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工作，不用正式名义。会议指出，在六中全会作出有关决定之前，华国锋仍是中央主席，仍要以此身份接待外宾。

## 1981年：移居北方的日子

归去来兮，  
老友将芜，  
往事不堪回首，  
转眼就白头。

——侯德健《归去来兮》

80年代是中国航空史上充满了政治色彩的年代，两岸的航空器逃亡事件迭起，成为两岸关系中的焦点事件。

29岁的黄植诚不知道大陆这边的故乡是个什么模样，他读过余光中的《乡恋》，但他的母亲和哥嫂，叔婶都生活在台湾，所以，他不能理解“乡愁”是一枚邮票，“乡愁”是一座小坟的意义，他能理解的是：乡愁是一弯浅水，“我在这边，大陆在那边。”

黄植诚祖籍是广东横县，1952年出生在台湾，高中毕业后按例进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受训4年，在学校生活中，他每每看到关于《战时勘乱



条例》中光复大陆的文字，往往感到可悲又可笑，对于台湾以弹丸之地志要吞并下去的大陆，黄植诚充满无限的向往。

在 8 年飞行生涯中，他多次想作吃螃蟹的人，他的潜心专一令他技术娴熟，成绩优异，并多次获奖。他的特殊地位让他可以收听大陆对台广播，他对两岸广播浓厚的火药味不感兴趣，但很喜欢“海峡之声”中那位声音柔和的徐曼小姐。那块长官表示一定要光复的天空会是什么样的颜色呢？随着岁月和青春的增长，越来越使他对大陆向往不已。他看见大陆的传单，看外国报刊上关于中国大陆的资料，善于思辨的黄植诚对台湾的一味恶意渲染产生了逆反心理。80 年代以来，他拥护大陆关于和平统一的主张，不满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阻挠统一的言行，决心以实际的动作为统一作贡献。

1981 年 8 月 8 日上午 20 分，黄植诚从台湾桃园机场驾驶 F-5F 型飞机起飞，同机的还有台湾空军 5 大队中尉飞行员许秋麟，任务是对许进行仪表飞行的考核。起飞后不久，黄植诚问现在到了哪里，许秋麟惊恐地发现飞机到了大陆，黄植诚告诉许秋麟：“我就是要到大陆。”并问许愿不愿意回大陆，许说不愿意，于是，黄植诚将许秋麟送到东引岛上空叫许跳伞，黄植诚看到许秋麟的降落伞打开后，急速把飞机下降，沿海而飞行，飞进大陆上空，在福建前线某地机场安全降落，当机场站长为他解开伞绳时，他高兴地说：“我早就盼望回到大陆，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黄植诚回到大陆后，受到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欢迎和高度赞扬，福州部队和空军领导机关先后召开欢迎大会，表彰黄植诚的爱国、正义行动，奖励他人民币 65 万元。并批准他参加解放军，担任某航校校长。

9 月 30 日，叶剑英元帅向新华社发表了著名的“叶九点”：(1) 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2) 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协议；(3)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4) 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5) 台湾当局和各届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6) 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 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8) 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到祖国大陆投资，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9) 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事。

大陆的积极态度无疑等于将了台湾当局一军，台湾当局开始允许台湾人回大陆探亲，以至发展到投资立业，今日大陆的食品业巨头顶新集团——大名鼎鼎的康师傅集团，就是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成功典范。

1981 年 12 月，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作用在于协助台胞来大陆经商。

投资、建厂、办校、讲学、做研究活动。

1983 年，邓小平说：“和平统一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他表示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提法，他说：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在“叶九点”所谈到的有关问题上，邓小平进一步说明：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中央政府要给台

湾留名额。

1983年12月台湾《中国导报》发表《对国事提出几点建议》，“建议”认为：中国统一问题已到了非马上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大家都为国家统一而着急，不能一拖再拖了。作者建议对中共的称呼，不要再谩骂，“应当礼尚往来，不要再以不当的词句相称了。”文章着重建议：“时机成熟，早日统一。”“今天中国统一问题，全岛上下，都为国家统一着急，可以说中国统一这个问题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论走到社会各阶层，大家都在说：早该统一了，不能再拖了。拖不下去了。”

自黄植诚驾机起义后，一批台湾人士回归祖国的激情高涨，先后以各种方式回到大陆，最著名的当属李大维和侯德健。

李大维祖籍安徽阜阳，1950年生于金门，同年随父母去台湾，1968年考入陆军军官学校。后进入陆军航空中心接受飞行训练。光后飞行2600多小时，两次被选为“克难英雄”。他生活在台湾的上层社会，家庭幸福，谁也没有想到李大维会于1983年4月22日12时25分，驾机回到大陆。他说：“我忍受与家人分离之苦，不是为了奖金，不是为了高官厚禄，是为了祖国的统一、强大而来的。”

侯德健是以一曲《龙的传人》来到我们生活中的。《龙的传人》旋律的豪迈和词义的深远，使它有足够的资格进入本世纪的经典歌曲之库。每当我们唱起“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她的名字就叫黄河……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时，我们就有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与悲壮。这首歌和台湾另一首校园歌曲《橄榄树》，常常勾起两岸人伤感的恋家之情。侯德健1983年6月4日飞抵北京，1983年12月，他决定定居北京，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先后在大陆快速地写成了《你和我的明天》、《新鞋子旧鞋子》、《归去来兮》等歌曲，为人们传诵。

1995年春节，江泽民就台湾统一问题发表著名的“江八点”，“江八点”重申，反对台独，不承诺放弃武力解放台湾。1997年7月1日，中国和平地收回香港，李登辉随即放言“台湾不承认一国两制适合用于解决台湾问题。”

已过不惑之年的黄植诚和李大维终于懂得了乡愁为什么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更深切地懂得乡愁中那一弯浅水的意境，我们和他们一样，永远不希望延续海峡之间的这种悲情。

#### 年度记事

#### 历史的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判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

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特别法庭判决书。判决书确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切切实实的犯罪活动，前后达10年之久，殃及全国各个地区和领域，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判决书详细列举了江青等10名主犯的犯罪事实，确认江青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对她所组织、领导的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颠覆政府、残害人民的罪行，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张春桥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张春桥是向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夺权的肇始

者和煽动者、策划者，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特别法庭据江青等 10 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 2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陈伯达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黄永胜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吴法宪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李作鹏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邱会作有期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江腾蛟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 我国人民吃穿用住现状

我国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吃 1980 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 428 斤，比 1952 年增长 8.2%；食用植物油 4.6 斤，增长 9.8%；猪肉 22.3 斤，增长 88.6%。1980 年每人每天消费的食物中含有的热量比 1952 年增长 14.1%，蛋白质增长 9.6%。

穿 1980 年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零售额为 42 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虽均未达到 1957 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有提高。1980 年皮鞋零售量达 1.69 亿双，比 1957 年增长 8 倍。

用 1980 年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日用商品的零售额为 42.4 元。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零售额比重，由 1952 年的 0.5% 提高到 1980 年的 24.5%。

住 1980 年底每人居住面积为 3.9 平方米，比 1952 年的 4.5 平方米减少 0.6 平方米。

建国以来，国家共新建职工住宅 6.7 亿平方米。但是城镇缺房情况仍较严重，无房户、拥挤房和不方便户约占总户数的 1/3。据 1980 年统计，农村平均每人有房为 11.6 平方米。

#### 《苦恋》受批评

4 月 20 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文章指出，部队作家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打着反封建主义、反对现代迷信的旗帜，诋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文章说，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现代迷信就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关系的基本原理。文章认为，《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论《苦恋》的通信》，作了自我批评。

对《苦恋》的批判不搞运动，不进行围攻，是我们党解决思想问题比较成功的一次尝试。

#### 宋庆龄逝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于 5 月 29 日 20 时 18 分在北京逝世，终年 90 岁。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6 月 3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宋庆龄，广东省文昌县人。1915 年和孙中山结婚。1926 年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她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人

紧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上海“四·一二”和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她与毛泽东等 22 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行为。十年内战的头两年，她在苏联和法国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反帝活动，并在 1929 年被选为世界和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30 年代，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她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帮助。1949 年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 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9 年和 1965 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一贯关心妇女工作和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长期主持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是中国妇女界杰出领袖。1981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接收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 月 1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她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声誉。1950 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成员，1952 年被评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国际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交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她被国际上公认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 电影“金鸡奖”、“百花奖”评选揭晓

6 月 23 日，中国电影协会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大众电影》举办的第四届电影“百花奖”的评选结果，分别在杭州揭晓。

第一届电影“金鸡奖”评奖结果：

最佳故事片奖——《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并列）；

最佳新闻纪录片奖——《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

最佳科教片奖——《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

最佳美术片奖——动画片《三个和尚》；

最佳编剧奖——叶椅（《巴山夜雨》编剧）；

最佳导演奖——谢晋（《天云山传奇》导演）；

最佳女主角奖——张瑜（《庐山恋》中饰周筠、《巴山夜雨》中饰刘文英）；

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石灵、欧阳儒秋、茅为蕙、林彬、仲星火、卢青（《巴山夜雨》）；

最佳摄影奖——许琦（《天云山传奇》摄影）；

最佳美术奖——丁辰、陈绍勉（《天云山传奇》美术）；

最佳音乐奖——高田（《巴山夜雨》音乐）；

特别奖——儿童故事片《苗苗》、译制片女演员向隽殊。

第四届电影“百花奖”评选结果：

最佳故事片奖——《庐山恋》、《天云山传奇》、《七品芝麻官》；

最佳女演员奖——张瑜。

#### 国务院调整烟酒价格

12 月 18 日，国务院决定从即日起，降低涤棉布的价格，提高烟、酒的价格，并为此发出了通知。通知说，近年来，烤烟和酿酒原料多次提价，烟、酒生产成本提高，收购价提高致使工厂利润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同时，由于社会购买力增长，全国高中档烟、酒长期供不应求，为此适当提高烟酒销售价格，既利于促进生产，供应群众需要，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回笼货

币，克服财政经济困难。这次调价，据全国统算，甲级烟零售价平均每盒提价 0.27 元，乙级烟平均每盒提价 0.08 元，丙级烟平均每盒提价 0.02 元，丁级戊级烟不提价。全国名牌白酒每斤提价 2.00 元以上，散装粮食白酒每斤提价 0.10 元到 0.20 元，散装啤酒标准品每公斤提价 0.16 元左右，散装黄酒也适当提价，这些品种的瓶装酒都相应提价，薯干白酒不提价。国务院通知强调，这次调价是人民生店中的一件大事，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加强物价管理，以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

烟酒提价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不适应，当有关部门作摸底调查时，知识分子愤愤地问：到底是哪些人向中央提出涨价的？

## 1982 年：文明之旅

世界是蓝色的，因为我失去了你，  
生活是灰色的，我的心因你离去而悲伤。

——保尔·莫列亚《爱情是蓝色的》

这一年，有一位中国厂长，为引进意大利、法国的生产化肥成套设备，赴洋考察谈判。所到之处，人见其为东方人模样，便问道：“君从日本来？”厂长答：“NO！”“从新加坡来？”“NO！”“必从台湾来也！”“哈哈……NO！”长毛洋人大惊：“文质彬彬，精神抖擞，难道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吗？”中国厂长点头，但未免涌起了心中不快，细问洋人不肯直认的原因，洋人坦诚相告：这些年西方“红色中国”串门走动少了，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人第一是贫穷，第二是文明素质不高，因此，对不起了！哈哈……

就像一切封建习俗不可能随着社会主义的来临自然而然地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消失一样，人们也不大可能在文革的混乱野蛮气息过后一下子变成谦谦君子。尽管 80 年代初的宣传工作者一再提醒人们：不要忘了我们可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但长期动荡和匮乏的历史使中国人似乎久久地忘掉了这一曾有过的光荣，为生存状态所迫的人，是不会关心优雅和高尚的事物的。中国人晦气重重的生存斗争历史，使我们几乎忘掉了关注我们的生存质量，这个问题，在 80 年代初被再次提起，这是中国人文明进程的一次重大觉醒。因此我们把它列入 80 年代思想解放的范畴。

80 年代的海外人士回国后，也经常讲起海外中国社区的不文明之举，如：无序、脏乱、吵闹等等。

80 年代，作家刘亚洲愤怒地谴责中国出洋人员的自暴自弃，他看到美国跳蚤市场的华文广告，看到这个多民族社会里华人和西班牙语系族群的惨淡形象，愤慨和悲哀的心情不亚于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

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倡导运动开始了，1981 年 2 月 25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卫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 9 个单位，联合向社会发出通过“五讲”达到“四美”的倡议。倡议认为：讲究文明不仅是一个国家社会风气的现实反映，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标志。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就庄严宣告：“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旧中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一方

面是出于民族歧视，另一方面是对落后中国民间不文明行为的排斥。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运动的轮番推进，没有在民族素质提高上下过功夫，特别是在文革，是非颠倒，荣辱易位，文明、礼貌和道德修养被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修正主义的标签，“打、砸、抢”的强盗暴行却被戴上“英雄”的桂冠。这种自我堕落只能让中国人重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恶梦。

“五讲”即我们所熟悉的“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包括以下内容——

“心灵美”，就是要注重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养，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做到“爱国、正直、诚实”。不做有辱国格、人格的事，不损人利己，不弄虚作假。

“语言美”，就是要使用和推广礼貌语言，做到“和气、文雅、谦逊”，不讲粗话、脏语，不强词夺理，不恶语伤人。

“行为美”，就是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人，做到勤劳、友爱、守纪”，不损害集体利益，不破坏公物，不危害社会秩序。

“环境美”，就是要搞好个人、家庭和工作场地、公共场所的卫生，做到“卫生、整洁、绿化”，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破坏树木花草。

有关宣传材料指出：要达到文明的要求，首先要有一个已确定的认识，过去把说话粗鲁、对人粗暴、认识粗浅，当作劳动人民朴素憨直的秉性，这是一种误解。

一个人的憨厚、善良的心地，一般要表现为礼貌的言行举止，待人亲切，直率，说话和气、讲理，粗鲁、粗暴和劳动人民并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他们的秉性。还有人把讲文明礼貌，说成是“资产阶级虚伪作风”，这同样是不对的。1987年2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1982年的“五讲四美”抓好三件事，搞好环境卫生，解决一个“脏”字；整顿公共秩序，解决一个“乱”字；提高服务质量，解决一个“差”字，这就是著名的打击“脏、乱、差”活动。1982年5月28日，中央批转《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的通知，通知指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特征。”

在中国第一次把“五讲四美”活动提高到“精神文明”的范畴。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上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国家通过普及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明精神水平的提高工作正式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

1982年12月22日，中宣部要求深入开展“五讲四美”，继续治理“脏乱差”，突出“提倡节约，反对大办婚事，提倡男女平等，尊养老人，反对歧视虐待妇女、老人；提倡相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健康的文化娱乐，反对赌博。”

1986年，关于文明礼貌的用语具体到“您好、请、谢谢、对不起、再见”10个字。

在一方面进行精神建设的同时，中国也进行对精神垃圾的清扫。

1987年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玫瑰梦》成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一个焦点事件。

《玫瑰梦》因有大量淫秽描写而被罚款60万元，有关人员受到严肃处理。到1989年3月，正式出版社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30多种，除被没收这些书的非法所得外，罚款250万元，6家出版社停业整顿，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下流的期刊130多种。

尽管如此，许多城镇的沿街书摊面貌依旧，堂而皇之地摆着《色欲横流》、《淫窟惊魂》、《肉体交易》、《当代军妓》、《荒淫艳女》、《玩了一百个女人的四大色鬼》、《三个男人迷恋的淫妇》、《少男少女试婚录》等充满诲淫诲盗的标题，加之渲染女色奸淫的封面插图，有的书贩已从零售发展到非法专营色情书刊，且已形成地下网络。个别地方“黄书”在押运过程中竟有警察开路，气焰甚嚣。

而对“黄泛区”，有关部门一方面加大力度堵住源头，整顿出版印刷部门，另一方面对书刊市场进行大扫荡，像林则徐当年烧鸦片一样，将没收的黄色书刊统统烧掉。

1982年3月12日，国务院颁发《关于严禁进口、复制、销售、播放反动黄色下流录音录像制品的规定》，揭开反精神污染序幕。

中国人文明精神的建设，在广大民众的言行举止的细微环节上实现着文明的进化。而在80年代，在精神领域的纵深层次，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巨大震荡。

倡导现代文明的社会运动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一直持续着，在世纪末的高速度变异中，社会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人们心灵的变化和认同节奏，甚至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国家文明的建设可能是一两百年的长期投资。好在呼唤文明、渴望真善美，始终是人民大众的追求。

198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医科大学空军医学系学生张华，为抢救一名掏粪落入粪池的老农而光荣牺牲，年仅24岁。80年代，张华的这一牺牲引起了大学生的争论，有人认为从生命的价值去思考，作为一个具有高等教育素质大学生的张华，对社会和人类所作的贡献，比他的援救对象对社会做的贡献要大得多，张华毫不犹豫的牺牲既是对自己也是对社会的负责。这些论点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认为奋不顾身、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不能因人而异，在道义面前人人平等。1982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颁令，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称号。

与张华不同，张海迪则以“生”的价值感动着新时代的中国人。这个山东女子5岁时因病造成严重的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她克服病痛和种种困难，自学小学、中学课程，阅读了政治、文学、外语等方面书籍1000多册。自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翻译了16万英文作品和资料，还自学针灸，为万人治病。

1982年，共青团和山东省授予她“模范共青团员”称号。全国青年在80年代都对张海迪敬佩有加，张海迪自己也勤学不辍，积极从事创作和翻译工作。

另一个80年代的社会明星为解放军朱伯儒，一直在进行关于国人精神文明方面的工作，他喜欢接触群众，关怀民生，5年来，他收到群众向他

倾诉心中苦闷的信 3000 多封，亲笔回信上千封，达 200 万字，内容涉及理想、事业、人生、道德、青春、爱情等，使许多浪子回头，不少厌世者重振精神，其书信编成《朱伯儒书信集》、《心灵这样沟通》、《假如梦变成真的》。朱伯儒的行为被赞为“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的“炭火精神”。

80 年代兴起的精神文明，虽然并未使全体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刹那间进入“朗朗乾坤”境界，甚至，90 年代以来，在精神道德的某些领域出现了某种逆转和浊流。

但真、善、美的美好之光照亮了中国人的文明之旅，高尚的信念从此普及人心，直到今天。

## 年度记事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9 月 1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行。9 月 1 日上午大会开幕，到会正式代表 1545 名，候补代表 149 名，代表着全党共 39657212 名党员。

邓小平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6 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11 日上午大会选出中央委员 210 人，中顾委委员 172 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32 人。大会通过《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后，李先念致闭幕词，宣布大会胜利闭幕。12 日举行了十二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赵紫阳、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彭真等 25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万里、习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候补书记。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

### 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

2 月 20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现在各级领导班子老化的状况，达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妥善安排新老干部的交替，已成为当前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必要的。《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长、副省长以及同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 65 岁，副职一般不超过 60 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 60 岁。《决定》还强调指出，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需要保留少量超过离、退年龄界线的老革命家，这是全局的需要，是保持国内安定团结和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需要，是完全符合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退居二线，包括当顾问和荣誉职务，不属于离休、退休。对离退休老干部，一定要很好地安排照顾，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还要略为从优。《决定》最后说，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不论遇到什么干扰和阻力都决不半途而废。

### 我国人口超过 10 亿

以 7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时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次人



人口普查工作规模空前巨大，同时借鉴和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普查项目包括各地区的人口数量及其年龄、性别、民族等 19 项。普查结果分 3 批公布于世。这次人口普查动员了 600 多万名普查员、指导员、编码员、录入员和电子计算机工作人员。投入大中型电子计算机 30 台，处理数据信息多达 400 亿字符。现场抽样检查和科学验证表明，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调查质量和电子计算机处理数据的质量及周期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公报，全国人口总数为 1031882511 人（包括台湾、金门、马祖和港澳地区同胞人数）。其中男子 519433369 人，占 51.5%，女子 488741919 人，占 48.5%。按民族构成区分，29 个省、市、自治区共有汉族人口 936703824 人，占 93.3%，各省少数民族人口 67233254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6.7%。

人口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有 15 个，即壮、回、维吾尔、彝、苗、满、藏、蒙古、土家、布依、朝鲜、侗、瑶、白、哈尼族。3 次人口普查工作的胜利完成，为我国政府制订政策和计划提供了准确、详细的人口数据，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生活的妥善安排和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 家用电器热

4 年前，电冰箱、洗衣机对于许多中国城市家庭来说，还是稀罕之物。现在，我国仅有 3 年发展历史的洗衣机，年产量已经达到 200 多万台。电冰箱，今年夏天北京市场供不应求。

许多国家的家用电器是从城市开始兴起，我国也不例外。有代表性的北京居民现在企求的是彩色电视机，落地电风扇、立体声收录机和普通洗衣机。70% 的住户已拥有国产或进口的电视机。市场上，电视机、电风扇除名牌货以外，已出现滞销现象，说明保有量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由中国轻工学会家用电器工程学会和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家用电器》杂志，短短的两年发行量就由 7 万份上升到 25 万份，也可略见家用电器热潮之一斑。

前些年，中国家庭企求的 3 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现在已发展为新的 3 大件：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

#### 抗议日本文部省歪曲侵华史

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把日本侵略中国说成是对中国的“进入”，把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军队抵抗的结果。中日友协、中国教育学会、全国学联、全国青联负责人，8 月 23 日分别发表谈话，向日本文部省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它从有利于发展中日两国的友谊出发，尊重历史事实，在中小学教科书中恢复历史真面目。8 月 26 日，我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肖向前约见日本驻华公使，要求日方纠正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的错误。

#### 黄金饰品恢复销售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从 9 月下旬开始，在国内市场恢复出售黄金饰品。

建国以后曾在若干年内停止了对黄金饰品的供应，鉴于近年来黄金生产已有较大的发展，具备了在国内出售黄金饰品的物质基础，国务院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在国内恢复出售。开始销售时，由于生产和销售部门对黄金饰品的品种和款式的具体需求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因此只在北京、上海、天

津及各省首府共 31 个城市的工艺美术部门定点生产和销售，后来逐步扩大了销售地区。目前国内出售的黄金饰品的品种主要有戒指、项链、挂件、金丝眼镜架及某些镀金制品，24K 黄金饰品已成抢手货，且向中高档的饰品发展。

#### 我国运动员取得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

第九届亚运会于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4 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在本届运动会上，中国共获得金牌 61 块，首次跃居亚运会金牌总数第一名，日本获 57 块金牌，居亚运会第二名，韩国获 28 块金牌，名列第三。比赛中金牌争夺相当激烈，有两天，我国比日本只多 1 块金牌时，赛场内外气氛十分紧张。12 月 2 日，当我国金牌领先已成定局时，日本共同社发出号外“中国金牌第一次压倒日本”。

法新社也综述说：由于金牌数的领先，曾一度被称为体育上的“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确信成为亚洲第一体育强国，结束了 31 年日本称雄亚洲体坛的历史。我国参加亚运会只有 8 年的历史，能够金牌翻番，跃居首位，确是可喜的突破。

## 1983 年：“严打”风暴

“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是啊，暴风雨就要来了。”

——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钟家轮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空手套白狼”的绝招，竟有玩不转的时候。在他的“北环企业服务公司”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钟家轮和他的同伙采取欺骗和行贿手法，先后与国家机关、部队、地方企事业单位签订了 30 余份供货合同和协议书，骗得货款 295.2 万元。在这期间，钟提供给对方货物的总价值仅占 10.1%，绝大多数合同，他们根本没有履行，却长期占用对方资金以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投机诈骗活动，除因购货单位一再追讨而不得不退还的货款外，尚有 62 万元的货款，既无货可供，又无款可退。1981 年 9 月，太原某单位希望“北环”帮助推销积压产品，作为交换条件，钟家轮乘机提出要对方购买他们的进口电视。然后以低价诱骗对方签订了购买 500 台“三洋牌”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合同。之后，钟、多次谎称货已备妥，骗得对方预付了 400 台电视机的货款 15.4 万元，等到对方来提货又借故拖延，两月后，对方提出控告，钟又以一张空头支票骗取北京某进出口分公司的电视来抵债，当这个分公司发现支票空头时，电视机已被提走。

钟家轮涉及金额高达 100 万元的诈骗案，在 80 年代无疑是全国惊天的大案。他的案情综合集中了诈骗、行贿受贿、贪污、窃取国有财产等犯罪形式，在钟的罪案中，涉及了国家官员，金融管理等部门，是经济改革初期的代表性案例。针对犯罪的新类型，政府一开始就高度重视，1982 年 1 月 11 日发出通知：“一些部门的干部甚至一些负责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的犯罪行为。4 月 13 日，中央决定：“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

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1982年“严打”的战果是：全国立案16.4万件，结案8.6万件，依法判刑3万人，追缴赃款3.2亿元。

在打击经济犯罪时，其他领域的犯罪也尘嚣日上，1983年9月2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这一系列决定的核心是，对治安犯罪的打击要“从重、从严、从快”。让老百姓提心吊胆了半年之久的王宗坊、王宗玮“二王”案是这类案件的突出代表，这一年，通缉“二王”的文告布满中国城乡。

1983年2月12日大年三十，“二王”持枪到沈阳市军区医院小卖部盗窃3000元人民币，正要离开现场，早已警觉的工作人员周化民和吴永春拦住去路，他们问大个子王宗玮：“你在医院遛遛窜窜干什么？把工作证拿出来！”不一会，小个子王宗坊也被抓获，分别在两个房间进行盘问，当医院教导员刘福生把王宗坊领子上的假军领章撕下，搜出他们的1000元赃款和一把钳子等作案工具后，“王宗坊像只被抹了脖子的鸡，垂下头来，全身颤抖，一边叫唤，一边抽风，‘哎哟’一声，直楞楞地向前倒了下去。”像是对王宗坊的回应，“砰砰！”从另一房间传来几声震耳的枪声，住院处的人们猛地惊呆了，职工卢文成抢先闯出，一出门，正遇上王宗玮……枪声又响了，卢文成被击倒，当另一位职工孙维金正打电话向保卫科报告时，王宗玮对他射了两枪，怒不可遏的刘福生举着铁架要砸王宗玮，在他举过头顶之时，王再度开枪，刘福生中弹倒地。情急之下，大夫吴永春和刚入伍的毕继兵始终扭住王宗坊，并把他作为挡枪牌，如果就这样僵持下去，也许“二王”很难再有什么机会，刚入伍的毕继兵突然撤身要寻武器，被王宗玮抓住机会射中一枪，吴永春也由于主动出击露出破绽被打一枪。脱身后的王宗坊说：“这小子没死，妈的，他最坏……”“砰”又是一枪。

4死3伤，这是“二王”杀人系列的第一桩血案。

辽宁省将“二王”的有关材料上报公安部，当天，公安部就发出13号通缉令，向全国缉拿杀人潜逃犯“二王”。25日，在北京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上，在湖南境内，乘警查验王宗玮的持枪证时，王宗坊向乘警开了一枪，“二王”趁乱逃到衡阳境内的西里坪。

27日，“二王”被衡阳市民蒋光煦等堵在一条死胡同内，王宗玮向蒋光煦射一枪，逃脱。在抢另一位市民李瑞玲自行车时，打伤其女儿，打死扑向二犯的丈夫张业良，李瑞玲死死抓住二犯的提包不放，二犯开枪打伤李瑞玲，但未能从李瑞玲手中拿走挎包，包里有5颗手榴弹，36发子弹。接下来，工人刘重阳骑车追击罪犯达3华里远，终被击伤。当公安部门在衡阳完全布控后，二犯已爬车逃出衡阳。

二犯杀人用的枪，是早在1976年时，从沈阳市北监狱盗得，王宗玮又在某部队偷得子弹百发。二人协同作案，此前已有多起。

二犯由北向南的逃窜一时引起了全国性震动，气焰如此嚣张的案子，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们议论道不知什么时候，也许“二王”就会窜到自己身边。

3月3日，“二王”出现在武汉，“二王”在交通检查站，杀两人，伤一人，劫一枪。并在与民警民兵枪战后逃脱，随后在轴承厂打死市民詹小健，

抢走他的自行车，从刑警大队的包围圈中，混入观望人群溜走。

公安部不得不发动群众配合，在河南、上海、江苏、江西、山东、安徽严密布控，但新问题是，有罪犯冒充“二王”作案。

8月29日，二犯在淮阳抢得2.1万元现金逃跑。

狡猾的“二王”在淮阳作案后，为躲避撒开的法网，带着蚊帐，筒袜等露宿山村野坳的用具，骑车逃离淮阳，14天的时间，他们从江苏横跨安徽省，又跑到江西省，妄图从这里再通过广东，福建两省南逃过海。

9月13日，二犯在江西广昌被发现，被追捕进入了盱江林场的深山密林，干警们完成了对二犯的包围。

9月18日，二犯被围在尖锋公社南坑山，开枪拒捕，被击毙。二犯蓬头垢面，皮色灰白，脚板上累累孔洞，一个公文包绑在腿上，内有人民币1.3万元，腹内空空无物。

追捕“二王”无疑是全国“严打”斗争最惊心动魄之作，“二王”得以持续作案半年，窜行千里，打死打伤多人，实施多次抢劫，无疑是对我们公安司法战线的一次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百姓呼唤着国家机器对公民安宁的更强有力的保障。

“严打”风暴给1983年的中国社会生活带来深远影响，一批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集团被严惩，一些以城市社区为蚕食目标的寄生阶级被吊销城市户口，正义之剑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从这时起，一直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持久主题。

#### 年度记事

#### 存在主义思潮能影响我国青年

《青年研究》第十二期发表文章说，为什么存在主义哲学能够被一部分大学生看得这样神？追溯其原因，与我们处在历史转折时期有关。青年能不能正确理解这个转折？我们的工作能不能适应？要分析影响的原因。

现在的青年和大学生，经历了十年动乱，饱尝了“四人帮”造成的社会灾难，一些人便想另找出路。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接触西方的社会思潮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热。萨特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鼓吹唯心主义，用存在主义补充和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色彩增加了存在主义对青年的吸引力。

存在主义强调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强调对自我意识、对自我存在的特殊意识现象的分析。这种观点在经过十年动乱的我国社会里，也必然在极左路线遗留下来的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土壤中得到孳生。

#### 学习张海迪活动

共青团中央于3月7日在北京举行了表彰大会，授予身残志坚的女青年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并作出向张海迪学习的决定。张海迪5岁时因患脊椎血管瘤，身体高位截瘫，有2/3失去知觉和功能。她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顽强抗争，努力为人民发热发光，作出了许多健康人难以作出的成绩。她自学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她还自学了4门外语，翻译了许多作品和资料。

新华社发表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领导同志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张海迪。叶剑英的题词是：“青年先锋时代楷模”。

邓小平的题词是“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的共产主义新人！”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向张海迪学习。

#### 我国将逐步推行劳动合同制

3月3日，劳动人事部发出通知，要求积极有步骤地推行劳动合同制。27日，劳动人事部负责人就劳动合同制答《人民日报》记者问指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以实行“新人新制度”作为过渡。今后新招收的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原有固定职工目前仍执行现行的制度，但对现行制度也要逐步加以改革，最终要达到所有职工都实行劳动合同制。

劳动合同制是我国用工制度方面的一次带有方向性的重大改革。

#### 卓长仁劫持民航班机飞往韩国

5月5日，中国民航296号班机在从沈阳飞往上海途中，被武装暴徒卓长仁等6人劫持，被迫于当日在韩国汉城附近的春川军用机场降落。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建、吴云飞、王彦大、高东萍6犯从1983年2月起，即共同策划劫持中国民航客机。5月5日凌晨7时，卓长仁等6犯在吴英俊等3犯的掩护下，将武器带上296号班机。事发后，中国民航局局长率民航工作组前往汉城，处理劫机事件。经双方磋商后，5月10日被劫持的旅客和机组人员返回了中国。经检修后，被劫持的客机亦于18日返回北京。

同日，国务院发布嘉奖令，决定授予中国民航王仪轩机组以“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的称号，授予机长王仪轩以“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的称号，奖励和表彰机组全体人员与暴徒进行斗争的英勇行为和在韩国的好表现。中国和韩国对6名劫机罪犯的处置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中国对6名罪犯未被交还表示遗憾，并声明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事件促成了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和韩国官方的首次友好交往。

#### 华山抢险

5月1日，第四军医大学200多名学员游览华山风景区，由于游人骤增，造成了“自古华山一条路”上的严重拥挤、堵塞、在千尺幢地段出现了10多人从陡峭的山崖梯跌落下来的险情。第四军医大学的学员们冒着被砸伤和跌落崖梯等危险，同群众一起奋勇抢救游人。他们用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对受伤的游人进行紧急抢救，忍着饥渴和疲劳，穿过25华里曲折的深谷和险道，将4名危重伤员护送到医院，使他们转危为安。另一部分学员在游人拥挤不堪，随时有掉入深谷危险的情况下，主动协助民警维持秩序，沿深谷一侧组成人墙，保护游人安全通过险道。四军医大学学员华山抢险的英雄事迹传出后，在全国，特别是在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 朱建华刷新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6月1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预选赛比赛中，朱建华跃过了2.37米的高度，刷新了男子跳高世界纪录。

世界男子跳高纪录在近年来提高得非常艰辛，早在1962年，世界跳高纪录就已达到2.26米。20年后，横杆才上升了10厘米，平均两年才提高1厘米。

1963年，苏联的布鲁梅尔跳过2.28米。经过8年的沉默，我国的倪志钦在1970年11月把世界纪录提高了1厘米，达到了2.29米。此后，美国的斯通斯和苏联的亚辛科分别把这个纪录提高到2.32和2.34米。1980年8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选手韦西格在莫斯科奥运会上跃过2.36米的横杆。这个保持了近3年的世界纪录被我国选手朱建华打破了。这以后，朱

建华又冲破了 2.39 米大关，成为国人瞩目的体育英雄。

#### 引滦入津工程竣工

9 月 11 日引滦入津工程建成通水，这是建国以来国务院批准的我国最大的跨流域、综合性大型城市输水工程，是为解决天津市缺水问题而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

它包括引水、输水、蓄水、净水、配水等完整工程体系，横跨滦河、海河两个流域。

将潘家口水库的水，经大黑汀滦河，流入蓟县于桥水库，再经州河、过宝坻县九王庄引水闸，沿输水专用明渠，将水分别从明渠输入海河，从暗涵钢管输入天津市 3 个水厂。一线长 234 公里。整个工程从 1982 年 5 月 11 日开工到 1983 年 9 月 11 日正式建成通水，提前 2 年实现国家要求。该工程荣获 1984 年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每年可供水 10 亿立方米，大大缓解了天津市城市用水，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 1984 年：新星

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全厂推行了一套独特的经营管理方法，使这个小厂的

产品畅销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成为浙江省一流的专业衬衣厂……  
——《人民日报》通讯

《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

对于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本年度由于步鑫生的出现而显得特别热闹，整个 1984 年，没有比这位小小的浙江省海盐县衬衫厂厂长更为知名的新闻人物了，甚至从解放以后我国报刊电台所发表的人物报道来看。步鑫生也算是继焦裕禄、雷锋之后的又一重点人物。

1983 年 11 月 16 号《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专题报道，新华社编者按里这样写道：“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以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创造一套治厂方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激起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与此同时，报纸还刊发了步鑫生的一幅头像。如同那个年代所有的先进工作者一样，相片里步鑫生显得干净朴素，远没有后来企业家飞扬的神采，这是对步鑫生最早的全国性报道。采写这篇通讯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万万没想到：一个改革史上的风云人物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并深刻影响到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

对步鑫生的新闻采访几乎是一种偶然，新华社记者童宝根 1983 年在浙江曾听朋友说起过步鑫生，这是一个领导部门有争议的人物，有争议也许就会有新闻。1983 年国庆节前后，童宝根来到浙江省海盐县衬衫厂采访，他还带着浙江省总工会的嘱托：步鑫生取消劳保待遇，随便开除工人，可以进

行一下调查。

童宝根在回忆当时采访时说：

“经过一个星期的采访，我觉得步鑫生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他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订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

“此外，我也发现步鑫生许多不足之处，他确实有独断专横的毛病，听不进不同意见，他把上级的规章制度视为‘条条框框’，不合意的就要冲破……他同上级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张，平时花钱也比较铺张。”

扩大企业自主权几乎是当时企业改革的唯一法宝，但内涵仍然模糊不清，尤其在政企不分的大形势下。很显然，企业扩大了自主权，主管部门就消灭了管理权，矛盾是不言而喻的。而在众多企业属倍守“产品经济”的时候，步鑫生的“市场竞争”，无疑开辟了企业发展的新天地。

采访报道首先作为内参送到了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在改革重要关头的1984年，中国多么需要勇敢的实践者来冲出一条道路，打开一片天地啊。这篇内参引起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当即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然而，对步鑫生的争议并没有停止，不同的意见也传到了中南海。1984年春节前夕，浙江省委组织联合调查团对步鑫生进行了详细考察，肯定了步鑫生的首创精神。

总书记胡耀邦再次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没有现成的道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尚未出台，1984年初，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急需可供借鉴的样板，步鑫生的大胆探索，使人们隐约地看到改革的方向。

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界对先进人物的宣传能超过中国，报刊电台如此之多，汉语语言如此丰富，明星效益的爆破力又如此巨大。新闻记者们蜂拥小小的海盐县城，进行长篇累牍的报道，数十天之间，步鑫生成为全国最为知名的工厂厂长。

成功的经验是多么宝贵，又多么需要借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团挤满海盐县城。自海盐建县以来，人们从未见到那么多的外地人，他们操着各地的方言，往来于海盐县各条街道。口头词是：步鑫生，市场竞争和企业自主权。而步鑫生本人则匆匆地往来于祖国各地，在掌声与鲜花之间，他一次次地演讲改革的经验，此外，他还向军队讲军事改革，向文艺界讲文艺改革……

文本中遗留下来的“三突出”原则再次发挥了作用，步鑫生成了改革的代表，崇拜的偶像，而新闻再次暴露倾斜和失衡，瞬间的光芒使步鑫生完全陶醉了，他无暇顾及经营，他相信，有“改革厂”的金字招牌和中央的支持，海盐衬衫厂将永立不败之地。步鑫生的工作作风也发生了某种改变：他

在一间深藏在许多道门后面的豪华办公室里孤独地遐想。甚至他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不提前约定，副厂长也不能随便见到他。当外地企业从他的经验中吸取“强化内部管理，开拓市场竞争”的营养时，他却放弃基地，好大喜功地策划投资庞大的项目。毕竟是1984年的中国，已启步的市场竞争，终于显露出了它冷酷无情的本质，开放的市场不会被原来简单的口号与经验所迷惑，也不会容忍平庸的竞争对手。

一年之间，步鑫生度过了他人生的辉煌，1985年起，海盐衬衫厂效益大幅度下滑，杭州市里的海盐衬衫厂专柜，产品开始蒙上了薄薄的灰尘。

在与本年度形成强烈反差的85年，步鑫生投资600万元兴建的西装厂，生产线刚铺设完，西装热早已烟消云散。然而独断专横的性格在“果断决策”的掩护下得到肯定，造成步鑫生一再出现经营失误。1986年，对于海盐衬衫厂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生产流水线停产，下水道、厕所堵塞，生产萧条，人心涣散，走掉了近一半职工”。这就是当年那个红红火火的明星企业吗？两年时间。衬衫厂亏损数百万。步鑫生后来的失败，教训是惨痛的，但本年度的步鑫生和“步鑫生热”激发了全国企业的改革热情，这一点又功不可没。步鑫生曾经很自信地说：我这个改革厂给国家的好处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其实，人们也同意这样的看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步鑫生最早完成了从厂长到企业家的过渡。

在步鑫生改革的背景下，本年度4月22日，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写信给省委领导，信中说：“现有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处在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的境遇，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要求下放包括“厂长负责制”在内的等10个方面权力。

5月1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决定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价格，机构设置扩大企业自主权。

另一种消费观念的改革也在静悄悄的进行，整个80年代初，到处都交织着类似的家庭矛盾，正值妙龄的儿女们与他们的父母就裤脚大小展开激烈争论，父亲嗤之以鼻，善良的母亲“啧啧”地感叹：“看那裤脚，全大街都让你给扫干净了！”但是，一切都在改革了，52岁的纺织工业部部长吴文英在视察淄博市时穿起了艳丽的金黄色紧身衣褂和线条流畅的长裙，围观人群禁不住鼓起掌来，刺激消费是为了刺激生产，吴文英部长神采飞扬地说：“不仅青年人要打扮得漂亮，老年人也要打扮得年轻一些。”“要解放思想，大胆穿起美丽时装，不要用50年代的服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

本年度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政策。《决定》强调了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企分开等重大问题。

本年度，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道：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

而序幕早已拉开。

## 年度记事

### 中英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中英两国9月26日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2月19日，声明规定：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



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现行的法律、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 50 年不变等。

联合声明的签署，圆满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问题，也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基础。双方重申，两国政府能顺利在 1997 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将进一步发展。

#### 居民身份证制度

4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规定：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未满 16 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和有效期。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期分为 10 年、20 年、长期三种。年满 16 岁至 25 岁的，发给有效期 10 年，25 周岁以上至 45 周岁的，发给有效期 20 年；45 周岁以上的，发给长期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应随身携带，妥善保管。在办理涉及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权益事务时，公民可以此作为身份证明。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的国家机关可以查验公民的居民身份证，但不得任意扣留、抵押。实行公民身份证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是有效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

#### “严打”第一战役成果辉煌

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报告》中说，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在社会治安不正常的情况下，采取组织战役、统一行动、集中打击的办法，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不但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见效。它解决了我们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为开创政法新局面，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积累了经验。

在第一战役中，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 1027000 人，检察机关起诉 975000 人，法院判处 861000 人，其中判处死刑的 24000 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 687000 人，劳教人员 169000 人。这是 1950 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这场斗争的实际效果，已经远远超出社会治安的范围，它对于党风、社会风气的转变，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公司热

本年度刮起一股“公司热”，专家指出：似乎只要组织起公司，管理经济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于是公司林立，甚至今天还是 × × 局，明天就换成了 × × 公司了。

实际考察一下，许多人是把公司作为行政管理机构的一个层次来对待的。“局——公司——厂”就是他们设计的管理体系，实际上，公司是企业，是经济组织，不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它只有企业内部管理的职能，没有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把二者混淆起来，等于进一步把政企不分强化了，削弱了国家管理的职能作用。

“公司热”的出现还有一种情况，由于行政机构的设置受到限制，就把一些管理部门改成公司，实行业务编制。这种作法，不但强化了政企不分，

削弱了管理职能，更严重的是为扩大编制，向企业摊派费用开了方便之门。

#### 仿古编钟

武汉民族乐器厂工人黄可复，根据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乐器，设计并和本厂编钟制作组及武汉精密铸造厂的职工一起，制成我国第一套仿古编钟，使 2300 多年前的楚国古乐再现于今日舞台。这是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新成就。

仿古编钟不仅能用来独立演奏，还可与现代民族乐队或西洋管弦乐队合奏。湖北省歌舞团上演《编钟乐舞》时，就使用了这套仿古编钟乐器。

#### 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

《北京晚报》、《北京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和八达岭特区办事处于 7 月 5 日联合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征求社会募捐活动。活动开始后立即得到社会各界、机关团体的积极支持，仅 1 周时间，就收到捐款 200 万元。这些捐款来自工厂企业、科研机构、农村、学校的工人、农民、学生等等。文艺团体、著名歌唱家为赞助活动举行了义演；北京首都医院开展了义务门诊；中国邮票公司也为此发行了 10 万套纪念封。9 月 1 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为这次赞助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使修复长城的社会赞助活动进入了高潮。为了鼓励单位和个人参加修复长城的活动，赞助委员会决定，个人赞助 500 元以上的，将在长城上刻名永作纪念。凡赞助 2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国内外单位或个人，可以用所赞助的款项包修一座城台，并在长城上单独树碑刻名留念。

#### 清理“三种人”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再次重申，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既要坚决清理那些已经查清核实的“三种人”，还要特别注意清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积极，干了坏事，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比较年轻，隐藏下来，对党危害大的人，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

#### 我国参加第 23 届奥运会

7 月 28 日至 8 月 12 日，第 23 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国自 1952 年以来，第一次派出以李梦华为团长，由 353 人组成的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本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参加了 16 个项目的比赛，共获得 15 枚金牌、8 枚银牌、10 枚铜牌（包括台湾运动员 1 枚），金牌数居第四位。中国运动员许海峰在奥运会第一天的射击比赛中夺得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使海峡两岸和海内外炎黄子孙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中国运动员在第 23 届奥运会上洗刷了中国 52 年来在奥运会上“零”的耻辱。女排夺得“三连冠”。中国获得金牌的队和运动员名单如下：排球——中国女子排球队；射击——男子自选手枪：许海峰；男子移动靶：李玉伟；女子标准小口径步枪吴小旋；举重——52 公斤级：曾国强；56 公斤级：吴数德；60 公斤级：陈伟强；67.5 公斤级：姚景远；体操——男子自由操：李宁；男子吊环：李宁；男子鞍马：李宁；男子跳马：楼云；女子高低杠：马燕红；击剑——女子花剑个人：栾菊杰；跳水——女子跳台：周继红。

#### 中国第一次公开招聘模特儿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 10 所艺术院校最近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

项启事吸引了 171 个报名者，大多数是待业青年。在他们中要精选出 20 名女性和 10 名男性模特儿，年龄在 17 至 30 岁之间，每月固定工资 40 元，每小时造型时还可以得到津贴，预计每月收入可以超过 100 元，聘用合同以半年为期。

以前学校请模特儿都是靠教师学生介绍，自从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个体户以后，找模特儿越来越难了，有关院校建议公开招聘，文化部同意了。

由于封建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做模特儿被认为是羞耻的。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 1985 年：无泪的长歌

不提工资，分不分房子，称不称先生，皆无所谓，我心无所求，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士为知己者死嘛。可惜者，于无言中，拒你于五服之外，让你隐隐约约感觉到，但不便说，让你影影绰绰意识到，但苦

于言传……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当人民喜爱的剧作家老舍凄凉地投进太平湖的时候，太平湖的水流激起了诗人苏叔阳心中的郁愤，写下了《无泪的长歌》，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长歌。

如今，太平湖已成了北京地铁仓库，那段历史也随风飘去。

当历史翻到 1985 年这一页时，那首《无泪的长歌》又似乎重新回响起来，知识分子的话题又开始流行。

1985 年 7 月 25 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登了宋鄂的一篇短文，提到他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常用《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对妻子所说的那句话来彼此安慰：“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从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年的某种无奈。

另一作家郭慎娟在 1985 年 11 期《报告文学》上发表的《知识的罪》写道：

“每每想到要以率真笔墨去如实揭示生活矛盾和社会弊端的时候，因分明感受到的一种压力而不免心悸。”

电影剧本作家秦培春在回答自己碰到什么困难时，忧伤地说：“困难很多，外部和内部都很难获得自由。尤其是存在着的一座心狱。”

这一年的报刊上，堆满了这样的标题：《从……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威力》、《要大胆使用……》、《应该怎样看待知识分子》等等，从这些题目，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问题已经到了让人心酸的境地。

而民众的看法似乎不太一样：“现在知识分子翘尾巴了”、“九路军压倒了八路军”这些调子开始流传于大街小巷。

在民众的心中，文革以后的最大获利者是知识分子，平冤案，定职称，评先进，发奖状，入党，什么都有他们的份，升官的也不少。“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猛然从“敌人”位置就成了远胜于朋友的“自己人”，20年来丑化知识分子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而在知识分子的心中，历史的幽灵在这一年仍游荡在中国的大地上，知识越来越不值钱的问题成为市民广泛流传的话题。

甚至在一些人眼里，自己的孩子考上宾馆服务生岗位远比考上大学更荣耀。

这一年里，一个村支书对一个工作20年的教师说，你是知识分子，每月工资58元，你的婆娘小学文化水平成了养鸡专业户，半年挣3800元，你这个教师没什么意思呵！

据1985年统计，全国职工平均工资1239元，而知识分子最多的科技文卫部门只有1182元，比最高部门低374元，知识分子工资增长明显低于其它部门。

奇怪的是这一年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宣扬中年知识分子的“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积劳成疾”的“群体英雄”形象，在老百姓眼中，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能用微薄的工资来衡量，这其中包含了“理想、信念和道德价值”，苦行僧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形象。

知识分子的生活窘况在这一年已经被大量反映出来，1985年陕西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上，曾组织对277名知识分子的调查。发现因家务劳动，住房困难，两地分居，经济收入少而影响科研工作的有51%。

1985年《文汇报》报道，在全国知识分子中，较合理发挥作用的仅占20至30%，未尽其才的占50%以上。

更让知识分子伤心的，却是另一方面，一位老知识分子在一次座谈会上，泪眼婆娑地说：

“提不提工资，分不分房子，称不称先生，皆无所谓，我心无所求，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士为知己者死嘛。可惜者，于无言中，拒你于五服之外，让你隐隐约约感觉到，但不便说，让你影影绰绰意识到，但苦于言传……”

这一年《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第九期上，集中发表了几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其中，R·达伦多夫把知识分子界定为傻瓜，说他们爱喋喋不休地讲述那些不受欢迎的真理或发表多余的不同政见，无谓地去关心和宣传“自由”，这也许可算是大众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的另一个重要版本。

传说抗战时期，日本人侵占江南某名城，一城人风闻而逃，只有一位清朝老儒生执意不走，日本兵闯入他家时，他仍端坐于大厅，日军头目问他为何不避，他缓缓吟出两句诗：“雪满山城鸦去尽，独留老鹤守寒梅。”那头目稍通古文诗词，闻听此语，默默无言，深鞠一躬，带人撤下。

人们常常乐道的知识分子的那种迂腐和可爱，注定了他们命运的多蹇。

吴研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句话：“落拓极而牢骚发，抑郁发而叱咤生。”但知识分子总感到愤世嫉俗之余，不觉自己也是一个大愚人。

这一年的知识分子们将在惆怅和焦灼的等待中，在骚动不安的灵魂的向往中，蒙上一层淡淡的哀愁，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还将面临转型时期的重大选择。

#### 年度记事

中央发出“一号文件” 农村开始第二步改革

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逐步把价格放开，真正按价值规律办事，做市场调节的文章；二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面向市场，因地制宜，使农业内部各个方面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

这个文件标志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以建立农村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第一阶段已基本结束，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农村改革第二阶段即将开始。我国农村从此进入全面发展商品生产的新阶段。

#### 我国恢复建立教师节

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1932年，国民党政府曾规定6月6日为教师节，改用“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教师没有单独活动，没有特点。此次将教师节定在9月10日是考虑到全国中、小学新学年开始，学校要有新的气象，新生入学伊始，即开始尊师重教，可以给老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气氛。1985年9月10日，中国恢复建立第一个教师节。

#### 5.19事件令人痛心

5月19日晚，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赛东区第二大组第一小组中国队对香港队的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比赛结果中国队以1:2负于香港队，失去出线资格。赛后，当两队队员退场时，看台上哄闹的观众中，有人向他们扔汽水瓶、果皮等物，使一位香港队员受伤。随后，不少人还在场外任意毁坏车辆，殴打司机，拦截外国人的汽车，破坏公共设施，并打伤一些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由于公安部门积极维持秩序，依法拘留了肇事者，这场风波始告平息。北京市和国家体委的负责人当即向香港队道歉。这是建国以来在北京举行的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违法事件。

#### 现在100元等于多少

由于币值贬低，从全国来看，1984年100元货币购买力大体相当于1983年的97.3元、1978年的85元、1952年的69.8元。

由于城乡物价水平上升幅度有高有低，1984年城镇居民拿100元货币只相当于1952年的58.7元。而乡村居民拿100元货币在当地购物则等于1952年的78.7元。另外，1984年城镇民拿100元货币购买食品只等于1952年的48元。如购买副食品只等于37元。

#### 《金瓶梅》出版风波

北京的作家近日都忙着购买洁本《金瓶梅》。在文艺部门任职的干部，须处级以上才能购得《金瓶梅》。

《金瓶梅》的购买权，其实已经大大下放，1959年，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出版了少量《金瓶梅》，是供部长级以上干部作“批判”用的，如今一下子降了好几级，于是争购者如云。

《金瓶梅》的再版，诚为不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为此担当了极大风险。她组织行家整理了一套洁本，并压好了纸型。谁知上级部门无人敢批准出版，随之又碰上“清污”，结果把纸型束之高阁达四五年之久，至今方才重见天日。

许多著名学者是支持出版《金瓶梅》的。可是，也有人猛烈抨击出版《金瓶梅》。

韦君宜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书,但是我们的作家、文学史研究者都看不到它,这是不正常的。出版这本书目的很简单,是供作家学者研究之用,并无它意,绝非为了赚钱,只印 1000 套赚不了钱。

韦君宜说,这次洁本删去了 19610 字,只删不增,并一概标明删去多少字。

### 百万大裁军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6 月 4 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我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 100 万。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中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 疯狂的君子兰

现在一株上品君子兰高达 1 万元、几万元,甚至有 10 万元一株成交的。君子兰是一种比较容易种养的花卉,一个花窖就可以养君子兰几百株、上千株。那么一株草本的花卉,价越黄金,真的是与它的价值相符吗?人们对此提出怀疑是不元道理的。

前两年有些单位为搞经营,做生意,不惜以重金购买君子兰,一下子把花价抬了上来。一部分领导人自己就企图从中谋取私利。例如可以把所谓名贵品种据为己有。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手段,作为加官晋级的敲门砖等,以致大量的金钱从国库流进个人腰包。正是由于有些单位敢于花大钞,出高价,君子兰价格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年年上升。可见,要解决君子兰的高价问题,首先应当停止用公款高价购买君子兰。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应采取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进行干预,绝不能让这种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君子兰高价现象再继续下去。

### 海南岛倒卖汽车事件始末

7 月,海南倒卖汽车案受到公开通报。中共海南区党委、区政府一些主要领导成员违背中央给予的自主权,大量进口国家控制进口的商品,用来倒卖赚钱。从 1984 年 1 月 1 日到 1985 年 3 月 5 日,共批准进口汽车 8.9 万余辆、电视机 286 万台、录像机 25.2 万台。进口的汽车也有 1 万多辆被倒卖出岛,销往 27 个省、市,其他进口物资也大量被倒卖出岛。为了进口汽车等物资,海南岛有关干部违犯国家外汇管理规定,非法高价从全国 21 个省、市及中央 15 个单位炒买外汇 5.7 亿美元。各单位用于进口汽车等物资贷款累计达 42.1 亿元,比海南 1984 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 10 亿元,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审计署、国家经委及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后决定:对海南区委的错误公开通报,并同意广东省关于撤销雷宇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区政府党组书记职务;给予姚文、陈玉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陈玉益海南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和区对外经委主任职务,同时建议撤销雷宇广东省委委员的职务。

### 沈阳对企业发布破产警戒通告

8 月 3 日,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防爆器械厂 3 家企业发出“破产警戒通告”,限令因经营管理不善连年亏损的这 3 家企业,在一年内改变面貌,逾期则正式宣告企业倒闭。这是沈阳市根据《关于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试行规定》的要求,第一次宣布的破产警戒通告。

### 上海赌博之风盛行

上海郊区有的乡,参赌人数上升之快令人吃惊。参赌者有社员、干部、

学生、教师，还有从事工商业的劳动者。川沙某大队成年社员中有 1/3 经常参赌，赌风如此之盛，究其原因大致有：

收入增加赌资不断。崇明县 1980 年以前，社员人均年收入 300 元左右，如今已达 800 元左右。有些人由此而变得昏头昏脑起来。

精神生活贫乏，把赌博当成“娱乐活动”。目前相当部分农村的文化设施没有发展，有的农家到镇上看电影，来回路程要花 3 小时。农村电视机目前尚未普及，而且电视节目对于一些农民来说也不大合“胃口”。

有关方面闻而不问。有个别地方，赌博几乎是公开进行的，当地一些干部对此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有的干部还躬亲赌台，使参赌者更有恃无恐。

#### 我国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

一是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过去，人们生活，但求温饱足矣。在生活消费总量中，吃的花费占去绝大部分。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吃的花费约占消费总量 50% 左右，正在从贫困水平向小康水平过渡。

二是从自给型向商品型转化。过去，农民很少花钱去买东西。现在农民手中的余钱多了，商品消费的比重大为增加。城市居民为了节约，过去也常常自己缝衣、做鞋等，现在，更多地是买现成的。

三是从物质型向文化型转化。过去，我国人民在文化方面的消费只占消费总量的 6% 左右，农村更低了。现在电视机、收录机等大量进入家庭，出现了农民订阅多种报刊、买钢琴的现象。

四是从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化。拿衣着来说，过去是颜色统一、式样统一。现在，人们衣着争奇斗妍，连中、老年人的服装也在开始变化。食物和其它方面也在向多样化发展。

五是从耐久型向更新型转化。现在人们买东西，不是考虑“能用几辈子”，而是首先注意款式新颖，不断更新。

## 1986 年：无规则游戏

遍地开花的家庭工商业发展起来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新矛盾，新问题，甚至一些严重违法行为。……

——7 月 8 日《人民日报》专稿

1986 年 11 月，也许是中国金融史上值得记住的日子，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范尔森一行访华，赠给邓小平一枚精美证章——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徽，作为回赠，邓小平将一张新中国第一次公开发行的飞乐股票送给范尔森。这一消息在市民中的震动是巨大的，但很快市场投资的意义被老百姓淡忘了，社会也被淹没在社会集资的巨大躁动中。

民间“抬会”在本年度达到疯狂的程度，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不再是“吃饭了没有？”而是“集资了没有？”

这一年的秋天，温州爆发的一起特大金融投机和金融诈骗案，可说是这一现象的缩影。

这场民间的“抬会”参加人数达 30 万人之多，会款发生额 8 亿人民币，这场风波灾难性的直接后果是：63 人自杀，200 人潜逃，近千人被非法

关押、拷打、摧残，数万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

听不到硝烟，听不到炮声，没有坠机、沉船事故，而这确是一股吞噬一切的金钱的波流。

平阳县境内整江边上，一个阴暗的仓库里，一个通过“抬会”捞了十几万元的人被严刑拷打，最后被愤怒的人放蛇活活咬死……

乐清县海屿乡上百间房屋被捣毁，门窗被砸，室内桌椅箱子锅灶无一不七零八碎，洗劫一空，全村百余户家庭逃在外面，留下的 300 余妇女儿童被五花大绑受尽摧残……

自从温州地区出现“抬会”这个怪物以后，不少小学校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人质抓走。苍南县有几十个讨债的人拿出炸药包赶到乐清县乐东乡的三个会主家中，逼迫会主交出钱来，平阳县鳌江镇数百名妇女多次举行游行，并步行几十里到县城示威。

这一年，温州金钱狂潮失去控制。

叶三凤，一个快 40 岁的女人，小学程度，“抬会”一年成了当地红极一时的财神，大批入会者蜂拥而来，她家门槛都快被踩断。她月纯收入高达 120 万。

可是，多少个曾对赵公元帅顶礼膜拜的当地农民、工人、干部，好不容易七拼八凑借来了巨款，幻想很快发财，结果都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人们追逐金钱，又被金钱愚弄，金钱的失落使他们变得残忍与疯狂。

与这场风波相呼应的是，在重庆市，一个叫余万珍的农家妇女，也在进行同一场游戏，这位仅仅小学读了两年书的农家妇女，用高息为诱饵，共诈骗集资 305 万余元，牵涉金额 930 余万元，在这起全国特大“地下银行”诈骗集资案中，先后有 674 人参与了这场投资，其中有 1/3 是机关干部、医生、教师和银行工作人员，一些有职有权的信用社干部竟把 100 万存款存入“余氏银行”，得到的凭据，竟是随意手写的没有任何印鉴的借条。

在高利率的引诱下，人们纷纷加入集资行列，有的攀亲找友，也往这条路上挤，大有趋之若鹜之势。

集资，在这一年成了热门话题，在中华大地上，引发了一场全民性的集资热潮。

这一狂潮的直接后果是，各地银行出现挤兑风波，纷纷告急，存款增幅急剧下降，国库券发行后销售不畅。集资狂潮在尚无完善的法规约束的情况下，导致了脱离银行信贷规模，扭曲了国家银行信贷政策，并诱发空前规模的金融市场的混乱。

这种后果，造成这一年的一个怪现象：

一些人眉笑颜开，钞票用秤称，用尺量，装满钞票的箱子堆满角落，一些人捶胸顿足，欲哭无泪，卖房、举债、卖儿卖妻。……这一年，不少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这一年，留在人们心中的是“假”的一年，晋江地区传来假药案，这个地区共有 57 个乡镇企业制造假药。

福建省传来制造假货假洋货的消息……

老百姓在惶惶中度过这一年。

#### 年度记事

#### 上海两名高干子弟被处决

3 月 19 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布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对



强奸、流氓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执行死刑的命令，三罪犯随即被处决。陈、胡二犯是上海市领导干部的儿子。1981年至1984年间，他们纠合在一起，以跳舞、帮助调动工作为名，结伙轮奸、强奸妇女9名，其中3名未遂；奸淫、猥亵妇女42名。

#### 上海女学生中出现“琼瑶热”

本年度，在上海女学生中出现了一般“琼瑶热”。开学至今，借阅琼瑶小说的盛况有增无减。一本琼瑶小说传过几个班级，甚至跨年级、跨校、跨区。新华书店柜台上的为数不多的琼瑶小说立即被女学生们抢购一空。

为什么琼瑶作品特别受女学生的青睐呢？

女学生说：“琼瑶小说是我们感情成熟的教科书。”琼瑶的小说以爱情为主题，有现代鸳鸯蝴蝶派和中国哥特小说之称。

琼瑶笔下的女主人公多是些出身寒微，但聪明纯洁、意志坚强的“灰姑娘”，而男主人公又风流潇洒，才华横溢。作品虽不能反映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内容，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以强者身份出现的女主人公，很能打动女学生的心弦。一些少女将自己带入角色，试图在小说中寻得知己找到急待解决而无法解决的感情的答案。

#### 大学生观念变化令人关注

对十几所高校的3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当今大学生对当前改革采取的态度和对生活的追求，有些新变化。这代人的生活动机和意向是多维的。在回答“你认为生活的格调应该是什么”的问题，54.6%的人认为应是“节奏紧凑——科学化的”；21.3%的人认为应是“情意浪漫——艺术化的”，15.2%的人认为应是“悠闲散居——村夫式的”；16.7%的人认为应是“不断进击——英雄式的。”

对于物质生活热烈追求是当代人与以往几代人不同的一个方面。调查表明，有47.3%的人认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为了赢得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27.1%的人认为享受和满足是人生的目标；14.4%的人认为这是区别于野蛮的一种文明的尊严。这说明当代大学生是重视物质生活的。其中有1/4以上的人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作追求的唯一目标。

当前实行的改革，大学生们反响强烈。调查反映，68.1%的人认为当前的改革是根本大计，国运攸关；24.1%的人则认为改革阻力重重，收效甚微，缺乏信心；4.2%的人看作是修修补补的过渡政策。

对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的选择上，有78.1%的人认为应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33.5%的人认为要学习西方“个性发展的竞争型气质”；20%的人认为学习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传统习惯；9.8%的人认为应学习坦白的物质欲求。此外，有60%的人认为工业化社会将有碍于人们彼此心灵的开放，感情的融洽。

#### 全国实行夏时制

5月4日起至9月14日止在全国实行夏时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通知动员全国人民为节约能源而早睡早起，并要求全国各部门做好宣传和安排工作。时间转换的具体办法是在夏时制开始那天的凌晨2时把时针向前拨快1小时，夏时制结束那天的凌晨2时，再把时针从2时拨回1时（夏时制经实践后，证明不妥，已取消）。

#### 国营工业亏损额已突破全年控制数

财政部最近的统计表明，今年以来，各地月月增亏。1至8月份，全国

国营工业企业累计亏损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68.8%，已经突破了国家年初下达的全年计划亏损控制制度。一些财政专家分析，今年头 8 个月国营工业企业亏损主要有 3 个特点：一是亏损面大。1984 年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10.5% 和 10.7%。

而今年到 8 月末已经上升到 17.6%，二是新亏损户增多。截至 8 月底，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亏损户已达 6800 多户，比去年同期增加 1600 多户，生产企业亏损户中约有 40% 是今年新发生亏损的。三是亏损数额大的集中在少数行业。

### 世人瞩目的“苏南模式”

《半月谈》22 期载文介绍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成功典型“苏南模式”，文章说：所谓“苏南模式”，一般指苏州、无锡两市所属 9 县及常州、镇江市个别县份的农村在发展经济中所走过的独创性道路。概括起来说，“苏南模式”有 3 大特点：1、苏南农村巨变首先起源于乡镇工业的兴起和成长，走的是以发展乡镇工业为主体，农工商协调发展的宽广道路。2、在乡土中自发生长的苏南乡镇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发展农村商品经济。3、农村经济是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体。

### 一些高校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

12 月，上海、南京、合肥、武汉、杭州、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从 12 月中旬起，一些院校中出现了内容大多对本校教学、生活及学生会工作等提意见的大、小字报，其中有些内容是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接着，上海等地少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煽动，使这些城市的交通阻塞，许多员工无法正常上下班，严重影响了生产、营业和工作，少数坏人则乘机捣毁汽车、侮辱妇女等。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发布了维持社会治安和交通管理秩序的两个通告，北京市也发布了关于游行示威的 10 条规定。

至月底，有学生参加游行的各院校基本已恢复正常秩序。

## 1987 年：大火灾

每次当你悄悄走近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1987 年。春节联欢晚会。这是一台让中国人兴奋无比的精彩文艺晚会。尽管歌手如云，但对于刚刚打开眼界的中国观众来说，最热烈的掌声全都献给了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费翔，这位身高 1.90 米，中美混血的年轻俊男以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又舞又歌的身姿风靡大江南北，费翔成为无数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完美偶像。

10 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费翔只是美国百老汇歌剧院的一名普通演员，当他再次踏上中国的大地举办演唱会时，带给我们的只是 10 年前我们自己心路经历的一段追忆。但在 1987 年，费翔的名气之大，形象之火爆甚至被人与本年度震惊世界的大兴安岭火灾联系在一起。人人都会吟唱的《冬

天里的一把火》余音未了，东北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就发生了特大火灾。

火灾当然与费翔毫无关联，肇事者是位大兴安岭林场的清林人员，在本年度的5月6日，由于他们分别在几个林场里违章作业和吸烟，造成了这场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火灾损失之重看看下面这些数据就知道了：

大火从5月6日起燃烧，到6月4日全部扑灭，历时整整1个月，着火面积101公顷，大火烧毁了3个林业局址，9处林场，4个半贮木场，烧毁存材95.5万立方米，各设备2488台，粮食650万公斤，桥涵67座，铁路9.2公里，通讯线路483公里，房屋61.4万平方米，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死亡，200多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

整整1个月，全国的目光都注视着祖国东北角的那片茫茫林海，没有比火灾更牵动人心的事件了。火灾的发生地漠河是我国最北的一座县城，充满神奇诱人的魅力，每当介绍起中国的版图，总少不了提到这个偏僻的小县城。现在，漠河成了中国观测北极光的中心。

5月6日，大兴安岭林区的西林吉、图强、阿尔木3个林业局局址突然报告出现火情，在一望无际的大兴安岭茫茫林海，火灾是破坏性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显然小灾小难时常不免，但这一次，火情来势凶猛。

漠河县的县委书记王招英是一位杭州的下乡女知青，5月8日，她向乘飞机赶到漠河的省委副书记周文华和林业部副部长徐有芳汇报了火灾的情况：

“火是5月6日下午在古莲林场5干线8公里处发现的，林场当即就汇报了，我们马上组织了1200人上去扑打，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到7号凌晨1点13分左右控制了火势。7号上午9点检查现场，没发现问题，可是到了下午4点，突然刮起了8级大风，火场余火蔓延开来，风助火威，火势迅速发展，我们立即又组织600人上去，可已经来不及了。那整个的火是立体的，离老远热浪就烤得人受不了，没想到火还是进了城，河流、公路都没能挡住火势，县城3339户住房基本上都烧毁了，办公楼、学校、医院等11栋楼保住了，现在14000多人无家可归，130多名伤员急需治病，吃、住、穿、医和交通成了目前最大的困难。

漠河县城成了一片焦土。

9号晚上，肆虐的大火又烧到了距塔河县城22公里的绣峰林场。塔河县城拥有5万多居民，是大兴安岭林区的重镇，大火一旦突破绣峰林场，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烧到塔河，后果不堪设想。紧急抽调的数千军民在绣峰林场与大火展开搏斗。

塔河县城现在成了灭火的总指挥部，到处是繁忙紧张的场面：消防车、大卡车、吉普车在大街上呼啸往来，军列车轰隆隆开进车站，直升飞机在空中盘绕飞行。指挥部里，电话铃声不断，地图摊在大桌子上，一个个箭头指向绣峰林场。

5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扑火救灾前线总指挥部。紧急从吉林调运帐篷，从黑龙江省城空运药品，人工降雨和风力灭火加紧实施准备。

李鹏总理于12日到达塔河、漠河视察灾情，并作出部署，新增援的数万解放军随即也投入了灭火队伍，人与火展开了严酷的拉锯战。几天几夜的扑打，东部地区被打出了一条马蹄形的防火隔离带。

到24日，人工降雨取得成功，而整整下了一天一夜，总指挥部里告急

的电话一夜没响，人们的神经稍稍松弛了一下。随后，新华社发出了“大兴安岭森林灭火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

6月4日，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全部被扑灭，共有58800名军民投入到扑火的战斗中，除了我国各省市，国际社会也给予了大量援助。

与军民抗灾的英勇形成对照，一些玩忽职守的人员受到了惩处。

漠河县公安局消防科副科长秦宝山就是一位典型。在大火烧到西林吉镇时，秦宝山奉命带领全县消防员和5台消防车保护贮木场、物资库、粮油库等重点部门，但他带队在已起火燃烧的物资库上浇了半车水就往回撤，他把3台消防车调回自己家里搬家具，还调来两台推土机，推倒其他民房为自己家打出防火隔离带。大火后，秦宝山以玩忽职守罪被逮捕。

林业部部长杨钟、副部长董智勇在大火完全扑灭后的第三天被中纪委宣布撤销一切职务。

大兴安岭林区是林业部的直属森工企业，森林火灾发生时，杨钟正在住院，在大火严重威胁林区的时候，他没有主动部署灭火抢险工作，而这之前，却参加了好几起外事活动。5月25日到达扑火前线后表现消极，没有对自己工作失职表示任何检讨。中央领导认为这次特大火灾，林业部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除了5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万公顷森林被严重破坏，这一后果将在长时间内危及整个东北的自然生态环境，这将是一笔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

后来传说，火灾期间，全国有不少气功界的特异功能人士来到了大兴安岭林区，设法施云降雨，驱除火魔，尽管有人相信气功存在的真实性，但对于这次特大的森林火灾，是靠着千万军民以生死相博，灭火设备的不断更新，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10年以后，我们又读到有关马来西亚森林大火，烟锁马六甲的消息，每一个中国人这时都一定联想起10年前发生大兴安岭的那次火灾，每个人一定对同样的灾难注入深厚的同情，并为人类自然的安宁而祈祷。

#### 年度记事

##### 中共十三大在京举行

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十三大提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会议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等4项决议。选举产生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和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 部分城市高校学生上街游行

去年12月中旬以来，合肥、上海、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对学校教学管理和有关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提出意见，并高喊“要民主”等一类口号。

本年1月1日中午12时50分，约有数百名青年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东侧马路上突然举行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人带头呼喊“游行自由”、“取消10条”等口号。这些人迅速打出了预先准备好的布制横幅和标语，个人在队伍中进行鼓动和组织。

游行造成了短暂的交通阻塞。1时许，游行人群散去，北京市公安局依法将若干带头肇事搞违法活动者带离现场，进行教育或审查。

学生游行的城市，交通和社会秩序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 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扩大会议一致同意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 我国日用工业品发展五大趋势

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分析，目前我国日用工业品的发展有五大趋势：

一是样式艺术化。越来越多的日用工业品讲究色彩、线条、图案的和谐与统一，并在造型上受雕塑、绘画、建筑艺术的渗透影响。

二是功能多样化。一物多用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如兼作手杖的雨伞，手表、计算器和收录机三者全一的计时器及多用家具等，都较受欢迎。

三是用具方便化。我国在高层建筑中居住的职工越来越多，对家具、电器、厨具等的要求是搬动方便、可拆可组合、灵活适用。

四是产品配套化。无论是室内的窗帘、床椅罩，还是西装、衬衣、羊毛衫、背心、风衣、外套的色调都讲究配套；化妆用品也需系列化。

五是包装礼品化。现在无论是衣服、床上用品，还是糖果食品等，凡包装新颖、醒目、精美、大方的，尽管价格较高，也倍受消费者的青睐。

#### 我国开始建立公务员制度

11月，中共十三大决定在全国逐步实行公务员制度。国家公务员是指在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分政务和业务两类。政务类公务员一般是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管理，实行有限任期制的政府官员。业务类公务员是按国家公务法规管理，实行常任制的政府行政人员。他们是政府职能的实际执行者，也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主体。建立公务员制度即把这批业务类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依法实施科学管理。这个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建立科学的职位分类制度；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严格实施考核和奖惩；实行功绩晋升制度；实行正规的培训制度；建立与公务员地位和作用相称的工资福利制度。

#### 我国电视录影带走向世界

我国电视录影带近年来迅速走向世界。自1982年以来的5年中，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提供了1万多小时的节目。

国内观众称道的一些电视剧，如《武松》、《包公》、《秦王李世民》等古装电视剧尤为日本、新加坡、泰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所欢迎。《红楼梦》、《西游记》、《努尔哈赤》等优秀电视连续剧更引人注目，国内尚未播完，就已经有海外电视台购买播映权。

#### 台湾记者首次来大陆采访

9月15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自费来大陆探亲、旅游和采访。

两人在东京办好入境手续后，于14日乘中国民航班机到达北京。中国新闻社派代表到首都机场迎接。在机场，李永得、徐璐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他们参观了故宫，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市容街景，访问了中国旅行总社总经理，围绕如何接待大批台胞回大陆探亲的问题，提出了询问。采访期间，还通过东京向台北发回了报道。他们又先后到杭州、广州、厦门、深圳等地

旅游、采访。参观访问了一些工厂、企业和学校，了解台胞在大陆投资的情况，并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一些教授讨论了学术问题。27日，两记者结束在大陆的采访旅游、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厦门经香港回台北。

### 文艺界“走穴”现象严重

“走穴”亦称“走学”或“私演私分”，一般由一位牵头者（穴头）根据演出地点观众的口味，串联一批一专多能中等水平演员和演奏员组成小分队，到一些城镇进行短期巡回演出，所得利润不上交国家而在参与者之间分酬，“穴队”实行成文或不成文的有偿合同制。

形成“走穴”原因，有以下3点：1、艺术院团人浮于事又无工作定额。1/3至2/3的闲散人员没有经常参加艺术实践的机会，能力得不到发挥，精神苦闷。2、工资收入低，经济压力大。3、院团内部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压抑着许多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 关于“走穴”的思考

《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对成方圆保定演出风波的调查以及由此引起的关于“走穴”的对话。

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说，团里规定不许演员在外私演。这种以捞钱为目的的私演严重干扰演出团体正常的演出后应向团里说明情况，演出费交团，团里按规定给她分成。

作曲家谷建芬认为“走穴”风容易使青年演员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但她也谈到助长“走穴”的一个原因是剧团臃肿，几百号人没事干。

几位在京的青年演员则认为，不演出才是耽误青春。她们说：“什么叫私演？你们记者晚上回家给外报写稿难道也要向领导汇报？在业余时间多干些事为什么就不行？”在谈到为什么外出演出不通知团里时她们说：“谁不愿走正当手续？可是外面来借人，十次有九次被打回去或变相不同意。”

孙志辉是这次成方圆演出的联系人，被称为“穴头”，他认为“走穴”是中国文艺界的大趋势。

还有人建议“穴头”以合法身份，国家照章收税，但马上有人反对：如果是这样，国家养活的3000多个剧团就成了为“穴头”培养挣钱的培训班，国家培养好一个，“穴头”请走一个。

## 1988年：商潮

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

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

——许纪霖《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

学者许纪霖在1986年第9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博得知识分子共鸣的文章。在“人民皆高”的洪流溃击下，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生存姿态呢？许纪霖试图在新时代为知识分子找到一条生存途径和心理途径，许纪霖将这称之为整个民族生死他关的大事。

相信这不是小题大作，1988 年的中国，经商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多少人安于循规蹈矩的现状？下深圳，闯海南，停薪留职，创办公司，成为当时勇敢者最为时髦的行动。无数的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都曾心动神摇，纷纷下海，尽管后来有许多人回头是岸，也有不少人终于成为人人称羡的“大款”。

本年度是一个开放的年度，从古以来受到轻视的商人，成为本年度最具光彩的象征。私营企业开始悄然涌起，国家统计局统计表明，雇工 8 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已达 22.5 万家，而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80% 下降到 57.5%。

一些小道传闻和报刊消息不断动摇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

北京前门的一位老大娘靠卖烤红薯，一年收入过万元；广州一位初中毕业的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个服装摊，几年下来已腰缠万贯，“万元户”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嫉妒又羡慕的时髦称呼。要知道，本年度首都北京的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只有 172 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 182 元。1 万元是他们 5 年工资的总和。

关于经商的大量民间流行语开始诞生：

“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

“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

新的“读书无用论”在社会酝酿，北京地区招收 89 级研究生，计划招收 8600 名，但报名人数不足 6000 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学生的择业方向已偏向于急功近利，莘莘学子已无法安坐书斋。

在本年度，他们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29 岁的王宗明在 7 月毕业于哈尔滨东北农学院，以优秀的论文通过博士答辩，获得兽医学科的博士学位。这之前，王宗明曾由四川农业大学毕业，考取东北农学院硕士生。受到长达 9 年高等教育的王宗明却因分配问题陷入困境，黑龙江省最大的兽医研究单位——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无此专业，没有收留他，母校东北农学院编制已满；王宗明已联系到西南民族学院，但黑龙江省规定：博士生外流必须交纳 5000 元至 20000 元的培训费。家境贫寒的王宗明哪里能拿出这笔当时看来庞大的费用，为维持生计，王宗明无可奈何地在东北农学院校园旁摆起了个小烟摊。

生动的现实教育了我们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教授卖烧鸡、博士摆烟摊的年代，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在本年度显得无足轻重，这是 1988 年的困惑。

长期以来第三产业的巨大空缺为人们提供了市场机遇，而 1984 年以来价格双轨制的实施，又为流通领域内“官倒”大开方便之门。

早在 1984 年，国务院下文，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以利于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这就是促使无数皮包公司诞生的价格双轨制。同一种商品，两种不同价格，为权力与金钱的互相转换搭起了桥梁。

一张执照，一个皮包，一部电话，就是一个公司；一张名片，一个帐号，一次倒卖，便能赚来无数钱财。

这一年的头 5 个月，北京新增公司 700 家，上海猛增公司达 3000 家，深圳的国贸大厦里云集有 300 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国公司达 47.7 万家，而其中官办公司成为热点。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 2 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

上海市的统计，本年度由上海市各类党政机关团体兴办的企业达 361 家，官商公司 122 家，650 多名党政干部担任公司职务，绝大多数公司属流通领域的商业性企业。

在国家工商部门注册的公司从业人员本年度达到 4000 万人，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 1/4，此外，更有数不清的掮客在到处牵线搭桥，人们戏谑地称之为：“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70%的公司从事着流通领域的经营，很明显，倒买倒卖是公司主要运作方式。

年产 1.2 亿支蓝天牌牙膏，年用铝材 1000 吨的天津牙膏厂，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有色金属订货会上，竟然没订到 1 吨铝材。国家牌价 1 吨铝 4400 元，但有价无货，私下交易是每吨 1 万元。蓝天牙膏厂 1987 年创下了 500 万元的纯利润，但现在光购买原料就得多付 600 万元，还有 100 万元的差额让厂长整日愁眉不展。

沈阳的“双喜”牌压力锅，在我国是畅销不衰的名牌产品，现在也成了“官商”眼中的肥肉了“这一年，先后有 7 个政府部门到压力锅公司，以出厂价调货，而生产压力锅需要的铝锭，原本只要 4000 多 1 吨，但经过“官商”层层加码，到厂里已涨到 5500 元，压力锅厂的厂长现在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广西某港口有 5 万吨进口尿素，6 个月未离港，反复炒卖，层层加码，涉及了 60 多个单位，其中绝大多数的公司与农业无关。

利润是惊人的，“万元户”不是人们称羡的对象吗？现在 1 吨建筑材，平价拿货，议价销售，1 吨就赚 500 元，只要拿到 20 吨平价货的批条，倒手就成“万元户”。

众多的公司，表面经营的是一批批商品，实际上贩卖的都是一次次的权力。

从 1987 年到 1988 年上半年，国家工商局共查处了 95 起倒卖生产资料的大案，其中的 58 起属于物资主管部门所为。

“官倒”的迅猛发展，给社会政治、经济已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本年度 10 月，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其中的重点就是流通领域公司的政企不分问题，决定要求取消公司的行政职能，要求严格执行机关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盛极一时的“官商”终于开始有所收敛。在今后，权力与金钱之间也没有像本年度这样可以肆无忌惮地划上等号，但更加严酷的市场竞争却等待着每一个人。“官商”只是商品经济中一次失误和过渡。

再回到许纪霖的论述，在回答商品经济对于知识分子的挑战时，他说到：

“社会的商品化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当中国终于摆脱了历史阴影的纠缠，开始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时，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责任去催生这个新社会的胎儿。

“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生存危机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古老的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这样的转型也势必



要求每一社会阶层实现相应的转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战胜了这一挑战，在现代商品经济中确立自己的地位——那种既在这一关系之中，又超越此关系之上的地位——的时候，他们才称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今天看来，这对于“全民经商”浪潮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件艰难的心理苦役。

### 年度记事

#### 抢购风潮席卷全国

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的市场价格放开，从这天起，全国各大中城市百货公司和烟酒门市部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北京、天津、上海的商店在开市后的几个小时内，准备供应一天的烟酒全部被抢购一空。当天下午，北京30多个销售点协调行动，价格上浮，全国各大城市也分别在29、30日两次调整价格，才使抢购烟酒的局面渐趋稳定。进入8月份，社会上盛传9月1日全面涨价的“小道新闻”，从8月中旬开始，各地先后出现抢购先兆，在上海，8月17日、18日，抢购的迹象已渐明显，火柴、肥皂、洗衣粉、毛巾、被单、铝锅等成为热门货。从8月19日起出现全国性抢购狂潮。以上海为例：皮夹克、鸭绒被、驼毛被、羊毛毯、毛巾毯、毛线、床罩、棉毛衫裤、汗衫背心、洗衣机、吸尘器、油烟脱排机、高档录音机、录像机、金饰品等均在被抢购之列。银行门前提款的人拥挤不堪，上海银行告急。上海华联商厦每两分钟即售出一台洗衣机，一天售出500台，8月27日这天现金销售达230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8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上海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凭票供应火柴、购买铝锅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户口申请购买。29日至31日，因物价未全面上涨，抢购风才自然平息。

#### 甲型肝炎流行上海

1月，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爆发甲型肝炎。全市总发病人数为310746例，报道死亡47人，损失至少4亿元。在浙江也有7万人发病。

此次甲肝爆发，在华东地区及全国引起社会恐慌。甲肝爆发原因，为上海市民食用来自启东沿海的被污水污染的毛蚶所致，发病的另一主要原因在于上海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城市建设老化，地下排污系统落后，致使传染病爆发后得以迅速流行。

### 灾月

1月7日，从广州开往西安的272次旅客列车在湖南永兴县境内的马田墟车站发生重大火灾事故，34名旅客死亡，26名旅客和4名路内职工受伤。京广铁路中断行车40多分钟。事故原因是由于旅客违反规定，携带易燃物品上车酿成的。17日，从三棵树开往吉林的438次旅客列车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境内的背荫河车站发生与货运列车相撞事故，伤亡90人，铁路运输中断。1月18日，西南航空公司222号伊尔18型客机从北京飞往重庆，在重庆白市驿机场附近坠毁，10名机组人员，98名中外乘客全部遇难。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发生严重的颠覆事故，造成当场死亡90人，重伤66人的重大事故。

针对这些事故，国务院都分别及时采取措施，作了妥善处理。

#### 满负荷工作法

“满负荷工作法”是当代中国企业中一种系统的科学管理方法。1985年由河北省石家庄市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首创并实施。他参照国外同行业厂

家的先进指标和国内企业的升级标准，把质量、供销经营、设备运转、物资使用、能源利用、资金周转、费用降低，每人工作量和工时利用等 9 项要素制定成“满负荷工作法”。

在实施过程中做到逐步推进，层层落实，与职工个人报酬挂钩，并搞好各种减轻职工生活负荷的福利设施，形成“效益提高、财富增多、生活福利条件改善、工作劲头足”的高节奏、高效率、高效益的良性循环。

#### 邓颖超谈“安乐死”

据《人民日报》报道，去年 12 月 24 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北京医学哲学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会联合邀请了 30 多位医学和哲学界人士座谈关于“安乐死”的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今年 1 月 22 日在《午间半小时》节目播出了讨论会的录音，节目组收到了邓颖超的来信。邓颖超在信中说：“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了关于‘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这是我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 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建国前罪行

4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公告》说，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的日益增多，这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的“三通”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为此，对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和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来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应遵守国家的法律，其探亲、旅游、贸易、投资等正当活动，均受法律保护。

#### 海南省设立

1987 年 8 月，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方案，建议撤销海南行政区，并将其所辖区域从广东省划出来，单独建省。中共中央于 1988 年 2 月决定设立中共海南省（筹建）工作委员会，许士杰为书记。4 月 13 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海南建省，同日，七届人大通过关于建立海南经济区的决定，同意把海南岛建设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可以给予比其他经济特区现行规定更加放宽的政策，经济管理体制也可以更为灵活。海南建省后简称“琼”，人民政府驻地海口市。

#### 大邱庄的“农业奇迹”

大邱庄原来有 11 个生产队，1200 多个劳动力，种 4000 多亩土地，最高年产粮 120 多万公斤。现在他们大多数人都进了工厂，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农业状况却越来越好。请看下面一组数字：

1982 年 215 人，产粮 165 万公斤；1983 年 173 人，产粮 170 万公斤；1984 年 163 人，产粮 190 万公斤；1985 年 90 人，产粮 202 万公斤；1986 年 34 人，产粮 215 万公斤；1987 年 15 人，产粮 225 万公斤，

到今年，农业队又减为 9 人，计划产量还能增加。现在大邱庄的农业劳动比例和人均产量已接近美国水平。

他们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大量劳动力转到工业上去以后，经济实力大增，给农业不断投入，从 1983 年至 1987 年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对农业投资达 580 多万元，农田作业从种到收，已全部实现机械化。在那里，农业

已成了令人羡慕的事业！

#### 名烟名酒价格放开

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各地从7月28日起，放开名烟名酒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同时适当提高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的价格。

国务院决定，为了继续保持市场稳定，今年下半年国务院不再出台新的提价项目，并严禁各部门、各地区在烟酒价格变动期间乘机“搭车”涨价。

#### “官倒”祸国

《经济日报》报道，当前，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原因何在？除了一部分企业利润转移，相互抵销的正常价格上升因素外，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

我国流通领域的改革方向是多渠道，少环节，而这些公司就像一个环，紧紧套在流通渠道上，使得生产资料必须从这一个个环中通过，使得企业只能到这一个个环中去讨食。

今天参加倒腾的，许多是官气十足的公司。江西省计委办了一家建筑工程咨询公司，规定所有基建项目必须经该公司论证评估，否则计委不予立项。还有的就干脆是由官员们办的公司。一些离、退休干部，不思如何发挥余热去推动经济发展，而是到商品流通领域中施展余威，老骥伏枥，志在千万（元）。

1987年到1988年上半年，国家工商局曾排出3批317件投机倒把大案要案，其中95起是倒卖生产资料，这95起中就有58起是物资主管部门搞的。他们利用权力将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平价调出，而后投入市场，转手高价卖出。越是紧俏的生产资料，越是他们手中的“玩物”。

#### 《汉语大词典》开始出版

早在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家黎锦熙等就曾筹备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建国后，1956年在制订科学研究12年规划的语言规划时，吕叔湘曾起草编纂《汉语大词典》。后因大跃进和“文革”而未果。1975年5月，出版部门在广州召开词典规划座谈会，再次提出编纂《汉语大词典》。全书按词的本义、引申义、修辞义来划分和排列义项，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揭示词的词义结构，第一个字所带词目，其义项和书证均比现有词书多好几倍。经过13年的努力，终于在1988年出版了第一、二卷。全书预定12卷，外加索引和附录一卷共13卷。预计收录语词37.7万条，共5000多万字。计划在1992年左右出齐。

#### 关于脑体收入倒挂的调查

北京市今年初对职工收入情况作了一次调查，根据工作性质将职工划分为：脑力劳动者，主要包括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机关干部和教师四部分；体力劳动者，以工人和服务人员为主。收入比例结果：脑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172元，体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182元，前者比后者差5.8%。

行业间收入差距是造成社会总体脑体收入倒挂的主要原因。在工业、交通邮电、公用事业、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等行业内部，脑力劳动者收入都略高于（或持平）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没有出现倒挂现象。但在脑力劳动者集中的部门，如机关，人均月收入128元，文体卫176元，教育136元，科研157元；体力劳动者集中的部门，如工业，人均月收入188元，交通邮电183元，建筑220元，公用事业187元，商业和饮食服务业190元。脑力劳动

者集中部门的职工收入明显低于体力劳动者集中部门的职工收入。

## 1989年：中国大宴席

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老婆告到纪检委，纪检委的书记说：该喝的不喝也不对。

——1989年民谣

1989年可真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六四”风波，通货膨胀，艾滋病，毒品，官倒，脑体倒挂，现代艺术使众多的中国人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状感到惶惑不安。

本年年初，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历经18个春秋终于宣告建成，早一些时候，数以亿计的中國人在电视上观看了大坝合龙的壮举。

农业方面，社会主义农村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大邱庄模式得到推崇。

这个原先十分落后的村庄，在1978年至1985年的4次改革中，从单一的农业发展成以工业为主的农工商联合体，并成为我国农村中第一个产值上亿元的村庄。

据银行统计数据，本年度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近3800亿，居民手中存有1700亿元的现金，一切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

但是，从1978年以来的十余年里，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已积淀颇深，它注定要在某个时候得以集中暴露。

恶性的通货膨胀，使绝大多数市民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压力。国家公布的零售物价上涨率，1987年为7.3%，1988年为18.5%，1988年12月比1987年12月上漲了26.7%，对32个大城市的统计，本年度9月份以后，上涨率达到30%以上，这大大超过了国家标准25%的恶性膨胀指标，恶性的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恶果，对物价的不满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会与国家统计局合作，从1988年8月开始，对全国16个大城市的1.2万名职工进行了一次有关政治社会生活态度的问卷抽样调查，下面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1989社会矛盾的严重。这是《瞭望》杂志在本年度第2期公布调查的结果。

在回答什么是当前社会安全中最突出的问题时，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占46.1%，居第一位；认为“坏人在公共场所行凶无人教管”的占35.4%，居第二位。认为“重大经济案件的增加”和“杀人抢劫重大刑事案件增加”的各占27%。

在选择什么是政治生活中最需解决的问题时，“党风不正”被排在首位，占63%。“社会风气不良”居第二位，占55%。“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占28.1%。另外，认为党风比以前好转的只占22%，认为无变化的占50.4%，认为比以前更差的占24.4%。

在回答“你认为法制建设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时，认为“某些领导干

部以权代法”占 61%，认为“执法人员素质差”占 35%，认为“法制不完善”占 31%。群众对执法人员的评价较低，认为执法人员好的和比较好的只占 19%，评价一般的占 48%，认为较差和很差的占 30%。

在回答“你认为以下方面的问题会产生新的矛盾冲突吗？”时，认为“物价进一步上涨”占 64.1%，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形成贫富悬殊”占 35.3%，认为“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的占 23.4%。

这组题为“城市职工心态录”的报道，以权威的姿态指出：1989 年社会已酝酿起较为普遍的不满情绪，城市职工对党内腐败现象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问题意见集中。

类似的信息反馈到了中央，面对改革 1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邓小平在本年度 3 月底会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他的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10 年来最大的损失在教育。”

“我们最近 10 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了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虽然这次谈话的对象只是非洲的一个小国的总统。但它透露出来的信息决不可平常视之，在中国，这往往代表着党中央的集体认识。教育，还是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教育，还有思想的教育，是重要而迫切的。

稍后一点有人用“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来形容人们这段时间的不满情绪，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人们喜欢用“吃”来解释许多或物质或精神的活动。

林语堂曾以肯定的语气说过“中国人如若不在饮食之时找些乐趣，则其他尚有什么时候可以找寻乐趣呢？”而在这‘年，使用公款寻找这种乐趣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许多机关的干部，企业的厂长和公司的经理因此成为了中国现时现世的公款“美食家”。

请吃者的如意算盘是“酒杯一端，政策改变，筷子‘举，可以可以。”吃者的内心想法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知，谁知都白吃。”

结果是餐桌上的浪费惊人。

尽管中纪委三令五申禁止大吃大喝，但据保守估计，仅全国骨干企业，乡镇企业，县市地省级的吃喝费用，每年至少要花掉 800 多亿人民币，这笔钱可以组建 4 支航空母舰混合编队，或组建 40 个第一汽车制造厂，或支付全国 3 年多急需的全部教育经费。专家甚至认为：1989 年的物价上涨，吃喝风是原因之一。

联邦德国的经济专家撰文说：中国是一个奢侈的国度，大量的资金被迫硬撤下来，流入那张贫穷却又阔绰的大嘴。这位专家在中国期间，一定受到过隆重而又丰盛的宴席接待，但很显然，这没有博得他的好印象。

1989 年度，被称之为“吃喝专员”的陕西省经委副主任、原安康地区行署专员魏明生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魏明生调任省经委副主任未上任之前，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分头到 69 个单位去“告别”，大吃大喝 2 个月之久，还收取了 6000 元左右的礼品。

而安康是全国闻名的贫困山区，魏明生的吃喝拿，遭到新闻曝光后，

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魏明生因吃喝而被查处，但吃喝风却远远没有被刹住，随着城市餐饮业的畸形发展，吃喝风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到后来的 1993 年，吃喝风达到鼎盛阶段。

在经济发达的 1993 年的广州，五星级酒店最好的一桌菜定价 10 万元。广州酒家 1993 年推出黄金宴，一个月售出 100 多桌，达到极致的是在《中国青年报》报道的深圳一娱乐城，某投资集团定下五桌酒席，每席 18888 港币，加上酒水，一餐过百万。

对于刚刚告别饥饿的历史，经济远远没有达到小康的 1989 年，吃喝风成为腐败，官倒，行业不正之风的催化剂。

有吃有喝是经济发展的标志，而吃喝风又是社会畸形心理的体现，这对于改革转型期的 1989 年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实。

#### 年度记事

####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 6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分析了自 4 月中旬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反革命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会指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干警作出的巨大贡献。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认为，赵紫阳同志在这场斗争中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在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 改革开放要坚定不移走下去

邓小平 6 月 9 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发表重要讲话。

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极少数人先是搞动乱，后来进一步发展到暴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平息这场暴乱中，人民解放军、武警和公安干警表现了很高的觉悟，经受了考验。这充分表明，我们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社会主义制度的捍卫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邓小平说，这次事件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

使我们事业的步子前进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实行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基本的路线，基本的方针政策不变，但是，要认真总结经验，那些搞得对的就坚持，那些失误要纠正，不足的要加把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着眼未来。

#### 农村第一个亿元村

大邱庄模式是社会主义农村小地区经济的发展的一种新的模式。大邱庄隶属天津静海县蔡公庄乡，原来是一个十分落后的生产大队，经过 1978 至 1985 年的 4 次改革，大邱庄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大队发展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农工商联合体，成为我国农村中第一个农业总产值达亿元的村。它的特点是：（1）社会化的联合劳动。整个大邱庄公司是一个联合劳动组织，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基础上的、农工商各业生产者自愿联合的经济实体。这里，没有个体经济，没有自留地，个人都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都向公司领取工资。（2）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大邱庄的联合劳动是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一切生产资料归公司集体所有。公司对下属集体所有的资产和设备有权调拨、履行、更新和处理。各经济单位向公司承包，按合同与公司共同分配收入。（3）统包结合的管理体制。公司对下属单位实行统一的经营管理，制定发展规划；对总厂和各单位正职有任免权。下属单位采取不同形式的承包方法，总的原则是，既把人人经济利益同成果紧密联系，又注意采取一些措施调节各行各业人员的收入，使大家能在大体相同的平等条件下，按劳取酬，共同富裕。（4）新型的农工关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形成了工农之间相互支援、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第一，农业以大量劳动力支援工业。第二，工业以大量资金支援农业，扶持农业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现代化。第三，消灭了工农差别，昔日贫苦的社员成了现代化的农业工人，同工业工人一样领取工资，享受福利、劳保待遇。

1989 年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邱庄主要领导者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年巨变》，详细介绍了大邱庄的发展情况和经验。

#### 我国通货膨胀进入恶化阶段

国家公布的零售物价上涨率，1985 年为 8.8%，1986 年为 6%，1987 年为 7.3%，1988 年为 18.5%，而 1988 年 12 月比 1987 年 12 月上漲了 26.7%。另据对 32 个大城市的调查统计，去年 9 月份以后，其上涨率均在 30% 以上。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物价上涨率达到 7%~8% 以上，已属奔腾式通货膨胀；而达到 25% 以上，则称为恶性通货膨胀。按照学术界的一种见解，物价上涨率超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通货膨胀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国去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 22.7%，而去年 12 月与前年 12 月比较，物价上涨率已达 26.7%，已进入恶化阶段。

1984 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一直很高，从 1984 年到 1988 年，平均年递增 24.7%，而同期的社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率为 13.2%。这一时期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比同期社会总产值增长率大 87%。通货膨胀将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严重恶果，它会破坏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正常运行，对改革将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 班禅大师圆寂

1 月 28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

协会名誉会长、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因心脏病突发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他的行宫德虔格桑普彰逝世，终年 51 岁。

1 月 9 日，班禅从北京前往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 5 世至 9 世班禅大师遗体合葬灵塔祝殿——班禅东陵扎布南捷开光典礼。由于操劳过度，致使心脏病突发。

中共中央闻讯后，立即派中央候补书记温家宝及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率北京医院著名心脏病专家小组乘专机赶去抢救，但班禅经多方抢救无效。班禅圆寂时，遗体呈卧佛姿式，遗容朝北，供僧俗众群众瞻仰、朝拜。班禅的遗体将被长期保存。

1 月 30 日，国务院决定：在日喀则市修建第十世班禅遗体灵塔和祀殿，由民主管理委员会办理第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寻访、认定等事宜，报国务院批准。

#### 邓小平说 10 年的最大失误是教育

3 月 23 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京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卡·穆塞韦尼时指出：“我们最近 10 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 中国大陆人口已达 11 亿

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北京市政府 4 月 13 日在京召开的“中国 11 亿人口日”大会，向人们再次敲响了人口的警钟：中国大陆人口到 4 月 14 日达到 11 亿，比 1949 年建国时翻了一番，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会上讲话说：人口多，耕地少，人均占有资源少，是基本国情，严格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相协调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

#### 《中苏联合公报》发表

《中苏联合公报》1989 年 5 月 18 日发表。《公报》说：邓小平主席和戈尔巴乔夫主席举行了会晤，就中苏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杨尚昆、赵紫阳、李鹏分别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见和会谈。中苏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中苏两国最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的利益。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将中苏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双方主张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境问题。中国方面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联方面支持这一立场。双方声明，中苏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中苏两国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当摒弃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和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的企图和行动。中国方面重申了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不同任何国家结盟的立场。中苏双方同意，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



## 1990年：年轮

每一次发现，都是新感觉。

每一次流泪，都是头一遭。

——电视剧《渴望》插曲

“人的命运有穷通之别，有幸与不幸。但无论哪个人，大致都不愿意拿自己的经历来和别人的交换。因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就是他的历史。历史不能篡改，也不能拿来交换。失去了历史的人也就失去了他自己。失去历史的人不曾存在过。

“人的资质有媸妍美丑之分，有聪明和愚鲁。月明之夜揽镜自照，无人之际躬身自省，人们也许会问问自己：我之为我，是怎么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于是你就想起昨天。昨天的你，昨天你经历的事。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你走过昨天，成了今天这副模样。”

翻开 90 年代的页卷，忽然想起了北里先生为《世纪档案》所作的这篇序言。整个 90 年代的形态，仍然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和发展着。90 年代是记忆和现实水乳交融的年代，当我们叙述到 90 年代以来的历史时，也许我们觉得最大的庆幸是，这历史终于有机会在我们面前显现出比较正常和纯粹的形态。尽管 90 年代的风云际会在我们眼里更不像的——就是一场“历史”？但我们踏上新的一轮“人民记忆”的征程时，我们心中回荡的是 80 年代中期由刘索拉作词的一首歌曲：

我想最后向你舍别，  
我想最后转过头说再见，  
忽然一段熟悉旋律，  
在我耳边时隐时现。

1990 年的人们都记得，在这一年，神州大地异乎寻常地掀起了“毛泽东热”和“红太阳热”。这一现象在文化学者那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法。但在更多的人眼里，这预示着一种历史观的回归，人们赞美毛泽东，追思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和清廉，并不代表人们当真想要回到毛泽东时代。它只是表明了一种情感——一种经过改苏开放价值震荡之后重新体验被冷落的本土历史的情感。在 1990 年，中国人经历了精神解放之后的繁荣场面之后，进入了一个更加务实的历史阶段。虽然外部世界增添了新的冲击，开放的中国也遭遇了某种封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切使得进入 90 年代的中国人的情感变得更加内敛，令他们以更深厚的态度看待本土历史。有人这样说：没有一个人会庆幸在苦难和匮乏的日子里做一个中国人，但是，既然这段苦难和晦气的历史是你的以及你的父辈的一部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宣称你已经“超越”了这种历史和民族形态。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没有因为同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交流而变成了别的民族，也是基于这个前提。

90 年代之初形成的“历史热”，一直持续到现在。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经过探索和争论，历史评价的钟摆渐渐地开始回归原位。90 年代形成的趋势是：中国人彼此的认同感日渐浓厚。90 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但唯独中国并未像有人希望的那样加入这种乾坤改变的大跳跃。相反，中国人的内部变得更加沉稳和关注自身、关注本土和现世的价值，一个重要的迹象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解放”，已经从偏重于观念而转化为偏重于物质。虽然中国人的生活没有摆脱“跟着感觉走”的痕迹，甚至，商品经济的冲击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某些人的迷信心理，但总的来看，命运的不可捉摸对大多中国人已成为历史。

80年代的思想解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祉。

90年代开始的追求又逐渐消除着人们因价值震荡而产生的失落和乖误。

正如我们所幸看到的，新一轮的年代虽然也产生着许多新的问题，但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良性运转，也产生了巨大的吸纳能力。

当我们的后代书写从这时开始的历史时，他们会对我们正在做着的一切抱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会不会齐声唱道：“他是一个呱呱叫的大好人……”

总之，他们会不会感激我们这一代人帮他们告别了晦气和哀伤的历史？他们会不会把我们正在做的，看上去是平淡无奇的事情视为一座里程碑？

这一切的答案，人们正在书写。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许多人正在为现在的年代即将成为历史而激动不已。

1990年大事记

北京解除戒严。

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亚运会标志着中国已被公认为亚洲体育强国。

《渴望》和《围城》成为本年度文化热点。

## 1991年：游荡的茨冈

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

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

——新民谣

90年代的钟声响彻在北京城的时候，细心的市民会发现这样的场景：

街头“卖牛奶”的第一声叫卖，远比街心花园的老年迪斯科来得更早；而午间建筑工地“吭唷”声，又比舞厅“蓬嚓嚓”显得更欢；“叮叮叮”的门铃声，时常打搅你的午睡；手持各种证件的“灾民”，贸然闯进机关和住户，在困惑不解的主人面前，操起难懂的方言，顽强地推销自己或自己的产品。

在成都，流动人口正神奇地变成这个古老城市的又一景观，他们的影子无所不在，从事的劳动无所不包。广大市民在这一年开始惊呼：吃苦耐劳的农民，已经开始把买卖做到你家门口了！城市是块宝地，又是块巨大的“洼地”，农村劳动力每天每时都一刻不停地朝这洼地里流动和倾泻。

腊月将尽，他们怀揣着挣来的钱回家过年，元宵前后，当空气中还萦绕着爆竹的硝烟味，城市居民还在津津有味地享受着春节的喜悦和各种口福

时。他们——过完春节的农民们，又整装出发了，背负各种梦想，以更汹涌澎湃的气势，再次向中国的各大城市进发，川军，皖军，豫军，鄂军……仿佛从天而降，汇成了强大的民工潮，这股富有勃勃生命力的大潮席卷而至，猛烈冲击各大城市的车站码头。这年开春，人们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类似的主题：郑州火车站，不堪重负；南京汽车站，人满为患；沿长江客运码头，民工如洪水般汹涌。

街头巷尾，车站码头，顺着街沿，倚着桥栏，那些来自山区的“找工作”的人或站或立或蹲，那沾着灰尘，涂着黄泥的衣鞋，那或背或放的大花被盖，把街头点缀得不伦不类。一本本摊开的家具图，一辆靠墙停放的有些生锈的三轮车，一把把被砖沙磨薄的磨亮的砖刀，一副副在路边支起的钉鞋掌，一柄柄立起的滚刷，……鲜明地向过往行人昭示他从事的职业或“工种”。

到本年止，中国 23 个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流动人口总量达 1000 万，其中，上海 183 万，北京 130 万，广州 110 万……，综合上海、北京、沈阳、成都、西安等 6 的城市资料，外来雇工比例如下——

建筑业雇帮工占流动人口 25% - 30%，一般居住两年以上；从事服务、修理业的占流动人口 10% - 15%，一般居住几月，长则数年。

除了摆摊卖水果、蔬菜，裁剪之外，还有从事搞搬运，拉蜂窝煤，补鞋，磨刀，打家具，收破烂等同市民密切相关的五花八门的劳动，他们还乐于充当医院、学校、机关等单位所需要的勤杂工，花木匠，炊事员甚至看门者守更人等，青年女性多受雇于旅馆业、饮食业的个体户承包者和家庭保姆。

盲流，既是一个象征，又是一个隐喻，在过去，它几乎是愚昧、肮脏的穷要饭的同义词，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因为贫困饥饿的威胁，万般无奈之下流落城市里的，又找不到谋生的就业门路，只好乞讨为生。

如今不同了，那张张朴实的面孔显露出的每一个表情，都在改变城市人的传统观念。

这一年，早已辞去村长职务奔向城市的张村长衣锦还乡，这消息传遍大别山腹地的村落，村民们纷纷上前讨教取经。当村长离开的时候，在迈向外地的山路上，外出打工的人流使得寂静的山路热闹起来，成为这个村子百年来一大景观。

这一年，在大巴山一个山村里，几乎关闭的储蓄所，忙得四脚朝天，腊月三十前 5 天，存款额急剧上升，竟达 30 万，全部为外出打工经商回乡过年的农民所存。

“青壮出门去，唯留童妇吏”，内地山区，老区，贫困地区劳动力不断外流，惊动了当地党政领导，在苏北农村进城打工占 70% 以上，淮河中游的南岸有一个 54 万人口的小县，外出人口达 12 万之多。

“要想富，就得雇”。城市成了他们唯一选择的营地。

在这一年市民的记忆中，城市越来越像城市，城市也越来越不像城市。

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条条大道越来越宽坦，农贸市场到处开花，服务项目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昔日的“乡巴佬”们充斥大街小巷。

进入市民家庭，衣衫呆板，口音古怪的外地人占据了本该市民们占据的位置，中国的大城市成了“大县城”。

在这一年里，市民们的失落感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暴露更充分。

这一年，城市市民在喜悦地享受民工给都市经济生活带来诸多方便时，也承接外来人口带来的骚扰和困惑。

这一年的某个傍晚，上海苏州河面一艘神秘的小船里，几个江浙民工在昏暗的船舱里分赃，多达 10 余万的钞票是他们在 10 余家工厂作案的“成果”。

同一时刻，在成都九眼桥劳务市场的一个棚子里，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妇女产下了她的第五个女儿。

也是在同时，一个叫安子的姑娘匆匆行走在深圳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这位几年前闯进深圳的山区小姑娘，带着白天打工的一身疲倦，走向深圳大学夜大班，开始构思她的系列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这部书使她成为深圳市家喻户晓的人物，并成为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之一。

90 年代的震荡，将以某种社会结构的改组为序曲。

1991 年大事记

5 月至 7 月，我国江淮地区暴雨成灾，受灾人口 7500 万，直接经济损失 160

亿人民币，我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影片《周恩来》、《焦裕禄》获很高上座率。

吸毒及毒品问题受到社会关注。

## 1992 年：大扫毒

1992 年 8 月 31 日，云南省 3000 公安干警和武装警察部队气势雄浑地以

排山倒海之势包围了平远镇，对贩毒、贩枪、贩黄的一股恶势力实施严打

……

——1992 年《中国西部大扫荡》

对于 60 年代以后出生的“第四代”人来说，最早对于毒品的认识来源于电影，在影片《林则徐》中，我们看到林则徐把成箱的鸦片在虎门就地销毁。虎门销烟并没有杜绝鸦片从海上长驱直入，直到新中国成立，开展的大规模禁毒运动两三年内就彻底荡除了残害中国达百年之久的烟毒。而进入 90 年代，随着我国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毒品又开始严重地侵扰盘旋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着 4000 多公里国境线的云南省，由于紧靠“金三角”毒品产区，首当其冲地成为境内外毒品贩子的贩毒基地。在高额利润的引诱下，一只只毒手从金三角引向云南，又从云南引向内地。

80 年代初，云南就成立了禁毒领导小组，公安部门组建了专门的缉毒队伍。

1989 年 8 月云南省率先通过第一个地方性禁毒法规《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但无孔不入的毒品，禁而不绝，日益猖獗。

在公安部严重关注的云南省平远街，就是名闻全国的毒品藏匿兜售中心。这是一座畸形繁荣的小城镇，这里还是枪支弹药的地下黑市场、贩卖走私车的黑窝。

1992 年的平远街，俨然是国家的“法外天地”：人们不必办户口和身份

证，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种地不交粮，经商不纳税，买汽车不挂牌。在这儿家家私藏武器，贩卖枪支；户户经营毒品，盗窃、抢劫、杀人屡屡发生。公安分局被砸毁，执行任务的警察被打死。文山州政法委书记带人去平远街的泥村抓罪犯，竟被罪犯甩出的一个手榴弹炸死。

平远街有各类脏车 500 多辆，其中不乏军车、警车。云南省公安厅八处 212 吉普车，被盗至平远街又高价卖到山东省霸县；第十四军团一辆野战用通讯车被盗卖到平远街，公安局做了大量工作，部队花 2 万元才赎回；个旧市公安干警追查脏车到田心村，一进村就被几十名手持冲锋枪、手枪的恶势力包围。

公安部对平远街恶势力的猖狂已记录在案，四、五月间，公安部派出秘密工作组进驻平远，身着便衣的公安部警官们站在公安分局大门口，平远街的毒贩见是外地人，主动围上来招揽生意，明目张胆地询问：“要不要黄色录像带，要不要毒品？”调查组成员用手比划枪的样子，毒贩们又高兴地引他们往家里走，机枪、冲锋枪、40 火箭筒、反坦克雷、手榴弹、自动步枪、手枪等轻重武器琳琅满目，平远街成了境外贩运武器的中转站。比贩枪更猖獗的是贩毒，从境外把毒品运到平远街，然后再贩运到广州、香港、澳门，平远街成了国际贩毒的大通道。

平远街活脱脱成了魔鬼当道的世界。公安部在一份向中央政法委汇报平远街问题的报告中写道：我们认为平远街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不能再拖下去了。绝不能容忍如此无法无天的现象继续发展下去。

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的指示下，云南省决定对平远街开展大规模严打斗争，以省公安厅厅长刘选明任总指挥的严打指挥部建立起来。

8 月 29 日每组 6 名公安人员、10 名武警组成的 20 个抓捕组化装潜入平远街的附近，大部队在 30 日到了离平远街数十公里远的铕卡农场。

31 日凌晨 7 点，严打行动正式开始。20 个抓捕组同时逼近 20 个罪大恶极罪犯的家。几千名武装警察包围了宽达 38 公里的平远七村。平远街的大毒枭们用贩毒的高额利润修筑了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式别墅，建筑奇异的亭、台、楼阁间暗藏着地道、夹皮墙、炮楼，架设着机关枪，钢筋水泥的碉堡，易守难攻。抓捕马明的公安武警部队一开始就遇到顽强的抵抗，马明罪恶累累，他贩毒、贩枪、打砸公安分局、炸伤公安干警，罪孽深重。他的住宅工事坚固，有两道高墙，两道铁门，楼上楼下囤积了大量武器弹药，室内有紧急通道、夹皮墙，院内水井中还有藏身暗道，马明睡觉时手枪压在枕头下，床头靠着冲锋枪，卧室里还放着手榴弹，他以火箭筒、催泪弹、手榴弹、冲锋枪等多种武器顽抗，经过激烈战斗，马明被当场击毙。

由于毒贩的准备充分，公安干警没有重型武器，没有装甲车掩护，缺乏防弹背心。在围歼大毒枭马总林的战斗中，公安干警付出了沉重代价：苏太德、高文亮、庞如宝壮烈牺牲。多名战士受伤。

按照我国法律，贩毒海洛因超过 50 克可判处死刑，平远街 800 名毒贩，没有哪一个贩毒少于 50 克，抓住是杀头，对抗是死罪，反正都是死，凭借坚固的堡垒和众多的武器，平远街的毒贩们准备对抗到底。

在严打的第二阶段，总指挥部实施强大军事威慑下的政治进攻，洛阳调来的防爆装甲车开到了战斗第一线，高倍红外线夜视仪安装就绪，100 件防弹背心运到了指挥部。

政治思想工作是我们的老传统和一大法宝，现在，禁毒工作队开进了

平远街，一户一户地宣传公告精神和宽大政策，强大军事压力下的攻心策略取得成功，不费一枪一弹，已逃进山中的 200 多罪犯下山投案自首，16 个贩毒集团，800 多名犯罪分子也相继交待罪行。毒贩的犯罪行为是惊人的：马国选一次藏枪 13 支，“女枪王”林红玉一人交枪 126 支，从大毒枭马武生的鸡窝里搜出海洛因 32400 克，马赛伟一次就交出海洛因 72800 克，平远街公认的“穷光蛋”王华聪一次就吐出毒资 200 万元。

一批顽固分子被严惩，平远镇副镇长林洪恩、毒贩沙国梅、马平福等被宣判死刑。

平远镇 7 个村庄严打 80 天，抓获惩处 854 名罪犯，缴获各类枪支 1000 多支，搜出毒品 1000 多公斤，毒资 1000 多万元。

平远街无法无天的状况改变了，恶势力瓦解，地区新政权建立起来，一切又走上法制的轨道。当然，毒品不可能因此就销声匿迹，但平远街的严打，表达了中国政府严厉打击贩毒的决心和力量。

1992 年大事记

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经济。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实际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

“第二职业热”兴起。

## 1993 年：站立的艰难

站直喽，别趴下！

——90 年代流行语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夏衍的《包身工》，那是中学课本里必选的课文，“芦柴棒”们的非人生活，拿摩温、东洋婆的残忍压榨，曾激起大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对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同时也激起年轻一代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之情。至今，我们仍能记住这些句子：

“在一种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膨大了。”

“在这千万的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器，制度和在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

报告文学《包身工》屡屡被选进 20 世纪文学的集子里，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该文的文学性，而在于其思想性、真实性。

站在 1993 年的土地上，回望 1936 年的大上海，夏衍的《包身工》总算让我们看到了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背后那令人心恸的真实。

而社会的良知代言人——新闻记者一度却看不到这种晦暗的现实。

1993 年大陆新闻界一片混乱，新闻界在老百姓眼中成了臭不可闻的大粪缸，有偿“报告文学”就是粪缸里的臭狗屎。

1993年4月23日，美国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时报》刊登《大陆记者生财有道》。

同年5月10日，香港《联合报》发表《记者不耐清贫，金元新闻风行大陆》。

同年8月5日，台湾《联合报》出现《大陆媒体有偿新闻引起中共重视》的大幅标题。

面对日益泛滥的有偿新闻和海外舆论的挖苦嘲讽，大陆新闻界一些老报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和忧虑。5月下旬10名老新闻工作者集体签名上书中央，大声疾呼，新闻事业正在滑向拜金主义的泥淖。随后中央中宣部也召开座谈会，认为新闻问题，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

此外，一些新闻界有识之士公开发表文章对新闻界的丑恶现象进行批判和揭露。

本年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同时还有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制约性规定。

在这种背景下，本年度我们有幸读到了如下充满正义精神的新闻，这不知是中国人的福气还是中国人的悲哀？

《妇女生活》以《今日“包身工”》为题，详细披露了福建石狮一合资企业是如何残酷地对待“中原打工妹”的。

《民主与法制》以《打工妹之死》为题，报道了广东南海市中外合资企业丽宝床上用品公司是如何滥用职权，侵犯工人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的。

当11月19日，深圳一家合资公司的一场大火无情地吞噬了被牢牢地紧锁在铁门里的82名女青工的生命之后，中国的主要新闻媒介立即迅速地报道了这一事件，指出：该企业“别出心裁”的野蛮的管理方式，是造成此次惨剧的主要原因。

12月6日，《劳动报》以较大的篇幅报道了上海东港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为了寻找一枚白金戒指，强行将31名男女工人脱去内外衣，搜遍内衣、内裤和胸罩的侵犯工人人身权利的事实。

……

将近半个世纪精心构筑起来的劳工神圣精神堡垒在本年度轰然倒塌，灰飞烟灭，历史巨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雄壮声音也仿佛别梦依稀。

本年度，中国人是否应该说不？

当湖北罗田县廖家坳乡工商所长听到本地“打工妹”不幸死亡，前往广东南海市丽宝公司讨个说法时、该地派出所和特警人员反以暴力手段对他进行威胁，甚至还将为惨死的“打工妹”打抱不平的人抓起来，送进监狱，港方老板公然扬言，“我要把你们送到香港黑社会手里，让他们来收拾你们。”

我们依然记得住《包身工》结尾的句子：

“不过，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这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这些句子曾经写在我们已发黄了的日记里，深深刻在我们的心灵上。

在后来的日子里。当一位韩国女老板强令一个打工仔下跪赔罪，这位打工仔昂起高贵的头颅，大声说“不”的时候，全国人民是何等的欢欣鼓舞！

在本年度的日历上，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5月17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称他们有几名女青年在乌鲁木齐市某餐厅工作时，受到中方雇主的虐待，并扣留其护照，限制其人身自由。乌鲁木齐公安局雷厉风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于1993年5月29日将包括哈国6名女青年在内的33名“洋打工妹”遣返回国。四川省也于同时遣返9名“洋打工妹”。

就在刚送走“打工妹”的同时，又从乌兹别克斯坦来了一拨“打工仔”。我们该怎样做老板呢？

在这一年里，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麦当劳在全球最大的一家分店，在员工的更衣柜里出现一张张神秘的传单，这份名为《自己人》的传单就劳资双方的摩擦向老板下了“帖子”，这份署名“自己人启”的传单宣称：

与其得过且过，何不据理力争，徒劳的轻信和等待，得来的永远是别人的说一不二——既然已不再幻想有谁来做救世主，那么，我们只能努力地去做到：自己对自己负责。

1993年大事记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威胁”两种论调开始出现于国际新闻界。

顾城血案震惊年轻一代知识青年。

北京申办奥运活动失败，中国足球队兵败伊尔比德。

## 1994年：大撒把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也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北京人在纽约》

整个90年代的上半叶，能到美国去成为中国青年引以骄傲的事情。美国，这个遥远的西方国度，在中国青年心目中的份量远远超过其他事物，超过了大款甚至神圣的恋爱，数十年前的美国人做过的“美国梦”，现在如同流行感冒一样传遍了中国。

从1990年到1995年，美国热从沿海到内陆，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据称，托福、GRE强化班遍地开花，留学生文学畅销不衰，纽约、旧金山、哈佛、斯坦福……地球另一半的学府名录、风土人情，人们谈起来兴高采烈，头头是道。我们总又有那么一两个朋友经过苦斗到了那片新大陆，他们带来的全新的梦想使我们夜不能寐，人们为此而苦读。

到本年度为止，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赴美的学子们许多已学有所成，业有所展。

1985年夏天，身揣40美元踏上美国土地自费留学的周励女士在美国开始了奋斗生涯。

她做过保姆，端过盘子，数年之后，凭着中国女性特有的顽强精神，她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在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拥有了自己的寓所，还可以无忧无虑去欧洲度假，这个曾在北大荒奉献出



青春的知青感慨而又骄傲地谈到：“谁又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坐在白色市政大厅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与纽约市长侃侃而谈，或是在气氛欢乐而幽默的圣诞晚宴上，周旋在美国富商巨子与社会名流之中？究竟是机遇或是命运，还是一股什么力量，使一个异国女子能在美国这块竞争激烈的大地上站住了脚？”

周励的自传《曼哈顿的中国女人》1992年第一次发行，就印刷了27万册，半年之后再次加印，周励的故事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神·话般的窗户。1986年赴美的张晓伍，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经过一番拼搏，他在美国律师界已崭露头角，被称为中国政策与法律的专家。本年度，他回到中国申请成立贝克-包利考夫律师事务所中国分所，并于当年9月获得国家司法部批准。

成功的典范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

到美国去，途径有很多，探亲、结婚、偷渡，当然，最普遍的是走留学的路子，除了极少量的国家公派，本年度绝大多数留学生是自己拿钱，但并非有钱就能出国留学，还过得关斩将。

TOFEL是美国大学入学的英语考试，不知是谁最先把它翻译成“托福”，只有通过了考试这一关，托它的福，学生们才能领到走入美国的通行证。GRE是研究生的英语入学考试。这些是必需具备的条件，当“托福”及GRE成绩达到很高水准时，预备留学生们还可能获得数千至上万美元不等的奖学金，无数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择取这条狭窄的道路，以至于美方一再提高托福入学成绩的最低限制。满分为677的“托福”，许多中国学生达到650分左右，这是美国学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分。

对于大多数不能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来说，更关键的是经济担保。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与老外攀上亲戚，众多的中国人把目光投向隔水相望的台湾省。民间流传着种种幸运儿的机遇与巧合的故事。在本年度的某些圈子里，出国是最常谈的话题。

“美国梦”也并非只有大学生才有资格做，为了改变生存的困境，一些无力通过留学考试的中国人开始采用非法的途径——偷渡。

90年代的一个夏季，一艘满载着300多偷渡客的“金色探险号”不慎在纽约皇后区的海滩上搁浅，当美方发现“金色探险号”时，几百人正挤在船中央混乱一团。

这艘船的偷渡之行是从台湾经由曼谷，东非，绕好望角，西非，穿越大西洋而后到达美国的。这些被称之为人蛇的偷渡者告诉警察：在很早以前，他们一伙人在闽江口附近乘小船出海，然后上了一条大船，经过长时间航行先到了非洲肯尼亚的莫巴萨港，前来接应的蛇头将他们掩藏在离港口不远的一个大仓库内，又等了一个月，他们和另一批人会合，同上了“金色探险号”驶向美国。

不必详细叙述人蛇们在8个月的远航中所遇到的种种磨难，一位知道儿子上上了“金色探险号”的母亲，在间接打听到轮船遇险并有十多人溺水身亡时，从福建特地打电话到美国打听儿子的下落，她说她儿子从家乡出发已有3年之久，这就是漫长而残酷的偷渡之旅。悲惨的故事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

“金色探险号”类型的水路偷渡是从1991年后才开始的，除此之外，偷渡客还费尽心力从空中和陆路偷渡到美国，据资料介绍：通常偷渡的人口多为福建人，尤其以长乐、亭江、连江和福清四个县份的人最多。

美利坚合众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之一，这块物产丰厚的新大陆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但是，通过成堆的书籍和无数羡慕的目光，90年代的中国人仍然无法了解这个遥远的西方国度的真实内情。

1994年，在美国生活5年之久的新闻记者陈燕妮，在她《告诉你一个真美国》的书中开篇便写道：

“我不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一介乐土，可惜的是中国人对于有关美国的事情道听途说得太多了。”

她说得对，对于90年代的中国人，道听途说关于美国的事件显然太多了，但谁也无法阻止部分中国人对于美国梦的狂热追求。

1994年大事记

上海浦东建设形成规模，成为上海又一炫目而成熟的社区，也成为中国的明珠。

好莱坞大片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电影业面临挑战。

原创音乐排行榜在各地调频电台受欢迎，本土流行音乐的崛起使港台音乐

“一统天下”局面一去不复返。

## 1995年：电脑时代

今天是星期日，何必如此辛苦。

——《星期日电脑病毒》警示语

1995年离我们如此之近，仿佛伸手可触。许多生动的故事在记忆中尚未褪色，欢笑和眼泪好像都在昨天。然而，的确已经过去两个年头了。

本年度5月，清华大学一位名叫朱令的女大学生，突然头发脱落，全身痉挛，送医院后陷入昏迷之中，医院反复检查，没有找到生病原因，无从下手。但不久，朱令的一位北大同学却带来了重要的信息：朱令极有可能是铊中毒，这对医院的确诊起到关键性作用，对症下药后，次年1月，朱令恢复了健康，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大医院都查不出病因，朱令的这位北大同学怎么会知道是铊中毒呢？信息来自称之为Internet的国际计算机互联网。当求助的信息从北大Internet网上的电脑发出后，短短的几个小时，数以百计的诊断信息从世界各地飞到了北大的电脑屏幕上，其中不乏国外的大医院和世界知名的专家教授，不少信息都认为朱令可能是铊中毒。

国内权威医院无法确诊的疾病，一台简单的486电脑便可集合起全世界的专家来共同诊断，这就是神奇的因特网，兴奋无比的电脑商们不失时机地向人们喊出：“中国已进入电脑时代。”

迄今为止，没有比电脑发展更快的行业了，80年代中期，电脑开始步入发展的轨道，大学开设了Basic语言课程。进入90年代，电脑由办公室逐步开始进入家庭，始作俑者是一批记者，作家和科技人员，平时以写稿为生的文字工作者长期饱受改抄稿之苦，电脑快捷的输入与编辑功能促使他们

最早把电脑抱进家庭，用电脑写作的作家们可以报出一串，而在目前北京的作家群中，电脑的普及率达到 80%。

作家邓贤用电脑完成了《中国知青梦》的写作，他回顾用电脑的历程说：“我是在 1990 年秋末的一天，由一个朋友推荐迷上电脑的，原先并没有买电脑的打算，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这笔钱，只是跟朋友演示看看，满足好奇心，谁知一看就不可收拾，我心里有个强烈的声音说：‘你不能没有电脑！……’”

抱回电脑后，邓贤写字速度从以前每小时 1500 字提高到现在 3000 字，他感觉到“生命内涵因此扩大若干倍”、“比别人多活了一次。”

这是 1995 年的新概念：你只需要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到电信局去注个册，你就可以骄傲地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你就已经跨入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信息空间，这就是因特网。本年度因特网的收费价格每小时 30 元，两年后，每小时收费已下降到 4 元。

这就是电脑发展的速度，从 8088 到 80286 用了 5 年时间，从 80286 到 80386 用了 3 年时间，从 386 到 486 用了不到两年，而从 486 到 586 只用了一年时间，现在每隔一个月，随着新产品的开发，电脑价格就下降数百元。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买来的电脑尚未完全掌握，就成了淘汰产品。

本年度，电脑商在中国销售出 100 万台电脑，进入家庭的电脑已达 300 多万台，国外大公司 IBM、AST、康柏、飞利浦、NEC 纷纷进驻中国。

本年度，因特网已连接全世界 4 万多个网络，380 多万台计算机，154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因特网互通电子邮件。

如 3 年前，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这样描绘信息时代的灿烂前景：“现在，梦想正变为现实。这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信息世界，打开网络令人头晕目眩的丰富信息纷至沓来。对于入网的用户，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开阔而又如此亲近。”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调查表明，拥有电脑的家庭 40% 用于文字处理，38% 用于娱乐。电脑时代从本年度开始，在中国还有相当的路途要走。

1995 年大事记

中国 and 世界各国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年周年。

农业改革的明星禹作敏以及家族成员因草菅人命、破坏法制受到政纪国法

严肃处置，大邱庄继续良性发展。

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

## 1996 年：太阳骑士

传销，是 20 世纪工薪阶层暴富的最后一次良机。

对于一个囊中羞涩的人来说，假如想实现自己的创业梦，传销就是一个不需花费很多本钱的成功阶梯……

——若干传销书上都有的句子

70 年代末的畅销书《从 1 到无穷大》有这么一个故事：古印度有一个国王很爱玩，于是一个术士发明了一种 64 个格子的棋奉献给国王，国王爱

不释手，便对术士说：“你想要本王如何赏赐你？”术士连忙拜倒：“小人没有别的要求，只请大王在棋盘的第一个格子放一粒米，在第二个格子放 2 粒米，第三个格子放 4 粒米，然后依此类推在以后的每个格子放满了，这些米就是我要求的赏赐。”国王一听，这点米算什么，就一口答应了。

那么国王该赏给术士多少米呢？

列出的算式是：

$$1 + 2^2 + 2^3 + 2^4 + \dots + 2^{63} = 2^{64} - 1 = 1844674073709551615$$

这么多米，可覆盖全球，国王倾全国之力也无法兑现他的诺言。

早几年这个神话在中国又一次上演了。

这一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有一名妇人正在她冰凉的陋居里做着发财美梦，一位现代术士手握计算器，高叫“芝麻开门”闯进她的梦境，这位术士给她带来了她做梦都不敢想的财富：半年后，妇人的财产将达到 1 亿 2 千万。这位术士告诉她：“只要你花 2000 元买下本公司的产品并劝说 10 个人来购买就行了。其余的就是等着收钱吧。”尽管这名妇人对数字计算一向头疼，但面对这一笔巨款却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在这个明媚的日子里，她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滚滚的传销大军中去了。

妇人的故事只是千千万万现代寓言的一个版本而已。

最初进入中国大陆的传销企业，是美国雅芳公司，雅芳登陆广州的时候，除了给人一种新鲜感外，似乎并没有多少入预感到它会给中国人带来一股旋风。但不久以后，这位“天上掉下的林妹妹”竟在我国各大城市风靡起来。随着安利、仙妮蕾德这些公司的登陆，“高级”传销，唤醒了国人暴富的梦，刹那间传销热遍祖国大江南北，真真假假，泥石俱下。

在大街上，在汽车里，在办公室，在家里，在一切有人活动的场所，传销像幽灵一样徘徊着，这构成了 90 年代的又一大风景线。

尽管更多的人与传销热无关，但成都市一个居民楼的两户居民肯定受到伤害：一天上午，两名自称传销商的中年男子分别敲开这两户居民的大门，推销一桶装新型“洗涤剂”。见房主疑惑的神态，那两人分别打开塑料桶凑近房主鼻子前，让其闻一闻，就这一瞬间，一股异香直冲脑门，两房主分别被麻倒在地……

这则报载的真实故事，昭示着传销对其追随者更像一剂异香扑鼻的蒙汗药。

请看这个场面：

在一个可容纳几百人的传销现场。人群拥挤，空气混浊，一个年轻的女士在讲台上声嘶力竭，泪流满面，在揭露了自己以往丑恶的行径后，挥着拳头，一遍又一遍地高叫：“我要发财，我要发财！”台下几百人同样泪流满面随声应和：“我要发财！”声达云霄，然后手挽手唱起了大会规定的三首流行歌曲。

这种类似宗教的狂热，让你不得不相信，传销有时确实是怪物。

与传销热相反的是，有关部门和新闻界大力反对不正当的传销，这同样构成 90 年代的又一条风景线。

早在 1994 年 5 月，《人民日报》揭露传销公司的骗人坑人事件，忠告消费者“切勿上非法传销的当”。1994 年 6 月，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专题报道《是是非非话传销》，给传销泼了一瓢不大不小的冷水。尽管如此，传销就像古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传销公司与政

府捉迷藏的游戏还将进行下去，东方不亮西方亮，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奇观。

本年度末尾的日子里，全国各大城市的传销分公司开始向中小城市进行战略大转移。

“仙妮蕾德”英文原意是“太阳骑士”，但愿这些太阳的使者能给芸芸众生的阴暗生活带去一线金色的光芒，去温暖那些久已冰冷了的发财梦。

在世纪末式的焦灼当中，中国人迎来了 1997 年的时光。他们有很多事要干，他们对幸福的理解也难免掺杂了一些虚幻和急功近利的成份。不能够否认，世纪末的中国人确实感到充满着许多机会，也许这一切机会在世纪末将被赐予答案，但显而易见，半世纪以来成功与挫折交织的人民生活史，在本世纪末终于有了一个不坏的结局。这是堪称庆幸的事实。

1996 年大事记

神州再爆股市热。

香港回归倒计时开始。

